保卫唯物辩证法

徐 崇 温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保卫唯物辩证法

徐崇温著

人民出版社

保卫唯物辩证法

徐崇温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印张 410,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 2001·189 定价 1.70 元

序　　言

好几年以前，我在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提出严重挑战的书籍和文章时，就有一个想法：在我们揭露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质的时候，难道不是也应该对他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提出的严重挑战，作出回答、进行回击吗？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不仅必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哲学，而且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对他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作出针锋相对的回答。这不仅对于批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攻击，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来说是必需的，而且对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来说也是必需的。因为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①。

之所以选择唯物辩证法作课题，也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决定的。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提出挑战时，把相当大的力量放在歪曲、攻击和伪造唯物辩证法上面。在一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流派全面攻击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有相当多的资产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46 页。

E/57/10

阶级、修正主义流派打着“辩证法”、乃至“马克思辩证法”的旗号，歪曲和伪造马克思辩证法，并用它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而复活唯心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用形而上学去顶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国家的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报章杂志上，例如，四十和五十年代在波兰的《哲学思想》杂志上，五十年代初在东德的《德国哲学杂志》上，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共产党人》、《哲学问题》和《哲学科学》等杂志上，六十年代在法国的《思想》、《现代》杂志，西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瑞士的《哲学研究》杂志，以及意大利的《再生》杂志上，七十年代在英国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激进哲学》、《新左派评论》和美国的《科学与社会》等杂志上，都曾就唯物辩证法的这个或那个问题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展开讨论或争论，就是这种形势的一个反映。

当然，由于我的视野所限，加之在写这本书时，只能选择那些在我看来是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人物所提出的带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论据，并就此作出回答，因此，疏漏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在回答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批驳他们的攻击、歪曲和伪造时，我自己的观点有错误的话，我既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也希望看到被批评者的答辩和反驳。

我坚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虽然改变一个人的哲学世界观，使具有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人统一认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的批评和反批评，却至少能够澄清各方的观点，弄清楚争执的焦点所在，使大家看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它们的产生根源到底是什么，它们的论据又是什么，它们同客观事实符合的程度如何，它们在实践中又将导致什么，从而为明辨是非提供依据。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1）

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辩证法观 ……………………（12）

（一）新康德主义 ………………………………………（12）

（二）新黑格尔主义 ……………………………………（15）

（三）新托马斯主义 ……………………………………（21）

（四）新实证主义 ………………………………………（24）

（五）实用主义 …………………………………………（26）

（六）存在主义 …………………………………………（29）

三、修正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呼应、配合与合流 ……（33）

四、老修正主义者的辩证法观 …………………………（42）

（一）伯恩施坦 …………………………………………（42）

（二）考茨基 ……………………………………………（44）

（三）波格丹诺夫—布哈林……………………………（45）

（四）德波林 ……………………………………………（48）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观 …………………（48）

（一）卢卡奇 ……………………………………………（50）

（二）柯尔施 ……………………………………………（53）

（三）布洛赫 ……………………………………………（55）

（四）葛兰西 ……………………………………………（56）

（五）列斐伏尔 …………………………………………（58）

（六）法兰克福学派 ……………………………………（60）

（七）德拉－沃尔佩学派 ……………………………………………（65）

（八）亚尔都塞学派 ………………………………………………（67）

六、苏联哲学家的辩证法观 ………………………………………（71）

第二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74）

一、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截然相反………（74）

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驳混同论之一）………………（83）

三、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

（驳混同论之二）………………………………………………（92）

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驳混同论之三）………（98）

五、两种不同的异化理论（驳混同论之四）………………………（106）

六、关于三段式问题（驳混同论之五）……………………………（111）

七、关于黑格尔的泛神论和理性主义（驳混同论之六）…………（116）

八、马克思不是改铸而是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

（驳混同论之七）………………………………………………（122）

九、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不容抹煞 ………（126）

十、黑格尔体系同其方法的可以分割性（驳绝对割裂论）………（138）

十一、马克思纠正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盘否定 ……（144）

十二、马克思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历史意义 ………（149）

第三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性质 …………………………………（162）

一、驳"马克思辩证法是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论 …………………（163）

二、马克思始终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176）

三、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 ……………………（189）

四、恩格斯概括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195）

五、恩格斯使用的是辩证方法 ……………………………………（204）

六、对恩格斯的诬蔑必须推倒 ……………………………………（208）

七、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原则区别 ………（215）

八、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无法抹煞 …………………………（220）

九、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227）

十、要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 ………………………………… (247)

第四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 (258)

一、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不容混淆 ………………………… (260)

二、形式逻辑勾销不掉辩证矛盾 …………………………… (269)

三、目无矛盾根源于坚持形而上学世界观 ………………… (276)

四、离开了同一去把握对立：把对立看成绝对不相容的和凝固不变的 ………………………………………………… (283)

五、何物"真正的对立"？……………………………………… (287)

（一）康德的观点和科来蒂的阐释 ……………………… (289)

（二）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纯属子虚乌有 ………… (291)

（三）不许造马克思的谣 ………………………………… (298)

六、离开了对立去把握同一：否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和客观实在性 …………………………………………………… (309)

七、运动的矛盾性质无法抹煞 ……………………………… (318)

八、在事物发展动力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 (338)

九、矛盾调和论和矛盾不可解决论是假辩证法 …………… (354)

十、剖析"矛盾的多元的决定" ……………………………… (369)

（一）从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倒退 ……………………… (372)

（二）羞答答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 (378)

（三）徒有虚名"归根到底"决定 ………………………… (381)

（四）离奇的神话 ………………………………………… (384)

（五）要害在于用结构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 (386)

第五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 ………… (391)

一、驳阶级对抗永恒论 ……………………………………… (392)

二、驳对立统一规律过时论 ………………………………… (406)

三、驳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负荷由斗争转到统一论 ……… (416)

四、驳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平衡和谐论 ………………… (420)

五、驳社会统一绝对论 ……………………………………… (423)

六、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基本矛盾论 …………………………… (431)
七、驳差别不是矛盾论 ………………………………………… (438)
八、驳矛盾未必对立论 ………………………………………… (448)
九、驳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 …………………………………… (456)
(一) 矛盾的错综复杂，并不使对立双方朝同一方向行动 ……… (458)
(二) 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能继续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原则 ……… (466)
(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双方先进、发展趋势吻合 ………… (470)
(四) 生产和消费的倾向并不一致 ……………………………… (474)
(五) 民主和集中的倾向也不一致 ……………………………… (477)
十、驳矛盾融合论 ……………………………………………… (481)
(一) 是对立面的统一，还是两个极端的调和、混合？ ………… (483)
(二) 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还是朝同一方向行动的共同倾向？ ……………………………………………… (487)
(三) 是斗争贯串始终，还是排斥斗争？ ……………………… (492)
(四) 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还是矛盾双方融合起来？……… (495)
(五) 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还是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 ……………………………………………… (499)
十一、驳发展源泉是统一而不是矛盾论 ……………………… (503)
人名对照表 ……………………………………………………… (515)
引用和参考书目 ………………………………………………… (523)

第 一 章
导 论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

这种围绕着思维同存在哪个是世界本原问题而展开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又是同围绕着宇宙发展法则问题而展开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列宁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②。

象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样，辩证法的宇宙发展观，早在古代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它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就是说，虽然它正确地把握了现象总画面的一般性质，但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页。

画面的各个细节。因而，这种自发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相斗争的结果是：在一段时期里，唯心主义占了优势，辩证法则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在从中古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纪末的长时期内，形而上学同唯心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人们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在欧洲，甚至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但是，辩证法在他那里却是唯心主义的。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在哲学中引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

毛泽东同志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把这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包括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变化、不发展的物质。与它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物质。这就既反对了形形色色的（就是说，不论其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又反对了各式各样的（就是说，既包括唯心主义的，又包括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用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辩证法去推进哲学唯物主义的，是完备而严整的世界观。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

---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46 页。

给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道路；它揭露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和剥削形式，证明了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而，这种世界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然要遭到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敌人的歪曲和攻击。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家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科学会抱别的态度，因为在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家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①。

资产阶级歪曲和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依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为转移的，在一个时候指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个时候则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唯物辩证法却始终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宣传、保卫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同歪曲、攻击和伪造唯物辩证法的斗争，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强调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

①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唯物辩证法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证明它的暂时性和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找到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的正确道路，因此，这种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在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的同时，又必然引起旨在保存或恢复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恼怒和恐怖。

事实上，早在 1848 年革命以后，当着欧洲的资产阶级转向反动的时候，它的思想家在抛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就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时代起，几乎所有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都蔑视和攻击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称作神秘论、诡辩论、正确思维道路上的陷阱。例如：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理论思想的反动。他深深感觉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锋芒，因而就把它说成是“纯粹胡闹”来同它进行斗争，并用形而上学的、神秘的反理性主义来代替辩证的认识过程；

取代叔本华而时髦一时的哈特曼，罗列了一系列引导人们见到“矛盾”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矛盾”的典型谬论，去驳斥黑格尔辩证法；

接着是特伦德伦堡否定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原理，把黑格尔辩证法看作类似于只是用于辩论的中世纪“辩证法”；

尼采攻击辩证法排斥贵人而使贱民得势，他惊呼“掌握辩证法的人，手中就掌握了不知怜悯的武器。……辩证论者使自己的敌

---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4 页。

人疯狂，同时也使敌人变得束手无策”；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攻击辩证法是“提法错误的难题”，是“完全不中用的东西”，魏亨格尔则从形式逻辑的意义上去曲解黑格尔辩证法；

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等人，也把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当作“精神骗术”而摒之门外；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也猛烈反对黑格尔辩证法，并用所谓由于个人的“决定”、“选择”而从“存在”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更高阶段的，名为“质的辩证法”、实则形而上学的货色，去同黑格尔辩证法相抗衡。

在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猛烈攻击黑格尔辩证法，是因为尽管黑格尔的保守体系把辩证法神秘化了，黑格尔却终究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从黑格尔的方法中，必然要得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结论，必然要得出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结论。显然，这一切都是同资产阶级永远保存资本统治的痴心梦想格格不入的。

但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在资产阶级那里所引起的恼怒和恐怖，其范围之广、其程度之深，却更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所无法比拟的。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使辩证法摆脱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而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以后，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本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根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乃至在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中，唯物辩证法都是无往而不在的。

就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来说，是借助于唯物辩证法而向前推进的。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①；

就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和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因为"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②；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典范。在这里，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交换关系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所以，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③。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唯物辩证法，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④。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

---

① 《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第411页。

③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哲学笔记》，第357页。

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

正因为这样，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②，称作"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③。

所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攻击和伪造，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否定唯物辩证法本身，而是妄图以此为突破口，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列宁曾经说过："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④。如果说，列宁的这个论述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基本前提和一切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尤其适用于唯物辩证法这个基本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不遗余力地歪曲、攻击和伪造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歪曲、攻击和伪造还愈来愈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辩证法观的核心。

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辩证法，往往连看都不愿看、听都不愿听，就宣布它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怪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既不熟悉、又不研究他们的批评对象，在"批评"中也提不出异议、拿不出反驳理由、指不出不对之处，却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58 页。

②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22 页。

③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31 页。

④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44 页。

味用讲空话来抹煞问题的实质，借庸俗的类比、乱扣帽子来回避对问题的分析；总之，在他们看来，为了消灭马克思主义、消灭唯物辩证法，对科学践踏得越无耻越荣誉，只要能踢马克思主义一脚，"其它什么都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条重要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①。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涉及到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态度的方面，问题的本质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涉及到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斗争策略方面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在徒劳地攻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基础一段时期之后，有些人感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分割开来，对其不同的组成部分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曾经说过："我们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不同于我们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我们必须以明确的否定态度拒绝唯物主义原理时，我们对辩证法完全可以取得肯定的关系"（《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年柏林版）。卡里什的这段话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甚至也不仅仅是新托马斯主义哲学流派的态度，而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若干流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时所采取的斗争策略。

正是在这种策略思想的指导之下，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现象：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全盘否定唯物辩证法，另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则否定唯物主义

---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3 页。

而歪曲和伪造辩证法，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拿了伪造的假辩证法去反对唯物主义而鼓吹唯心主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打着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伪造假马克思主义，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另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甚至伪造假“马克思辩证法”去反对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则打着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还原主义唯物主义”的旗号，用他们伪造的假辩证法、假“马克思辩证法”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资产阶级伪造假辩证法乃至伪造假“马克思辩证法”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越来越阴险、越来越狡猾，另方面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弱，致使现代资产阶级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已经不能仅仅借助于攻击和谩骂，而必须同时也乞灵于掺假和伪造了。

早在资产阶级的这种伪造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刚刚露头的时候，列宁就作过揭露和批判。

当着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布兰克引证马克思的词句来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时，列宁就尖锐地指出：“正象布伦坦诺、桑巴特、伯恩施坦之流一样，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正在关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进行着伪造马克思的‘细致工作’”①。

①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31页。

这就是说，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早就是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策略了。

在批驳民粹主义者歪曲利用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其反动论点的“根据”时，列宁又锐利地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欧先进社会学说中实际的统治力量，“以致在俄国，连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不能在很长时期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进行诡辩，伪造（往往是无意识地）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好象是自己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并且力图‘依照马克思’来推翻马克思理论在俄国的应用！尼古拉—逊先生的民粹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自居（1880—1890年），后来，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之流的自由资产阶级理论，也是从‘几乎’完全承认马克思开始的。他们在‘进一步批判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外壳掩饰了来发展自己的观点，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①。

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去掩饰自己的观点，装作自己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而且还“力图依照马克思”去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应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使用这样的斗争策略，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揭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手法的极端重要性吗?!

而在指出资产阶级伪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时，列宁又强调说：“二十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贯彻自己观点和希望的这种‘手法’。最近的事变特别鲜明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

① 《关于纪念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93页。

他们妄想'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手段，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来扼杀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列宁还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要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要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①。

"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好象是自己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并且力图'依照马克思'来推翻马克思主义……"，"在'进一步批判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外壳掩饰下来发展自己的观点"，"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希望"，"'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手段来扼杀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揭露俄国资产阶级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时所作的这些鞭辟及里的分析，直到现在还象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资产阶级伪造假辩证法乃至伪造假"马克思辩证法"的原形，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流派，特别是其中的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流派，先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后，接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五十、六十年代，当着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的时候，正是用与此相类似乃至相同的一些手段炮制假辩证法、假"马克思辩证法"，来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抗衡的。

---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199页。

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辩证法观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分为五花八门的流派，尽管它们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彼此区别乃至相互争论，但又被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共同的根本任务所统一起来，虽然它们歪曲、攻击和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又是各不相同的。

（一）新康德主义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无条件地战胜了一切敌对的思想体系而占有统治地位，但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①。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康德主义流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适应于这样的需要，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出来，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广泛传播的。

新康德主义打着康德的旗号，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哲学中不可知论、形而上学和神秘的道德原则等唯心主义因素，而否定康德哲学中关于"自在之物"是客观存在的等唯物主义因素。新康德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企图把工人运动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引向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为此，它在打着"伦理社会主义"的招牌，用康德的伦理学去顶替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又在攻击黑格尔辩证法的幌子下，否定一切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1865年，新康德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李普曼提出了"回到康

---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页。

德去”的反动口号。同年，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个最早的代表弗·爱·朗格，在《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一书中，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为此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再驳斥。

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在看了朗格的书以后，针对该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无理攻击，立即写信给朗格批驳说：“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现的）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①。

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严厉地批驳朗格说：“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泽斯·门德尔森。这个不学无术的典型人物曾经写信问莱辛：他怎么想到要严肃地对待‘死狗斯宾诺莎’呢？朗格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就一致认为，他们早已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②。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在1873年1月24日所写《〈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特地宣布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为争夺原料和销售市场，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激

①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71—472页。

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2页。

③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对内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推行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的需要，都要求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遮羞布，而加强其反动的国家机器的作用。于是，资产阶级在把黑格尔当作“死狗”那样对待了半个世纪以后，又重新求助于黑格尔哲学，企图利用黑格尔关于国家、法和战争的理论，把黑格尔的体系改造得适合于资产阶级当时的需要，这样，就出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的“黑格尔复兴运动”。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康德主义流派还念念不忘要在攻击黑格尔辩证法的幌子下，否定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1910 年，新康德主义巴登（夫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文德尔班，在海德堡科学院发表的题为《黑格尔主义的复兴》的演讲中说，对于黑格尔的兴趣之所以不断增长，是由于人们力图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躲避唯物主义的避难所，因此，“回转到黑格尔将意味着现代思想体系的健康化”，如果新的思潮“摆脱掉旧派黑格尔主义的奇怪的曲解和疏忽的话，如果它能够抛弃外壳而保存内核的话”。文德尔班要求保存的“内核”是指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他号召“抛弃”的“外壳”则是指的辩证法。

直到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意识到新康德主义的缺陷，而纷纷用黑格尔去补充康德的时候，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分子李毕特还在坚持其反辩证法的立场，他叫嚷说，“我们认为，强调辩证法概念中的悲剧意义，就可以保卫住康德世界观的复辟，并予以新的论证”（《辩证法的精神和世界》1929）。他所谓“辩证法概念中的悲剧意义”，就是把辩证法说成是一种承认矛盾在原则上的不可解决性为根据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在具体的辩证的矛盾的地方，偷偷塞进康德的二律背反。

（二）新黑格尔主义

在“黑格尔复兴运动”中，提出“从康德过渡到黑格尔”的口号而在资产阶级思想市场上广泛流行起来的，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新黑格尔主义流派。

新黑格尔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国家学说等保守、反动的方面，而竭力抹煞黑格尔学说中的进步、革命的方面，歪曲、篡改和伪造辩证法，并公开用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和新康德主义公开否定辩证法的作法不同，新黑格尔主义者哓哓不休地侈谈“辩证法”。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是，把辩证法局限于纯思辨领域。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麦克塔加特在《黑格尔辩证法研究》(1896)和《黑格尔宇宙论研究》(1901)等著作中，攻击黑格尔夸大了辩证法的适用性；另一个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则认为具有内在矛盾的人类思想，在现象的领域中运动而不涉及存在的真正本质，为此，他把矛盾从“实在”中排除出去，使之限于现象：“我们周围的一切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现象，现象在其本身是矛盾的，因此不可能是实在的事物”，“最高的实在是不和自身相矛盾的”(《现象与实在》1893)。又一个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认为，只属于有限之物的“低级”领域的“矛盾”，是一个逐渐消逝的因素，因而，当有限性这种特性缩小到最低限度时，它便在最高的经验类型中逐渐缩小(《科学和哲学以及其它论文》1927)。

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攻击黑格尔力图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他认为，“事实之间的关系不能象对立的概念那样，因为它们并不象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那样，是互相对立的”，

“对立是……实在的东西中的非实在的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形式阶段”(《逻辑是关于纯粹概念的科学》1909)，并认为“纯粹概念”的思辨范围是辩证法的唯一适用范围。另一个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金蒂雷认为，客体、自然界和物质，作为“被思考过的思想”来说，是对进行着思考的思想的否定，它们是死板的没有创造性的因素，对于这种因素，不能应用辩证法，而只能应用形式逻辑，只有“进行着思考的思想”，才是辩证法的应用领域。

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朗纳认为，“经验世界”的矛盾是虚幻的，它始终不过是我们判断的错误的结果，只有思辨的矛盾才是真实的，这种矛盾不是由谬误产生的，而是思辨认识的必要因素。因此，他把自己的观念称为“思辨的辩证法”而否认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法(《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黑格尔主义者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把辩证法局限于纯思辨领域的观点，并直接用它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柯热夫在《黑格尔研究入门》(1947)中说：“辩证法是思维和人的推理的运动，至于在人们思考和谈论的现实本身中，却没有任何辩证法可言”，因此，“只有人参加在自然界中时才有辩证法”，“除了联系到人及其活动以外，是不可能有辩证法的”，他说什么马克思就是跟随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后这么看的，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反对和改变了它。从这同一个立场出发，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955)中，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用语，在我们看来好象本身就是十分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矛盾的”。

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1955)中说：“辩证法只有当它涉及到能自由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思维的人类

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物质不能是辩证法，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一种木质的铁”。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在《黑格尔逻辑研究》（1959）中说，“辩证法的关键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各个阶段的过渡以及构成人的自我意识的活动的二重性”，“辩证法就是这些〔精神活动的先验要素和经验要素〕的相互作用”；“马克思认为他的辩证法的主要源泉是事物中的一种真实的矛盾，但是除了在自我发展的精神各阶段之间，矛盾只不过是僵死的东西”，“马克思的辩证法运动完全是经验的，表现为纯粹是一种来自物质基础并缺乏任何在前面的吸引的因素的努力，但这样错误地设想的发展根本就不成其为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纯然的不可预言的突然冒出的奇迹的继续”。英国的另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诺克斯说：“正因为辩证法是思想的一个过程，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相矛盾”（《为黑格尔答辩》，载斯坦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971）。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是把辩证法同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

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朗纳在《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4）中说：“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卓越的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是辩证法家”，而“辩证法就是变成了一种方法的、成为合理东西的非理性主义”，“辩证的思维就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为什么说辩证法是“非理性主义”的呢？克朗纳说：“作为辩证的、思辨的思维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即超悟性的，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它是有思想力的生活本身”，因为它是非理性的生活思维着它本身时的那种思维，所以按其内容来说是非理性的。为什么说生活是非理性的？克朗纳说，因为它是矛盾的，而具有矛盾的存在就证明着非理性，“矛盾破坏着规定的合理性，因此也就证明‘思辨的’（即辩证的）规定。在这规定中，理性自身被合理形式所破坏，因此矛盾就用合理

的方式表现着超理性的、辩证的东西”。那为什么又说辩证法是理性的呢？克朗纳说，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来说，就具有概念的形式，表现在概念中，运用概念、范畴给直觉以形式逻辑的性质，因而按其形式来说，是理性的。

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在《逻辑和存在》(1953)中也说：“黑格尔主义的决定因素”，就是“力图理解思想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使得黑格尔同时变成了过去曾经有过的极伟大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极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第三个特征，是鼓吹差别论、调和论，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认为黑格尔夸大了对立的概念，把对立同差别混在一起。他认为，辩证法无非是差别的原则，“矛盾性只有在差别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在精神的统一中，基本的东西是差别，……相反地，黑格尔则紧紧抓住了纯粹的矛盾性，把它当作基础，把它变成现实的创造者；因此他不了解精神及其形式的复杂辩证法”(《逻辑是关于纯粹概念的科学》1909)。为此，他用概念的一致和差别原则去顶替对立统一规律。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就其形式的、主要是最突出的外貌而言，乃是对立面的综合”(《黑格尔导论》1959)。

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一切哲学都想出对立面的和谐、统一、调和”，“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上的对立改造成粗暴、残忍的权力集团的冲突。他们的‘辩证法’只是力量反对力量的一种冲突，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的冲突是一个绝对不明智的过程”(《辩证法》1953)。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是使矛盾成为永恒的二律背反，鼓吹矛盾不可解决论。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在把矛盾说成只属于有限之物的“低级”领域的同时，又说在这个领域中，矛盾是永恒的不可解决的对抗，说什么“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罪恶和苦难应当始终不变地存在于世界之中”；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把历史说成是善与恶这两个对立的抽象本原的斗争，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善与恶不断斗争的永恒表现，企图以此证明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和战争是永恒的、不可消灭的，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认为，人类辩证发展的基础是对抗性冲突、为死亡而斗争、战争，而这一切又都是“和存在不可分开的紧张化”的表现，是不可消灭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它，那便是鼓吹“历史的终结”。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第五个特征，是把辩证法凌驾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上，使“辩证法”神秘化，并把它同宗教世界观联接起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在《辩证法》(1953) 一书中，缪勒一方面说“作为辩证法的运动，它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超越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发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是相互补充的对立面”；“它是唯心主义的，只要实在被把握在视觉中，作为哲学化的人的观念而变得明显起来”，“辩证法〔又〕是实在论的，实在本身在人身上创造了一个器官，它通过这个器官的视力而获得一个出港许可”；另方面，缪勒又说宗教具有辩证性质，表现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观念之中。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第六个特征是：竭力抹煞和攻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和改造。

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曾经攻击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改糟了，只保存了它的“形而上学残余”；英国的新黑格尔主

义者缪尔说,"黑格尔相信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绝对精神在人的经验中的自我表现","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就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种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三段式的公式"(《黑格尔逻辑研究》1959);英国的另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诺克斯说,"由于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头立地',并含有把它倒过来的意思,马克思这就使黑格尔主义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除了提供他自己的意义之外"(《为黑格尔答辩》1971)。

另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则根本否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作了唯物主义的颠倒和改造。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955)中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动力,都是"说自我意识不可异化,而又说这种意识的异化""这一矛盾"。为了达到否定马克思颠倒和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这同一个目的,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芬达莱甚至公然把黑格尔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1959年的题为《黑格尔的现实》的报告(载法国《哲学文库》1961年第3、4期合刊)中,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有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实在论和唯物论的基础","不可能由卡尔·马克思把他倒转来用脚立地","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是客观主义的,又是主观主义的,并且他的被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所假定的改造,只是在其内容的无限丰富中的一种——往往是可笑的和肤浅的——选择";而在1971年的《黑格尔对目的论的应用》(载斯坦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971)一文中,芬达莱干脆把"黑格尔的体系"说成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可被说成是它的一个拙劣的、业余的笨拙表演"。

新黑格尔主义者侈谈辩证法的这些基本特征,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其它流派,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伪造假辩证法来同唯物辩

证法相抗衡的流派，或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相互连接。例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新托马斯主义流派所炮制的宗教辩证法，就是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把辩证法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使辩证法神秘化的观点相连接的。

（三）新托马斯主义

新托马斯主义是最有代表性的现代宗教哲学。自从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在其通谕中宣布十三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体系是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以后，它就成了天主教的官方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在使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体系适应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学说的同时，积极炮制神学“辩证法”来攻击马克思主义。

新托马斯主义者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拥护辩证法，但却又坚决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说：“我决不是辩证法的敌人，……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辩证法恰好把一切都弄糟了”，而“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天上拉到地下来了，其结果它是变得更加有害”，他恶毒攻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什么“超等的迷惑工具”，是什么“辩证的诡计”（《经院哲学与政治》1945）。

瑞士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鲍亨斯基说：“辩证法是基于一种本身正确的对存在与变化的复杂多样方面的看法”，但又说辩证法“破坏”了“黑格尔主义的……富有价值的因素”，并“给恩格斯的哲学……也给列宁主义加上了很重的负担”（《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1956）。

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也说：“我们对辩证法却完全可以取得肯定的关系。但要是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或黑格

尔意义上的辩证方法，并以存在一元论为内容，那我们就必须断然地否定辩证法”，“辩证法并不必须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正如它也不必须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样”，那么，新托马斯主义者所赞成的辩证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卡里什说：“照基督教徒看来，实在论的辩证法承认绝对的、有人格的上帝是世界上一切创造下来的存在和一切变化的最高原则”，这就是说，“它懂得，世界上不仅有变化，而且不变的上帝也赋予世界以不变的特征。作为实在论的辩证法的基督教徒在衡量和评价一切存在和变化的时候，是考虑到了上帝这个绝对真理的”(《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问题很清楚，在新托马斯主义者所“肯定”的“辩证法”中，唯一的实在是自身“不变”而且“赋予世界以不变的特征”的上帝！这同辩证法到底有什么干系呢？但是，他们却硬要把它叫作“实在论的辩证法”，不，这是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假辩证法，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在新托马斯主义者炮制的神学假辩证法中，“矛盾完全是观念上的东西”，“矛盾只有在纯粹否定的地方，即思想中才能存在”(安·马尔克：《肯定的辩证法》1952)；“辩证法是主体——客体的关系”(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这就是说，没有主体，就谈不上什么客体。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归于物质，就是赋予物质以一种精神的属性—神圣的属性，物质成为新的绝对、神”(威特尔：《辩证唯物主义》1958)，就是“把辩证法放在物质里”，“回到一种物活论”，“把类似灵魂和自由的东西赋予物质”(马里旦：《完整的人道主义》1936)。不仅如此，新托马斯主义者还把他们炮制的这种神学假辩证法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马克思以为在自然中离开了人，那就不可能设想自然”，“自然辩证科学就在人和自然接触时所发生的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起着作用，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接触就不存在任何独立

的现实”，“如果说，现实的根据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最初的关系，这等于说，不以任何人的存在为转移的一种辩证法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据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被说成是“对马克思著作的一个认真的革新”（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

在新托马斯主义炮制的神学假辩证法中，矛盾调和论占有突出的地位。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安·马尔克说，有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或者“为了对立面的一方而消除另一方，或者把双方都维持下来加以调和。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后一种态度才是完全可能的”，“真理不在于一味肯定对立面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而在于双方之调和”（《肯定的辩证法》1952）；过了几年以后，他又从划分矛盾的等级上去论证矛盾调和论，把矛盾分为“矛盾、对峙、关系、缺乏”几个等级，说什么人们的“任务在于使矛盾从对峙发展为纯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斗争为和睦所代替”。马尔克号召不要把矛盾弄得尖锐化，而要让上帝去处理：“上帝进入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在人类中建立上帝的关系辩证法，以代替对峙的辩证法”，据说这种“辩证法”意味着各方面的完全综合，即各方面的绝对和谐（《方法和辩证法》1956）。

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比他的法国同伴走得更远，他不仅用矛盾调和论去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异想天开地说什么“在现实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对抗性矛盾，没有完全对立的事态”，因此，“以可忍受的和不可忍受的生存条件来代替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想象的”，而“按照基督教徒的看法，社会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可忍受的、必须用革命斗争来加以解决的（包含毁灭性）生存条件。已发生的紧张关系总是可以在现存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在保留它的体

现者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政治和社会的对立应当经常借助于爱、正义，借助于仇恨的排除，通过意识的进化和变化来调和”(《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这哪里是在谈论什么辩证法？不，这是让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俯首甘受剥削和压迫的一篇地地道道的神学说教！

（四）新实证主义

和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炮制假辩证法有所不同，新实证主义全盘拒绝辩证法。

实证主义是一个自称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实际上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新实证主义是继孔德和斯宾塞的十九世纪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之后，实证主义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同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攻击辩证法是形而上学，马赫主义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相一致，新实证主义也致力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新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罗素，毫无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都说成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借来的”，而根据他的“逻辑”，马克思哲学中“凡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思想因素都是不科学的”，因此，他打着“最好是把黑格尔主义的礼服脱掉”的旗号，叫嚷着要马克思主义“完全抛弃辩证法”(《西方的智慧》1945)。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奥地利形成的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时所用的策略，同罗素完全一致。如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卡尔纳普在其《自传》中，也是先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同起来，然后攻击辩证逻辑同现代逻辑科学不相容：“我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下于我们拒绝自称为能起逻辑作用的黑格尔辩证法”，因为“辩

证逻辑和近代符号逻辑不相容，而符号逻辑是我们认为直到今日最发达的逻辑科学”(卡尔纳普:《理智的自传》,载谢尔普编:《卡尔纳普的哲学》1963)。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个成员弗兰克循着同一条路线说，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教义颠倒过来”，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未脱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常常迷失方向，脱离开精密研究法来确定物质属性的道路”，他叫嚷说，马克思主义要把反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这种两条战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它就必须脱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即抛开把辩证法三规律的意义过分地夸大的主张”(《现代科学及其哲学》1950)。

在观点上附和维也纳学派的英国新实证主义者艾耶尔，集中攻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说:“断言自然界受辩证规律支配的理论……在没有对有关的具体现象确切说明以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从逻辑意义来看‘矛盾’这个术语，那么自然界不可能有矛盾”，而“如果象通常那样，把这个术语任意地加以理解，以致把相互作用的每一种形式都看作是一种冲突，而且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后果看作是它们的合题，那我们又会陷于绝境”(《哲学与科学》，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1962 年第 1 期)。

柏林“经验哲学会”的新实证主义者莱辛巴赫，用相反的手法来达到同一目的，他说:“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方面，他是黑格尔的最大反对者”，而马克思之所以不把自己同黑格尔明确分开，是因为“他需要有同唯心主义哲学的种种联系作为这一学说的支持”，莱辛巴赫竭力把唯物辩证法和新实证主义的尝试——错误法混同起来，用后者去顶替前者:“经验方法的一般步骤，即尝试——错误法和成功——成功，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试验——也可以看作是辩证规律的无穷的反复”，“但它〔指辩证规律〕既不够精确，也不够概括得足以供历史预见之用，并且不能把它用作论证某一科学理论

是真理的论证"(《科学的哲学之兴起》1957)。

在新实证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批判理性主义者坡培尔那里,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更其达到疯狂的地步。他信口开河地攻击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论断是"惊人的但它们却是毫无根据的",是"以一种不严密的、糊涂的说法为根据而已"。他还进而攻击"辩证法是不科学的:它是形而上学的",是"不能接受为科学的预测的可靠基础","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根本不用它,因为我们总是可以应用尝试和错误的方法这个比较清楚的术语"。他特别猛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当辩证法在抛弃原有的唯心主义基础的时候,它就失去了一切使它成为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据我看,唯独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甚至比辩证唯心主义更坏","这些话特别适用于马克思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推测与反驳》1963)。

英国的列夫也攻击"辩证法却是繁琐哲学的最后堡垒","辩证变化这整个概念,绝不是自然界的产儿,乃是头脑中逻辑的产物",他诬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把逻辑范畴当成了现实世界的范畴",认为"要想信赖辩证法而又同时不歪曲自然或历史,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的暴政》1961)。

(五)实用主义

同新实证主义的辩证法观相接近的,是实用主义的辩证法观。

实用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相信有用就是真理的信条,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这个流派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同时,还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辩证法。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詹姆士把辩证法说成是用理性的东西去表现非理性东西的一种尝试,是"诡计多端的"(《彻底经验主义

论文集》1922)。

实用主义流派的另一个首领杜威则千方百计地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说成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相同的东西。

杜威信口开河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成是从黑格尔那里演绎出来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个'规律'并非、也未曾打算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推演出来。这是从黑格尔的辩证的形而上学中推演出来的。其推演的方法，据马克思说，就是把黑格尔倒立过来"(《自由与文化》1939)。

杜威还把科学共产主义瞎说成是轻信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他说："只有异乎寻常地轻信黑格尔的对立的辩证法，才能想到由一个阶级使用强力就会突然转变成为一个民主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因为"强力引起相反的强力"(《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载拉脱纳编:《当代世界的智慧　杜威的哲学》，1939)。

而当杜威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唯物、唯心的根本区别时，杜威又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保留了什么矛盾调和论:"马克思把辩证唯心主义转变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在那里，作为达成最后统一和和谐之手段的矛盾的辩证法被保留下来了，而其中的推动力量却是经济阶级，而不是观念"(《自由与文化》1939)。

杜威的学生、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代表胡克，在早年曾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队伍，致力于炮制实用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因而在他那里，对唯物辩证法就采取了在三十年代歪曲和伪造，在四十年代攻击，在五十年代以后谩骂的态度。

胡克在三十年代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伪造，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限于意识和社会生活的领域之中，而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

胡克宣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地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

会"，"在马克思那里，正象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辩证法可以说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地表现为历史意识和阶级活动的逻辑，自然的客观秩序只有当它隐含地涉及到它制约着社会和历史活动的方式时，才是同辩证法有关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据此，胡克鼓吹"必须把那种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企图看作同自然主义的出发点相矛盾的而予以排除。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是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活动的原则，它的中介物是阶级斗争，它的矛头在阶级社会是社会革命，不论自然辩证法可能是什么东西，反正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到了四十年代，连这种局限于"意识生活"和"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所谓辩证法也不再能被容忍了。

胡克攻击说："辩证法的所谓的普遍规律，既不是自然的规律，也不是精神的规律，也不是逻辑的规律"，"这些规律违反了逻辑、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处处违反了首尾一贯的造句法的基本原则"。为此，他要求根本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因为"辩证的方法，只有在其被理解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语时，才能声称有意义和正确性；而既然在传统的公式中，辩证法为许多使人误解的和错误的概念所困扰着，那么，如果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它就会更有助于清晰的思维，而保留这个用语则会酿成一种神秘的自然哲学，为双重真理的学说准备道路，而最后，它还鼓励了一种易于导致检查、命令和迫害科学家的态度"，"为了澄清起见，最好让〔辩证法〕那个名词沉沦于废止的古语之中"（《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到了五十年代以后，胡克干脆用泼妇骂街的姿态把唯物辩证法诽谤为"宗教的代用品"。他攻击马克思主义者"避开不用上帝或绝对精神并坚持运动没有外来的根源，反之一切运动都是自己

运动，他们就觉得避开了宗教，但同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非是用内在的神学来代替超越的神学。因为对宗教来说根本的不是用‘上帝’这个词而是相信宇宙或多或少对人和人的目的是友善的，相信自然过程是这样的，它们必须实现人的最高理想（如共产主义，假使你相信它的话）……在它的信奉者的头脑和心灵中唤起这种信念，恰恰是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神学的任务"(《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1959)。

(六)存在主义

同新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观相衔接的，是存在主义、特别是法国存在主义的辩证法观。

存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一个非理性主义流派，这种哲学流派从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关于"存在不可理解"的感觉出发去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把它们说成是为"人的存在"本身所固有的、不可消灭的因素，它强调个人的主观精神状态的第一性。

存在主义者一贯鼓吹假辩证法而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早在上一个世纪，存在主义的先驱、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就炮制了一种称作"质的辩证法"的东西。在所谓"质的辩证法"的招牌下，他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攻击辩证法关于从量到质的转化的学说是"迷信"，又把辩证法关于事物通过内在的转化而不断发展的学说诬蔑为"胡说"。

德国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企图把唯物辩证法说是"烦琐哲学的思维技术"、"相互联系的割裂的图片"(《世界观的心理学》1954)。

法国存在主义者则企图从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观

出发，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例如，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加缪斯就说什么“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有思想的辩证法”(《反叛的人》，1956)。

另一个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者梅劳—庞蒂，一会儿把辩证法的动力说成是从主体到客体和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一会儿又说辩证法只是存在于造成主体的会合的那种类型的存在之中。根据这种虚构的主观唯心主义杂凑，他攻击马克思主义“想把辩证法放进自然，进而使辩证法自然化”，攻击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存在方式运进了自然，这是不折不扣的魔术”，而“在变成物质之时，辩证法就呆板重滞了”，“马克思那里的历史的惰性，便由此而来”。他叫嚷说，马克思主义“给辩证法加上一剂自然主义”，“立刻瓦解了辩证法。它也满足于在客体中，在存在中安放上一种很难放在那里的东西，即辩证法”(《辩证法的历险》1955)。

在对存在主义辩证法观的阐述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特别是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

萨特尔攻击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硬化了，忘记了具体的人，忘记了辩证法，堕入了简单的客观主义，抹煞了思维的职能，忘记了把历史决定论和创造历史的个人具体实践联系起来的中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落入到科学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地步。萨特尔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种关于具体的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而全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钥匙则是辩证法。他鼓吹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去“补充”和篡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不把西方的某些学说采纳进去，那就会简单化为它本身的一架骸骨，……这种哲学的中心有一块具体的人学的空场”。

萨特尔首先“把辩证法确定为人学的普遍方法和普遍规律”，说这是先天确定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是后天地论证

的，是通过非辩证的方法而得出自然界的辩证规律的。他攻击说，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辩证法变质为一种纯粹外来的、与具体的人相分离的“教条主义公式”、自然界的形而上学规律：“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中，寓于一种超人的自然界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

其次，萨特尔把辩证法的源泉说成是在个人的实践中，而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把辩证法了解为外因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的运动，因而只看到历史中完全是现成的辩证法，而不看到它的形成中的辩证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辩证法又变成一种神圣的规律和一种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就应该来自各个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即使假定辩证理性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那也不外乎是在一定社会里而且受那个社会一定阶段制约的人们，在人的实践中而且依靠这种实践来发现并且奠定基础的东西”。萨特尔说，“必须从这个发现出发，来确定辩证法的明显的界限和有效性”，据此他认为，“唯物辩证法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它在人的历史内部确立那种被受制约的人的实践所发现并且亲身蒙受的物质条件的优越性……〔这是〕发自内部的唯物主义……它就只能在我们的社会世界的范围内具有真理性”。

为此，萨特尔特别激烈地攻击自然辩证法，并把它排除在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之外：“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以一个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你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这种自以为发现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梦想的话”。他胡说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把思维硬加在自然界中的产物：“我们在自然界只发现由人们导入其中的辩证

法”，“只是在历史的和社会的世界里，才真正有辩证理性的问题；把这种理性搬到‘自然’世界里，那就是生拉硬栽，恩格斯剥夺了辩证理性的合理性，这不再是人在创造自身时把它创造出来，它又回过头来创造人的那种辩证法，而只是一种偶然的辩证法，……简单地说来，理性又变成一副枯骨”。萨特尔还攻击说，肯定自然辩证法，就是“重新堕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就是搞“不再需要证实和检验”的形而上学，“甚至对于批判认识和建立认识都变成无用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都以人对周围世界的某种关系为前提，而“自然辩证法就是没有人类的自然”。他得出结论说：自然辩证法的学说是由于错误地把历史研究领域内制定的、只适用于这个领域的范畴和规律，移植到自然界而产生的结果”。

接着，萨特尔又把辩证法说成是偶然性，而否定规律性、普遍性：“辩证法如果应当是一种合理性而不是一种盲目的规律，那么，它就应当自己给自己提供一种不可超越的可知性……辩证法如果存在，那么它就是它的对象的特殊的偶然性”，“如果象恩格斯……那样，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诸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每一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知性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仅如此，在萨特尔的“辩证法”中，还是没有矛盾对立的地位的：“问题在于要恢复一种灵活而耐心的辩证法，把运动和它的真理结合起来，反对先验地把一切实在的冲突看作矛盾或者甚至看作对立面”，“矛盾的对立，初看之下，也不象必然是辩证过程的动力”，他甚至说什么“被剥削者也不是剥削者的对立面（或矛盾）”（《辩证理性批判》1960）。

问题很清楚，萨特尔等存在主义者嘴里的“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同真正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它只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用主观唯心主

义去攻击和否定唯物主义，诋毁和诽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工具罢了。

三、修正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呼应、配合与合流

什么是修正主义？它是怎样产生的？它同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关系？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在其被击溃、被排除出工人运动的队伍以后，就另找出路，它们不再公开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装着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主义继续斗争。他们在批判唯物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幌子下，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他们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贩卖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观点；他们伪造马克思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中经过歪曲可以接受的东西拿过来提到首位，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为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东西加以隐瞒、抹煞和抛弃。

所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新的形式下的继续。在这里，斗争的形式、诱因改变了，斗争还在继续。事情正如列宁所尖锐地指出的那

①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样：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影响和腐蚀无产阶级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表现，修正主义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①。

修正主义者总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来进行招摇撞骗，但是，这种“发展”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却是两种沿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根据条件的变化和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修正主义者却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去推翻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的方面。所以，当着司徒卢威之流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一味闭起眼睛不看所谓对马克思学说的‘资产阶级’批判，而重复和转述马克思学说，现在这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时候，列宁就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说：

“不仅‘一味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这是老生常谈。但是，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的‘倾向性’等等之类的一些具有完全确定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司徒卢威既然想方设法（注意，在俄国书刊中）研究了重复马克思的‘害处’（sic!），难道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看出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的害处吗？”②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9页。

② 《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第581页。

正因为修正主义无非是“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因而资产阶级——不论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哪一个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攻击和伪造，就总能在修正主义的言行中找到其反映，听到其回声，看到其对于资产阶级的呼应、配合与合流。不仅在公开鼓吹“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的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那里是这样，不仅在公开宣称要以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这样，而且在经常打着“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旗号进行招摇撞骗的一些苏联哲学家那里，同样照出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清晰的影子。

这里且列举数例以资证明。

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即一九五八年初，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就在一篇题为《争取各国哲学家之间联系的发展和加强》的社论中，鼓吹什么“不能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列宁教导说，要同资产阶级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等的反动思想体系作斗争；但是他也说这些学者能够写出‘专业方面极有价值的著作’，还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善于吸收和进一步研究他们得到的资料”(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8年第2期)。

这是苏联哲学界对列宁观点的明目张胆的篡改和修正，又是他们要同资产阶级哲学同流合污的公开信号。

被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社论篡改和修正的列宁的那个论述，见之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其中，列宁指出：

奥斯特瓦尔德、马赫、彭加勒“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

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①。

列宁这段论述的意思十分清楚，当他说资产阶级教授在“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时，这里所说的“专门领域”是指“化学、历史、物理学”等等专业。列宁所说的这个“专门领域”是不包括哲学的，不仅不包括，而且还恰恰是把哲学这样有党性的科学排除在外的。列宁强调指出：“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教授们的东西不仅不是“极有价值”的，而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当然，这是就资产阶级哲学的“整个路线”来说的），因为这“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

然而，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却公然发表社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列宁所特地排除的哲学领域，包括进资产阶级教授“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的“专门领域”中间去；并针对列宁关于一旦谈到哲学问题时，资产阶级教授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的论述，胡乱批驳说“不能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还把这一切明目张胆地反对列宁论述的胡说，强加到列宁身上去，叫做“列宁教导说……”。

苏联哲学家如果认为列宁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就应当明确地指出，但是，明明是在反对列宁，却还要打着“列宁教导说”的幌子，这却是极不光彩的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勾当！

列宁在谈到跪着造反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时，曾经指出：“只有修正主义者由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

---

① 《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62 页。

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①。

然而，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之所以要篡改和修正列宁的上述论述，还只是为了制造舆论，把他们那套同资产阶级哲学呼应、配合和合流的修正主义言论付诸于行动。

一九六一年三月，英国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实证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艾耶尔，跑到苏联去访问，他除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了一些报告之外，还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哲学与科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艾耶尔明明是在狂妄地攻击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苏联《哲学问题》却从“不能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学者能够写出专业方面极有价值的著作”的修正主义教条出发，特地给这篇文章加按语说，它“实际上包含了作者较详细地弄清楚辩证唯物主义某些问题的第一个尝试”，并说“他开始对辩证唯物主义发生兴趣，企图从中找到对于从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然而，新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却并不领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这份情。他回到英国以后，就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把自己的访苏之行说成是“冲破辩证法的帷幕”，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曲意阿谀奉承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不得不在一九六二年第五期上发表编辑部评论，在一九六二年第六期上又发表社论，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象它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编者按中胡吹乱捧艾耶尔时，瞎说的什么艾耶尔“开始对辩证唯物主义发生兴趣”，要“弄清楚辩证唯物主义某些问题”，并“企图从中找到对于从逻辑实证主义立场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序言，《列宁全集》第14卷，第6页。

出发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是“艾耶尔否认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意义，不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实际上是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仿佛是不科学的——这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维护者向往已久，然而无法实现的幻想”（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六期社论：《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任务》）。

艾耶尔明明是在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但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却在匍匐于资产阶级面前的修正主义教条的支配之下，硬要颠倒是非地说艾耶尔在肯定辩证唯物主义，直到艾耶尔一纸声明把它打得鼻青脸肿，这个“教训”不能说不“惨痛”吧?!

但是，既然修正主义的客观地位就是“资产阶级的奴才”，因而他们就不会、也根本不可能从这里吸取任何“教训”。

事情过了十年之后，苏联科学院外国意识形态派别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院士米丁在为 1972 年在巴西召开的第八次泛美国际哲学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又在说什么“我们也认为，许多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某些方面，尽管经常是以非科学的形式反映的，却能够包含，而且的确也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一点关系到我们对待某些现代哲学学说（如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态度”。

什么诸如“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之类的“许多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包含着合理的内核”！米丁在这里的表演，同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在1958年鼓吹的所谓“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能够在专业方面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以及在 1961—1962 年阿谀奉承新实证主义者艾耶尔时所表现出来的丑态，不是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吗?

苏联哲学界同资产阶级哲学家呼应、配合与合流，也带动了其它一些国家的哲学家。如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沙夫，早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语义学引论》和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语义哲学

论文集》中，就在鼓吹什么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不能虚无主义的，要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沙夫叫嚷着要"吸收"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个"合理的内核"，到底是指的什么呢？请看他们自己在行动中所作出的回答。

大家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论述运动的矛盾性质说：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①。

对于恩格斯所表述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几十年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一直在进行歪曲和攻击，必欲加以否定并以形而上学的"运动"观代之而后快。

一九四八年，波兰的里沃夫——华沙学派的新实证主义者艾杜凯维奇，也在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一九四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题为《变化和矛盾》的论文，指责恩格斯关于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论述，是建立在对"同一瞬间"的两种意义的混淆上面的，因为"同一瞬间"的前一种意义是指运动物体正好处在时间的一点上，而"同一瞬间"的后一种意义则意味着时间已有延伸，为此，他提出用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通过点P"这种无矛盾的说法来取代恩格斯关于运动的矛盾性质的论述。

艾杜凯维奇的指责和提议，本属资产阶级哲学家攻击和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在实质上是一种把运动的辩证矛盾掩盖和隐藏在"通过"两字之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这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

因为，既然说的是运动着的物体通过空间中的点，那么，在这个“通过”之中，就仍然存在着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在这个点上又不在这个点上，既在这个点上又在另一个点上的矛盾，要取消这个矛盾，就只有取消运动。

然而，沙夫却把艾杜凯维奇这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观点，奉为什么“合理的内核”而加以“吸收”。沙夫在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一九五五年第四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矛盾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沙夫又是对艾杜凯维奇顶礼膜拜，说什么“我完全同意他的论证的原则”；又是对自己过去宣传过恩格斯表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一事表示忏悔，说他已“改变”了这个观点，现在要“批判”它；又是攻击恩格斯有关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同芝诺的陈述“建立在同样的形而上学的立场的基础上”，是“接受了黑格尔的论证”，是“攻击矛盾律的效力”等等；接着，又鹦鹉学舌地跟着艾杜凯维奇用什么“一个运动着的物体通过空间中的点”的说法，来取代恩格斯的上述表述。

沙夫的这一番表演，极大地鼓舞了艾杜凯维奇，他在兴高采烈之余，随即又在东德的《德国哲学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进而鼓吹抛弃“变化本身包含着矛盾”的观点。

沙夫的这一番表演，也“带动”了当时正在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任职的捷克人柯尔曼。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九五八年四月举行的“从现代科学和实践看矛盾问题”的讨论会上，柯尔曼发表了题为《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想中的反映》的报告，攻击恩格斯关于运动的矛盾性质的论述“违反了矛盾律”，跟“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陈述有分歧”，并提出用“物体在同一个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的说法去取代恩格斯的表述。

沙夫、柯尔曼的这一番表演又影响了苏联哲学家。据美国哲学家约翰·索姆维尔报道他在苏联的听课情况说，苏联哲学家巴克

拉节等人在苏"中央哲学研究所"、"第比里斯哲学研究所"和"亚美尼亚"等地讲课时，也公开攻击"恩格斯〔所说运动即矛盾〕是错误的，是被一种多半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关于运动本质的错误概念所误导"（索姆维尔：《本体论、逻辑和辩证唯物主义》，载《国际哲学季刊》一九六八年三月号）。

这些哲学家承认他们之所以要攻击和篡改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的表述，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影响。例如，柯尔曼就说过，他之所以要公然指责恩格斯的"错误"，是因为他"在国外跟唯心主义者进行不少论战"，他们"至今都死抓住这个错误"。

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对于苏联东欧的这些哲学家参加到他们"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去一事，则表示热烈的欢迎。例如，美国《哲学杂志》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五十七卷第七号上，破例译载了沙夫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矛盾律》一文，作为对沙夫的鼓励；西德《哲学研究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表彰沙夫、柯尔曼等人的"功勋"说："如果说在苏联学术界关于矛盾原理的看法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那么，这绝大部分要归功于象柯尔曼、沙夫……这样一些独立的思想家的批判工作"；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一九六五年春季号发表普里姆的题为《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文章，欢呼"沙夫的论文卓越地证明了卢卡奇的意见……恩格斯的观点必须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普里姆"批评"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攻击马克思主义时以恩格斯为靶子，是"从二十世纪的眼界出发去驳斥十九世纪形成阶段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抛弃了恩格斯的陈腐的或者错误的观点"，"恩格斯的……这些陈述已经不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的一部分了"！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歪曲、攻击和伪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上呼应、配合得如此之紧密，合流得如此之迅速，清楚地说明了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给自己脸上涂什么样的油彩、搽什么样的脂粉，却终究同它的前辈一样，在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资产阶级的奴才罢了！

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亦步亦趋地同资产阶级呼应、配合与合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资产阶级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它的辩证法观，是以资产阶级的辩证法观为其哲学基础的。

四、老修正主义者的辩证法观

（一）伯恩施坦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是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为其思想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的。

伯恩施坦公开求助于康德。他叫嚷说："社会民主党需要有一个新的康德使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去"证明轻视理论和承认物质因素为发展过程中的万能力量都是自欺行为"（《历史唯物主义》）。而当他的这种谬论遭到批驳时，他又叫嚣说："我曾受到各色各样人们的愤慨，而这些愤慨却不过加强了我如次的确信，即社会民主党显然需要一个康德，他会酷烈犀利地批判那种传统的教条，而当那教条外表上的唯物论成为最高因而最易被人误解的观念形态时，他就会揭发出来：轻视理想并且将物质的因素提高为进化的全能威力，就是自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而伯恩施坦之所以公开求助于康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康德来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他写道：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反对面，并且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理观察的圈套”，“要是信任黑格尔学说，来选择可以前进的道路，那就马上一定会陷入泥坑里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完成了那个大事业，并非因为依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力量，毋宁说是因为不曾依靠它的力量。假如说在另一方面他们忽略了布朗基主义最显著的错误，那也首先因为他们自己的学说中，掺杂着黑格尔派的味道”，“马克思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和布朗基主义完全相同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施坦公然提出用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去顶替辩证法：“斯宾塞的公式：分解和整体化，专门化和新的结合——与黑格尔关于发展的学说没有丝毫原则性的矛盾，它们只是以新的形式表述了黑格尔的思想，这种形式较之黑格尔的法则，更可以少引起一些误会和得出错误的结论”（见《新时代》杂志第17年度第2卷）。

在伯恩施坦的影响之下，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或者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达尔文主义的”；或者叫嚣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好幻想的黑格尔主义中解放出来”，要“扫清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

正是针对伯恩施坦主义拜倒在资产阶级新康德主义哲学脚下的这种丑态，列宁早在一八九九年所写的一篇书评中，就指出：

“伯恩施坦还指责了辩证法，硬说辩证法会导致任意的编造等等。伯恩施坦重复着这些滥调（连俄国读者也听腻了），却根本不想指出辩证法不对在什么地方，犯了方法论错误（究竟是哪些）的究竟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①；

而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列宁又进一步揭露说：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70页。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①。

（二）考 茨 基

第二国际的首领考茨基，从在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采取调和立场，滚到了修正主义的泥潭里。

考茨基公然扬言："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应该公开地声明新康德主义很少使我感到惶惑不安。我从不精通哲学，虽然我完全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是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观点和历史观点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和新康德主义并存；要知道，达尔文主义和毕希纳唯物主义共处得好，正如它与赫克尔的一元论及朗格的康德主义共处得好一样，假如伯恩施坦仅在这方面变节了，那么我对这一点不会感到任何不安"（考茨基给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见《普列汉诺夫文学遗产》第5集）。

正是从这种哲学立场出发，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

考茨基首先把辩证法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和精神领域，而否定自然辩证法，他说："我们也把辩证法的过程主要看作一种精神的过程，看作有认识有意识的行动的东西对它周围世界的斗争"，它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只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认为，单个有机体的发展不是辩证的，而只是重复循环，外界不会改变循环顺序和目的，使一个有机体变为另一个，只有有机体的各个种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是通过个体和外界矛盾而产生的新东西，才是辩证的；“而恩格斯却把它〔指辩证法〕看作一般的自然规律”，所以“我们的辩证法的某些点更接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不是更接近于恩格斯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

考茨基还进而攻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唯物主义颠倒。他说什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恰恰在卓有成效地做了唯物主义的‘颠倒’以后，倒颇令人大费踌躇了”，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即使把它简单地‘颠倒’过来，在自然界和社会里都不能普遍地应用，倒常常只能以很勉强的方式才能应用，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能应用”。那么，应该怎么办？考茨基说：“就唯物主义的应用来说，必须不只是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头脚颠倒过来，而且也要把脚走的路完全改变”(《唯物主义历史观》)。

考茨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即矛盾的论述，认为矛盾只存在于意识中而不存在于外部世界；考茨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论述，还反诬恩格斯在黑格尔的强烈影响下，不把运动发展看作自我和周围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唯心主义。……这样，考茨基终于用他的“脚”从辩证法走到了形而上学，走到了折衷主义诡辩论。

(三)波格丹诺夫—布哈林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辩证法观抄袭自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康德主义流派的话，那么，俄国波格丹诺夫—布哈林的辩证法观则抄袭自实证主义，特别是抄袭自马赫主义。

波格丹诺夫否认辩证法的普遍适用性，攻击马克思辩证法象

黑格尔辩证法一样不明了和不完善，他说什么“辩证法是一个个别场合，它底公式，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式”，“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也象黑格尔的一样没有达到十分明确和完善的地步。正因为这样，对辩证法的运用就不准确、不固定了，在辩证法的公式中就掺杂着随意的成分，以致不仅辩证法的范围不能确定，就连辩证法的意义有时也被严重地歪曲了”。接着，他公然提出要用“经验一元论”去代替唯物辩证法，他说：“经验一元论就是由此产生的一种新的观点”，“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辩证法是通过对立倾向的斗争道路的、组织起来的过程。这和马克思的理解是否一致呢？显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讲的是发展，而不是组织起来的过程”（《生动经验之哲学》1923）。

那么，波格丹诺夫所谓“通过对立倾向之间的斗争而进行的组织过程”的辩证法，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波格丹诺夫的这种“辩证法”，首先把斗争看作是暂时的，而把平衡看作是基本的，他说：“如果这个过程有一个开始，那么，显然在它开始以前，就还没有发生两种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在这一方面就存在着某种平衡。如果这个过程在某处结束，那么无疑不再存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且关于这些力量，某种新的平衡已经自行建立起来”（《生动经验之哲学》）。

波格丹诺夫攻击“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看到……辩证法的生动的真正意义，因而他们也就不可能解释从量到质的转变”，攻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只揭露出两种概念之间的矛盾”，“而没有揭露实在力量或倾向之间的矛盾。但是，两种概念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矛盾，只存在于思想之中，如果把外界事实还原为思想，……那就意味着转向唯心主义的观点，意味着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生动经验之哲学》）。

波格丹诺夫使劲鼓吹矛盾调和论和矛盾不可解决论，并认为

差别不是矛盾。他说:“即使在一个整体的要素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也还不意味着必定有矛盾;只有当这些要素不仅有差别而且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时候……才会产生矛盾。但是,在这种情形下,通过组织调节来消除矛盾的可能性并不完全消失,……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社会整体的要素之间的差别才一定会变成一种不能解决的矛盾,这种情况就是,社会的集团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社会心理学》,1906 年第 2 版)。

在波格丹诺夫之后,布哈林继续鼓吹用均衡论去代替辩证法。他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并没有除去目的论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可避免地是由黑格尔以‘精神’自动发展为基础的公式所发展出来的”(《攻击》论文集,1922),说什么“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用语转译成机械的用语,我以为是很可能的”(《唯物史观》1921)。

把辩证法转译成机械的用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先意味着把“物质辩证法”说成是什么“平衡之不断的破坏和建立;平衡之破坏,它又在另一个新基础上重建起来,又重复破坏等”;

同时,也意味着把事物的对立方面了解为相互外在的、纯粹机械地互相接触的力量,而把矛盾了解为“这诸种力量的冲突”。

布哈林用这种谬论去否定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而鼓吹外因决定论,他说:“十分明显,每一个体的内部结构(内部的均衡),必须依据个体对于环境的关系而定。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为个体的一切情状,即其运动的根本形式(萌芽、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唯物史观》)。

显然,波格丹诺夫一布哈林这套均衡论同辩证法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四）德　波　林

同伯恩施坦、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哲学反映了把黑格尔当“死狗”的资产阶级思潮相反，德波林的修正主义哲学则反映了“黑格尔复兴运动”的资产阶级思潮。德波林对唯物辩证法的修正和歪曲，都是在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旗号下进行的。

为此，德波林首先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等同起来，说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把一切哲学思潮调和起来并联合在一个最高的哲学综合中，它是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结果”，“是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综合”（《康德的辩证法》）；还说什么“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意味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综合，它在科学上是用来调和这个对立物的”（《伊里奇的辩证法》）。

德波林狂热地鼓吹差别不是矛盾的谬论，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说：“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纯粹状态，一切存在物都应当从纯粹状态中，即从无差别的抽象的同一中摆脱出来”，“同一转化为差别，差别又转化为对立，而后又转化为矛盾”（《哲学与政治》）；“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等同，经过差异和对立而达到极端的矛盾——都过去了的时候，‘解决矛盾’的时期就到来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德波林还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说什么“康德把反题和正题对立起来，想证明正题排斥反题，因而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不能解决的。可是积极的辩证法认为，正题和反题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而是互相调和的对立面”（《康德的辩证法》）。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观

德波林修正主义是一种局限于俄国一国的现象，而同这种修

正主义思潮相平行的，则有在范围上要广泛得多、在时间的持续上要长得多、在内容上要庞杂得多的所谓重新考查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打的旗号是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又反对所谓第三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实际上却是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的反动，是对资产阶级哲学中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思潮的呼应。这股思潮从匈牙利的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算起，包括德国的柯尔施、布洛赫，意大利的葛兰西，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列斐伏尔，法国梅劳-庞蒂和萨特尔的存在主义，以及在西德和美国具有巨大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它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

这股思潮歪曲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把人的意识、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心脏。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在辩证法理论中，没有"存在"同"认识"的任何分割，在意识中理解世界就意味着使之成形和改变它。

据此，他们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对立起来，说什么马克思的辩证法描述意识和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因而只以社会生活为其对象，认为辩证法发源于主体，而不存在于自然界之中；

据此，他们攻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忽略了通过意识的能动中介，没有把领导作用给予能动的历史主体，是漏掉了辩证法。为此，他们叫嚷要赋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素以新的活力；

据此，他们用主观主义地解释的主体—客体问题去解释哲学的基本问题。

他们把主体客体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

客体的相互作用，把物质也归结为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把客观现实说成是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甚至说什么“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

而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他们又把主体的能动性提到首位，把它称作某种实体的原则、独立自主的原则，用它去对抗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把这种主体的能动性归结为精神的能动性，并且在侈谈“实践”的掩护下，鼓吹由主体到客体的无止境的“移注”。

他们不仅用是否承认这种主体的能动性去划分什么“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而且用它去划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否认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基本方向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代之以承认这种主体能动性的“辩证法”、“动态思维”，同否认和反对这种主体能动性的“形而上学”、“静态思维”的对立。

(一)卢　卡　奇

卢卡奇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富裕的犹太银行家家庭里，先在匈牙利读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等学校跟资产阶级“生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席美尔和麦克斯·韦伯学习，一九一八年底参加匈牙利共产党，次年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任教育和文化委员。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流亡维也纳，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写文章、发议论。为此，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曾指出他发表在《共产主义》杂志 1920 年第 6 期上的《论议会制问题》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①。

一九二三年，卢卡奇发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系统的歪曲、攻击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43 页。

和修正，这使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左派修正主义思潮的一名重要的代表人物。

卢卡奇首先竭力夸大黑格尔辩证法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源性，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有一系列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以及经常使用的范畴，是直接地从黑格尔的《逻辑》中产生出来的”；他还把马克思方法的实质，归结为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说什么：“整体对于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优越性，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以一种独创的方式把它放在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基础上的方法的实质”，与此同时，他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归结为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说什么：“思维和存在的黑格尔式的同一，即辩证的统一，把二者的统一理解为某种过程的统一和完整性，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的实质”。

接着，卢卡奇又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把它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并据此而攻击恩格斯。他写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种片面的僵硬的因果性必须被交互作用所代替。然而，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却不仅没有被应有地置于系统研究的中心，甚至简直没有被提到。然而，没有这种相互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了”，“能够把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说明的误解，主要地归诸于下列事实，即：恩格斯——追随着黑格尔的错误的引导——把这种方法扩展到也应用于自然。然而，辩证法的定局性的决定要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范畴的基础的、实在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卢卡奇得出结论说：“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方法在这里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不论辩证法谈论的何种命题，它总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圈子：对历史现象的整体的认识”（《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

在卢卡奇的这些谬论遭到揭露和批驳以后，他曾经作过一些检讨。例如，在1934年，他曾检讨说："我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书中所犯的错误是完全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批判的〕这些偏向一致的。……我当初是席美尔和麦克斯·韦伯的学生（当时我受到德国哲学流派'精神科学'的影响），从哲学上来说，我从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客观主义，从康德发展到黑格尔。同时，工团主义哲学（索列尔）对我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这样，我于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时是抱着明显的工团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纵然有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我却仍然抱着不赞成共产国际路线（1920—1921年）的极左的工团主义反对派的观点"，"我在1923年出版的那本书……是这些倾向的哲学总结。……我的书里所探讨的所有问题，从哲学问题直到阶级意识的定义和危机理论，都详细地证明这一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意见》，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4卷，1934年7—8月号）；在1938年，卢卡奇再次就《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作检讨说："由于它的唯心主义，由于它对反映论的错误解释，由于它否认自然辩证法，所以它是反动的"（《现实主义论丛》1948）。

但是，由于卢卡奇并没有真正抛弃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在这以后，他又继续歪曲、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例如，在《文学史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52年）中，卢卡奇又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的方法的实质归结为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的错误，企图用整体观念去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对抗，说什么"最最重要的是，对立不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且也表现为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自身的内部矛盾"，并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搞什么"伊壁鸠鲁式的中间世界"，把无

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现实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在真空地带进行的抽象争论，变成黑格尔的范畴和观念的矛盾自我运动。在《今日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1956)中，卢卡奇又用所谓中介范畴去冲淡、顶替基本的矛盾斗争，他写道："就我们时代底基本矛盾来说，毫无疑问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对立起来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要想把这种对立应用到具体问题上去，究竟是否无需任何中介而就能直接办到呢？"接着，他就通过诸如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战争与和平、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之类的'中介"，用不分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去顶替阶级斗争，在哲学上，则用辩证的理性主义和反辩证的非理性主义之间的斗争，去顶替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理性的毁灭》1953)。

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卢卡奇参加纳吉政府任文化部长，以后就退出政治生涯；到六十年代再次出版他的书，七十年代初卢卡奇完成其《走向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著作，一九七一年去世。

(二)柯　尔　施

在思潮上同卢卡奇相呼应的是柯尔施。

柯尔施本来是德国共产党极左派的发言人，当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从"左"面展开进攻时，柯尔施曾同他积极配合，把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业说成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把联共(布)说成是"富农化了"的党，又把共产国际说成是"机会主义的"组织，鼓吹推翻当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革命"的必要性，为此，在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以后他就侨居美国，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直到一九六一年去世。

二十年代柯尔施极左的政治活动，在哲学上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原发表在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

第十一卷中，一九三〇年以同一题目在莱比锡出版单行本)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唯物辩证法所作歪曲、攻击和篡改。

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竭力搞所谓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为此，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他就把一八四八年到十九世纪末之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搞“实证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另一方面又搞“复归到黑格尔的哲学”的时期，他说这“显然是矛盾的，但在实际上又是相互补充的哲学发展”。

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立场出发，柯尔施歪曲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所作的唯物主义颠倒和改造，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倒转，只是在于把唯心辩证法从其最后的神秘化外壳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它在于在观念的辩证的‘自我运动’后面发现隐藏着的实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宣称这个革命历史运动是最后留下来的绝对”，并据此而攻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指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一般存在的观念中，以及特别在革命运动内部，他们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观念完全复归到一种全然抽象的观点”。他还指责说，对于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头足倒置，最后无非意味着一种术语上的变化，在其中，物质代替了黑格尔的“精神”而成为新的绝对。总之，他攻击列宁主义倒退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

在关于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所进行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和改造问题上，柯尔施指责列宁用物质代替黑格尔的“精神”而成为新的绝对，他鼓吹革命历史运动是最后留下来的绝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柯尔施的这些观点，清楚地说明了他企图在侈谈“革命历史运

动”的幌子下，抽掉人的能动精神的物质基础而加以抽象的发展，用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化的所谓辩证法，去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三）布 洛 赫

同卢卡奇、柯尔施属于同一个思潮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者，是德国人布洛赫。

布洛赫早年就学于席美尔、麦克斯·韦伯，在长期侨居美国以后，于一九四九年去东德莱比锡大学教哲学，一九六一年又向西德要求政治避难，此后一直在图宾根大学执教，直至去世。

布洛赫企图在黑格尔主义的意义上去修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黑格尔主义。为此，他首先就在重新评价整个黑格尔遗产和马克思在其中的地位的旗号下，把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竭力说成是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激进思想。

在《主体一客体 对黑格尔的解释》（柏林 1952 年版）中，布洛赫认为，黑格尔是作为一个基本上是激进的而不是反动的思想家而出现的，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则被看作是同黑格尔的见识密切联系着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方面是那些沿着革命实践的方向对黑格尔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改造的方面。布洛赫在 1956 年 11 月所作《黑格尔与体系的威力》的讲演中，又公然要求马克思主义重新活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寻求掌握黑格尔体系所包含的“合理内核”。

和卢卡奇一样，布洛赫从主体一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去曲解辩证法，并用这种“辩证法”去强调意志自由和决定能力而否定决定论，他说：“辩证法本身，在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中就是客体一主体的关系，此外无它；就是所研究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常常克服由它本身所决定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并飞跃地向前突进”（《主体一客

体》)。

布洛赫甚至把客观现实、把物质统统归结为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说什么“物质就是那种其中没有主体之物的对立物”(《物质—原稿》)。据此，他认为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物质性，而在于主观性，在于人的能动性。

布洛赫还用范畴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去顶替客观辩证法，顶替作为运动源泉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他把发展看作是有目的地克服主体和客体间的差别，达到它们的最终的同一，他认为扬弃异化就是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纯粹过程，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的消除:“这种人和自然界中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异化的扬弃，就是扬弃了实物性的客体同显示出来的主体，以及扬弃了实物性的主体同显示出来的客体之间的吻合、溶合”(《希望的原理》第一卷)。

布洛赫在分析主体、客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时，以抽象的人和围绕着他的敌对的环境为前提，把人在发展中的进步，看作是与主体对立的客观性的被克服，看作是客体的主体化，这种主体化倾向于导致主体同客体的同一。这样，在布洛赫那里，辩证法就成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假辩证法，即客体在主体之中“形成自我意识”，最终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的完全一致，而从此一概“结束”世界的发展的真形而上学、假辩证法。

(四)葛 兰 西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六年被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逮捕，判刑二十年，一九三七年四月获释，两天后就逝世了。在被囚禁的十年中，葛兰西写了一部《狱中笔记》，阐述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葛兰西无疑是一个同阶级敌人作了殊死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

战士，但他在《狱中笔记》中一方面同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进行论战和交锋，另方面又受克鲁齐的强烈影响；就思潮来说，葛兰西的哲学观点同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有许多的共同之点。

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强调要从哲学上去论证人的革命实践的意义。为此，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的哲学”，但是却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看作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合理的辩证法。

葛兰西说：“黑格尔依据法国革命和王朝复辟的经验，辩证地统一了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这种人的思想的两个方面，但是这种综合的结果原来是‘倒立着的人’。黑格尔的继承者打破了这种统一，有些人回到唯物主义的体系，另一些人则回到唯灵主义的体系去。实践的哲学〔指马克思主义〕，以它的创始者为代表，为了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即‘用脚站着的人’，便重复了黑格尔、费尔巴哈、法国唯物主义的全部经验”。但是，“实践的哲学的始祖，决不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唯物主义’，在谈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则主张应该加以批判，应该加以更彻底的批判。因此，他反对‘神秘的’辩证法而制定出来的，并不是‘唯物的辩证法’这个公式，而是‘合理的辩证法’这个公式。他对‘合理的’这个词给予了非常正确的意义”；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一元论’这个术语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或者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物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与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一精神）”。

葛兰西从这种把实践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对立的同一性”的观点出发，把物质自然界理解成在实践中同人的活动合为一体的、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的实践的一个从属性因素，并据此而

大肆攻击唯物主义。

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写道:"在实践的哲学看来,……不可以把物质作为它本身来考察,而必须作为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的东西来考察","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客观的概念,好象意味着在人之外也存在着的客观,然而,断言甚至在人不存在的情形下现实也是存在的时候,这不是在作一个比喻,就是陷入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里去了";"在科学中,向人类的外部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悖论。没有人,宇宙的实在有什么意义呢?","离开人的活动,'客观性'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实践的哲学看来,使存在离开思维,使人离开自然,使活动离开物质,使主观离开客观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作这样的分割,那就会堕落成为一种宗教的形式或者无意义的抽象"。他还说:"存在着超历史的、超人类的客观性,这是可能的吗?但是,谁来判断这种客观性呢?谁能站在这种'宇宙本身的观点'上呢?……所谓客观的,常常是'人类地客观的'这种意思,……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就是'普遍地主观的'这个意思"。

(五)列 斐 伏 尔

二十世纪中期,在法国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柯热夫、伊波里特相呼应,竭力用唯心主义去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修正主义者,是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主要从两个方面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上进行伪造。在《辩证唯物主义》(1939)一书中,列斐伏尔鼓吹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对黑格尔的一劳永逸的唯物主义纠正,因为马克思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十分不同地评价他同黑格尔的关系。所以,必须重新解释黑格尔—马克思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关系。他说,从马克思的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黑格尔的辩证法看起来是不可救药地被处决了”，“马克思最初的一些经济学见解（特别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带有经验的性质，……因此，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它的重要因素之一——辩证法被抛弃了，于是只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努力揭示内容（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人类的和实践的）的时候，取消了形式的方法。这个内容的发展要求一定的辩证法为前提：阶级的矛盾、富有和贫穷的矛盾及这一矛盾的克服。但是这个辩证法并没有同以概念表现出来的结构联系着。它被理解为通过实践和经验而确定下来的东西”，“必须等到1858年，才第一次毫无恶意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只是当“马克思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准备工作时，才重新发现和恢复辩证法”，而从此以后，通过辩证法，“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仅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联结起来，而且被转化了和超越了”。

二是在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和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观的关系上进行伪造。列斐伏尔说什么马克思既同认为在人类、社会干预之前，自然就包含辩证运动的晚年恩格斯相对立，又同认为物质独立于意识、认识是现实的拷贝的列宁相对立；他说，对于马克思这个唯物主义者来说，辩证的范畴只是作为历史实践中的节点才存在，就是说，作为一种通过人的活动而连续不断地得到中介的物质实在中的节点才存在。对于改变“客观性”具有构造性作用的人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拱心石。所以，他说：“辩证法？……这不是从始至终贯穿在事物之中的”，“深化的马克思主义反映出改变着事物的能动性”，“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这个命题是用〔社会〕实践活动写成的，而不是用纯粹意识的词句写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1957）。

（六）法兰克福学派

然而，把卢卡奇、柯尔施一伙“使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衣钵继承下来，长时期内在学术的框架中加以阐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和西德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广泛的思想市场的，却是法兰克福学派。

说起法兰克福学派，首先要追溯到一九二三年在德国美因河畔出现的一个由富裕的谷物商捐助成立的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形式上附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则是独立的。社会研究所的头任领导格律恩堡，是一个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法的历史学家，他想把社会研究所办成一个“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因此，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中，就不仅发表属于第二国际传统的伯恩施坦、阿德勒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属于第三国际的李亚山诺夫等人的论文，也发表当时既反对第二国际、又反对第三国际的极左派卢卡奇、柯尔施的著作，还发表一些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

格律恩堡一九二九年退休后，霍克海默于一九三〇年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他在就职演说中给社会研究所重新确定方向，要求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对哲学概念进行社会学批判，对社会学概念进行哲学批判。为了同传统的社会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片面专业化倾向相对抗，他组织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来对社会和个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把说明社会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和文化方面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这项研究的目的，认为这项任务的解决，应当使人获得解放，使人摆脱其受偶然经济力量支配的条件。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社会批判理论，都是由此而来的。

霍克海默在为社会研究所重新确定方向以后，就把马尔库兹、阿道尔诺、弗罗姆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集结起来，和他一起，用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去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开始发行《社会研究杂志》作为它的喉舌，而停止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小资产阶级那里的反映，在开始时，它的主要锋芒是指向以新康德主义为目标的“传统理论”，指向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指向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

随着希特勒在德国逐步夺取权力，霍克海默在三十年代初期先是把研究所的基金，继而把研究所的档案、图书、主要研究人员和杂志编辑部迁出德国，经由瑞士、法国而迁移到美国，加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四十年代初期，当社会研究所的一些成员随美国政府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些成员到其它大学去执教或任作家，研究所活动大大削减以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卜洛克又把研究所再迁至美国南部伯克利，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在那里，他们完全退出政治活动而搞一些社会学调查，虽然他们还保留其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基本锋芒，但却沾染上了对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创立新社会的力量丧失信心的悲观主义。

在战争结束以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把社会研究所迁返法兰克福，共任所长，而马尔库兹则继续留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公开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兹为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歪曲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发达工业社会所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大肆鼓吹无产阶级颓废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叫嚷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不再适用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重新规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概念和

在这个时期中的战略的任务”，妄图用其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去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由于马尔库兹的这一套“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迎合了六十年代在发达工业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发展起来的“新左派”青年学生的口味，因而曾经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思想市场上风靡一时。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毕竟只是一个在资产阶级学术框框内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流派，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内外矛盾的激化，这个流派在思想政治上就滋长和发展着严重分歧，在组织上则日益陷于土崩瓦解。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中，马尔库兹用他那套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指引着新左派运动不断碰壁；阿道尔诺退缩到被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申斥为沉思瞑想的状态之中，同被这种理论所鼓动起来的西德激进学生发生一系列的冲突；霍克海默则在1959年退休以后，逐渐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在1970年1月6日同西德《明镜》周刊记者会见时，甚至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其分歧严重，以至发展到分道扬镳的地步：它的“左”翼代表人物涅格特同托洛茨基主义合流，乃至参加新托派组织，它的右翼代表人物哈伯尔梅斯等人则同辩护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相混一。在组织上，自从1969年阿道尔诺去世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也开始了解体，它的第二代的一些代表人物纷纷离开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它的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理论，在新左派运动中，乃至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一哲学界，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历来以辩证法自我标榜，并且一直把辩证法作为自己区别于其它思潮的标志和批判其它思潮的武器。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辩证法，却是卢卡奇之流所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之类的东西：霍克海默否认辩证法是在人的控制之外的一个客观过程，认为辩证的，就是包括有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马尔库兹认为，辩证思维就是把事实理解成主客体紧密地联合到客体在其结构中包含主观性的过程（为《理性和革命》1960版所写序言《关于辩证法的意见》）；而阿道尔诺则说："辩证法是探查意识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力场"（《认识理论的形而上学》，1956）。

从辩证法是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这种观点出发，法兰克福学派首先反对把辩证法"本体论化"，也即否认辩证法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普遍规律，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把辩证法说成只是一种历史方法，并用歪曲和伪造的手法，把它的这种观点强加于马克思和列宁，同时又攻击恩格斯。

在1941年出版的《理性和革命》中，马尔库兹说："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一个普遍的本体论的过程，在其中，历史是仿效存在的形而上学过程的。反之，马克思却使辩证法同这个本体论基础分开。……它变成了和社会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况"；在1958年出版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中，马尔库兹又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把辩证法作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的图式来加以发展，在这方面的第一步是由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迈出的"，而当辩证法"从一种批判思想方式变成一种具有僵硬地固定的规则和规定的普遍的'世界观'和普遍的方法"时，"这种转变就比任何修正都更加彻底地毁坏了辩证法"。

马尔库兹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显然是同马克思本人关于自然界辩证过程的大量论述不符合的，而马尔库兹之所以要作出这个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概括，则是为了要借口历史领域中有人的活动而根本否认辩证法的客观性，根本否认物质

世界的独立于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例如，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兹就公然歪曲列宁的著作说："辩证的原则并不是一种可以同等地应用于任何主题的一般原则。当然，每一个不论怎样的事实都能够接受辩证的分析，例如一个水杯在列宁的著名论述中那样。但是，一切这样的分析将导入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构中并表明它是所分析的事实的构成要素。辩证法把事实当作一个确定的历史总体性的要素，对于这些事实是不能把它们从这个总体中游离出去的。当列宁在述及一水杯的例子时说'整个人类实践必须进入对象的定义中'；水杯的独立的客体性就这样瓦解了"。

但是，辩证法一旦丧失了客观性，就成为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就转化成为折衷主义和诡辩论，转化成为形而上学。法兰克福学派鼓吹的"辩证法"，就正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突出地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理解为否定一切，以及主张事物发展的外因论上面。

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兹说："在经验的和理论的基础上，辩证的概念宣布它自己是无希望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在现在与其未来的裂口之间架起桥梁来的概念；不抱任何希望，也不显出任何成效，它始终是否定的"；而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道尔诺更进而说什么："辩证法，否定知识的这个本质，不愿意有同自己并列的任何东西，作为否定的东西，辩证法吸取的是特殊性的戒律……它应当反对自己"，"斗争一定要结束，这恰恰是因为存在的最高原则是否定一切。一切对立面都将彼此消灭，此后，一切都衰落，陷于不存在，剩下的仅仅是衰落和不存在"。

然而，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这只是法兰克福学派否定观的一种表现。这种否定观的另一种表现，则是认为事物的否定方面可以被什么一体化力量所中立以至使之变成肯定方面，从而使事物

成为只有肯定方面而没有否定方面的东西。例如，马尔库兹 1966 年在布拉格举行的黑格尔大会上所作题为《论辩证法的否定概念》的报告中，就攻击马克思主义集中注意力于内部否定力量，而对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力量估计不足。他说，这种一体化力量“是很强大的，以至于可以中立否定力量，甚至使否定力量变成肯定力量”。

和这种否定变肯定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尔库兹在上述《论辩证法的否定概念》的报告中，还指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忽视否定性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方面转移到外部这一事实。他写道：“主要的困难在于辩证的概念。按辩证的概念，否定的力量是在现存的对抗体系内部发展的”，但现在，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在“全球的统一的整体”中的对立，却吞没了“晚期资本主义里”的革命潜力，使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这个全球性的对立中变了样”，据此，他得出结论说，矛盾的真正辩证的解决导致一定要“从外面”来解决。

显然，这是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同辩证法毫不相干。

（七）德拉—沃尔佩学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一股“科学的趋向”。它争辩说，革命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不正确理解，即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修辞学去取代了科学政策的缘故。他们主张重新考查运动的奠基性文件和对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以便引出正确的结论把潜在的阶级斗争改造成为积极的阶级斗争。这种倾向发轫于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

德拉—沃尔佩是意大利西西里米雪那大学的教授，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曾同法西斯主义妥协，1944 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他的学生、罗马大学教授科来蒂，曾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欢呼为

"解放",而在赫鲁晓夫下台时,因感到"所期待的更新没有发生"而退出意大利共产党。

以德拉—沃尔佩及其学生科来蒂为主要代表的德拉—沃尔佩学派,虽曾在匈牙利事件后主持过意大利共产党《社会》杂志编辑部,但因同该党领导有分歧,在1962年编辑部被解散以后,一直从事于理论活动。而这种理论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以歪曲马克思在1843年所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为主要依据,断然否定在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任何连续性,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解释成为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

德拉—沃尔佩在1957年出版的《卢梭和马克思》等书中,攻击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关于区别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和辩证方法,拒绝体系而拯救方法的论述,而宣称黑格尔的方法是同体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他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不同,是"科学的辩证法",是用特殊的确定的抽象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一般的不确定的抽象,是"一个从具体或现实到抽象或观念,和再从后者回到前者的循环运动。这正好意味着经济抽象或范畴的一次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证实",所以,科学辩证法只是实验方法本身,它从一个实在的具体的问题出发,前进到一个合理的("抽象的")假设,在最后为了证实而回到具体性。这是"现代的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是"自然—社会科学的统一",它的符号是"具体—抽象—具体循环"。在意大利共产党《再生》杂志1962年第19期上发表的《论辩证法》一文中,德拉—沃尔佩又攻击列宁把辩证法的本质规定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是接受了黑格尔化观点,违反了列宁主义,因为"具体不能被规定为对立面的统一,而是复杂、不同的统一"。

德拉—沃尔佩的学生科来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更加恶毒的攻击。

在196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一书中，科来蒂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特殊贡献的"物质辩证法"，早已包含在黑格尔著作中，是其唯心主义的工具和手段，"辩证唯物主义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抄写到它的文本中去罢了"，"然而，这个错误却表现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科来蒂还操着资产阶级新实证主义的腔调说："矛盾存在于命题之间，但不存在于事物之间，这两者之间的混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检验印记，这把它规定为一种假科学"。

在1975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的《矛盾和对立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一文中，科来蒂又以康德关于"真正的对立"的论述同辩证矛盾的区别为出发点，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两者混淆起来："恩格斯对……〔这种〕区别不置一词"，"在列宁那里，则由混淆支配着"，"毛主席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沿着相同的路线前进"。与此同时，科来蒂还用"真正的对立"论去否定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同科学原则、同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不相容，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院哲学式的形而上学"，而恩格斯的著作则是"形而上学宇宙进化论的源泉"。

（八）亚尔都塞学派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开始的，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地割裂开来的思潮，在二十年以后，即六十年代在法国亚尔都塞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并且在资本主义思想市场上产生了广泛得多的影响。

亚尔都塞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应征入伍，被俘后囚禁于德国战俘集中营，战后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白歇拉的指导下，写了《黑格尔哲学中内容的概念》的论文，一九四八年获得学位后，一直在那里教书。在组织上他是法国

共产党党员，但同该党路线有一段时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他曾反对追随苏共鼓吹人道主义，由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亚尔都塞的追随者曾经受到法国共产党严厉的党纪处分，亚尔都塞本人只是由于保持“沉默”才得以幸免。但是，在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公开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亚尔都塞一面声称有所保留，一面却又在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到处发表演说为之辩解，他说：“在事实上，它是说，‘在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等之后，专政这个词已变得不可容忍的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说工人阶级在一个广泛的人民联盟中的‘领导作用’时，只是在重复一个经典的命题罢了。所以，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亚尔都塞论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载《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七、八月号第一〇四期）。

从六十年代开始，亚尔都塞在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下，同人类学家高迪勒、塞倍等人一起，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研究，发表了《读〈资本论〉》(1965)、《保卫马克思》(1965)、《列宁和哲学》(1966)、《政治和历史》(1972)、《答约翰·刘易士》(1973)、《自我批评论文集》(1974)等一系列著作，在法国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附和与反驳之声纷至沓来，使亚尔都塞在资产阶级思想市场上获得巨大的名声。

亚尔都塞自称要对赫鲁晓夫谴责“个人崇拜”中所未曾解决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一些评论家更因他反对人道主义，反对黑格尔，主张什么矛盾的多元决定，而说他的辩证法观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有类似之处，这是同事实不符的，因为亚尔都塞无非是在用结构主义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罢了。在1977年11月11—13日在威尼斯举行的关于“革命后的社会”问题会议上发表的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演说中，亚尔都塞又进而说，“在六十年

代的整个检验时期，我们以我们的不同方式‘回到经典’，当时，我们阅读或重读马克思、列宁、葛兰西，试图在他们那里发现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论传统显然并不是‘纯粹的’；即同列宁的过于轻率的说法相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块钢铁’，而是包含着困难、矛盾和空白的”，接着，他列举出这些“困难、矛盾和空白”说：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上的表述，这是一个算术上的表述”，在其中，“劳动力作为一个商品被纯粹地和简单地计算着”，而“完全忽视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条件（劳动条件）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条件”；其次，“并不真正存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只是关于避免一切有关国家的资产阶级概念的反复警告，所以是一种反面的分界线和定义”，“列宁……企图超越出古典的反面的定义，——但摸索着而没有成功”；再次，“在马克思主义遗产中，你将找不到关于阶级斗争组织的真正理论，首先是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理论”；除此之外，亚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其它困难，也有许多谜。例如哲学的谜，特别是辩证法的谜，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除了提出少数几条过于概括而无法从字面上领会，以及过于模棱两可而令人费解的公式之外，没有说过任何东西。还有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东西危若累卵，尽管它显然具有非常抽象和非常哲学的特性……”。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的沉默以及根据他的著作重新确定他的哲学立场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打开了通往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道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里所写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章，把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形式固定并冻结了三十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载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一九七八年七月号）。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也被否定了，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

主义"呢？显然，亚尔都塞鼓吹的这一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在六十年代，亚尔都塞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阅读和研究马克思著作时，在有关唯物辩证法问题上所引出的结论，主要有二：一是根本否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二是竭力强调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

为了根本否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颠倒，亚尔都塞把矛头指着恩格斯，实际上也是指着马克思。他叫嚷说："决不能设想，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是不曾把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玷污了的"，"不可能设想，只凭一次'脱壳'的奇迹就可以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同他的世界观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所谓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并不仅仅是指他的思辨哲学、他的体系，而是也指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它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内在、同质的因素，"所以，要解放辩证法，只剥除它的第一层外壳（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也剥除附在它身上的第二层外壳。我敢于说，这第二层外壳就是辩证法本身的、不可分离的皮，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直到它的基础——本身"。所以，"不是把〔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向颠倒过来的问题，而是辩证法的结构的改造的问题"，马克思所谓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的说法是示意性、比喻性的，它提出的问题并不比它已经解决的问题少。费尔巴哈就是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是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引出了一种唯心主义人本学，所以，谁要是单纯地企图把黑格尔思辨哲学颠倒过来，谁就永远只是一个哲学上的蒲鲁东，成为思辨哲学的不自觉的俘虏（《矛盾与多元的决定》，载法国《思想》杂志 1962 年 12 月号）。

而为了强调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亚尔都塞还特地从语言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那里去借来"多元决定"

这个术语来描写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矛盾观的本质特征。

综合亚尔都塞在《矛盾和多元的决定》、《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等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可以把他关于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的论述，归结为四点。一是说，黑格尔的总体性是概念的简单的原始的统一，相等要素的循环的统一，而马克思的总体性则是各不相等的，在一个由历史决定的社会组织内相对自主平面上的复杂结构，它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二是说，在黑格尔的总体性内，各要素的连接由其在观念的内在化中决定，而在马克思的总体性内，则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三是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元的单纯的矛盾，一切事物的发展是由一个单纯的矛盾从始至终地决定着，反之，马克思的矛盾却是多元决定的；四是说，在黑格尔的矛盾中，观念的自然发展是本质，不同的社会现实是其表现、外在化，它们不可能占统治地位，而在马克思的矛盾中，政治、理论、意识不是经济的外在化，经济只是决定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等因素中由哪一个因素占统治地位。总之，亚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甚至在‘根本上’也是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反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种种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的统一、‘扬弃’、由量变到质变、矛盾……等等，在马克思那里具有一种与黑格尔手中所有的结构不同的结构”（《矛盾和多元的决定》）。

六、苏联哲学家的辩证法观

苏联哲学家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攻击和伪造，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而展开。早在五十年代中期，随着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捷潘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乌克兰采夫等苏联哲学家，就开始为

割裂、歪曲乃至公开修正和篡改对立统一规律而制造舆论，他们借口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特点，胡说什么辩证法的许多原理，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只“反映对抗性社会的特点”，而“不适应于上升的共产主义世界”；公开鼓吹“用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公式去代替过时的公式”。虽然随着苏联领导集团中由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换马，斯捷潘年、乌克兰采夫一伙鼓吹的对立统一规律过时论，由于过于露骨、不适合于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去骗人的需要，而遭到指责，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费多谢耶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博士罗森塔尔为代表的，以更加狡猾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谬论占了上风。但是，他们所鼓吹的，在实质上却是一路货色，只不过披上了较为精致的伪装罢了。

正因为这样，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权后大搞社会帝国主义的二十多年里，充斥于苏联哲学报刊上的，尽是一些否认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的谬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只反映对抗性社会的特点”呀，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负荷，已由斗争转到统一”呀，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和谐与平衡”呀，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统一是绝对的”呀，什么“差别不是矛盾”呀，什么“矛盾未必对立”呀，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基本矛盾”呀，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双方发展倾向一致”呀，什么“通过对立面的融合以克服对立面”呀，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矛盾而是统一”呀，……苏联哲学家们鼓吹的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所信奉的，是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部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假辩证法，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矛盾调和论、矛盾取消论的假辩证法。

在苏联一些哲学家那里，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攻击和伪造，还远远不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如前所述，在诸如运动的

矛盾性质，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实在性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上，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苏联哲学家巴克拉节、季诺维也夫，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沙夫、捷克的柯尔曼……一个接着一个地或作讲演、或写文章，操着和资产阶级学者完全一样的腔调，公开攻击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运动即矛盾的论述，而鼓吹用“没有矛盾的”运动表述去修正唯物辩证法的论述，鼓吹把矛盾局限于逻辑矛盾的范围之内，而否定其客观实在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面对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这种进攻，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揭穿他们的歪曲和伪造，驳斥他们的攻击和诽谤，推倒他们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并肃清其流毒，这是我们保卫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事情正象列宁所说的，我们“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遭到歪曲，并把它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①。

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辩证法观中，可以看出，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攻击和捏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性质——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问题种种；

关于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现在，让我们就从这样四个方面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歪曲、攻击和伪造逐项进行考查和剖析。

---

①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列宁全集》第5卷，第309页。

第 二 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截然相反

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经常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这样。

例如，在斯坦因克劳斯编的《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971 年纽约版)的论文集中，英、美、意大利、瑞士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哲学界名流，就都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

西德萨勒密近所著《黑格尔的辩证法》(1971 年柏林德文版，1975 年波士顿英文版)，更在题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的一节中，专门论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中的几次"颠倒"；

法国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亚尔都塞在 1977 年 11 月威尼斯"革命后的社会"问题会议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时，又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的问题"列为"危机"的表现之一。

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的问题，是一个哲学史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从各个角度阐明了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

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在马克思剥掉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去掉其唯心主义外壳，把它颠倒和改造成对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在哲学史上早有定论的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却在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老是纠缠不休呢？这显然不是由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哲学史上的这个问题，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①。

但是，杜林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时，却公然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恩格斯当即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这是"犯了错误"②。

然而，在二十多年以后，当着俄国的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却又重蹈起杜林的这个覆辙。为此，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强调指出："这又是老一套地非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非难看来已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用烂了"③。

从列宁写下这段论述到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八十多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居然还在再三再四地因袭着被他们的先辈"用烂了"的这"老一套"非难。

英国的新实证主义者罗素说："辩证法是马克思原样从黑格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5页。

③ 《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页。

那里拿来的"，"马克思的解释完全用了黑格尔的方法"（《西方的智慧》1945）；

奥地利的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他〔指马克思〕很不幸，由于在黑格尔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终未逃脱其恶劣影响"，"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是一种颇为危险的糊涂"（《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63）；

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胡克说："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就是黑格尔的方法"，"由于它们〔指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用同一武器彼此战斗，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方法"（《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费萨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马克思在 1844 年打算利用〔黑格尔的〕《现象学》来真正地达到理解历史，并且实现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载西德《黑格尔年鉴》第一卷上册，1961）；

另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维尔德姆特干脆说："独立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虚构"，"对于我们说来，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为占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它结成一种明确的关系而进行的斗争史"（《卡尔·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问题》，载瑞士《哲学研究》，巴塞尔，1963）。

…………

修正主义者尾随在资产阶级之后，也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这样那样地等同起来。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在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起来的基础上，攻击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反对面，并且是妨碍对事物作一切合理观察的圈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苏联的波格丹诺夫说："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和黑格尔的一样，并没有达到充分明了和完善的程度"（《生动经验的哲

学》1923)；

苏联的德波林说：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和唯物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综合"(《康德的辩证法》)；

匈牙利的卢卡奇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一整列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的以及经常使用的范畴，是直接地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发生出来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

德国的柯尔施说，在从一八四八年开始到十九世纪末结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离开一般的哲学而走向一种实证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另方面又服从于"一种在外表上相矛盾但在实际上却是相补充的哲学发展，……可以把这种发展的本质的特征描述为复归到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法国右翼社会党人蓬涅尔甚至说："黑格尔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东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承袭的，不仅是辩证方法，而且是对世界、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幻想，……所有一切构成本体论的辩证法的东西"(《黑格尔和马克思》，载《社会主义评论》1957年11月号)。

…………

为什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谈论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竟悍然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己多次明确的论述，而硬把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尽管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思想渊源，但它们毕竟代表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黑格尔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懦怯、妥协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要求——这反映为黑格尔的矛盾发展思想，但是，在

实践中的懦怯性和软弱性，却使得这种矛盾发展思想只能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表述出来，并在最后陷入到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之中，使得辩证法所固有的革命本质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完全遭到窒息。所以，黑格尔辩证法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反之，马克思辩证法所反映的，却是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百多年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之所以硬要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就是为的要抹煞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界限，借以摧毁无产阶级世界观。

正因为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攻击、歪曲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因此，列宁在斥责米海洛夫斯基之流的资产阶级批评家非难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滥调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班先生既不能从实质上反驳这个学说，就拚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摧毁这个理论的实质”①。

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黑格尔辩证法只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思想渊源，而在实质上，它们却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推翻不了唯物辩证法这种无产阶级世界观，就企图通过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混淆等同起来的办法，去摧毁它。

然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这种企图，同样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的一切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反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根本不同、截然相反的论述，却是对客观事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页。

实的正确反映和科学概括，因而也是推翻不了、抹煞不掉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在论述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不同、截然相反时，曾具体地阐述说：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

马克思的这些阐述，不仅说明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根本不同、截然相反，是在事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根本不同、截然相反，而且还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了马克思辩证法是怎样地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进行唯物主义地颠倒和改造，剥去它的神秘形式而发现其合理内核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一八四三年三月到八月所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把黑格尔辩证法从其唯心主义外壳中解放出来的艰巨工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的头脚倒置的思辨的辩证法：

“他〔指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②。

从物到思想，还是从思想到物？这历来是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原则区别。上面所引马克思在《黑格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法哲学批判》中的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事实同罗素、胡克、维尔德姆特、伯恩施坦、德波林、蓬涅尔等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原样拿来辩证法的种种说法完全相反，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揭露和批判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表述其辩证法的。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专辟一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进行批判。在其中，马克思强调指出：

首先，由于黑格尔在其哲学的发源地《精神现象学》中，把他认为是从人的本质中异化出来的财富、国家政权等等这样一些实际存在着的东西，把整个客观世界变成了思想物，变成了纯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其次，由于在黑格尔那里，人占有异化的对象世界，只是以对精神存在的占有形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是通过认识过程来实现的，“因而，尽管《精神现象学》具有彻底地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貌，并且尽管在其中在实际上包含有往往预示着在很远以后的发展的批判，但在《精神现象学》中却已经有以一种萌芽、潜力和秘密的形态潜伏着的、黑格尔后来的著作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①。

马克思在这里，用这样明确、清晰的语言指出，就在黑格尔哲学的发源地《精神现象学》中，潜伏着黑格尔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是有力地驳斥了费萨所谓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并在1844年手稿中打算利用《精神现象学》来实现黑格尔哲学的说法吗?!不是也有力地驳斥了坡培尔所谓马克思没有逃脱黑格尔的恶劣影响，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同样是颇为危险的、糊涂的说法吗?!不是还有力地驳斥了蓬涅尔所谓马

①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5—126页。

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承袭了对世界、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幻想等一切构成本体论的辩证法的东西的说法吗?!

在一八四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写作、一八四五年二月发表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

“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①。

在这里，马克思不是在坚持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吗？哪里是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从黑格尔那里原样拿来辩证法呢?!

在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手稿里，马克思恩格斯还曾说过：

“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

“按照黑格尔的幻想，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②。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从始至终都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从始至终都着眼于揭露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而绝不是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继承”、“占有”现成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于一八四六年基本完成以后，马克思更一面继续深入对黑格尔辩证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

的批判，一面又时时处处强调自己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例如，在一八四七年所写《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一次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质，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由于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而"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①。

在一八五七年八月至九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揭示了"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② 的原因。

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针对着那个在头年写评论故意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等同起来的杜林，强调指出：

"他〔指杜林〕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③。

马克思辩证法在批判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0、1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75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26 页。

展起来的这一部历史，彻底戳穿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原样拿来辩证法，所谓没有独立的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等一切谎言；它突出地说明了由于黑格尔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具有着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因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

正因为这样，在批判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辩证法，它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就不是一般的不同，而是截然相反，根本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致施韦泽的信中所指出的，是“科学辩证法”、“真正科学的辩证法”同“思辨哲学的幻想”之间的区别①；或者象恩格斯在一八七三年开始写作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指出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②。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把科学和幻想混淆起来，在化学中把热素说和热之唯动说，把燃素说和拉瓦锡理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话，那么，在哲学世界观上，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就更是荒谬绝伦的。

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驳混同论之一）

为了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还从各个方面去抹煞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原则界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8页。

首先就是竭力抹煞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为此，他们或者否认黑格尔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而颠倒黑白地把它说成是唯物主义的；或者否认马克思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而信口开河地把它诽谤成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的等等。

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芬达莱在1959年9月于伦敦召开的“现代英国哲学座谈会”上作报告说：

“在黑格尔那里有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实在论和唯物论的基础”，因为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一书中，“他主张一种相当奇怪的理论，即生命和精神出于拥有它们在无机界中的一切手段，犹如密纳发从丘比特的头中产生一样，黑格尔又承认，在这一决定性的事件以前，已经有了一个存在，却无数千千万万年没有发展。谁主张这一点，便不是主观主义者，并且也不可能由卡尔·马克思把他倒转来以脚立地。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是客观主义的又是主观主义的，并且他的被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所假定的改造只是在其内容的无限丰富中的一种——往往是可笑的和肤浅的——选择”（《黑格尔的现实》，载法国《哲学文库》1961年第3、4期合刊）。

到了一九七一年，芬达莱更加放肆地说什么：

黑格尔的体系“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可被说成是它的一个拙劣的、业余的笨拙表演”（《黑格尔对目的论的应用》，载斯坦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971）。

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斯说：

“马克思比黑格尔走得更远，他装模作样地把黑格尔看成一个唯心主义者，其实不是，正如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一样”（《反叛的人》1956）。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在马克思那里，正象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辩证法可以说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辩证法是理解这种韵律和参与其中的一种途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

新实证主义者弗兰克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教义颠倒过来，着手以他的三个辩证思维规律来树立物质的规律。这样，他们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它们仍然未脱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带有唯心主义的萌芽”(《现代科学及其哲学》1950)。

另一个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关于把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的那段话“指出了某种趋于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的倾向，可以说是一种实际的二元论，虽然在理论上说来，马克思认为精神显然只是物质的另一种形态(或另一个方面，或也许是一个附带现象)，但在实际上，它却不同于物质，因为它是物质的另一种形态。所引〔《资本论》的上述〕段落表明：虽然可以说我们的脚必须立在物质世界的坚固地面上，但我们的头脑——而马克思是高度相信人的头脑的——是涉及思想或观念的。根据我的意见，除非我们承认这种二元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63)。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说：

“然而，辩证法‘用脚站立’，决不是这么简单的事。纵令是事物常在现实中，但超越了我们能凭经验确证的事实的范围去思考，我们就会立刻陷于慫生的概念的世界。我们在这场合若是遵从黑格尔所拼凑的规律，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上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伯恩施坦用这种迂回曲折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尽管马克思

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了过来，辩证法还是唯心主义的。

德国的极左派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的概念，是对以前一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假定的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日常的、科学的和哲学的意识并不是一个空虚的幻象，也不是对现实的物质发展过程的一个从属的“反映”，包括科学的和哲学的意识在内的意识，是已确立的实在本身的一个现实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科学方法，这只是因为它是辩证的，而不是抽象的和自然主义的。根据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前科学的、科学外的以及自然界的科学意识，特别是历史社会世界的科学意识，不再自发地和从外面面对这个世界，而倒是作为它的现实的——如也是‘观念的’话——组成部分站在世界之中”(《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柯尔施的意思很清楚，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

黑格尔辩证法到底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这完全不取决于芬达莱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爱这样说还是爱那样说，而取决于黑格尔辩证法到底是怎样对待物质同精神的关系的，是把精神的东西当作最初的出发点，从中引出物质的东西，还是相反？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无非是概念的自我发展，不知由于何种原因从来就存在着的绝对概念，先是经过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尔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再后又在历史中挣脱出来，在黑格尔哲学中完全地达到自身。

既然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显露出来的辩证发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我运动的翻版，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

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推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和荒唐的创世说的神学虚构，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如实地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把辩证法归结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又把概念的辩证法看作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那么，马克思就显然把黑格尔辩证法倒置了过来，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颠倒和改造，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显然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问题很明显，胡克所谓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都把辩证法看作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加缪斯所谓黑格尔不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这种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而芬达莱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唯物主义颠倒和改造，叫作什么对黑格尔的内容无限丰富的辩证法的一种选择，乃至是什么拙劣的业余的笨拙表演，更是极其卑劣的瞎说。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再“丰富”，也并没有包含着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选择”。

那么，芬达莱所说的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那个“唯物论的基础”乃至“辩证唯物主义”，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里，问题并不象芬达莱所说的那样，在于黑格尔是否承认在生命之前有一个无机界的存在，因为对于黑格尔这样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来说，要害的问题并不是判定生命与无机界孰先孰后，而是是否肯定有一个作为全部现存世界（包括芬达莱所说的生命和无机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的绝对概念的存在。因此，在这里，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

问题的焦点就不在于黑格尔怎样论述生命和无机界的关系，而在于黑格尔到底怎样看待他的绝对概念对现实世界的关系。什么是本原的，是绝对概念，还是现实世界？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不过是绝对概念的"异化"，而无机物质只不过是绝对概念借以创造自己的异在发展的顶点的手段而已。他说：

"自然是上帝的圣子，但是并非作为圣子出现，而是表现为羁留于另外的存在之中——它乃是暂时被放在上帝的眷爱之外的神圣概念"；"自然是自在的，在概念中它是神圣的，但是作为自然的自然，其存在却与其概念不相符合；毋宁说自然乃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矛盾，它的特点就是设定性和否定性，例如古代哲学家们就把一般的物质理解为非存在。这样，自然也就被宣布为概念的自身堕落"，"就概念外在化成为自然来说，它的矛盾确切点说就是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各种自然物具有概念所产生的必然性，并且在有机体中具有合乎理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自然物具有漠不相干的偶然性，以及无法规定的无规律性"（黑格尔：《自然哲学》）。

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芬达莱所谓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物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纯属子虚乌有，纯属虚构。

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是"完全适合自然界对于精神是第一性的这一神圣的公式"的谬论时，曾经指出：

"波格丹诺夫把物理世界叫作人们的经验，宣称在发展的锁链上，物理经验要比心理经验'更高一层'。这真是荒谬绝伦！而这种荒谬正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如果波格丹诺夫把这样的'体系'也归入唯物主义，说什么他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那简直是滑稽。如果这样应用恩格斯的定义，那么连黑

格尔也是唯物主义者了。因为，在黑格尔的学说中也是心理经验(名为绝对观念)在先，然后是'更高一层'的物理世界(即自然界)，最后才是人的认识，人是通过自然界认识绝对观念的。在这种意义下，任何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否认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因为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性，实际上自然界不是被看作直接存在的东西，不是被看作认识论的出发点。实际上还要通过'心理的东西'的抽象概念这一漫长的行程才转到自然界"①。

列宁的这段话，是在芬达莱煞有介事地说黑格尔那里有"唯物论基础"，说黑格尔的体系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前整整半个世纪乃至六十多年以前写的，对于历任英国皇家学院哲学讲座、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自居的芬达莱来说，显然不会是陌生的。然而，这位讲座教授居然穷极无聊到去重演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被彻底戳穿的，波格丹诺夫把唯心主义叫作唯物主义的"荒谬绝伦"的"滑稽戏"，这难道不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中，已经没有什么象样的武器了吗?!

那么，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由黑格尔的把思维过程看作现实事物的创造主，改变为马克思的把观念的东西看作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这是不是象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所说的指出了一种实际的二元论呢?

不，这完全不是什么二元论。

因为二元论是一种把宇宙万物的基础看作是物质和精神两个互不依赖的本原的理论。而马克思却并不把精神的东西、观念的东西看作独立于物质的东西之外的独立本原，而是把精神的东西、观念的东西看作"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这就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237 页。

是说，把精神的东西，在本原上归结于物质的东西，就是把宇宙万物的本原归结为物质的东西这个唯一的本原，因而，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而不是什么二元论。

不错，马克思是高度相信人的头脑的，而人脑则是涉及思想或观念的，但这丝毫也不影响马克思对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个（物质的东西）而不是两个（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根本看法，因此，它所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是有别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二元论，而是有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评述施达克借口费尔巴哈“相信人类进步”而把他说成是“唯心主义者”的时候，曾经指出：

“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①

坡培尔指责马克思是什么“实际的二元论”，也具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什么“实际的二元论”，这在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坡培尔对于唯物主义的偏见和对于辩证法的无知。

柯尔施关于马克思辩证法认为意识既不是空虚的抽象，也不是对现实的物质发展的从属“反映”，因而是对以前一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假定的否定的说法，也同样是一种借口马克思辩证法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而否定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谬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4页。

论。因为尽管马克思辩证法承认意识具有创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但是第一，这是以意识正确反映客观实在为前提的；第二，更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意识终归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这，也就无比明确地肯定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肯定了一切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虽然这是一种有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以后，辩证法规律是否象新实证主义者弗兰克所说“仍然未脱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因而若是遵循这些规律，就会象伯恩施坦所说，“不知不觉地上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呢？

不，当然不是这样。

首先，辩证法规律并不是黑格尔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同样地贯串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逐渐地被思维着的人们意识到的。远在黑格尔之前，无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还是在东方哲学史上，都有人这样那样地表述过辩证法规律，而黑格尔则第一个全面地、然而以神秘的形式阐发了辩证法规律。

其次，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规律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事物和过程的反映，而是相反；因为他把辩证法规律当作思维规律，并把它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这样，世界的现实联系就完全被弄得头足倒置了，这就产生出一系列牵强的虚构。

因而，当着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以后，也就剥去了黑格尔强加于辩证法规律的唯心主义累赘。于是，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就立刻变得简单而明白了。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一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指出：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打来”①。

既然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规律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规律是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发展的反映，那么，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以后，辩证法规律“仍然未脱去唯心主义外壳”，若是遵循辩证法规律，就会“上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等等说法，就只能是出于形而上学仇视、敌视辩证法的偏见。

三、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驳混同论之二）

如果说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流派是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问题上，抹煞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界限的话，那么，资产阶级哲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流派则在马克思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问题上散布谎言，企图以此来抹煞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对立。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3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一切都弄糟了。在一种意义下，马克思之于黑格尔，有如亚里斯多德之于柏拉图；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天上拉到地下来了，其结果它是变得更加有害，我此刻说的乃是经马克思倒转过来的黑格尔辩证法，我是在考察它在纯粹的意义下所具有的逻辑效能。存在中是再也没有原因和结果的了；历史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依据各种内在矛盾的作用自己发展出来的”；

“于是，这种辩证法愈要求现实化，愈要求占有现实，把它当作由理智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愈把现实熔成液体，以便按照心灵的想象，把现实放在一种逻辑宇宙或一种逻辑变化的框子里加以改铸。……马克思曾经说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化，他自己的辩证法自以为是现实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不过是使这种神秘化变本加厉而已”(《经院哲学与政治》1945)。

奥地利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做了‘唯物主义的倒转’，但仍然给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带来一股‘神秘主义’的气味”，“来自辩证法的神秘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辩证唯物主义》1958)。

西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海斯也说：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颠倒’实在是令人惊异的和举世无双的事。虽然它并不象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去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衣。反之，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到底谁的神秘性程度更大，是黑格尔的还是马克思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1961)。

为了考查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评”，先得弄清楚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明确指出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了，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具有神秘形式、神秘外壳？马克思、恩格斯又是怎样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个神秘形式、解除其神秘外壳的呢？

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写的跋中，马

克思曾经说过：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近三十年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的批判，首先是指的在一八四三年三月至八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

那么，马克思所说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到底是指的什么，马克思又是怎样批判它的呢？

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第二六二节的批判中，马克思揭露和批判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说：

“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它们结合成国家，不是它们自己的生存过程的结果；相反地，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在这里，“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这一节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②。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揭露和批判的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就在于：黑格尔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关系这个主体，当成了理念的谓语；他把现实看作是理念向目的运动的结果、理念的产物，把现实的发展看作理念发展的现象。这样，黑格尔就把主体和谓语、现实和理念、原因和结果统统头足倒置过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3页。

所以，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正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必然表现。

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第二六九节的批判中，马克思又指出：

“他〔指黑格尔〕把身为理念的主体的东西当成理念的产物，当成理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①。

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思维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不是把辩证法看作现实发展的反映，而是把辩证法看作思想的自我发展，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看作其反光。这就是源出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

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第二七九节的批判中，马克思又指出：

“黑格尔说：‘可是主观性只是作为主体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这也是神秘化。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人格是人的规定。而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做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弄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神秘地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因此，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主体）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而这类规定的某一体现者总是应该有的），于是，神秘的理念便成了这类体现者”②。

不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而且在尔后的有关著作中，马克思始终坚持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方面的批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② 同上书，第272、273页。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在黑格尔那里，“外化底全部历史和外化底整个复归过程，不过是抽象的亦即绝对的思维，逻辑的、思辨的思维底生产史。因而，异化，作为这种外化和这种外化之扬弃底关键，在黑格尔那里乃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这就是说，它是思想本身范围内的、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或现实感性之间的对立。其它一切对立和这些对立的运动，不过是构成其它世俗对立之真谛的这些最关键的对立底外观、外壳、公开的形式”①。

在一八四五年发表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果实这个概念的分析，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说：

“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②。

…………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方面的上述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神秘主义显然源出于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神学虚构，显然源出于黑格尔的那个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绝对概念、理念。

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经说过：

“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例如，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观念、抽象的观念、绝对观念，却是唯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5、1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75 页。

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①。

因此，一旦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也就一举而剥去了它的神秘形式，解除了它的神秘外壳，使主体和谓语、现实和理念、对象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从头足倒置的思辨结构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正常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的唯物辨证法那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神秘主义可言的。

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哲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流派偏要说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以后，神秘主义反而"变本加厉"，而且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了呢？

马里旦的话给我们揭开了谜底。

原来，新托马斯主义指责马克思辩证法为"神秘主义"，同马克思揭露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毫不相干。

马里旦说：在马克思辩证法里，"存在中是再也没有原因和结果的了；历史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依据各种内在矛盾的作用自己发展起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马克思批判地吸取和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主张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运动。马里旦一伙新托马斯主义者之所以要把马克思辩证法指责为什么"神秘主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自己运动"跟神秘主义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新托马斯主义者要把主张事物自己运动的马克思辩证法指责为"神秘主义"呢？

原来，主张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就是从根本上排除了什么上帝创世、什么"第一推动力"的一切神学胡说。对于竭力想用加浓了的神学去代替黑格尔的"冲淡了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7页。

的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来说，这显然触到了它的痛处，因此，他们就出来表演这么一幕贼喊捉贼的把戏。这就是新托马斯主义把马克思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衣，说成反而使神秘主义"变本加厉"以至说神秘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全部原委。

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驳混同论之三)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混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又一个方面，是在马克思如何对待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的问题上散布谣言，制造混乱。

英国的新实证主义者罗素说：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更是直接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并且也遭到同黑格尔一样的困难"(《西方的智慧》1945)。

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说：

"马克思把辩证唯心主义转变成辩证唯物主义——在那里，作为达成最后统一和和谐之手段的矛盾的辩证法被保留下来了"，甚至马克思所阐明的阶级斗争"这个'规律'并非、也并未曾打算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推演出来，这是从黑格尔的辩证的形而上学中推演出来的，其推演的方法，据马克思说，就是把黑格尔倒立起来"(《自由与文化》1939)。

杜威的门徒、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得更加离奇：

"对冲突和对立的辩证解决是一切发展的原动力。它是对一个情境内部的相互冲突着的要素的生产性的综合，而不是对双方所共有的东西的演绎的分析。一个真正的综合要超过这和那的逻辑上的加法。它是用一种明确的方式采取的这和那"；"命题和反命题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的：即拒绝每一方构成为一个关系

的整体的要求；然而每一方的各方面都在新的整体或情境中得到保留和保存；并作为一个更加包罗一切的整体中的附属要素而得到重新解释或估价。正如查理·皮尔士所认识到的，黑格尔用这种方式摸索着去发现的，是自然的连续性的逻辑。黑格尔断定，这种连续性纯粹是逻辑的，马克思则认为它主要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胡克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同黑格尔共有着同一个所谓自然连续性的逻辑。

新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同客观事实背道而驰的。

大家知道，黑格尔辩证法是为反对唯物主义而论证唯心主义服务的，是为调和科学同宗教的对立、调和阶级矛盾而服务的。因此，黑格尔辩证法就不能不具有调和矛盾的特色。一方面，黑格尔认为任何具体事物都包含内部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正是由于这种内部矛盾的推动而转化和发展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表述的，因而他的矛盾学说在最终就不能不陷入形而上学之中：他认为只是在精神中才有矛盾发展，而在自然、物质中则没有新鲜东西产生；矛盾终究不是最真实的，而是要被扬弃的；矛盾的转化和发展只在不是最真实的有限事物中进行，而最真实的无限者，则是矛盾的超出和否定，对立物仅仅是其中相互依存的规定。总之，黑格尔认为，对立面的矛盾、斗争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绝对真理、认识的最高目标就在于矛盾的调和。

“〔在‘否定之否定’中，〕矛盾不是抽象地消灭了，而是被解决了和被调和了”（黑格尔：《逻辑学》）。

“只有在〔矛盾〕双方面的和解与调停里才有真实”，“所谓〔矛盾的〕解决并非说矛盾和它的对立面就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们在和解里存在”；“真正的发展只在于作为对立面来看的对立面的扬弃，

只在于各种活动力量的和解，而这些活动力量在它们的冲突中是互相力求否定对方的"；"真实界就是这种和谐与统一。理解真实的这种概念就是哲学的任务"(黑格尔:《美学》)。

"对立推到极端，就会消解其自身"，"而永恒的生命即是永恒地产生对立并且永恒地调解对立的生命"（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反之，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服务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却是把对立统一贯彻到底的辩证法，反对矛盾调和论的辩证法。

正因为这样，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地批判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就不仅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而且也批判了与此相联系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调和论；而更其重要的则是，马克思还针对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全面地论述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问题。

在一八四三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产生黑格尔矛盾调和论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和思辨性。

由于黑格尔把绝对概念当作世界的本质，所以他就把现实的矛盾看作是这种本质的表现和存在方式，把矛盾归结为现象，把对立面看作只是在精神中存在的，只是思想上的对立面，而不是现实的相互斗争的两极，所以他就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也即用某种第三种要素来作为矛盾双方的中介，而不是通过矛盾双方斗争的展开来达到矛盾的真正解决。为此，马克思强调指出：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8、358页。

接着，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通过对立面的中介把矛盾导向调和，而不是使之达到真正的极端即斗争的观点。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忽而使行政权成为国王和等级要素的居间者，使等级要素成为国王和市民社会的居间者，忽而又使国王在立法权中充当行政权和等级要素的居间者。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

"在这里，这些忽而起着极端作用、忽而起着居间者作用的极端所包含的荒谬性完全暴露出来了。这就象雅努斯的两面头，时而现出这一面，时而现出那一面，前后两面，各不相同。最初被规定为两个极端的居间者的东西，现在自己成为一个极端，而依靠原居间者同另一个极端联系起来的一个极端，现在（正是因为不同于另一极端）竟成了自己的对立极端和原居间者之间的居间者了"；马克思还讽刺地指出，在黑格尔法哲学中这种职务对调的结果，是使对立面之间不发生真正的斗争而竭力避免冲突，从而使它们在实质上成为不是真正的对立面："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帮好战之徒，可是他们又非常害怕彼此真打起来会打得鼻青眼肿，而磨拳擦掌准备打架的两个对手也就都想法使拳头落在给他们劝架的第三者身上，但充当这个第三者的却又是打架双方中的一员，结果由于顾虑重重，架始终没有打起来。这一中介体系还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一个人想打败自己的敌人，同时又不得不保护自己的敌人免遭别的敌人的打击；由于这种双重的地位，他的打算全部落空了"①。

同黑格尔的这种矛盾调和论截然相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揭露实际存在的矛盾、正确理解和把握实际存在矛盾的唯一途径，因而就从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4—355页。

象性和思辨性上，也即从根本上去克服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马克思指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象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

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同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立面的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重要原理（虽然那时的表述还不够完善）：

"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同时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有对另一极端的渴望、需要或预期"，"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以及这些对立面的转化……这种转化却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定性斗争的热烈渴望"②。

在这里，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指出一切对立的成分都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它们的互相对立并不排斥它们的互相联结，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真正极端不能被中介所调和，也不需要中介，以及由对立面的尖锐斗争到对立面的转化等思想，却是对黑格尔矛盾调和论的有力批判和驳斥。它们同黑格尔的处处强调对立面的"和解"、"调停"、"调解"、"和谐"、"消解"等等矛盾调和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面揭露了"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亦即他的只是似是而非的批判主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② 同上书，第355—356页。

根源”①，另方面，又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针锋相对，唯物地阐释了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探索了这对矛盾怎样发展到对立面之间的激烈冲突，怎样导致共产主义革命。这些论述，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论述相比较，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底关系就是劳动、资本以及两者的关系。

这两者直接和间接的统一，表现在：“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随后，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但是两者彼此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这两者相互之间的对立，表现在：“它们互相排斥，劳动者把资本家（反之亦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底存在”；

这两者各自对自己本身的对立，则表现在：“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后者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最彻底地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劳动者阶级，正象劳动者——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底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己本身和工资。劳动者本身是资本、商品”。

马克思强调指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敌对性的相互对立”，而且“无产和有产之间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就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就还没有从它的能动的关系、从它的内在的关系来把握，就还没有把它理解为矛盾。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底发达的形式（如在罗马和土耳其等等地方那样），也可以通过初步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的对立还不表现为受私有财产本身制约的东西。但是，作为排除了财产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的东西的劳动，即私有财产底主体的本质，和作为排除了劳动的东西的资本，即客体化了的劳动，——这就是处于上述对立底发展到矛盾地步的状态，因而也处于促使这一矛盾解决的强有力的紧张状态的私有制"①。

在一八四五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又针对着黑格尔就对立面统一问题所作的矛盾调和论的解释，论述了私有制世界中对立双方相互联结而又相互斗争的各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私有制世界产生的两个对立面、统一的整体。"问题在于在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在指出私有制是对立的肯定方面，要求保持自身和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而无产阶级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在异化中感到自己被毁灭，要求消灭自身和对立面——私有制，是对立内部的不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说：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3—74、79—80 页。

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①。

而在一八四七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指出这种矛盾导致人们的肉搏和全面革命。从而彻底否定了黑格尔的矛盾调和论：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在消灭阶级和阶级对抗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②。

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矛盾调和论的批判，马克思对于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制定的这一过程，清楚地说明了：罗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是直接从黑格尔那里借来，遭到同黑格尔一样的困难的论调；杜威所谓马克思保留了作为达成最后统一和和谐之手段的矛盾辩证法，所谓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中推演出阶级斗争规律来等等论调，统统是没有丝毫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而胡克的把对立双方在新的整体中都得到保留和保存的所谓“辩证解决”，把实用主义分子皮尔士所谓的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198页。

然连续性的逻辑，强加于马克思，就更是一种肆无忌惮的伪造。

五、两种不同的异化理论（驳混同论之四）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起来，还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等同起来。

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说：

"说自我意识不可异化，而又说这种意识的异化，这似乎是矛盾的。但这一矛盾，恰恰是黑格尔全部哲学的动力，至少是《现象学》的动力，也是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动力"，"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955）。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尔维兹说：

"马克思的异化范畴基本上与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范畴相类似"，区别只是在于"马克思异化概念不象黑格尔那样的广泛，它只是指人丧失自己的那些状况，它不包含那些主体通过自己外化而借以获得一种新内容的状况"（《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

另一个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比果说：

"马克思毕生是个黑格尔派。从黑格尔那里，他保留下人的异化和辩证法运动这两个重大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61）。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成员弗罗姆说：

"黑格尔是创造出异化概念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人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人的异化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也同在黑格尔看来一样，异化概念植根在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植根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或者换句话说，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他

应该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混淆等同起来的这种种说法,都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绝对概念的异化,异化是指的绝对概念把自己转化为自然界和历史,然后再复归自身的过程。

“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建立事物性”,“自我意识同样也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并使它们返回自身,因而在它的他在中亦是在自身——这是意识的运动,并且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它的各个环节的全体”;

“自我意识……从它的人格中把自己外化出来,从而把它的世界创造出来,并把世界视为异己物,因而现在必须加以占有。但是它的自为存在的放弃就是创造它的世界,通过自为存在的放弃自我意识就直接占有了现实。或者说,只有当自我意识自己异化自己时,它才是某种东西。它才有实在;因此它才把自己建立为普遍的东西,它的这一普遍性是它的有效性和现实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是宗教的异化,异化是指人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然后对它顶礼膜拜。

“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对于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异化论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持批判态度的。

关于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异化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说：

“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对宗教的批判只是政治批判的“胚胎”②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因为“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③。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有力地戳穿了伊波里特、比果之流关于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保留异化思想的谎言。

同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异化论、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根本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劳动异化，异化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了财富，却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他人，不仅如此，这些财富、财富占有者以及工人劳动本身，还统统成为同工人相敌对的、统治他们的异己力量：

“劳动者外在于他的产品中，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某种对他说来是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这个劳动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而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则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生命与他相对抗”①。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自我异化，劳动条件和劳动者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都是劳动异化的不同形态，它们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就把这种异化现象的消除同私有制的消灭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

“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②。

问题十分明显，由于黑格尔把异化看作是绝对概念使自己外化，然后又复归到自身的过程，因而，在他那里，异化就是一个在思维中发生、又在思维中消除的过程，它必然导致取消现实的阶级斗争；反之，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异化的理论却揭露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指出要消除这种异化现象，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社会分工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0、42 页。

的对抗形式，因而它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革命。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是两种在性质、内容上完全不同的异化理论。伊波里特说，自我意识的不可异化而又异化的矛盾，既是黑格尔哲学的动力，又是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动力，卡尔维兹说，马克思的异化范畴和黑格尔的异化范畴基本类似，只是广泛程度不同等等说法，统统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

既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这样明确地彼此区别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什么硬要把它们混淆等同起来呢？

原来，他们要打着异化的旗号，去鼓吹一种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以便把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同人性相对抗的、异己的力量。而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为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弗罗姆才把所谓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疏远的人性异化论，强加于马克思，把这种人性异化论说成是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共有的异化观。

然而，弗罗姆的这种说法，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造。

这不仅因为马克思所阐述的劳动异化论同弗罗姆鼓吹的人性异化论毫无共同之点，而且还因为马克思早就对有关人性异化的胡说作过尖锐的批驳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7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指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人性的异化”是一套“哲学胡说”：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就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①。

六、关于三段式问题
（驳混同论之五）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混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原则界限的又一个方面，是在马克思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式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做正反两个方面的文章。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说：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三段式的公式”，不仅如此，“马克思使用三段式公式给予这种运动〔指辩证法运动〕以一种颇为虚假的严格必然性的外貌。马克思完全为这种公式所迷惑”（《黑格尔逻辑研究》1959）。

西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海斯说：

“辩证法运动的炮制法……主要在于：在辩证法的三段式中，任何继起的环节都扬弃先行的环节，而自己又被下一个环节所扬弃”，“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如何遵守着这条操作原理”，他据此得出结论说：“黑格尔与马克思使用着同一个根本的运动公式”（《辩证法的本质与形式》1959）。

俄国的布哈林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5—496页。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辩证法“在思想上是由黑格尔的三题法的公式表现出来的”(《唯物史观》1921)。

意大利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来蒂则认为:

“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的辩证法是建立在黑格尔逻辑基础上的三个一组的结构的简单抄本”(《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

同这种把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黑格尔三段式的奇谈貌似相反、实则相成的另一种怪论,是说黑格尔压根儿不知道什么三段式。

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黑格尔的原文的真相不仅是偶然地脱离‘正题、反题和合题’,而是根本没有提到诸如此类的东西。‘辩证法’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正题、反题和合题’”,“卡尔·马克思把这个〔正反合〕的奇谈传播开来,……这种奇谈是马克思主义强加在黑格尔头上的”;

那么,马克思的这个正反合三段式的提法到底是哪里来的呢?缪勒煞有介事地告诉读者说:

“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六年的那个冬天,德累斯顿的一个康德主义者小组邀请基尔大学哲学教授海卡吕波依斯给他们讲授康德以后的新的哲学运动……他的讲演于一八三七年以《思辨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发展——为了促进学术界对最新学派进一步理解》为题公诸于世。这本书非常流行。曾经出了三版。在我手头的一八四三年第三版版本里,海卡吕波依斯教授说,‘第一个三部曲是有、无和变易的统一,……我们在这第一个方法论的正题、反题和合题内得到了……说明此后一切的例子或公式’。……卡尔·马克思在那个时候是柏林大学的一个学生,黑格尔俱乐部的一个成员,这本呱呱叫的书曾经在那里被讨论过。马克思摭拾了这个提法,而把它引申发挥成一套僵死而抽象的架格”(《黑格尔的

"正反合"奇谈》，载于美国《思想史杂志》1958 年第 3 期)。

缪勒在这里真是吹得天花乱坠、五光十色，只可惜是一个肥皂泡，一戳就穿！

在这里，对于缪勒用一半估计、一半猜测编造出来的这个所谓马克思摭拾了海卡吕波依斯的三段式提法的神话，根本没有加以考察的必要，因为问题的焦点在于正反合三段式到底是不是黑格尔的东西？黑格尔究竟有没有提到过这个东西？

缪勒凭着他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身分赌咒发誓地说："黑格尔……根本没有提到诸如此类的东西"！但遗憾的是，黑格尔却不买缪勒的账，他坚持说这是他的东西。

黑格尔在《小逻辑》开宗明义第一篇"有论"中，讲到"有"、"无"、"变易"时，就提到了"正反合"问题。谓予不信，请看黑格尔的原话：

"'有'之自身以及从'有'中推出的各范畴，不仅是属于'有'的范畴，而乃是一般的逻辑上的范畴。这些范畴也可以认作对于绝对的界说，或对于上帝之形而上学的界说。至少在每一正反合的方式中，第一和第三范畴可以这样看，因为第一范畴表示那范围内的单纯性质，而第三范畴则表示由分化而回复到单纯自我相关。因为对上帝予以形而上学的界说，即将它的性质表示在思想里，而逻辑学即包括一切思想的形式。每一个三进方式中的第二范畴表示那范围内的思想之分化阶段，因此只是对于有限事物的界说"(黑格尔：《小逻辑》)。

既然黑格尔本人坚持说正反合是他的东西，那么，当然就谈不上什么"马克思把正反合的奇谈强加在黑格尔头上"的问题，于是，实实在在地剩下来的，就只有缪勒自己捏造出来的所谓"马克思从海卡吕波依斯摭拾了这个提法，而把它引申发挥成一套僵死而抽象的架格"的"奇谈"，并在贼喊捉贼声的掩饰之下，把这种"奇谈"

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问题。美国俄克勒荷马大学的一位研究教授缪勒，为了诋毁马克思，竟饥不择食到要弄起这么一出顾头不顾腚的不光彩把戏，岂非可笑而又可悲?!

然而，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批评家”那里，缪勒这样的作风却并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事情。缪尔、布哈林所谓马克思保留了和迷惑于黑格尔的三段式，用它来表现物质辩证法运动，海斯所谓马克思与黑格尔使用着同一个根本的运动公式，科来蒂所谓马克思辩证法是建立在黑格尔三段式结构上的简单抄本等等说法，在实质上都是用和缪勒相类似的手法炮制出来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当杜林在《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书中，说什么“否定之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指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英国原始积累的产生的历史概述〕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的时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驳道：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因而，杜林的上述论断，是“纯粹的捏造”①。

几十年前，列宁在批驳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炮制的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的说法时，又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三段式的关系：

第一，“恩格斯〔《反杜林论》〕立论的重心在于断定唯物主义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47 页。

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这显然只是表明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每一个读过恩格斯（在反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种注解和第二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知道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第三，“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是按三段式的辩证规律来决定现实的发展的。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不过是物质的反映’。于是全部问题归结为‘正面理解现在及其必然的发展’：三段式只能起着使俗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黑格尔的字眼’，——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①。

问题十分明显，只有在把观念的发展看作是按三段式决定着现实事物的黑格尔那里，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在把观念的东西如实地看作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的马克思那里，是根本谈不上什么三段式的作用问题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三段式只是表明由于马克思辩证法在历史上起源于黑格尔辩证法，因而带有黑格尔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而丝毫也不意味着马克思辩证法在实质和内容上归结为黑格尔的三段式。只有“俗人”才会把他们自己感兴趣、但在马克思那里却只是起着“盖子”和“外壳”作用的三段式，当作马克思辩证法的内容和实质。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144、145、147页。

当着缪尔、海斯、布哈林、科来蒂说什么马克思保留了和迷惑于黑格尔的三段式，用它来表现物质辩证法运动，说什么马克思与黑格尔使用着同一个根本的运动公式，说什么马克思辩证法是建立在黑格尔三段式结构上的简单抄本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充当这种把盖子和外壳当实质和内容的“俗人”，又是什么呢？他们不是在重弹杜林、米海洛夫斯基的早已破了产的滥调，又是什么呢？

然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这些“批评家”们，却又不只是一些兴趣庸俗的“俗人”而已。他们之所以要重弹杜林、米海洛夫斯基的早已破了产的滥调，显然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在决定着他们的如意算盘：只要抓住马克思的这个表达方式，攻击其起源于黑格尔主义，就足以证明其等同于黑格尔主义，从而就可以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了。但是，他们所要的这出自作聪明的把戏，在实际上却拙劣无比，只能起到掩耳盗铃、骗骗自己的作用罢了。客观事实在那里摆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非常丰富的定义和叙述中，压根儿就没有黑格尔的三段式这么一项，杜林、米海洛夫斯基给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硬栽上黑格尔式的三段式的企图，在恩格斯、列宁的揭露和批驳之下，已经彻底破产，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们不以他们的前车之覆为鉴，那又怎么能使自己的后车不重蹈覆辙呢?!

七、关于黑格尔的泛神论和理性主义（驳混同论之六）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混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原则界限的又一个方面，是说既然马克思辩证法适用于客观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那么，这就陷入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泛神论。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说：

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把辩证法放在物质里"，这就使"出自黑格尔左派的形而上学的无神论渐渐地回到它的根源，回到老的黑格尔泛神论那里去了"（《完整的人道主义》1936）。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尔说：

"把辩证法弄成一种强加于宇宙的天然规律，弄成一种它自己会产生历史过程的形而上学力量，这就重新堕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理性批判》1960）。

意大利的科来蒂也帮腔说：

所谓马克思主义特殊贡献的"物质辩证法"，早已包含在黑格尔著作中，是其唯心主义的工具和手段，"辩证唯物主义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抄写到它的文本中去罢了"，"然而，这个错误却表现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物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信奉上帝的马里旦却把这叫作回到黑格尔的泛神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萨特尔则称之为重新堕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不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又是什么?!

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泛神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种唯心主义、泛神论承认物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吗？

事实是，由于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是作为绝对概念的"异在"而存在的，绝对概念是第一性的，而自然界则是由它派生的：

"直观着的观念就是自然界"；

"直接性的观念，作为它的反映，自由地外在化为自然界"；

"这个存在着的观念就是自然界"（黑格尔：《小逻辑》）。

因而，尽管黑格尔曾经阐发了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

但是，这些规律却不能不作为思维规律而被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事实上，正是从这里产生出牵强附会的结构，也正是从这里表现出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和泛神论。因为唯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把心理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把概念、观念当作本原，当作最初的出发点，从中引出物质自然界。而概念、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被当作抽象、绝对的东西凌驾于物质自然界之上，也就成了神的观念。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普通的人的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就成了神的观念"①。

反之，马克思恩格斯在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以后，所制订的却是唯物辩证法，就是说，不是把精神的东西，而是把物质的东西当作本原，当作最初的出发点；不是把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引出它们所固定的客观规律来，并且认为"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②。

在这样泾渭分明的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哪里有什么共同的"物质辩证法"呢？科来蒂之所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特殊贡献的"物质辩证法"早已包含在黑格尔著作中，显然是因为他把被黑格尔强加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的思维规律，同马克思恩格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引出来的客观规律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了。

事情也同马里旦、萨特尔的说法完全相反，恰恰因为马克思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思辨〕辩证法放在物质里"，把物质自然界的辩证法看作是绝对概念的反光，而是从物质自然界的运动中发现辩证规律，这才克服了黑格尔的泛神论；恰恰因为马克思不象黑格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尔那样，“把〔思辨〕辩证法弄成一种强加于宇宙的天然规律”，而是从宇宙万物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并把辩证思维看作不过是在宇宙万物中盛行的对立统一运动的反映，这才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指责马克思辩证法陷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泛神论的同时，又说马克思辩证法接受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写道：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马克思把辩证法称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因此当他在晚年重申自己忠于黑格尔的时候，我们可不能误解他的意思；他在黑格尔那里寻求的已经不再是辩证法的灵感，而是理性主义，为的是用它来为‘物质’、为‘生产关系’服务，而把生产关系看成一种自在的秩序，一种完全肯定的外在势力。问题已经不在于把黑格尔从抽象中挽救出来，重新创造辩证法，把它托付给内容的运动本身，并不建立任何唯心主义的准则，而在于把黑格尔的逻辑联系到经济学上去。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与黑格尔非常接近，而同时又正好相反；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才会写道，应当把黑格尔‘重新放在脚上’，马克思才会写道，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正好相反’”（《辩证法的历险》1955）。

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受惠于黑格尔的东西是一种关于理性的真正理论，德拉—沃尔佩的门徒科来蒂更进而发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著名的‘合理的内核’就是他的关于理性的理论。……如人们认识到只有黑格尔才能首尾一贯地发展这样的概念，认为思想是一个对象，认为理性不是一个实在或一物，这种理论的伟大性就变得明显了。事实上，在一切以前的哲学中，无限总是被看作和有限相分离的”（《科学的辩证法和价值理论》1961）。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又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作过明确的回答。

黑格尔认为：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黑格尔：《逻辑学》)。

蒲鲁东把黑格尔的这一套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炮制什么“贫困的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此作了揭露和批判：

“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①。

事情很清楚，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由于把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是他思维中发生的一切，这就颠倒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1、142、143 页。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客观事实，同时，又由于它局限于抽象的逻辑论断而否认作为理性来源的感性事实的可靠性，因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

按照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世界上的一切，无非是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总之是通过抽象而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归结为逻辑范畴，使整个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中，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中。显然这种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恰恰就是同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联系着的，而不是它的合理内核，对此，马克思历来采取批判态度。所谓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所谓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截然相反，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地克服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

所以，梅劳一庞蒂所谓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寻找理性主义，德拉一沃尔佩所谓马克思受惠于黑格尔的理性理论，科来蒂所谓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其理性理论的种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不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甚至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还卖弄过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但是，被马克思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却并不是梅劳一庞蒂所说的“黑格尔的逻辑”即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因为黑格尔遗留下来的辩证法，具有着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所以，事情就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所指出的：

“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

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通过无到无'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

被马克思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是经过唯物主义地改造过的辩证法，"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①。

所以，就连梅劳—庞蒂所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联系到经济学上去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马克思寻求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岂非无稽之谈?!

八、马克思不是改铸而是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驳混同论之七)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除了在一系列表现这两种辩证法根本对立的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外，还竭力美化黑格尔的政治观点，给黑格尔贴上革命的标签，据此而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根本颠倒说成是什么"改铸"。

早在一九五一年，德国的布洛赫就打出重新估价整个黑格尔的遗产和马克思在其中地位的招牌，把黑格尔描绘成一个在基本上是激进的思想家，把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说成是同黑格尔主义的见解密切地关联着的(《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1952)。

十年以后，西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海斯在一个专题报告中，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0—531、532页。

进而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说成是改铸而不是颠倒的关系：

“马克思说过，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作了颠倒，以便从中找到合理的内核。我们的比较研究则真正证明事情并非如此。马克思改铸了黑格尔。根据黑格尔写的状子，他提出了起诉，作为法官他证明罪犯是谁，宜判何种刑罚”，“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决不可能仅仅接受了辩证方法。他接受了更多的东西。如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描绘，黑格尔对异化世界的描述。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的阴暗描绘”，“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是黑格尔门生中最忠实的门生。马克思详细发挥了这位大师往往只是大略构想出来的概念。黑格尔首先在《现象学》里叙述的，后来在《法哲学》中发挥的财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里也表现出来。马克思的这个宏伟的描述是从黑格尔对自我异化世界的描述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方法的那种‘颠倒’才能完成”(《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1961)。

首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企图给黑格尔的政治容貌涂绘一个革命的脸谱，那是枉费心机的。

代表着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懦怯的、妥协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黑格尔，虽然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强烈影响之下，承认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使德国落后的封建关系现代化，但他却又不希望根本改变德国的封建贵族制度，尤其反对德国本国的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革命群众运动，他所向往的是君主立宪。在一八一八年任柏林大学哲学讲座以后，黑格尔更以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资格出现，把普鲁士王国称作绝对观念的体现者，认为当时的普鲁士君主制度是最合理的制度，社会发展的过程在这里最终停止了，不再有矛盾发展了。针对黑格尔所表现出来的懦怯的德国资

产阶级想同反动的容克地主妥协的倾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这是最坏的一种混合主义”①。

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实践中的懦怯性和软弱性，使得他只能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去表述那反映德国资产阶级一定程度进步要求的矛盾发展思想，而黑格尔的保守、反动的政治思想更促使他在哲学思想方面最终陷入到形而上学之中，认为矛盾最终被调和，发展最终要停止。

所以，象布洛赫那样把黑格尔描绘成一个在基本上是激进的思想家，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说成同黑格尔主义的见解密切相联，那显然是极其荒唐的。

那么，海斯所谓马克思接受并在《资本论》中表现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特别是关于异化世界的描述，所谓马克思详细发挥了黑格尔的概念，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两种不同的异化理论，在这里，让我们再以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异化世界的不同描述为例，来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正确地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人的本质在劳动过程中的对象化问题。但是：

第一，“黑格尔只知道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劳动”，因此，尽管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它看作是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对象化，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意识的对象在黑格尔看来，无非就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4页。

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第二，黑格尔认为，人在对象化过程中，只是在思想上丧失了自己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对象化了，获得了物的形式，但是，它不是对象化为自身的对立物，而是对象化为抽象思维的对立物。他认为，异化的劳动以自我意识表现出来，“在这里，异化底被设定的和应予扬弃的本质，不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为非人的、与自身对立的东西，而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与抽象思维有别的对立的东西”；

第三，“因而，对已成对象并且是异化对象的、人底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亦即在抽象中进行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①。这就是说，黑格尔认为只要在思想上理解异化过程，异化就会被扬弃了。

正因为这样，黑格尔就完全没有揭露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在生产中发生的人的力量的真正异化，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反之，马克思却考察了一般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条件下的劳动的问题。他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的四种基本形式，分析了异化劳动后断定：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工人本身没有权力支配自己，异化的社会力量把人贬低到机器附属品的地位，并使人与人之间建立歪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于人们自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对财产的关系。这种统治着人们的权力，就是资本。由此，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在私有制运动中奠定了全部革命运动的基础，并预料到通过革命来消灭私有制是消除劳动异化的途径：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底产品，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作

①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8、126 页。

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与劳动对立的"，"在政治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些制度下，劳动底这种实现、劳动底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底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底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对象底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样，劳动者经过异化、外化了的劳动，就产生出一种和劳动格格不入并站在它之外的人同这种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或人们称之为劳动的雇主和它的关系。这样，私有制是异化劳动、劳动者同自然以及同他本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①。而"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②。

所以，马克思对异化世界的描述和黑格尔对异化世界的描述，是在原则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描述。对于黑格尔描述异化世界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只有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和颠倒之后，才能被利用起来。而这也就再一次说明了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绝不是海斯所说的什么"马克思详细发挥了黑格尔概念"的"改铸"关系，而是马克思从根本上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的批判和改造关系。

九、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不容抹煞

在一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的时候，另一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则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地割裂开来，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联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系，有一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则在一些方面把这两者混淆等同起来，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把这两者绝对地割裂开来。

早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堕落为孟什维克以后，在哲学上，也歪曲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他把马克思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即三十年代后半期的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的绝对崇拜者”，第二阶段即四十年代时期的马克思，是“与传统的黑格尔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时期”，只是在已经完全制订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才对他们先前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表现了某些保留态度，对黑格尔所作的辩证法的发现作了肯定的评价。

关于所谓“与传统的黑格尔派进行坚决斗争时期”，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四十年代时期，即《神圣家族》时期，该书是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哲学贡献”，在这个阶段上，“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是两个杜撰的虚构的连结，两个零相加之和或相乘之积还是等于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进化中，在四十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很不公正”，“对黑格尔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不想从毒草中分出鲜花，从他的绝对精神分出辩证的方法”（《马克思的哲学进化》190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列斐伏尔著书立说认为只是在一八五八年以后，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准备工作时，马克思才重新发现和恢复了辩证法。在此之前，马克思是根本否定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一切辩证法的：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在这个时期的所有著作中，黑格尔的逻辑学受到了最大的轻视”，“《哲学的贫困》包括着一些特别严厉的字句，以针对黑格尔这种‘利用抽象和分析’把‘一切事物’归结为‘逻辑范畴’境界的方

法”，“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看起来是不可救药地被处决了”，“因此，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它的重要因素之一——辩证法被抛弃了”，“必须等到一八五八年，才第一次毫无恶意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193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在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的近二十年中，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割裂开来的思潮，在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中甚嚣尘上。

先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发表文章和著作，断然否认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任何连续性。他说，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一方和以斯大林为另一方，都假定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如同在“辩证法”中看到的连续性，而他则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毫无关系，是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辩证法，是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卢梭与马克思》1957）。

以后，亚尔都塞又进一步发挥了德拉—沃尔佩的观点，竭力强调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他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种种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的否定、对立的统一、‘扬弃’、由量变到质变、矛盾……等等，在马克思那里具有一种与黑格尔手中所有的结构不同的结构”，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矛盾观也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矛盾观，“多元的决定构成了与黑格尔的矛盾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特殊性”（《矛盾与多元的决定》，载法国《思想》杂志 1962 年 12 月号）。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地割裂开来的这种种说法，正如把这两种说法混淆等同起来的说法一样，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事实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从来就不是象费尔巴哈那样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而始终是注意发现和拯

救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致力于清洗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辩证法这颗珍珠的。

在一八四三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想进程中头足倒置的根本缺陷时，又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象存在于我们的各个邦里的那类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①。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再一次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说：

由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虽然在其中人只是在精神的形式中出现的，——所以在其中隐藏着往往已经在一个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形式中准备好了的和制定好了的批判的一切要素"，"因此，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底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底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底本质，把对象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底成果"②。

在一八四四年写作、一八四五年发表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进行深刻揭露的同时，又强调指出：

"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2、338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127页。

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①。

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怎么会在许多方面提供真实评价人类关系的因素呢？原因在于，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宏伟的历史观作基础。所以，尽管黑格尔辩证法是抽象的、唯心的，但他的思想发展却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决定了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他的思想发展的验证，因而表现头足倒置的颠倒，但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在他的哲学之中，黑格尔力图历史地，就是说在同历史的一定联系——当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所以，黑格尔是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在《神圣家族》中，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剥了出来，矫正了它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歪曲，用来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对立统一规律，从而展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私有制矛盾运动的各个方面②。

在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把经唯物主义改造过的辩证法，用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展开了有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以及社会和自然、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物质生产和人的生活的再生产、自由和必然等一系列问题辩证过程的论述。

在一八四七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一方面批判了蒲鲁东所抄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质，另方面又批判了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主观主义的歪曲。这后一方面，在实际上就反映了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所作的肯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6页。

② 同上书，第43—44页。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①。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这样再三再四的肯定和阐发，清楚地说明了普列汉诺夫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黑格尔抱完全否定的态度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坚持矛盾、强调对立，是他的深刻之处或较深刻的地方；指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隐藏着远超出其观点所准备和制定好的批判的因素，而作为其最后成果的否定辩证法则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147、148页。

系的因素；……

面对着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明确透彻的论述，普列汉诺夫所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是两个杜撰的虚构的连结，两个零相加之和或相乘之积等于零”，“不想从毒草中分出鲜花，从他的绝对精神分出辩证的方法”等说法，列斐伏尔所谓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的马克思著作中，“黑格尔的辩证法看起来是不可救药地被处决了”等等说法，岂不统统是一些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说法?!

那么，在一八四七年《哲学的贫困》之后到一八五七年的十年间，马克思又是怎样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呢？是不是真象列斐伏尔所说“必须等到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才第一次毫无恶意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呢？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里只要列举出马克思的一段话来，就可以再一次戳穿列斐伏尔的谎言。

在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日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社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说过：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指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①。

在这里，马克思用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的可能影响去例证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页。

格尔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不是有力地驳斥了列斐伏尔所谓必须等到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才第一次毫无恶意地提到黑格尔辩证法的说法吗？

事情很明显，在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辩证法之间存在着确定无疑的思想渊源联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时，又剥取其合理内核，这是任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都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

正是基于这个客观事实，马克思才在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看待的时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强调指出“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①。

所以，真正有启发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对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这个不容抹煞的客观事实进行毫无根据的怀疑，而是在于：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发现、拯救、清洗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一八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在强调解除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具有的神秘外壳的极端重要性时，曾经指出：

“黑格尔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②。

一八五九年八月，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中说：

作为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基础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必须通过对黑格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0页。

辩证法的批判，"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①。

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又强调指出，在剥去神秘的形式之后，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②。

一八六八年五月九日，马克思在致约·狄慈根的信中，又指出：

"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③。

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写的跋中，又一次强调指出：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④。

在一八七八年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指出：

"辩证法的运动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6页。

③ 同上书，第5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14、26页。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说：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①。

…………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连续性，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发现、拯救、清洗其合理内核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在马克思本人看来，黑格尔辩证法尽管有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却并不妨碍它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并不妨碍它包含有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并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既然把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个合理内核从它的唯心主义神秘外壳中剥出来，是建立唯物辩证法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那么，象德拉一沃尔佩那样断然否认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任何连续性，说什么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毫无关系，或者象亚尔都塞那样竭力强调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岂不统统是毫无根据的伪造？岂不全都是在把根本不是马克思观点的东西强加于马克思吗？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还有力地驳斥了列斐伏尔为了论证其在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关系问题上忽而混同忽而割裂的观点而散布的相对主义言论。列斐伏尔说，“无论对于马克思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唯物辩证法都不是一劳永逸地给予的、对黑格尔的一种唯物主义纠正”，“正如马克思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完全不同地评价他和黑格尔的关系那样，我们也必须按照历史的状态和由它决定的我们理论兴趣的本质，来从新另行解释关于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

和黑格尔的连续和分离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1939)。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说明，尽管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的批判和对其合理内核的肯定，在马克思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有所侧重，但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开始，却始终是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评价黑格尔辩证法的，就是说，既批判其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思辨性质，又注意发现并肯定其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过包括唯心主义神秘外壳在内的黑格尔辩证法，也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包含对立统一的发展学说这一合理内核在内的黑格尔辩证法。列斐伏尔所谓“马克思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完全不同地评价他和黑格尔的关系”，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而是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幻想。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压根儿就不知道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的统一，因而要辩证地观察问题，就必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形而上学思维总是在“是一是”、“否一否”的两极中游动着，在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思辨性质的地方，就否定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任何连续性，把两者绝对割裂开来，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发现和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地方，就否定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对立性，而把两者混淆等同起来。

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同把这两者混淆等同起来的作法截然相反的，但在实际上，它们却是歪曲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关系这同一个基本手法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服务于同样的政治目的。

如果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意味着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界限的话，那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则意味着企

图用形而上学去取代辩证法。

列斐伏尔在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的同时，宣称在一八五八年以前“还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它的重要因素之一——辩证法被抛弃了”；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辩证法同“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等同起来；科来蒂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结果是面向康德的某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而亚尔都塞关于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的论述，则使比亚齐得出结论说，所谓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是非常成问题的，倒不如说，马克思是从康德和费希特设置的问题出发的”（比亚齐：《结构主义》1970）。

然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通过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的办法，用形而上学去取代辩证法的企图，却正如他们通过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等同起来的办法，把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混同起来的企图一样，是徒劳的、枉费心机的。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在戳穿着这些绝对割裂论者的伪造：

在《论蒲鲁东》中，马克思强调指出：

在“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等问题时，“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

“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4页。

十、黑格尔体系同其方法的可以分割性(驳绝对割裂论)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时所持的一项主要论据，是说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同他的辩证方法是不可分割的。

德拉—沃尔佩说，认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象在“辩证法”中看到的连续性的说法，其历史先例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之间的区别，对于恩格斯来说，体系必须予以拒绝，但方法却必须予以拯救。然而，在黑格尔那里，这样一种分割却是不可能的(《卢梭和马克思》1957)。

亚尔都塞详细发挥了德拉—沃尔佩的这个论点。他说：《资本论》中关于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那段论述中“‘颠倒过来’这种说法，只是示意性的，甚至是比喻性的，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比它已经解决的问题少”，这是因为，“决不能设想，辩证法可能藏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面，如同一个内核藏在它的外壳里面那样”，所谓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不是相对地存在于辩证法之外的一种因素(例如“体系”)，而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内在的、同质的因素，所以，要解放辩证法，只剥除它的第一层外壳(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也剥除附在它身上的第二层外壳。我敢于说，这第二层外壳就是辩证法本身的、不可分离的皮，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直到它的基础——本身”，“不可能设想，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是不曾把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玷污的，或者认为这种‘玷污’只是对那一种虚构的所谓纯洁的、被‘玷污’以前的辩证法的‘玷污’”，所以，“把辩证法从它的黑格尔的形式中严格地夺取过来，这只会使我们陷入种

种危险的暧昧之中"，"谁要是单纯地企图把思辨哲学颠倒过来（例如从中引伸出唯物主义），那他只会永远是一个哲学上的蒲鲁东，成为思辨哲学的不自觉的俘虏，好象蒲鲁东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那样"（《矛盾与多元的决定》，载法国《思想》杂志 1962 年第 12 期）。

德拉一沃尔佩、亚尔都塞这些议论的一个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思辨性。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神秘形式，发现和拯救隐藏在其中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进而制定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这早已不是一个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成了客观现实的问题。而这一任务的胜利完成，则清楚地证明了：黑格尔辩证法同其保守体系的联结，只是说明了黑格尔辩证法在其原来形式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适用性，因而必须加以颠倒、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唯物辩证法，但却不说明黑格尔辩证法同其保守体系是不可分割的，是不能把黑格尔辩证法从其保守体系中解放出来加以唯物主义的颠倒和改造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到底是怎样论述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及其辩证方法之间的区别，又到底是怎样论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和改造的。

在那里，恩格斯指出：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那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

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①。

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在黑格尔那里，就是把历史的终结设想成：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对绝对概念的认识。而黑格尔的方法则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历史中，都是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显然，黑格尔的这种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同黑格尔体系的把全部教条内容宣布为绝对真理相矛盾的。

德拉—沃尔佩说，在黑格尔那里，体系和方法的分割是不可能的。但在这里，恩格斯却明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了，为什么、有什么根据说是不可能分割呢？德拉—沃尔佩没有回答。显然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恩格斯不仅把它们区分开来了，而且这种区分还是根据黑格尔体系和黑格尔方法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既然黑格尔的方法要求消除一切教条东西，黑格尔的体系却把全部教条内容宣布为绝对真理，那么，对于有一点现实感的人来说，怎么能够说把这两者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呢？显然，德拉—沃尔佩要使他的主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不应限于宣布这种分割是不可能的，而应当就恩格斯上面所举的例子，说明为什么这种分割是不可能的，证明这种分割是怎样地不可能的。

亚尔都塞所谓决不能设想，辩证法可能藏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面，如同一个内核藏在它的外壳里面那样，也和德拉—沃尔佩的议论一样，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纯抽象、纯思辨性议论。恩格斯明确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36—337 页。

出了黑格尔辩证法是怎样地藏在黑格尔体系中的，如果亚尔都塞认为恩格斯的论述是错误的，他就显然应当拿出事实、拿出论据来说明这个错误表现在哪里，说明辩证法为什么不能藏在黑格尔体系里，说明那藏在黑格尔体系里的又到底是什么方法。亚尔都塞的抽象的思辨的议论显然对问题的深入毫无裨益，因为根据于恩格斯的阐述，黑格尔的认为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自然和历史的辩证发展观，明明在黑格尔的认为在他的哲学中达到了对绝对概念的认识的体系里隐藏着，所以，这是一个对现实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承认还是不承认客观事实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显然，这是不以亚尔都塞如何“设想”为转移的。

恩格斯在指出黑格尔的方法同黑格尔的体系之间的矛盾以后，接着就指出：

当“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

那么，这个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装饰的革命方面，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这样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37—338 页。

亚尔都塞说，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的同质因素，因而要解放辩证法，就不仅必须剥除作为其第一层外壳的体系，而且也必须剥除作为其第二层外壳的辩证法本身，因为不可能设想黑格尔辩证法未受其体系玷污。

亚尔都塞的这番议论，纯粹是一种由抽象经过抽象达到抽象的议论。

这是因为，在这个场合，亚尔都塞要论证其所谓神秘形式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的同质因素，就必须指明在我们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把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之后，同辩证法“内在地同质”的神秘形式，又到底还表现在哪里？就必须指明神秘形式同辩证法又到底怎样“内在地同质”的？而决不应该满足于发表一些武断的宣言。

同样，在这个场合，亚尔都塞要论证其所谓要解放辩证法，就不仅必须剥除黑格尔体系，而且必须剥除辩证法本身，显然就必须指明对于辩证法本身应当如何加以剥除？而在把辩证法本身剥除掉以后，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解放辩证法”？而决不应该打着解放辩证法的旗号去剥除辩证法。

归结起来，在这个场合，亚尔都塞要论证他那套观点，就显然应当针对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应当发表一些抽象的空论。

然而，亚尔都塞、德拉—沃尔佩之所以竭力回避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味用抽象的空话、宣言来代替具体论证，却又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们的目的和企图所决定的：正因为德拉—沃尔佩企图用什么“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去顶替辩证法，亚尔都塞企图用什么康德设置的问题去顶替辩证法，因而，他们就不仅要反对黑格尔辩证法，而且要打着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旗号，反对一切形式

的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为此，他们就采取了把黑格尔辩证法同黑格尔体系不可分割地粘连在一起，借口不能从黑格尔体系中分割出辩证法，来反对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和改造，反对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唯物辩证法，采取这一系列策略。这就是亚尔都塞要把从黑格尔体系中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叫作什么"哲学上的蒲鲁东"、什么"思辨哲学的不自觉的俘虏"……的全部原委所在。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只能发表一些空洞、抽象的议论，而不能面对现实进行具体分析，以免把他们的上述目的和企图连同他们的策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总而言之，尽管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是唯心主义的、被神秘化了，但是；把黑格尔辩证法同他的体系不可分割地粘连在一起，否认其合理内核的客观存在，进而把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却是没有根据的。

恩格斯曾经用自然科学史上一种学说同它的前驱的关系，来生动地比喻和分析过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如在他的体系的其他一切部门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

"但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因而必须把这些理论同样地倒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长时期中占统治地位。当热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都被看做特殊的神秘的物质，而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质的运动形式时，热学的情况就是这样，热之唯动说才完成了这个倒过来的工作。然而被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在这里，特别是〔让·巴·约·〕傅立叶和萨迪·卡诺为正确的见解开拓了道路，而这种正确的见解本身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成自己

的语言而已。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列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①。

显然，无论在具体科学中，还是在哲学中，把一种学说同它的前驱混淆等同起来也罢，绝对割裂开来也罢，都是错误的。

十一、马克思纠正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盘否定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或者混淆等同起来、或者绝对割裂开来的同时，还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说成是费尔巴哈式的，并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唯物主义颠倒，张冠李戴地记在费尔巴哈的账上，借以贬低马克思和马克思辩证法。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应当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在是费尔巴哈在其《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和在其《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中才华焕发的分析的一个压缩了的复述，当马克思写他的批判时，他本人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8页。

瑞士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鲍亨斯基说：

“费尔巴哈在保存了辩证法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对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马克思……他特别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从费尔巴哈采取了基本的主张，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辩证法……后来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的’那个因素，在他还很少得到阐发”(《苏俄辩证唯物主义》1956)。

法国的亚尔都塞也把马克思在一八四○年至一八四四年的著作说成在本质上是费尔巴哈式的，只是在一八四五年以后才作了认识论上的突破(《保卫马克思》1965)。

不错，费尔巴哈从一八三九年发表《黑格尔哲学批判》开始，就站出来揭露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这一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无疑地是有巨大影响的。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强调指出：“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①。

在一八四二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中，费尔巴哈曾经叙述过怎样才能把思辨哲学翻转过来的方法：

“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无疑地可以找到费尔巴哈这一思想的反响。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时，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反，他并没有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义的颠倒和改造，而是全盘否定和根本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

“德国的先生们(反动的神学家们除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①。

为什么要“问心有愧”呢？就是因为费尔巴哈全盘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就是因为在这种全盘否定的影响之下，黑格尔辩证法被当成了一条“死狗”，使得形而上学重新泛滥起来。

费尔巴哈曾经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过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却唯独没有觉察到存在于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相反地，他把这两者混淆了起来，把黑格尔辩证法仅仅看作是他的唯心主义的体现，看作是他对自己体系的证明，因此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一起，象“把小孩连同澡盆中的脏水一块泼出去”一样地根本抛弃掉了。

虽然费尔巴哈在《改革哲学的必要性》、《宗教的本质》、《宗教本质讲演录》等著作中，发表过一些关于对立统一的观点，谈到过否定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力图了解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变化，但是，总的说来，费尔巴哈却是反对黑格尔以唯心主义形式提出的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

例如，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就说：

“真理并不在于与它的对立面统一，而在于驳倒这个对立面”。

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又说对立的同一只是一种思辨的抽象，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立范畴的直接统一，只有在抽象之中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用的。实际上对立物总是通过一个中间概念而联系起来的。这个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页。

间概念就是对象，就是对立物的主体”，“如果我将这些对立特性同时在我之内统一起来，这些特性就中立化了，迟钝化了，如同化学过程中的对立物一样：在化学过程中，对立物是同时并存的，它们的差别是在一个中立产物中消失了”。

费尔巴哈还把发展同斗争割裂开来，把发展理解为排斥矛盾，不同于斗争的另外的东西，并把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发展过程仅仅归结为纯粹的量变，避而不谈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

正因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所以，即使在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具有巨大影响的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也从来就是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有着原则的区别的，而根本不是什么费尔巴哈式的，更不是什么费尔巴哈的观点的复述。

例如，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高度地评价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说“费尔巴哈是唯一的一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抱严肃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真正地克服了旧哲学”①，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点和局限性，从而鲜明地标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同费尔巴哈式批判的原则区别：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底本质的发现，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仍然——至少是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同哲学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一事成为必要的，关于这一点，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弄清楚”②。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仍然存在着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必要性问题需要解决，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批判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2 页。

② 同上书，第 4 页。

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展开批判之前，马克思又特地强调指出：

“费尔巴哈把否定所包含的那个肯定，亦即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看做还缺乏自信的、因而本身还包含着自己的对立物的，怀疑自身的、因而需要证明的、亦即还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本身的，没有被承认的肯定；因此，感觉可以确实感知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是与否定之否定直接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然而由于黑格尔从否定之否定所包含着的肯定方面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是真正和唯一肯定的东西，而从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是一切存在底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还不是作为先在的主体的人底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产生底活动、发生底历史——底运动发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①。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指明了费尔巴哈是把否定之否定当作一定的意识状态来论述的，当作没有信心的、怀疑的、动摇的意识状态来论述的，而没有看到，黑格尔以此来表达——虽然是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历史运动，没有看到黑格尔指出了以否定之否定为形式的辩证发展，是一切存在的自我肯定的行动和自我创造的形式。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接着又指出：

“我们不仅要说明这一运动〔历史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而且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与现代的批判截然相反的、亦即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节对同一过程的描述截然相反的特征；或者更正确些说，我们将弄清楚这个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的批判的形式”②。

---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3 页。

② 同上。

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明确地指出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在原则上不同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是说，马克思的批判和费尔巴哈的批判相反，他不仅要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非批判性，而且要把黑格尔辩证法头足倒置过来，用批判的形式去揭示在黑格尔那里采取抽象的、非批判的形式的历史运动，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费尔巴哈不是唯物主义地颠倒了、而是全盘否定和根本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仅不是什么费尔巴哈式的，不仅不是什么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批判的压缩了的复述，而且同它正好相反，是一种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辩证法这颗珍珠”来的批判。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①。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②。

十二、马克思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历史意义

客观事实驳斥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起来或绝对割裂开来的种种错误说法，而雄辩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在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颠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5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3 页。

和改造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混淆等同和绝对割裂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又竭力贬低、歪曲乃至攻击和诬蔑马克思唯物主义地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历史意义，散布颠倒错误论、颠倒范围有限论、颠倒无用论和颠倒有害论，以诋毁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贬低无产阶级世界观。

资产阶级首先从坚持辩证法与唯心主义的结合的观点出发，来攻击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是“错误”的。

资产阶级哲学家维尔德姆特说：

“马克思让黑格尔辩证法头朝上、脚朝下的尝试是否成功了呢？那么，我们可以回答说：按照辩证法的最初的问题（象它从思辨唯心主义的基础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认为，颠倒〔辩证法〕的这种说话方式是错误的”，因为“辩证法是一种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从根本上说来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它永远只能在自身，亦即对现实的认识中显现出自身来”（《卡尔·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问题》，载瑞士《哲学研究》1963）。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梅劳一庞蒂说：

“当马克思说他使辩证法重新用脚立地，或他的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物’之时，那并不能只是历史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简单地对调脚色，好象这种对调会收到黑格尔指派给精神的那些作用似的”，因为“在变成物质之时，辩证法就呆板重滞了”，“马克思那里的历史的惰性便是由此而来的”（《辩证法的历险》1955）。

对于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的最好驳斥是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头几年中，在唯物主义地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制订唯物辩证法以后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制订了唯物辩证法，这就把伟大的认识工具、思想武器给了人

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这就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成为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武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百多年以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越来越深的程度上，以越来越高的自觉性参加历史活动，推动历史的迅速发展，单是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有力地驳斥了维尔德姆特关于辩证法是根本难以“实现”的认识过程，它只能在对现实的认识中显现其自身的说法，就有力地驳斥了梅劳—庞蒂所谓在变成物质之后，辩证法就重滞了，历史的惰性就由此而来的说法。不，事实正好相反，它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箴言：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①。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还出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偏见，而竭力贬低“颠倒”的伟大意义。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原校长诺克斯说：

“通过辩证法而获得的对立面的统一，是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对立据以克服的路线。但只有把第一性给予主体，它才能被克服，象在唯物主义理论中那样把第一性给予客体，就是忘记了正是主体在给出着这种第一性。物质之为物质，只是通过同精神的对比，因而是对精神而言的。由于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头立地’，并含有把它倒过来的意思，马克思这就使黑格尔主义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除了提供他自己的意义之外”（《为黑格尔答辩》，载斯坦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971）。

西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海斯说：

“马克思把唯心辩证法颠倒为唯物辩证法，这个结果并不令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震惊。物质生产条件、社会存在同意识形态的辩证交错关系很复杂，所以，任何这样的公式只有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这种“辩证交错关系”到底怎样地“复杂”呢？“对这一层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最严肃的代表人物也不否认‘意识’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决定‘存在’。无论如何马克思决没有否认这一点，而只有最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才把它简单化为这样：好象意识是从物质产生出来的，就象结果是从原因产生出来一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1961)。

德国的极左派柯尔施说：

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马克思的‘把黑格尔辩证法以脚站地’最终无非是意味着一种术语上的变化，在其中，物质被用来取代黑格尔的‘精神’而成为新的绝对，因为根据这种唯物主义，被解释为唯一主体的个人在‘认识论’上碰到一种‘独立于他的意识而给予的’实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些观点。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就是说，把黑格尔的认为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的唯心辩证法，颠倒和改造成为把观念的东西看作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的唯物辩证法，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颠倒和改造，具有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意义。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他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而包括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内的一切唯心主义则把世界说成是精神的世界，因此，尽管他们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

活动的"①。只是当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地颠倒和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创立了把世界看作是运动发展着的物质世界，把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提到首位的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才实现了世界观上根本性的革命变革，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提供了革命的武器。

恩格斯曾经说过：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②，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和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唯物辩证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③。

所以，诺克斯、海斯和柯尔施竭力贬低马克思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意义，那完全是因为唯心主义偏见在作怪的缘故。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和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这首先意味着把黑格尔鼓吹的所谓绝对概念对于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在内的现实世界的根源性，颠倒成：确认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

这是不是意味着诺克斯所说的"把第一性给予客体，就是忘记了正是主体在给出着这种第一性"，就不能实现"只有把第一性给予主体才能克服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对立的辩证法路线"呢？

---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当然不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确认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根据于客观事实，根据于人类实践，根据于科学。在这里，只有实事求是地确认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问题，而根本不存在诺克斯所说的什么“把第一性给予客体”那样随心所欲的恩赐问题。诺克斯反对唯物辩证法这个命题的逻辑实际上是：因为“第一性”这个名词是主体“给出”的，因此这个“第一性”就只能象唯心主义那样给予主体，而不能象唯物主义那样“给予客体”，否则便是忘记了由主体给出第一性这个名词的前提。然而，诺克斯的这个逻辑却是以名乱实的荒唐逻辑，拿了这种逻辑来观察事物，必定导致荒唐的结论。我们且举父子关系为例：父亲之所以为父亲，是由于和儿子相对比，是对儿子而言的，是由于儿子称之为父亲，这是常识。可要是按照诺克斯的逻辑办事，既然“父亲”这个名称是由儿子“给予”的，那么，就应当把它“给予”儿子，而不应当“给予”父亲，而要是把父亲这个名称“给予”父亲，那就是“忘记了儿子在给出父亲这个名称”！试问，这不是荒唐的谬论，又是什么呢？

至于诺克斯所谓只有把第一性给予主体，才能克服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对立，同样是把事情说颠倒了。这是因为，要是不确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对于意识的根源性，那么，不论黑格尔绝对概念“外化”、“异化”的能动性有多大，它充其量也只能在思辨中，以抽象的形式去克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曾经说过：“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①。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的克服，是只有在确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的基础上，通过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页。

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的由物质到意识、再由意识到物质的不断飞跃才能实现的。

所以，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以后，并不象诺克斯所说的那样，“使黑格尔主义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除了提供他自己的意义之外”，而是使辩证法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使之同唯物主义相结合，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获得其应有的意义。而这样一来，黑格尔辩证法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以后，也不象柯尔施指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样，似乎这种颠倒“最终无非是意味着一种术语上的变化，在其中，物质被用来取代黑格尔的‘精神’而成为新的绝对”。不，这种颠倒绝不是什么术语上的变化，而是世界观的根本改变，正是世界观的这种改变，导使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提高着自觉性。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这就重新唯物主义地确认物质世界的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但这并不是复归到机械唯物主义那样地贬低意识的作用，而是阐明了根源于物质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真正现实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和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这也意味着把黑格尔认为意识（绝对观念）第一性、物质（自然界、人类历史）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观点，颠倒和改造成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当然，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是和机械唯物主义不同的：

① 《哲学笔记》，第 228 页。

"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①。

但是，列宁在这里所说的"非常有限的范围"，却根本不同于前引西德资产阶级哲学家海斯所说的那个"很有限的范围"。因为列宁的意思是说：在确认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范围之外，第一，意识并不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什么东西，而是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谁否定这一点，便是二元论；第二，意识对于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谁否认这一点，便是机械唯物主义。

反之，海斯借口马克思主义的最严肃代表也不否认意识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决定存在，而说什么"马克思把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只有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却是企图给"意识是从物质产生出来的"这个命题贴上"最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而把它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中排除出去，在实际上，也就是企图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去否定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从而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干脆归结为零。这是因为，认为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的共同命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关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的强调，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区别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大脑这个物质分泌思想有如肝脏分泌胆汁，而唯物辩证法则认为意识是人脑这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它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还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不可分离。而要是马克思真象海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8页。

斯所说的那样，压根儿否认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真象海斯所说的那样，把这种观点叫作什么“最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哪里还谈得上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和改造呢？不，这一切统统是海斯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同马克思毫不相干。

如果说诺克斯、海斯、柯尔施贬低“颠倒”的意义的言论，是出诸于唯心主义的偏见的话，那么，考茨基在这方面的言论，则反映了他想用形而上学去顶替辩证法的意图。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首领考茨基一方面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即使把它简单地‘颠倒’过来，在自然界和在社会里都不能普遍地应用，倒常常只是以很勉强的方式才能应用，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能应用”，另方面又说“就唯物主义的应用来说，必须不只是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头脚颠倒过来，而且也要把脚走的路完全改变。我们必须不是在有机体的发展方向里，而是在其发展的动力中去寻找这个公式里的辩证的东西，而且把每个有机体对于环境的辩证法的行动看成这种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思维和实在的符合”。

那么，所谓必须完全改变脚走的路，必须在有机体发展的动力中去寻找辩证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考茨基说：

“按照恩格斯所描述的讲来，运动和发展不被看作自我和周围世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只被看作个体这一因素的自己运动，而反题和合题一样是从同一个体中求得。在这里，黑格尔的榜样，显然还有强烈的影响，黑格尔的榜样也只是从一个因素来说明运动，即只从由自己本身中设定自己的否定的那个精神来说明运动”（《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

在这里，考茨基显然是在鼓吹一种根本否定辩证法的形而上学。

问题的实质在于，把“运动发展”“看作个体这一因素的自己运动”，就是承认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就是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的统一来认识，就是承认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而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地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时，“必须揭发、理解、拯救、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①，而考茨基鼓吹的所谓“把运动发展看作自我和周围世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却是一种形而上学。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②。

反之，要是按照考茨基的主张办事，“不只是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头脚颠倒过来，而且也要把脚走的路完全改变”，那就不是什么“普遍地应用”或“以很勉强的方式”“应用”辩证法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能应用”辩证法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辩证法的问题，因为循着考茨基所指的这条路，只能走到形而上学外因论的死胡同里去。

---

① 《哲学笔记》，第1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合订本），第276—277页。

资产阶级对马克思颠倒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非议，还表现为肆意歪曲“颠倒”的本意，加以恶毒的攻击和诽谤。

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马克思……怀着充满恶意的傲慢在《资本论》序言中宣布说他已改革了哲学，他把黑格尔倒过来了”，“黑格尔把历史的意义说成是‘在对于自由的意识中的一个进步’，如果马克思在说他把黑格尔的哲学颠倒过来时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句话就要读成‘历史的意义是在对于奴役的无意识中的进步’”(《对立的相互作用》1956)。

法国的亨利·桑勃勒说：

“在他〔指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概念中”，“就已经有某些原则为‘个人崇拜’……开辟道路”（《从卡尔·马克思到毛泽东》1963）。

西德的海斯说：

“把辩证法变成预言工具的另一种颠倒也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颠倒。正是从这种颠倒中产生了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甚至对整个马克思的存在都至关重要的革命概念”，“这种颠倒却具有不同于马克思所赋予它的意义，这种颠倒归根到底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愿望，……制造混乱，把至上的东西翻到了最下层”，并说什么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的一段话中“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如何赋予无产阶级以武装侵略的任务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1961)。

关于马克思是在把认为思维过程看作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的唯心主义，颠倒成认为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意义上去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讲得非常清楚，而没有丝毫的含糊。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资产阶级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攻击、诬蔑，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统统是在肆意歪曲马克思原意基础上的胡说。

且以缪勒所谓“黑格尔把历史的意义说成是‘在对于自由的意识中的一个进步’”为例来说，马克思怎么颠倒它呢？

缪勒说要说颠倒是正确的话，就要把自由读成奴役，把意识读成无意识，这显然是蓄意歪曲。因为既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那么，颠倒的这种性质就规定了它并不是在什么自由和奴役、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的，而是在到底是把意识还是把社会存在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上进行的。

“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①。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②。

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把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完全颠倒过来，创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③。这就是说，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2—3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45页。

③ 同上书，第43页。

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

所以，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中，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把历史的意义看作是对奴役的无意识中的进步的问题。缪勒不顾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明确规定性，胡乱搬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原是想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侮辱一番，但是，事情却跟他的主观愿望相反，恰好搬起石头打了他自己的脚。

当着现实生活中，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于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奴役日益加剧的时候，当着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强调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火车头是革命，而不是什么“对于自由的意识”之后，缪勒之流却居然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搬出来，妄图再度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再度把一切外部的感性斗争都变成纯粹观念的斗争，并为此而对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进行恶毒的攻击，这不是在日益“进步”地宣扬“对奴役的无意识”，又是什么？

在实际上，宣扬“对奴役的无意识”的，不仅是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的目的，而且也是象桑勃勒、海斯这类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共同目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极其仇视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他们不以理论上的攻击为满足，而且还在政治上胡乱编造什么“为个人崇拜开辟道路”、“赋予无产阶级以武装侵略的任务”等帽子扣在马克思身上，来发泄他们的思想感情。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原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8页。

第 三 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颠倒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创立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它宣告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破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破产。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歪曲、攻击和伪造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竭力否定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任何可能性，恶毒攻击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由于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一个极其明显的标志，便是确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便是认为不仅人类历史和思维活动，而且物质自然界，都是辩证地发展的，便是明确指出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辩证法，是物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的辩证法的反映，因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否定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结合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时，就总是以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作为其攻击的突破口，在这个问题上歪曲和篡改马克思，攻击和诽谤恩格斯，宣扬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辩证法的必要因素，否定自然辩证法，否定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进而提出用这样那样的假辩证法或他们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取代唯物辩证法。

一、驳"马克思辩证法是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完整而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的哲学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出于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需要，却偏要不顾事实地散布谎言，在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同恩格斯的辩证法观之间制造对立，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观说成是限于意识生活、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排斥自然辩证法的某种东西，说成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如，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地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正象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辩证法可以说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辩证法是理解这种韵律和参与其中的一种途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

"必须把那种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企图看作同自然主义的出发点相矛盾的而予以排除。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自然辩证法。虽然他十分知道在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单位中，量的渐变产生质变"，"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地表现历史意识和阶级活动的逻辑。自然的客观秩序只有当它隐含地涉及到它制约着社会和历史活动的方式时，才是同辩证法有关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说：

"如果自然是辩证的，那是因为它是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明确指出的那个被人知觉并同人的活动分不开的自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48）。

"马克思已经把一种并不神秘的辩证法提上了日程"，它是同恩格斯的"使辩证法自然化"、列宁的"把辩证法放在纯粹的存在或客体中"相对立的，"从主体到客体和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乃是辩证法的动力"(《辩证法的历险》1955)。

美国肯色斯大学哲学系主任戴乔治则说：

"究竟马克思是否认为整个自然以及社会和历史是辩证地运转的，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1968)。

然而，应当指出，把马克思辩证法说成是什么主体客体相互作用，却并非始于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这方面，始作俑者是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那些竭力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人。

早在一九二三年，匈牙利的卢卡奇就在《历史和阶级意识 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这种理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种片面的僵硬的因果性必须被交互作用所代替。然而，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却不仅没有被应有地置予系统研究的中心，甚至简直没有被提到。然而，没有这种相互作用，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了。……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是改变现实"；

"能够把恩格斯对辩证法说明的误解，主要地归诸下列事实，即：恩格斯追随着黑格尔的错误的引导，把这种方法扩展到也应用于自然。然而，辩证法的定局性的决定要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

意大利的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写道：

"实践的哲学的始祖"〔指马克思〕，"反对'神秘的'辩证法而制定出来的，并不是'唯物的辩证法'这个公式，而是'合理的辩证法'这个公式"，它主张"具体的历史行为中对立物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与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

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一精神）”，认为“不可以把物质作为它本身来考察，而必须作为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的东西来考察”。尽管葛兰西的语言晦涩难懂，但他的意思却很清楚：在他看来，所谓马克思的“合理的辩证法”，就是认为物质、自然是同人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合为一体的，离开了这个主体一客体的同一性，是谈不上“合理的辩证法”的。

德国的布洛赫在《主体一客体　对黑格尔的解释》（1952）中说：

“辩证法本身，在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中就是客体一主体的关系，此外无它；就是所研究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常常克服由它本身所规定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并飞跃地向前突进”。

法国的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1957）中说：“辩证法……这不是自始至终地贯穿在事物中的”，因为“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

然而，把卢卡奇首创的所谓马克思辩证法是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论加以系统的发挥和论证的，却是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把辩证的，看作就是包括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马尔库兹认为，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把事实理解成主体和客体紧密地联合到客体在其结构中包含主观性的过程，阿道尔诺则说，辩证法是探查意识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力场的。

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马尔库兹和第二代的代表施密特，还为把这种辩证法即主体客体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而作了竭力歪曲事实真相的理论论证。

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理性和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兹说：

“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否定的总体性之中。然而，马克思的理论所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总体性，却不同于黑

格尔哲学的总体性，而且这个区别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决定性区别"："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一个普遍的本体论的过程，在其中，历史是仿效存在的形而上学过程的。反之，马克思却使辩证法同这个本体论基础分开。在他的著作中，实在的否定性变成了一个不能把它实体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事态的历史的过程。换句话说，它变成了和社会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况"。总之，"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变成的总体性，是阶级社会的总体性，而成为其矛盾的基础并形成其每一内容的否定性，则是阶级关系的否定性"，"这样，辩证方法在其本质上就变成一种历史的方法"。

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马尔库兹又说：

"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其概念结构上是一种关于历史实在的辩证法的话，那么，就只在自然其本身是历史实在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才包括自然（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对于自然的支配和利用，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然，等等）。但只要象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把自然从这些历史关系中抽象出来加以研究，那末，看来它就处在辩证法的领域之外"；而且，"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把辩证法作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的图式来加以发展，在这方面的第一步是由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迈出的"，而当辩证法"从一种批判思想方式变成一种具有僵硬地固定的规则和规定的普遍的'世界观'和普遍的方法"时，"这种转变就比任何修正都更加彻底地毁坏了辩证法"。

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之一、现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的施密特，则在其导师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具体指导下，专门撰写了题为《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博士论文（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五年法兰克福德文版；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伦敦英文版

中，还增添了施密特给辩证法问题巴黎辩论材料的德译本所写题为《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论文作为附录）去论证所谓马克思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间相互作用论。

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的“导言”中，施密特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从同人类的关系上来看自然”，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一切表述“不论是思辨的，认识论的还是科学的，都已预先假定了社会实践”，因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是自然构成要素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的题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非本体论特性》的章节中，施密特说，“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质就是把〔费尔巴哈所谓自然是非历史的〕同质性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他通过使自然和一切自然意识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而克服这种〔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特性”。

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的附录《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中，施密特又以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论述为依据，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说，辩证法只可能是一种历史方法”，“马克思……总是说他自己是非常警戒于‘自在的自然’的主题的，关于自然的一切表述都同所达到的社会对自然占有的特定阶段有关”。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其首要的含意，就是否认辩证法存在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界之中，就是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中，也即认为辩证法发源于人类、发源于主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鼓吹这种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把主体的能动性提到首位，用它去对抗和替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因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把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理论强加于马克思，则显然是没有

根据的，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让我们先从施密特的论据入手来进行考察。

诚然，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确实有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相互制约的论述，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却根本引申不出施密特所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同从人类活动的关系上来看自然”而摒弃“自在的自然”的主题，所谓“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一切表述都预先假定了社会实践”，所谓“马克思把自然的同质性分解为主体和客体，因而自然构成的辩证法就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只能是一种历史方法”等等结论。这是因为在那里，马克思明确指出：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尽管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但它们却终究是可以“划分”的两方面，是只在人类产生以后才相互制约的两方面，而并不是什么始终并存、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吗？不是清楚地说明了虽然只要有人存在，两者就相互制约，但自然史却终究先于和外于人类史，而并不是自然始终以主体—客体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因而自然史从属于人类史吗？

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也确实曾经从同人类活动的关系上来谈论自然界，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自然界”称作“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②；在《资本论》中，又把“土地”称作“劳动者”的“原始的食物仓”和“原始的劳动资料库”③。但是，要以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依据"去否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却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在一系列著作中，明确论述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过程。

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马克思辩证法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排斥自然辩证法的种种说法相反，马克思是始终确认在物质自然界里是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的。

早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篇中，马克思就指出了太阳与植物互为对象的关系，指出了月亮、慧星、地球之间肯定、否定的对立统一关系：

"太阳是植物的对象——对于植物来说，太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确定其生命的对象，正如植物是太阳的一个对象，是太阳的唤起生命的力量的表现，太阳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的表现"；

"象月亮和慧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的自然形式，依逻辑讲来，是一方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同另一方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之间的对立。而地球，作为这种对立的否定的统一，就是逻辑上根据的自然形式，等等"①。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太阳和植物，月亮、慧星和地球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说，是没有主体介入的、"自在的自然"中的辩证关系。因此，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显然一下子就戳穿了施密特所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从同人类活动的关系上来看自然"而摒弃"自在的自然"的主题，所谓"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一切表述都预先假定了社会实践"，所谓"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质就是把自然的同质性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所谓"马克思辩证法只能是一种历史方法"等等伪造。从而，也一举戳穿了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谓马克思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伪造：既然在太阳和植物，月亮、慧星和地球的关系中，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提到

①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145页。

过人这个主体，试问，在这里，哪能有什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里，根本没有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作用，而马克思却展开了“自在的自然”中辩证过程的论述，这不清楚地说明了所谓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观，同马克思毫不相干吗?!

然而，马克思对物质自然界的辩证过程的论述，还远远不只是这一处。

在一八四五年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又指出了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①。

在一八四七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重申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的观点说：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②。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一再重申运动是“物质”、是“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存在物”所“固有的”“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时，并不是指人力对于它们的推动或改造，而是指体现物质的生命力的、它本身所固有的运动。

在一八五三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学者”，就是指的黑格尔。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自然界基本奥秘之一，看作是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并且要用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可能影响去检验这个规律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有力地揭穿了马尔库兹所谓的马克思辩证法的特征在于使辩证法同普遍的本体论基础分开的说法，纯属他自己的伪造。

首先，既然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基本奥秘之一的论述，那么，马尔库兹所谓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一个普遍的本体论过程，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同这个本体论基础分开，是一种历史的方法的说法，就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肯定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基本奥秘之一，这哪里是什么“同本体论基础分开”呢？又哪里是把辩证法只当作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呢？

其次，既然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基本奥秘之一的说法，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万应的原则的论述，那么，马尔库兹所谓第一个把辩证法作为一般的方法论图式来加以发展的，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而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纯属无稽之谈。马克思肯定黑格尔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自然界基本奥秘之一，看作适用生活一切方面的万应原则的作法，这不是在把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看作是普遍的世界观和普遍的方法论，又是什么?!

再次，马克思肯定黑格尔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自然界基本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页。

秘之一，看作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万应原则的作法，并让人们用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去检验它，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同马尔库兹所说的完全相反，这不仅不是什么“比任何修正都更加彻底地毁坏了辩证法”，而且恰恰正是展开和运用辩证法的一项基本内容，恰恰证明了辩证法是无所不在的。

在一八六七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交换过程时，曾经指出椭圆是一物不断地向另一物落下又从该物离开这个矛盾得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①。

“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在这段论述的注释中，马克思又指出：

“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为基础的”②。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又指出：

“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象机器和其它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22 页。

② 同上书，第 341—342 页。

间间隔"①。

上面所引马克思的九段论述，从时间上说，摘引自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一直到一八八三年马克思逝世之前还在精心创作的《资本论》第三卷，就是说，这些论述，是在马克思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创始人之后的近四十年的长时间内写下的；从内容上说，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不仅从原则上肯定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指出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而且还具体地论述了从天文学中的太阳、月亮、慧星、地球，到力学中起落的物体，化学中的分子，生物学中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的对立统一以及作为对立统一的表现的质量互变和肯定否定的辩证发展，而只字没有提到人类作为主体同这些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清楚说明，马克思是始终肯定物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辩证发展，而且也同样反映了物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作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在内的。

因而，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就雄辩地驳斥了实用主义者胡克、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兹所谓马克思辩证法在概念结构上就是历史实在的辩证法，主要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而把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排斥在外的种种说法。

当马克思在上述论述中，具体地谈到天文学中的太阳、月亮、慧星、地球，力学中起落的物体，化学中的分子，生物学中的植物和动物的成长和生产时，这哪里是什么"在概念结构上就是历史实在的辩证法"，"主要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呢？又哪里是什么"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而把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排斥在外呢？不，这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5页。

所涉及的，统统是人类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人们意识生活之外的物质自然界；而且这些“自然的客观秩序”，还不是象胡克所说，只是由于其“制约着社会和历史活动的方式”，或者象马尔库兹所说，只是由于其是“历史实在的组成部分”，或者象梅劳-庞蒂所说，只是因为“被人知觉并同人的活动分不开”，才同辩证法有关的，不，它们统统是和人类社会与历史活动的方式无关地，按照对立统一规律以及作为这个规律的表现质量互变、肯定否定地运动和发展着，因为这是“物质的固有的特性”，是物质的“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有力地驳斥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定局性决定要素，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所谓马克思辩证法以主体到客体和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为动力等等说法。

当马克思在上述论述中，谈到天文学中的太阳、月亮、慧星、地球，力学中起落的物体，化学中的分子，生物学中的动植物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关系时，既没有提到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没有谈到什么从主体到客体和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但它们在这种既没有卢卡奇所说的“定局性决定要素”，又没有梅劳-庞蒂所说的“动力”的情况下，却照样地相互关联着和辩证地发展着，这不就雄辩地说明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谓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定局性决定要素，梅劳-庞蒂所谓从主体到客体和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动力等等说法，纯属没有根据的伪造吗?!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还有力地驳斥了戴乔治所散布的所谓马克思是否认为整个自然以及社会和历史是辩证地运转的，还是一个未决问题的怀疑主义论调，因为马克思在近四十年中所作始终一贯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说明，在马克思看来，整个自然界，也象人

类社会和历史一样，都是辩证地发展着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未决问题”，而是铁案如山，不容推翻的定论，因为它证据确凿地反映了客观事实。

然而，尽管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是始终确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的，象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卡尔维兹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却偏要出来借助于诡辩加伪造，大做翻案文章。

例如，关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有关运动是物质的固有的属性那一段论述，卡尔维兹说：“首先这不等于说，物质有其固有的运动，即使在没有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个运动也支配着整个现实”（《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

真是别出心裁！

马克思明明是说的“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卡尔维兹却偏要颠倒马克思原意说“首先这不等于说，物质有固有的运动”，偏要把这种为物质所固有的运动说成是由于“人在场”。这不是强词夺理的诡辩和无中生有的伪造，又是什么？

卡尔维兹把物质固有的运动说成是由于“人在场”，进而说成是由于什么“神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的结果，借以欺骗和愚弄其信徒，这对于新托马斯主义的神父来说，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卡尔维兹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利把他的这种明明是跟马克思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神学说教强加于马克思。

然而，事情还不限于这些，卡尔维兹还把马克思著作中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大量论述，说成是“在这些主文里面指的不是严格的自然辩证法，而只是仅由于运用智巧才成为可能的自然辩证科学”，而“自然辩证科学就在人和自然接触时所发生的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起着作用。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接触就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现实”（《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

真是越编越离奇!

卡尔维兹显然认为他如此这般地“运用智巧”,编造出一个“在人和自然接触时发生的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起着作用的”、区别于“严格的自然辩证法”的、所谓“自然辩证科学”这么一个名词来,就能把马克思著作中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大量论述一笔勾销了,但这只能是一种痴心梦想。这是因为马克思在上述论述中所提到的太阳与植物,月亮、慧星与地球,一物不断地向另一物落下又从该物离开,化学中分子的运动和关系,植物动物成长和生产的自然时间间隔规律等等,这一切都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就客观地存在着的,而在出现了人类之后,有的仍然完全在“人和自然的接触”之外客观地存在着,有的则在没有“人和自然的接触”的情况下还照样地存在着,所以,它们根本不是在什么“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起着作用”的,因而,它们所证明的,正是马克思论述的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不是卡尔维兹编出来强加于马克思的什么“自然辩证科学”!

二、马克思始终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把所谓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观强加于马克思的同时,又肆意篡改马克思的自然观,竭力否认马克思始终肯定外部自然界优先地位的立场观点。为此,他们首先就致力于歪曲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论述。

早在一九三二年,当着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以德文公开发表时,就有人撰文说什么“这个马克思是实在论者,而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抛弃了哲学唯心主义,并没有

使得他用物质的最高实在性来对抗观念的虚构的最高实在性，无宁说他使这两种实在性仅仅从属于既被动又能动、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无所不包的生活现实的总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种歪曲和篡改症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那里更加广泛地蔓延开来。

存在主义者埃里希·梯尔在为一九五〇年科伦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评注性导论时，说道：

《手稿》证明，马克思在制定其“洞察自然界、社会和历史的创造和终极目的”的世界观时，把“人及其生活的意义”，即“哲学—社会学的人本学”提到中心的地位，他把《手稿》中关于人在劳动过程中同自然界统一和相互作用的观点，说成是“关于人类本质的本体论的学说”，他企图借此证明，马克思所了解的自然界，不过是从人的感性派生出来的某种第二性的东西（埃利希·梯尔：《从巴黎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一书导言》，1950）。

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霍梅斯说：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自然界只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关于客观现实的学说，而是主观借异化而客观化的学说（《技术爱神》1955）。

奥地利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说：

“我们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的对人和自然统一的辩证理解，是与唯物主义不相容的，因为它是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前提的”，而“假定了这个超时间的人的观念的预先存在，我们就会抛弃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中的人和自然》，载于《一九六一年大学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和人物》）。

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朗特格莱勃说：

“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在一种无意识的事态的规律性的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一种自存的自然物质的运动规律”，这是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自在的自然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自在的自然可能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可以根本不问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自然根本就什么也不是，一般说来，对它作不出任何一种有意义的说明。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不仅与唯心主义有血缘关系，而且甚至在结构上相同”(《辩证法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60)。

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说成是认为“自在的自然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本就什么也不是”的唯心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朗特格莱勃拿出马克思的两句话来作“证据”。一句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说“抽象地、对着自然本身而与人隔离开来加以固定的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只是虚无”；另一句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着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劳动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尔维兹说：

“马克思以为在自然中离开了人，那就不能设想自然”，“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就是整个自然的运动”，而“这等于说，不以任何人的存在为转移的一种辩证法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卡尔维兹还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责备过费尔巴哈，因为他把自在的自然界看作是离开人而独立的”，为此，他也引了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所说“抽象地、对着自然本身而与人隔离开来加以固定的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只是虚无”来论证他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之一的施密特，也歪曲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类对于自然界能动改造的论述，去否认马克思始终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马克思并不认为对于〔自然〕这个在人之外的实在，要在一个未被理解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从本体论上来加以理解”，相反，由于“马克思接受唯心主义的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见解”，因而认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内”，“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是通过社会劳动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条把感性世界分成原先给予的要素和经由实践中介的‘外来附加成分’划分开来的路线”(《马克思的自然观》1973伦敦版)。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关于马克思的自然观在结构上和唯心主义相同或者接受唯心主义、或者抛弃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种种说法，统统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歪曲和伪造。

那么，马克思的自然观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又是怎样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呢？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地球创造说，从地球发生学——即把地球的形成、地球的生成当作一个过程、当作自我发生来叙述的科学——方面遭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地球创造说的唯一的实践的驳斥”①。

在这里，马克思热情欢呼地球发生学对于地球创造说的胜利，积极赞同并宣传把地球的形成、地球的生成当作自我发生、自然发生来叙述的地球发生学，这不有力地证明了事情同朗特格莱勃、卡尔维兹所说的完全相反，马克思不是否定而是明确肯定“离开了人的”、“自在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吗？这不有力地批驳了埃利希·梯尔所谓马克思把人及其生活的意义即哲学—社会学的人本学提到其世界观的中心地位的说法吗？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实竭力强调人类实践改造自然界的能动性，认为自然界并"不是完全符合原样地直接呈现在人的存在物面前"，而是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经过人类劳动实践改造过的自然界，才是"人底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①，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还是强调指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要是没有自然，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劳动者就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因为"感性外部世界是材料，他的劳动是在材料上表现的，在材料中进行活动的，从材料里面和凭材料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的资料"②。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是彻底揭露了施密特所谓"马克思并不认为对自然界要在未被中介的客观主义意义上加以理解"，所谓"'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内"等种种说法纯属伪造吗？不是还驳斥了资产阶级哲学家所谓马克思使物质和观念两种实在性都从属于生活现实的总体的歪曲吗？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在批驳所谓"对土地的开垦'创造充分的土地所有权'"这种说法时，曾经强调指出：

"其实，这里只创造了物质的新的生产能力。……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③。

马克思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在这里得到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明。而马克思的把"物质本身"同"物质的新的生产能力"明确区别开来，则不仅指出人类通过"对土地的开垦"等生产实践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而且指出，即使对后者的创

---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91页。

② 同上书，第53—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造也得以前者的“预先存在”为前提。

所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有力地揭露了施密特所谓“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是通过社会劳动的形式而出现”，所谓“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条把感性世界分成原先给予的要素和经由实践中介的、外来附加的成分划分开来的路线”等等说法，纯属他自己的捏造而同马克思毫不相干。马克思的论述，还有力地驳斥了埃利希·梯尔所谓马克思了解的自然界是从人的感性派生出来的第二性东西，霍梅斯所谓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只是人类世界一部分等等说法。

至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马克思接受唯心主义而抛弃唯物主义的种种说法，那么，应当说，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论述就象是对此所作的一个明确的批驳。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确实说过，由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些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不是从主观方面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是，紧接着马克思就强调指出：“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①。

所以，事实的真相和施密特、威特尔、朗特格莱勃的歪曲完全相反，并不是什么马克思“抛弃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而是批判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那种形式，因为它“忘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也不是什么“马克思接受唯心主义”或马克思的观点“和唯心主义在结构上相同”，而是批判了唯心主义，因为它“忘记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马克思的观点，是在既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又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主义。

为什么马克思说“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唯心主义抽象地看待主体及其活动，只看见它对外部世界的能动作用，而看不见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及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性。反之，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主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出发点，揭示了客观外界对于人类实践的制约性，确认了客观外界的优先地位。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在有关主体的能动作用问题上的这个原则性的观点分歧，列宁曾经生动地指出说：“‘这最初的开端’被唯心主义忘记并歪曲了。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把‘开端’同延续和终点联结起来”②。所谓把开端同延续和终点联结起来，就是把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及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性，同人类通过实践改造外部自然界的能动作用，同人类的实践活动成为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联结起来。在实际上，这种联结，象一条红线一样，始终贯串在马克思的一切有关论述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并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但是，在另一方面，马克思紧接着又强调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存在着”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② 《哲学笔记》，第3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50页。

既然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是现存世界的基础，那么，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这种优先地位不仅表现在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界，是人类感性活动的物质前提，而且还表现在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周围感性世界，虽然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那个自然界，而是经过他们的劳动实践所改造过了的，但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却又是作为预先存在的外部自然界而出现的，作为他们的感性劳动的物质前提而出现的。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①。所以，事实再一次说明了施密特所谓"'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内"的说法，完全是对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界这一事实所作的唯心主义歪曲；同时，也进一步戳穿了卡尔维兹、朗特格莱勃等人所谓马克思认为离开了人的、自在的自然界是根本不存在的种种说法，埃里希·梯尔所谓马克思所了解的自然界，不过是从人的感性派生出来的某种第二性的东西的说法，纯属他们的伪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同样地，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说："抽象地，对着自然本身而与人隔离开来加以固定的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只是虚无"一语，也丝毫帮不了朗特格莱勃、卡尔维兹等人篡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忙。

这是因为，只要联系上下文来进行阅读，就不难发现：马克思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他在几个月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我们在上面所引的那些话的意思。

就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

"抽象思想其本身是虚无；绝对理念本身是虚无，只有自然才是某种东西"①。

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又把自然同"虚无"联系起来呢？

原因就在于，正如前述，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也即经过人类劳动实践改造过的自然界才是"人底现实的自然界"、"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认为自然界并"不是完全符合原样地直接呈现在属人的存在物面前的"②，就是说，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并不是象对于动物那样直接地存在着的，而是按照它被人的劳动实践所改造过的那个样子存在着的。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说"抽象地、对着自然本身而与人隔离开来加以固定的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只是虚无"，正是指的这个意思，而丝毫也不象资产阶级哲学家所歪曲的那样，似乎马克思在这里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而把物质看成虚无。

所以，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这本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所写著作中，所用术语有的还不够完善，但所表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却是清楚而明确的，是绝对不容把它们歪曲和篡改成为唯心主义的。事情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①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2 页。

② 同上书，第 91、134 页。

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①。

归结起来，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精神可以通过实践而变成物质，因而经过人们世世代代实践的改造，自然界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之前的那个样子，在今天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朗特格莱勃、卡尔维兹等人却把马克思的意思说成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物质是不存在的，离开了人的自然界是没有的。这不是赤裸裸的歪曲和篡改，又是什么呢?!

所以，尽管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针对当时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需要，使唯物主义"向上发展"的需要，用辩证法来发展唯物主义的需要，特别强调人类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作用，但是，这种强调却毕竟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活动之外地客观存在着的。因此，它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原则同格"论的唯心主义没有丝毫的共同点。

马克思认为，在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界为客体的两者之间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的，但是，这种相互作用并不是没有基础的，不，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是自然界。在自然界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人、产生人类社会，人类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去改变自然界的面貌，但是，这种改变，却只有在符合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范围内才得以实现。

所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辩证法说成是排斥自然辩证法的某种东西的种种说法，什么马克思辩证法"不是在一种无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7页。

意识的事态的规律性的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什么马克思辩证法“不是一种自存的自然物质的运动规律”，什么在马克思那里“不以任何人的存在为转移的一种辩证法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都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类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原理，不但不是要求人们否定，而且恰恰正是要求人们认识和掌握物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也就是自然辩证法。

尽管马克思始终明确地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肯定自己的辩证法观点的唯物主义基础，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在其《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中，却偏要通过歪曲引证马克思的一些论述，来否定这一事实。

施密特援引的论述之一，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对此，施密特引申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中，一切自然存在都是在被经营以后，才被设想的。而既然这个存在的辩证的或非辩证的结构问题，是‘离开实践的’，那它就是一个‘纯经院哲学的问题’”。

所引马克思的第二条提纲原文说得很明白，是讲实践是检验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离开实践”的问题，是指的不经实践的检验而去争论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而压根儿不是施密特所说的“一切自然存在都是在经济上被经营以后，才被设想”的问题。

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存在的辩证结构问题的论述，那么，这不但不是施密特所说什么“离开实践的”“纯经院哲学问题”，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且刚好相反，恰恰是一个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的问题。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曾经引用凸镜集中阳光而得火，把引信、炸药和弹药放进枪膛里加以发射而爆炸等实例，来论证自然界“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践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么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①。这不清楚地说明了施密特把“自然存在的辩证的或非辩证的结构问题”，说成是什么“离开实践的”“纯经院哲学的问题”，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吗？

施密特所援引的马克思的另一个论述，是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所说“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②。据此，施密特引申说：“人们并不是把满足他们需要的外部资料首先当作‘外界物’来遭遇的，这就是说，他们并不处在同它们的认识论关系中”，“实践在其本身变成反思的课题之前，已经完成了主体和客体的中介”。

在这里，施密特同样是在搞胡乱引申的把戏。

问题很清楚，马克思的原意是用实践在先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批判瓦格纳的认识在先、估价在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也即“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赋予价值”，而绝不是相反③。

反之，施密特却把马克思的原文歪曲引申去否认人在实践中遭遇“外界物”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劳动过程时，却正是从说明人在这种生产实践中是怎样遭遇到自然这种“外界物”开始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05 页。

③ 同上书，第 406 页。

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①。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清楚地说明了施密特的上述引申，完全是一种歪曲原意的引申。

施密特援引的马克思的又一个论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中，马克思批判了"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②。施密特据此而论证说，在马克思看来，为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在各个场合说明它如何栖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

施密特在这里所作论证，同样地驴唇不对马嘴。

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指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在他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在认识论领域里所具有的对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自发信念。这种信念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是因为它确信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之所以又称之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往往是自发的、不彻底的、局限在自然科学家专业范围内的，一旦越出了这个范围，特别是进入人类历史领域的时候，这些自然科学家又往往是唯心主义者乃至虔诚的宗教徒。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性质的缺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那个注中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拒绝"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坚持外部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唯物主义的方面，而是它的在"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暴露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② 同上书，第410页。

来"的"缺点"。但是，施密特却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把事情说成是"马克思……拒绝'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接着，又对"排除历史过程"几个字作主观随意的解释，从中引出"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必须栖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这样的结论。这便是施密特把自己的观点伪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伎俩所在。

归结起来，不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怎样进行歪曲、篡改和伪造，马克思始终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个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却终究是无法否定、无法抹煞的。

三、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肆意歪曲和伪造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和自然观的目的之一，便是竭力否定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观点的一致性，把两者说成是相反的、对立的。

法国巴黎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教授顾尔维奇说：

"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过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才研究它"(《辩证法与社会学》1962)。

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桑勃勒追随在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柯热夫之后，说什么：

"只有人的实在才能被称作辩证的，这就是卡尔·马克思跟随在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的领导之后所清楚地看到的东西，而且这是被恩格斯版本的自然辩证法所改变甚至于反对的东西"(《从卡尔·马克思到毛泽东》1963)。

美国肯色斯大学哲学系主任戴乔治说：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反杜林论》中，……包含大量的为恩格斯

独创的东西，特别是在哲学中，恩格斯把辩证法的概念扩展到整个自然和自然科学中”，“恩格斯把辩证法理论扩展到整个自然之中，明确地展开了在实在的一切领域——自然和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的思想——中得到例证的辩证法的一般法则，马克思是否同意这个扩展，是一个有许多争论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1968)。

卢卡奇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概念不相容。

李希特海默说：

自然辩证法只不过是恩格斯个人的发明，他“不明智地”在“马克思不敢涉及的领域里进行了冒险”(《马克思主义》1964)。

直到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在展开有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讨论时，有些人还在反响着这种声音。

然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恩格斯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观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作法，却是同客观事实背道而驰的。

首先应当指出，顾尔维奇所谓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才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说法，同事实完全不符。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一八六九年恩格斯退出商界之前，为条件所限所作的“只能是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二是在他于一八六九年七月一日退出商界，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日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以后，恩格斯把其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其上面的研究。在这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除了在一八七六年五月到一八七八年七月这两年多时间内，恩格斯主要从事于《反杜林论》的写作之外，从一八七三年五月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恩格斯一直在从事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在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当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中《电》这一章时，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说《电》这一章给予

他的小小的胜利，在信的结尾，他说，现在必须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①，但他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因为在一八八三年三月，马克思就逝世了，而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由于全力倾注于完成《资本论》的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不得不在事实上停止《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只是由于再版《反杜林论》和创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才在一八八五年为《反杜林论》第二版，写了一篇序言，从哲学唯物主义立场上阐述并综合那些揭示和证实自然辩证法的自然科学最新发现，进一步论证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并把他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所写的作为《反杜林论》的"注释"或"增补"的两篇札记（即《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和《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手稿中论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的一个片断收入到《自然辩证法》中去。

所以，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就其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来说，不但不是象顾尔维奇所说是"在马克思逝世后"，而是恰好相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前进行的。

其次，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不但不是象桑勃勒所说的什么"改变甚至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的，不是象戴乔治所说的"马克思是否同意"还"是一个有许多争论的问题"的，也不是象李希特海默所说的，是"恩格斯个人"到这个为"马克思不敢涉及的领域里"去进行"不明智的冒险"，不但不是象他们所说的这一切，而且恰好相反，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正是在同马克思经常交换意见，而马克思则予以密切的注视和积极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里且举数例以资证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4—115页。

例子之一，是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把化学中的分子理论联系到哲学上质量互变问题的通信。

先是恩格斯在读了奥·威·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一书以后，于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写信给马克思说：

“霍夫曼的书已经读过。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大进步。作为物质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畴，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①。

六月二十二日，马克思复信恩格斯时表示赞同，并引了自己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作为印证：

“你对霍夫曼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在正文的一条注释中（当时我正好听过霍夫曼的演讲）我提到了分子理论，但是没有提到霍夫曼，因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给它上了一点光泽，而提到罗朗、热拉尔和维尔茨，后者是这一理论的真正创始人”②。

例子之二，是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实际上则是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宏大计划的通信。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提出“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说：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12页。

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接着，恩格斯从“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机械运动”、“本义上的物理学”、“化学”和“有机体”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他的设想①。

第二天，也即五月三十一日，马克思复信说，虽然他还“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指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卡·肖莱马和赛·穆尔〕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马克思还是告诉恩格斯说：“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并在把恩格斯的信给卡·肖莱马看后告诉恩格斯说：“肖莱马读了你的信以后说，他基本上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肖莱马在恩格斯信的页边上写道“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完全正确！”“这是最根本的！”等等边注，表示完全同意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思想〕②。

例子之三，是在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期间，在一八七六年五月到一八七八年七月写了《反杜林论》。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根据自己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多年研究，第一次用概括的形式展开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述：“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才能做到”，“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③。而《反杜林论》这部著作的全部原稿是经过马克思审阅和同意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82—86 页。

② 同上书，第 87—89、85—8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25、26、154 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再版序言中指出：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①。

例子之四，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平方在变换形式的能的传递中所起作用的通信。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

“电气中的电阻和机械运动中的质量是一回事。因此，无论在电的运动中还是在机械运动中，这种运动在量上可以测量的表现形式——一种是速度，一种是电流强度——在不变换形式的简单传递中，作为一次因数发生作用，反之，在变换形式的传递中——作为平方因素发生作用。可见，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来的运动的普遍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②。

四天以后，也即十一月二十七日，马克思复信恩格斯说：

“你对平方在变换形式的能的传递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证非常好，为此向你祝贺”③。

…………

还可以举出若干类似的例证。但仅此数例，就有力地揭穿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关于恩格斯“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改变甚至反对着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地去研究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是否同意，是一个有许多争论的问题”，关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在“马克思不敢涉及的领域里进行不明智的冒险”等等说法，纯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4—115页。

③ 同上书，第115页。

毫无根据的捏造。

在所引上述四个例证中，有的涉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总的概括，如《反杜林论》和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的通信；有的涉及物理、化学领域中分子、电气、机械运动的客观规律，如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和二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次通信。对于恩格斯在这些信件和著作中所表述的范围如此广泛的自然辩证法的见解，马克思都或则表示同意，或则评为“完全正确”、“非常好”，或则表示“非常高兴”，或则写信热烈“祝贺”。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所编造的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一切神话，不全都原形毕露了吗？

事实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捏造相反，马克思是积极支持和赞助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的，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四、恩格斯概括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在马克思的积极赞助下，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全面地、系统地展开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具体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歪曲和篡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把它伪造成一种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的东西的同时，又集中攻击和诽谤具体阐述自然辩证法的恩格斯。

恩格斯曾经再三说明自己研究和阐述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时，

所遵循的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来的唯物主义原则，而不是把主观臆造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的唯心主义原则。例如：

在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旧序中，恩格斯说：

“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①。

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反杜林论》再版序言中，恩格斯又再次申明：

“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②。

尽管恩格斯把事情说得如此之清楚，资产阶级哲学家为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却偏要把恩格斯所反对的东西强加于恩格斯，硬说恩格斯遵循的是唯心主义的原则。

法国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说：

“恩格斯为了想把辩证法放进自然，就进而‘使辩证法自然化’，把它当作对于对象的某些属性（通过矛盾发展，从量过渡到质）的简单陈述”，“这种辩证法与人的实证精神的混合物把人的存在方式运进了自然，这是不折不扣的魔术”（《辩证法的历险》1955）。

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恩格斯的关于自然过程是受辩证否定的支配的描述，也把意识的要素当成了一切事物的一个普遍的特征，从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假设不相容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1940)。

以色列耶鲁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阿维诺立说：

“由于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恩格斯就使辩证法同意识的中介分离了开来，严格地说来，这样一种见解是压根儿不能被叫作辩证法的”。他先是附和卢卡奇的意见，攻击恩格斯阐明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理解的唯物主义的方式很少有共同之点，必须到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庸俗化版本和生物学中去寻找恩格斯见解的根源”，接着又附和施密特的意见，指责“恩格斯把一种辩证的图式应用于一组特定的自然科学材料，好象辩证的图式恰好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的方法，而不是题材的内在内容似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68)。

但是，只要把恩格斯在阐述自然辩证法的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摆一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是在概括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而不是用什么“把辩证法放进自然”、“把一种辩证的图式应用于一组特定的自然科学材料”之类的办法，来展开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述的。

大家知道，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整整四百年间，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否定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和自然界中各种事物、过程彼此之间的联系，即使当它承认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的时候，它所理解的运动也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个地点，总是产生着同一个结果。总之，它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又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而只承认自然界在空间中扩张，而不承认自然界在时间中的发展；它只看到一个一个有着分界线和类的区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转化，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到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它们的相对的静止，而看不到它们的永恒不断的运动……。

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用于哲学之后，就形成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是同当时自然科学还处在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从总的联系中抽取出来，分门别类地逐个研究其特性的状态分不开的。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发展，却在这种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而把它弄得千疮百孔。

首先是康德在其一七五五年的《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一书中，以他的星云假说宣布了太阳的起源，把牛顿的所谓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又以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半个世纪以后，拉普拉斯在其一七九六年发表的《宇宙体系论述》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一个太阳系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又半个世纪，分光镜驳倒了一切异议，证明在宇宙空间确实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这样，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从而第一次动摇了那种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形而上学自然观。

其次是赖尔在其一八三一年发表的《地质学原理》一书中，以关于地球缓慢进化的地质学，指出了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的地层，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这就说明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动植物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说明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渐次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渐次改变以及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

再次是自从维勒在一八二八年从无机物制成第一种有机物——尿素以后，新创立的有机化学一个跟着一个地用人工的方

法从无机物制成了无数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有机化合物，扫除了这些有机化合物的神秘性的残余，从而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并填平了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一大部分。

此外，还有在生理学、胚胎学、动植物比较解剖学等方面所获得的其它许多科学成就，也都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然而，有决定意义的却是著名的三大发现：

第一是约在一八三六年施旺在动物方面、施莱登在植物方面所发现的有机细胞：包括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在内的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以外，都是从细胞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生长的。这个发现，不仅揭开了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按一个共同规律成长的秘密，而且通过细胞的变易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够改变自己的物种、从而能够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

第二是一八四二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等人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所导致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证明，说明了机械力、热、光、电、磁等一切所谓物理力甚至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都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从而说明了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是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使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成为自然科学的事实。

第三是一八五九年由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证明了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在内的整个有机界，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同时又说明了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并为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直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提

供了基础。这就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的这一切成就意味着什么？

这些成就使人们不仅能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也能够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被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它所强制规定的严格到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原来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渗透着；被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看作是僵硬、固定、永远存在的东西，或者溶化了，或者消散了，或者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而自然科学则由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现成事物的科学，变成了在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联结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总之，这些成就突破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界限和框框，敲响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丧钟，它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意识到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着；它们准备了并要求着在人们的自然观上，来一个由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革命变革。因为只有从事物的联系、连结、运动、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自然界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才能为自然界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由形而上学自然观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①，而完全不是、也决不可能象梅劳-庞蒂、阿维诺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等人所说的那样，用什么“把辩证法放进自然”、“把一种辩证的图式应用于一组特定的自然科学材料”之类的办法来实现。同时，它们也清楚地说明了，恩格斯在概括自然科学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份地展开的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阐述，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关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所以，胡克、梅劳-庞蒂、阿维诺立等人攻击恩格斯阐述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就是什么“把人的存在方式运进了自然”，就是“把意识的要素当成了一切事物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假设不相容的”，或者反过来，说这就是“使辩证法同意识的中介分离了开来……压根儿不能被叫作辩证法”，这一切统统是无稽之谈。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应当懂得，既然恩格斯对于自然辩证法的阐述，是在概括自然科学的上述许多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那么，为要“驳倒”这个阐述，最起码的工夫显然是要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成就，弄清楚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符合于自然界的实际情况，自然界又到底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归根到底不是辩证地而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着的？拿不出象样的证据，而只是闭着眼睛胡说乱道，凭着偏见瞎扣帽子，那不仅驳不倒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而且暴露了这些“批评家”的水平的低下和学风的恶劣。

例如，前引阿维诺立所谓“必须到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庸俗化版本和生物学中去寻找恩格斯见解的根源”，就是这种低下的水平和恶劣的学风的表现之一。

诚然，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伟大意义，但也正是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了达尔文的错误及其局限性，例如关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恩格斯就曾尖锐地指出：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①。

恩格斯对达尔文这个错误的批评，不也正是对那种把生物学规律庸俗地搬到社会现象领域中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厉批判吗？所以，把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阐述的根源，归结为什么“达尔文主义的庸俗化版本和生物学”，那是毫无根据的。

如果说，阿维诺立的“批评”，是毫无根据地把恩格斯对整个自然界辩证发展的阐述，在根源上归结为生物学这个局部的话，那么，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批评”，则在另一端把研究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辩证法，同研究运动的各种特殊形式的具体学科绝对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胡克说：

“恩格斯……的辩证法定义表明他是不知道作为同物理学的‘变化’概念和生物学的‘发展’概念相对立的辩证法的特殊的特征的”，“伽利略的运动规律和一个昆虫的生命史同辩证法毫无关系”（《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然而，胡克的这个指责，不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恰恰暴露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偏见。物理学的“变化”概念，确实不同于生物学的“发展”概念，伽利略的运动规律也确实区别于一个昆虫的生命史，因为它们所表述的是运动的各个特殊的不同形式。然而，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尽管在表现形态上各各特殊，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2页。

又终究都是物质的运动，都遵循着物质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而辩证法则正是研究和表述这种最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正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有什么根据把它同物理学、生物学中的"变化"、"发展"概念绝对对立起来？又有什么根据说它同伽利略的运动规律、同昆虫的生命史"毫无关系"呢？不，这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①，这不也正是对蔑视辩证法的实用主义分子胡克的生动写照吗？

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桑勃勒说：

恩格斯说自然是辩证法的检验的根据，这就"使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成为服从于他并不控制的力量的力量，结果是整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从而，"在事实上，自然是统治着辩证法和宇宙的上帝"(《从卡尔·马克思到毛泽东》1963)。

在这里，桑勃勒显然由于其唯心主义偏见作怪，把整个事情说颠倒了。

我们人类，连同我们人类的肉、血以及头脑，统统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这一切是一个不依人们信奉唯心主义还是坚持唯物主义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那么，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人类，又怎么能够控制外部自然界呢？人类社会的历史反复证明：这并不在于象唯心主义有神论者所宣传的那样，是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象辩证唯物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有计划地使之为一定目的服务。恩格斯强调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②。所以，恩格斯指出自然是检验辩证法的根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9页。

② 同上书，第125—126页。

阐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这不但不是象桑勃勒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使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成为服从于他并不控制的力量的力量”，而使自然成为什么“统治着辩证法和宇宙的上帝”，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类越益深刻地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从而为控制和统治自然界开辟了道路。

五、恩格斯使用的是辩证方法

为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资产阶级哲学家不仅攻击自然辩证法的阐述者恩格斯没有遵循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中引出其固有规律的唯物主义原则，而且还指责恩格斯没有遵循辩证方法。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

萨特尔一方面说“我们在自然界只发现由人们导入其中的辩证法”，“恩格斯责备黑格尔把思维硬加在自然界上面。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硬要自然科学来证明他在社会世界中所发现的一种辩证理性”，“把这种理性搬到‘自然’世界里，那就是生拉硬栽”，另一方面又攻击恩格斯“相信能够用比较、类推、抽象、归纳等等非辩证的程序，从自然界中抽出它的辩证规律”（《辩证理性批判》1960）。

法国巴黎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教授顾尔维奇则指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下混淆了下面两个不同的问题，即自然的现实运动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辩证法与社会学》1962）。

攻击恩格斯在阐述自然界发展规律时没有遵循辩证方法，同攻击恩格斯没有遵循唯物主义原则一样，是毫无根据的。问题在于：尽管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着的，但倘若人们在研究和阐述它时，不是遵循辩证法而是遵循形

而上学的方法，那也同样不能阐明自然界的辩证规律。

所以，尽管自然科学的上述发现，反映了自然界现象所固有的客观辩证法，在客观上驳斥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并为确立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创造了前提，但要是人们用形而上学而不是用辩证法去进行思考，那就同样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些发现。例如，积极参加论证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赫尔姆霍兹，由于纯粹从量的方面来解释这一定律，而忽略了它的质的方面，以致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与把各种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移动的原则调和起来。又如拉马克发展了物种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可以改变的思想，但由于他以机械论观点来解释生物界发展本身，因而就没有阐明生物界质变和量变的辩证统一，也没有把间断和不间断的统一看作这些过程的经过。

正因为这样，恩格斯一面指出现代自然科学的这些发现“再也不会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相反地，把这些发现加以系统化，就将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一场“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的性质”的革命，并在哲学领域内敲响“旧形而上学的丧钟”，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如果只是依靠“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由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转变，那将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多余的阻碍需要克服”，反之，“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么，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指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认识”①。

恩格斯反复强调：“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15、16页。

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而“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①，所以，“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②。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为要阐明或者“抽出”自然界的辩证规律，就必须而且只能应用辩证方法，而不能应用非辩证的形而上学方法。萨特尔所谓恩格斯“相信能够用比较、类推、抽象、归纳等等非辩证的程序，从自然界中抽出它的辩证规律”的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实际情况完全和萨特尔所说的相反，恩格斯所坚信的，是只有运用从事物的联系、连结、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普遍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去观察事物的辩证方法，才能从自然界“抽出”它的辩证规律来，而这也就是恩格斯在阐述自然界辩证规律时所使用的方法。

正因为恩格斯创造性地运用了辩证方法，所以才能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正确解决那些由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进程所提出的问题，正确解决那些围绕着当时自然科学发现而展开的思想斗争进程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过程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在关于电运动现象的解释上，当时流行着许多混乱观点，以黑格尔和法拉第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电是一种脱离开一切物质的特殊状态，一种特殊的力；以费希纳和威廉·爱德华·韦伯为代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25页。

② 同上书，第383页。

的一种观点，则认为电是作为特种物质的两种“流体”向相反方向流动；以后，诺伊曼提出一种流体说，而维德曼又调和这二者。一八四六年法拉第又凭着想象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电是弹性媒质以太的一种运动。在这众说纷纭的混乱假设中，恩格斯运用辩证方法，揭露了前两种理论的内在矛盾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质，指出以太说是个无可否认的进步，但又没有揭示电运动的本质，与此同时，恩格斯又对电运动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指出电学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弄清楚“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并在实际上预示了电子的存在：“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①。在这里，压根儿就没有半点“非辩证程序”的影子，而有的只是贯串在从电学理论到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

那么，当恩格斯这么说和这么作时，是否象顾尔维奇所说的那样，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下，混淆了自然的现实运动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呢？

不，顾尔维奇的这个指责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这个指责倒正好暴露了顾尔维奇自己把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把概念辩证法和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绝对地割裂了开来。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的辩证法，也即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创造了概念的辩证法，作为辩证的思维方法的主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客观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459、454 页。

证法的自觉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指出：

"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的两个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因袭者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①。

顾尔维奇在恩格斯把主观辩证法、概念辩证法当作客观辩证法、现实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来阐述的地方，看作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下，混淆了自然的现实运动和自然科学的方法"，顾尔维奇的这个指责，难道不正是清楚地说明了他自己倒正是"形而上学的因袭者"吗?!

六、对恩格斯的诬蔑必须推倒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还对阐述自然辩证法的恩格斯进行其它许多莫须有的攻击和诬蔑。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就是一个典型。

在《马克思的自然观》(1973 年伦敦版) 一书中，施密特专辟了题为《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判》的章节，对恩格斯进行系统的攻击和诬蔑，在附录《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中，施密特又把一半左右的篇幅用来诬蔑恩格斯。

施密特对恩格斯的诬蔑，除了重复别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恩格斯同马克思早有分歧，所谓恩格斯用非辩证的方法把辩证法强加于自然界等等陈词滥调之外，具有"独创性"的主要有三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11 页。

为把恩格斯阐述的自然辩证法说成是非辩证的形而上学，施密特首先指责“恩格斯有意撇开不谈‘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即在自然脉络关系中那种叫作社会劳动的特种形式的相互作用的现象。然而，……唯物主义理论却要求具体辩证法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的活动才发生作用”。

所说“恩格斯有意撇开不谈‘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是指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在谈到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时所说“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① 一语。

显然，恩格斯的这句话完全是理论分析中的一个暂时假设，而作这个暂时假设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对比，来说明在自然界中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活动的，是两种不同的动力，它丝毫也不意味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有意撇开不谈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恰恰相反，恩格斯不但极端重视这种反作用，还从各方面精辟地阐明了这种反作用的特性。

例如，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恩格斯指出，人的生产——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不同于动物的生产，因为动物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②。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与此同时，恩格斯又强调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374页。

的人一样”，“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题为《辩证法》的札记中，恩格斯又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并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②。

对于恩格斯这样反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的这些客观事实，施密特视若无睹，反而用曲解恩格斯的一句话作为“依据”去指责“恩格斯有意撇开不谈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这不是诬蔑，又是什么？

在对恩格斯的一片莫须有的指责声中，施密特宣扬什么“唯物主义理论却要求具体辩证法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的活动才发生作用”。然而，事实的真相恰好相反：只要人们对唯物主义有最起码的尊重，那就不能不承认，自然界是按照自己的辩证规律发展的，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而改造自然界，不是由于取消了自然界固有的辩证规律而带进了人的“具体辩证法”，而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运用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施密特所谓“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的活动才发生作用”的“具体辩证法”，没有一点唯物主义的气味，同辩证法也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一些唯心主义的臆想罢了！

施密特的诬蔑之二是说“恩格斯认为，自然和人最初并不是通过历史实践而统一起来的；人只是作为自然过程的一个消极反应和进化的产物，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出现”。“证据”是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18、519 页。

② 同上书，第 573—574 页。

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施密特说“同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责费尔巴哈的论战中所已达到的观点相比较，这标志着倒退到素朴实在论”。

前引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界反作用的精辟论述，清楚地说明了施密特所谓恩格斯否认自然和人通过历史实践而统一起来，所谓恩格斯把人看作自然过程的消极反应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而把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说成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倒退到素朴实在论，就更是歪曲和诬蔑。

施密特所引恩格斯的那个论述，见之于收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一篇。在那里，恩格斯指出，有了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以后，自然界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已经基本上解释清楚，现在的任务在于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通过批判去“剥取”从古希腊哲学家以来两千多年的“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因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①。

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这里立论的重点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中的对立：到底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而不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对立：仅仅把人看作是环境的产物，还是也看到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是指的唯物主义主张如实地反映客观外界的真实情况，恩格斯所说“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则是说的在认识客观事物时，不把人们头脑里虚构、造作的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种联系和过程强加于外部自然界。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为古希腊人以来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所共有的。但是，恩格斯并不主张退回到两千年前古希腊人那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去，而是主张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剥取两千年来在错误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事情是不是象施密特所说的，要强调人对自然界能动的反作用，就不能坚持"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反之，要是强调"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就是把人看作自然过程的消极反应，就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倒退到素朴实在论呢？

否。恰恰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而且恰恰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而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时，马克思强调指出："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例如，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就是这样"①。人类对外部自然界的能动改造，是同如实地反映客观外界的真实情况、同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分不开的。所以，事情同施密特对恩格斯的诬蔑相反，不是什么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倒退到素朴实在论，而是施密特在高喊人类对自然界能动改造声的掩护之下，否定如实了解事物本来面目的唯物主义，偷运在认识事物时附加外来成分的唯心主义。

施密特的诬蔑之三，是说"恩格斯在一种纯客观辩证法的意义上去解释前于和外于人类的自然的企图，在事实上必定导致……辩证法同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到一个'自然—主体'的泛神论的一物活论的概念，从而当然抛弃唯物主义的立场"，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9 页。

另一方面，由于“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前，自然界只能有存在于彼此之外的诸要素之间的两极性和对立；至多是相互作用，但不是辩证的矛盾。恩格斯的‘自然的体系’，象霍尔巴赫的一样，是一个单纯的相互作用的体系”，“符合于自然本身的前辩证特性”，“他的关于自然的见解最终是前辩证法的”。

恩格斯根据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阐明自然界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规律，在施密特的笔下，反倒成了“抛弃唯物主义的”、“前辩证法的”，甚至成了什么“泛神论一物活论”，这不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又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也象在别处一样，施密特的诬蔑只能起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作用罢了。

所谓泛神论，是指把神和自然界等同起来，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之中；所谓物活论，则指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有生命、都有感受性，认为一切形式的物质都有感觉和思维能力的理论观点。要是恩格斯所阐明的自然辩证法，确实必然导致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之中，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有感觉和思维能力的泛神论—物活论概念，那么在所谓的“恩格斯的自然体系”里，怎么只有存在于彼此之外的诸要素间的“前辩证法的”“两极性和对立”，连个“辩证的矛盾”都没有呢？显然，施密特只图诬蔑得痛快，顾了头而忘了腚，连起码的逻辑也不要了！

事实和施密特的诬蔑相反，由于恩格斯坚持根据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去阐发自然界固有的辩证发展规律，而不是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由于恩格斯阐明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在特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而不是把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那些运动规律强加给前于和外于人类的自然界，因而是彻底地唯物主义的，施密特所谓恩格斯阐明的自然辩证法必然导致抛弃唯物主义、导致泛神论—物活论，纯属无稽之谈。而施密特所谓前于和外于人

类的自然界只有前辩证法的两极性、对立和相互作用，而没有辩证矛盾的说法，倒正好暴露了他自己毫无根据地把辩证法同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运动形式、同人类的参与等同起来，而把不合乎这个尺度的、前于和外于人类的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摈于辩证法之外，斥之为“前辩证法的”。把施密特的这种以片概全、削足适履的企图，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本学唯心主义，称之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主体—客体原则同格论的新翻版，不倒是名副其实吗?!

在实际上，人本学唯心主义，这不仅是施密特曲解马克思而诬蔑恩格斯、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鼓吹什么“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论的一个思想根源。

施密特的老师、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一个重要代表阿道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1973 年伦敦版）中说：

“那是由于转到客体的优先地位，才使辩证法成为唯物主义的。作为非同一性的肯定表现的客体，是一个术语上的面罩。一旦客体变成认识的一个对象，它的物质方面一开头就通过翻译成认识论，通过那种一般地说在最终是由胡赛尔的现象学在方法论上加以规定的还原，而被精神化了。而当着在认识的批判中不可解决的主体和客体的范畴显得是虚假的——即不是彼此纯粹对立的时候——这也意味着客体的客观的方面，即它的不能加以精神化的方面，是只从一个按主观目的进行的分析的观点来看才被称作‘客体’，而在这种分析中，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把客体说成是什么“术语上的面罩”，说成其物质方面在认识论中已被精神化，即使其不能加以精神化的方面，也只是从主体首要性的分析中来称谓的，把客体如此这般地消融于主体之中，不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不错，阿道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也一再提到“客体的优先

地位”，但是，紧接着，他又说什么“只有通过主体才能设想客体”，“成为一个客体也是主观性的意义的组成部分”，反正七弯八绕弄到最后，还是“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否定的辩证法》1973伦敦版）。

在这样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怎么能够有辩证法呢？不，在这里是不可能有什么辩证法的，有的，只是人本学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

七、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原则区别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还把恩格斯阐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说成是什么追随于黑格尔的错误引导，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乃至黑格尔的泛神论，而重新堕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例如，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说：

由于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放在物质里”，这就使“出自黑格尔左派的形而上学的无神论渐渐地回到它的根源，回到老的黑格尔泛神论那里去了”（《完整的人道主义》1936）。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从历史上和分析上说来，相信自然辩证法，这是从普罗提诺到黑格尔的每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学说”，他企图据此而把“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帽子扣到肯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头上来（《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把辩证唯物主义诬蔑为：

“自以为发现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梦想”，并且说“把

辩证法弄成一种强加于宇宙的天然规律，弄成一种它自己会产生历史过程的形而上学力量，这就重新堕入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理性批判》1960)。

俄国的波格丹诺夫说：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只揭露出两种概念之间的矛盾……而没有揭露真正力量或倾向之间的矛盾。但是，两种概念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矛盾，只存在于思想之中，如果把外界事实还原到思想……那就意味着转向唯心主义的观点，意味着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生动经验之哲学》1923)。

匈牙利的卢卡奇说：

“产生于恩格斯对辩证法说明的误解”，在于“恩格斯追随着黑格尔的错误引导，把这种方法扩展到也应用于自然”(《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这种种说法，和客观事实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事实是，尽管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辩证方面，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但是，恩格斯又极其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黑格尔自然哲学之间的原则区别。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现实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本原的，而思维、观念则是派生的；反之，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却把自然界看作绝对概念的“外化”，看作是派生的，而思维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页。

其思想产物的概念则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直观着的观念就是自然界"，"直接性的观念，作为它的反映，自由地外化为自然界"，"这个存在着的观念就是自然界"（黑格尔：《小逻辑》）。

黑格尔泛神论的根子在哪里？就在这种被看作是最初的东西的绝对概念。由于普通人的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的头脑就成了神的观念，因而，黑格尔的这种"绝对概念"就是一种用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

所以，问题很清楚，黑格尔的泛神论源于其唯心主义，而不是源于什么"把辩证法放在物质里"。而恩格斯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就彻底否定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泛神论。因此，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说恩格斯阐述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就是回到老的黑格尔泛神论那里去的指责，完全是颠倒了是非。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概念是现实事物的反映，概念的辩证法是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因而主张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运动形式出发，从这些事实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后又尽可能再用经验加以证明。总之，是主张从自然界中找出其固有的辩证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而不是把任意虚构、凭空臆造的东西从外部注入自然界。反之，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则认为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认为在自然界中显露出来的辩证发展，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因而就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把辩证法的规律当作思维规律来加以阐述，并把这些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

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唯物主义特性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心主义特性的对照，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所以，萨特尔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弄成一种强加于宇宙的天然规律等等的形而上学力量的指责，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事实上，倒正

是萨特尔自己，毫无根据地把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心主义特性，强加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头上。同样地，波格丹诺夫关于恩格斯把外界事实还原为思想意味着回到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指责，卢卡奇关于恩格斯追随黑格尔的错误教导，把辩证法扩展到也应用于自然的指责，也具有着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加于恩格斯的类似性质。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象条件反射那样，一见自然辩证法的字眼就大叫大嚷说是黑格尔的东西，而根本不知道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里，从来就只有强加于自然界的辩证思维规律，只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里，自然界所固有的辩证法规律才得到阐发。正如不能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那样，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硬说成就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同样是指鹿为马的荒唐事情。

再次，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着的物质，因而就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都有时间上的历史。反之，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却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绝对概念，认为自然界只是绝对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而只能在空间中展示其多样性，因此，他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一个地展示出来，并注定永远重复着总是同一的过程。总之，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否认辩证发展的普遍性的：“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也不过是徒然使人觉得无聊。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有新的东西发生”（黑格尔：《历史哲学》）。显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的，是不符合于当

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的，也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根本不同的。

最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仅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而且这种自然观还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它在理解现实世界时，就能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就能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反之，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却由于其唯心主义的本质，由于其完全颠倒了世界的现实联系，由于其使世界强行符合于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的思想体系，而不顾事实地任意地构造体系，由此就产生出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这一系列原则区别，清楚地说明了恩格斯在概括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既恢复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又摆脱了黑格尔那里阻碍辩证法贯穿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它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因而在原则上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如果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至多只是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的话，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则在精确地描绘宇宙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上，严密地论证了自然辩证法。因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黑格尔自然哲学混淆等同起来的种种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以此为"依据"，去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更是徒劳而不能得逞的。

至于胡克那种硬把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同自然辩证法、同辩证唯物主义粘到一起去的说法，就更加荒谬绝伦。

大家知道，普罗提诺认为宇宙的过程始于不可理解、不可说明的神的始源，这就是被置于存在和思维之上、被置于一切对立面和规定性之上的"太一"，"它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性质，也不是数

量，也不是心智，也不是灵魂，也不运动，也不静止，也不在空间中，也不在时间中，而是绝对只有一个形式的东西，或者无形式的东西，先于一切形式，先于运动，先于静止”。它由于自身的充溢而流出万物，先是宇宙理性，然后是宇宙灵魂，再后是感性的现象世界。他认为人的生活目的，就是在高度的出神状态中，使灵魂离开肉体而接近神，与神合一。在他那里，神秘本身是哲学的最后一言，“辩证法”就在于使主体能够超越有限而在其自身中实现绝对的统一。所以，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物质自然界是最低级的领域，是当灵魂忘却了向上仰望理智、精神时，从它里面流溢出来的某种东西，它是被动的，因为“物质永远依赖别的东西”，它不是现实的，因为“它的实质，是在非存在中”，“它是在可能性中存在的东西”，说到底，是带着存在物的形象的不存在的东西。显然，把这样一种极端神秘主义哲学，说成是“以自然辩证法为其中心学说”的东西，那只能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胡说。

八、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无法抹煞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歪曲和篡改马克思、攻击和诽谤恩格斯的同时，还直接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

新实证主义者艾耶尔说：

“断言自然界受辩证规律支配的理论”，“在没有对有关的具体现象确切说明以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哲学与科学》1962）。

另一个新实证主义者波培尔说：

“物理的实在是辩证地发展的——这是一个非常地缺乏科学根据的极端独断的论断”（《推测与反驳》1963）。

新托马斯主义者卡尔维兹说：

“如果假定辩证法永远包括有另一种理解而要求与绝对者有

某种关系，那么也许就完全不排斥自然辩证法的可能”，换句话说，在假定上帝为世界创造发展规律而人则意识这种规律的情况下，“自然辩证法也许不是不可想象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

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说：

“只是在一种次要和派生的意义之下，才有自然辩证法：我们所观察的自然，提供了相互作用的事实和质的飞跃，但是，象在芝诺那里的运动一样，这种辩证法流产了；它是对立物的毁灭。对立物只是在历史中，在人中，才被扬弃”（《辩证法的历险》1955）。

另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尔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否认自然辩证法客观实在性的理由。他写道：

“自然辩证法的确是可能存在的。不过，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最微小的初步证据”；

“事实上，我们在自然界只发现由人们导入其中的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就是没有人类的自然，因此，它不再需要证实和检验”；

辩证唯物主义“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界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辩证理性批判》1960）。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说：

“虚构的自然界的矛盾，事实上是对自然界理解上的矛盾”（《论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

波格丹诺夫说：

“自然界中的组织过程，不仅是经过对立体底斗争而完成，同时也还得经过别的道路而进行，所以辩证法是一个个别的场合，它底公式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生动经验之哲学》1923）。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到底是不是有需要证实和有没有证据证明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

在这方面，首先要指出，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的两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自然辩证法就是没有人类的自然，因此是不需要证实和检验的，另方面却又说，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存在，我们还没有最微小的初步证据。既然压根儿就不需证实和检验，那又哪里来的有没有"最微小的初步证据"的问题？萨特尔散播这些言论的目的，显然是想既把自然辩证法说成是什么"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又进而麻痹和削弱人们寻找证据证明自然辩证法客观实在性的意志，从而使自然辩证法永远处在"先验的"地位，而在人们心目中丧失其客观实在性。

然而，萨特尔却只是枉费心机而已。因为辩证地发展着的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之前，固然是"没有人类的自然"，但在人类出现之后，却依旧存在和发生着作用，因而就并不是什么"没有人类的自然"，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自然，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人们是有可能进行检验和证实的，而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迫切需要，也要求有这种检验和证实。

和萨特尔所谓自然辩证法不需要检验和证实论相反，恩格斯强调指出：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

那么，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现代自然科学又到底提供了哪些证明材料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义是和萨特尔的“还没有最微小的初步证据”论相反，恩格斯仅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所写《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就一下子列举了五条材料来证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客观实在性，来证明“辩证自然观的核心”：“两极对立”“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①。

第一条材料，是被十九世纪初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在很高的压力下也不能液化的氢、氮、氧、一氧化碳等所谓“真正”气体，到了十九世纪末，被发现只要把温度降到各该气体的临界温度之下再加以一定的压力，就统统可以被液化；同时，一些自然科学家还在气体液化过程中发现有一种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的状态，创立了气体和液体连续性的理论。这些，有力地证明了固体、液体、气体，物质的这三种聚集状态，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第二条材料，是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V^2=\frac{3KT}{M}$（在气体运动的这个基本方程式里，V是分子的运动速度，K是一个气体专用常数，T是绝对温度，M是分子的质量）。而热正是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的表现，因而根据这个方程式，可以得出气体运动说的能量基本方程式：$\frac{MV^2}{2}=\frac{3}{2}KT$，而这个方程式则指出了热运动中分子的平均动能是和绝对温度成正比的。这就把热现象和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联系了起来，把热直接列入到运动形式之中，根据温度的高低直接计算出热量即气体分子运动的能量大小。从而纠正了十八世纪初一些科学家把热看作是一种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看不见、没有重量而又可透入一切物体中的神秘的特殊物质——热素、热质的形而上学观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页。

第三条材料，是随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热的机械当量的测定（产生一千卡的热所需要作的机械功等于427千克米），证明了一切所谓物理力、化学力，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证明了这些机械力、热、光、电、磁等等所谓物理力和化学力，原来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的存在形式，证明了在自然界中的全部运动都可以归结为由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不断过程。这就使笛卡儿在一六四四年所提出的能量守恒定律从量的方面扩展到了质的方面，发展成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个发现有力地打击了那种认为世界是经由上帝推动之后才开始运动起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从而“使人们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

第四条材料，是在十九世纪以来，人们按照进化论从事生物学研究以后，发现一切有机体都是蛋白体和细胞长期发展的结果，在物种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且，从植物到动物，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中间都有许多过渡性的环节，如某些低等生物既有植物的特征，又有动物的感觉的痕迹，根本无法分辨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又如，文昌鱼具有血液循环和管状神经等脊椎动物的特征，却没有任何骨骼和专作行动用的器官，因而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再如鸭嘴兽，既有产卵和鸭嘴式嘴唇等鸟类的特征，又有哺乳育雏等兽类的特征，因而是界乎鸟类和兽类之间的类型。又如细鹗龙和始祖鸟的化石，证明它们是从爬行类发展到鸟类的桥梁，如此等等。在这些发现下面，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界线一一消失了，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内，在生物学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物种不变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五条材料，是随着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等有机细胞被发现以后，人们认识到从简单的有机体到高等的动物

和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个细胞都有一定的构造和生命特征，植物、动物等有机体的繁殖生长，都是通过细胞的分裂或增殖而进行的。这个发现打破了以前那种把动物的个体与其组成部分绝对对立起来，只把动物体看作是能独立地进行生命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生命个体，而认为构成动物的各个部分则没有任何相对独立的生命能力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使人们关于动物的个体性概念变得复杂起来。

应当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证实自然辩证法客观实在性的材料，确实象恩格斯所说，是“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而且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但是，仅仅《反杜林论》二版序言中所列举的这五条材料，在这里，就足以证据确凿地驳倒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否定自然辩证法客观实在性的种种说法。

那么，这些材料所证明的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为自然界所固有的，还是象萨特尔所说是“由人导入其中”的呢？

在上述五条材料中，第四条材料所涉及的，使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消失的，象孵卵的哺乳动物鸭嘴兽和用四肢行走的鸟始祖鸟这样的发现；第五条材料所涉及的，使动物的个体性概念变得复杂起来的白血球的发现等等，纯粹是人们对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发现，它们以自己存在的本身证实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证明了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们所意识到，或者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们。在这里，压根儿谈不上萨特尔所说什么“由人们导入其中的辩证法”。

在第二条材料中，虽然把热本身列入直接计量的运动形式，是根据于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和方程式；在第一条材料中，液化“真正”气体和把物体置于一种无法分辨其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况，需要人们把其温度降到它的临界温度以下和施加一定压力；在第三条材料中，导致到从质的方面积极表述能的转化的，热的机械当量的

发现，需要有人们的实验测定，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场合，人们的上列各种动作，都只是为发现自然过程所固有的辩证性质所需的条件，而并不是在把辩证法“导入”到自然之中。

在事实上，从来就只有人们创造条件去发现自然界固有的辩证法的问题，而压根儿就不存在人们把“外在”的辩证法“导入”到自然界中去的问题。正如人们通过加温，只能把鸡蛋孵化成鸡子，却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那样。所以，这些材料有力地驳斥了萨特尔所谓“我们在自然界只发现由人们导入其中的辩证法”的说法，说明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上述五条材料，分别涉及到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每一条材料都说明着两极对立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说明着自然界中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从而也就说明了梅劳-庞蒂所谓在自然界是“对立物的毁灭”、“辩证法流产”，波格丹诺夫所谓“自然界的组织过程，不仅是经过对立体底斗争而完成”，因而“辩证法是一个个别的场合”，而“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等等说法，统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上述五条材料也驳斥了新实证主义者艾耶尔用所谓“对有关的具体现象的确切说明”，来代替和否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的说法。这是因为，虽然人们是通过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而达到对于自然辩证法的认识的，但是，如果人们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规律的反映）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战胜理论困难而达到这种认识，就可以大大缩短这个过程。

例如，恩格斯在谈到与上述第三条材料有关的热之唯动说，以说明熟知不同时代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普遍联系的见解，对于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

“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热之唯动说曾经以新的例证支持能量守恒原理，并把这一原理重新置于最前列，这肯定是它的巨大成果；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记得笛卡儿早就提出了这一原理，那末它还能作为某种绝对新的东西出现吗？”①。

所以，艾耶尔所谓“断言自然界受辩证规律支配的理论”，“在没有对有关的具体现象确切说明以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论调，在实际上，完全是企图把人们拉回到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的思维方法中去，遭受蔑视辩证法的惩罚。

上述材料还致命地打击了新托马斯主义者卡尔维兹用自然辩证法来论证上帝为世界创造发展规律的神学企图，因为正如第三条材料所说明的那样，在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前面，不仅上帝的第一推动说遭到了彻底破产，而且人们连对于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不，物质自然界按照其固有的辩证规律运转着，在这里，是没有卡尔维兹的那个上帝的立足之地的，更不需要它来为世界创造什么规律。

九、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

迄今我们考察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为否定自然辩证法而提出的种种论据，从歪曲和篡改马克思，攻击和诽谤恩格斯，一直到直接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为什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

义者要花那么大气力来否定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辩证法？原因不仅在于自然辩证法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否定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找缺口，去否定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结合，否定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同时，又对辩证法进行全面的唯心主义歪曲，把它同唯物主义绝对对立起来。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辩证法所作的唯心主义歪曲，首先表现在宣扬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辩证法的必要因素，而排斥物质自然界存在着辩证法过程的可能性，排斥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

例如，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辩证法从行动者的立场出发，去探求自然和社会事实的客观知识，人的行动作为一种必要因素参加进去”（《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

“辩证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因而它的综合就总是受人的活动的影响”（《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新实证主义者波培尔说：

“辩证法可以应用于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应用于哲学思想的发展，”而说“物理的实在是辩证地发展的——这是一个非常缺乏科学根据的极端武断的论断”（《推测与反驳》1963）。

存在主义者萨特尔说：

“只是在历史的和社会的世界里，才真正有辩证理性的问题，把这种理性搬到自然世界里，那就是生拉硬栽”，所以“应当在许许多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去探究辩证法”（《辩证理性批判》1960）。

另一个法国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说：

“辩证法……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痛苦的关系、无休止的交换

的复原"，"辩证法只是在这种类型的实在之中，即在那里造成了主体的会合，这种会合不仅是主体们每个为着他的打算而扮演的一幕戏，而且是他们的居住之所，是他们交往和相互搀入的地方"(《辩证法的历险》1955)。

新黑格尔主义者兹-马尔克说：

"辩证法不是产生于某种实在的历史现象，而是产生于自我意识"(《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1931)。

另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柯热夫说：

"辩证法是思维和人的推理的运动，至于在人们思考和谈论的现实本身中，却没有任何辩证法可言"(《黑格尔研究入门》1947)。

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说：

"辩证法的关键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各个阶段的过渡以及构成人的自我意识的活动的二重性。不论是精神活动的先验要素，或精神活动的经验要素，若分离开来并就其自身孤立地加以考察，则二者都不是辩证的，因为辩证法就是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黑格尔逻辑研究》1959)。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辩证法只有当它涉及到能自由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思维的人类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物质不能是辩证法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1956)。

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朗纳说：

"辩证法就是变成了一种方法的、成为合理东西的非理性主义，因为辩证思维就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1924)。

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桑勃勒说：

"辩证法只是因为人出现在自然中才存在，正是因为人出现在实在之中，才存在一种自然界的辩证法，而如果排除了这种存在，

自然科学的内容其本身并不是辩证的，只有人的实在才能被称作为辩证的”(《从卡尔·马克思到毛泽东》1963)。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著名代表马尔库兹不仅把马克思辩证法的范围局限于阶级社会、阶级关系的范围内，把马克思辩证法说成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是所谓同本体论基础分开的，他还用歪曲列宁论述的办法，去论证他的这种唯心主义辩证法观：

“辩证的原则并不是一种可以同等地应用于任何主题的一般原则。当然，每一个不论怎样的事实都能接受辩证的分析，例如一个水杯在列宁的著名论述中那样。但是，一切这样的分析将导入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构中并表明它是所分析的事实的构成要素。辩证法把事实当作一个确定的历史总体性的要素，对于这些事实是不能把它们从这个总体性中游离出去的。当列宁在述及一个水杯的例子时说‘整个人类实践必须进入对象的定义中’，水杯的独立性就这样瓦解了。每一个事实只有在它是受社会过程的对抗的影响的范围内，才能接受辩证的分析”(《理性和革命》1941)。

然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要把主体、人、人的思想和活动，说成是辩证法的必要因素，认为在不具备这些要素的地方，就没有辩证法可言，其目的还在于以此为论据，把辩证法说成是同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相互排斥的，攻击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结合，攻击辩证唯物主义。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作为辩证的运动，它既不是‘唯心论’的，也不是‘唯物论’的。辩证法是超越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因为它发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是相互补充的对立面”，“‘辩证唯物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意义；物质并不认识它本身；它并不追逐真理，它只是冲突着”(《辩证法》1953)。

过了三年以后，缪勒更加恶毒地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是“荒唐

之事"、"一种本质的铁"(《对立面的相互作用》1956)。

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用语〔指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看来，好象本身就是十分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矛盾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955)。

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当辩证法在抛弃它原有的唯心主义的基础的时候，它就失去了一切使它成为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据我看，唯独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甚至比辩证的唯心主义更坏，这些话特别适用于马克思所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推测与反驳》1963)。

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说成：

"正如水之于油是相互排斥的"，因而"辩证唯物主义……自身就现身说法地表现为一个大矛盾"，它"必将导致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智大厦的普遍解体"(《辩证唯物主义》1958)。

另一个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说：

"辩证法并不必须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正如它也不必须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样"(《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存在主义者加缪斯说：

"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有思想的辩证法，而唯物主义本身却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在逻辑上说不通的说法"(《反叛的人》1956)。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前校长诺克斯说：

"辩证法是思想的一个过程，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为黑格尔辩护》，载斯坦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971)。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勃勒叶说：

"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说法；因为辩证法

是与唯心主义联结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是与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联结在一起的”，“当人们从辩证法中排除了唯心主义之后，辩证法所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唯物主义是静的和单纯化的，辩证法是动的和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怎么样并且如何把它们联结起来？问题就在于此”(《当前的哲学论题》1956)。

实用主义者胡克、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等人虽然并没有提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新思想，但却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恶毒攻击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恶毒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其用词之下流在这里无法引证，因为引出来只能弄污引者的纸笔。

资产阶级还从肆意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捏造“论据”去攻击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攻击辩证唯物主义。

例如，美国肯色斯大学哲学系主任戴乔治说：

“马克思主义从其一开头就在它的唯物主义和它的适应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被撕裂着”，“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联盟从一开头起就是有裂口的”(《新马克思主义》1968)。

法国巴黎大学社会学教授雷蒙·阿隆写道：

“有两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一种是辩证法和黑格尔影响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另一种是唯物主义在其中占统治地位”(《二十世纪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载德拉克考维茨编：《现代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1965)。

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说：

“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平衡”，是“不会稳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冲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作为辩证思想与自然主义的冲突出现了，列宁主义正统派清除了卢卡奇的企图，也正如马克思本人清除了自己早期的‘哲学’一样”，并说这是一道“经常从辩证法转到自然主义去的回流”(《辩证法的历

险》1955)。

以上我们用较大的篇幅，列举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由宣扬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辩证法的必要因素，进而攻击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典型言论。这一切，全都根源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于辩证法所作的唯心主义的歪曲，因此，为了驳斥他们的这种种攻击，首先就得正本清源，把辩证法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作的唯心主义歪曲中解脱出来，还它以本来面貌。

“辩证法”一词，在希腊文中，确实是指进行谈话、进行论战的意思；在古希腊哲学史上，也确实曾经有过一些哲学家，把辩证法看作是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艺术，或者把辩证法当作争论的艺术，当作证明或推翻某个论题的艺术。

例如，苏格拉底就是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通过提问题，使对方观点发生冲突，从而揭露对方观点中矛盾的艺术的，就是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进行学术谈话以达到概念的正确定义的方法的。

柏拉图把辩证法看作是在考察任何哲学问题时，通过把相反意见对立起来加以对比，在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认识真实的存在——观念，由此来进行思想从低级概念向高级概念运动的一种逻辑方法。

诡辩学派更进而认为，辩证法是把非真实的、可疑的东西穿凿附会地说成是真实东西的艺术。

麦加拉学派则把辩证法叫作争论的艺术，如此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们常常把辩证法看做一种技艺，好象它是基于某种主观的才能，而不是属于概念的客观性”(黑格尔：《逻辑学》)。

然而，也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

编造的那个所谓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公式也是谈不上的，因为在这里，只有主体而没有同它发生相互作用的客体；在这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人的行动是辩证法必要因素的公式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为在这里，只涉及人的思想、概念，而与行动无关。

但是，辩证法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显然不是这样的。

这首先是因为在希腊哲学史上，早在人们把辩证法这个词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以发现真理的艺术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哲学家把物质自然界看作是对立同一的过程了。

例如，揭开古希腊哲学第一页的米利都学派泰利士，在实际上就是唯物地理解物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化的，他把水看作始基，认为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

泰利士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更进一步，认为“无限”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从无限体的基质中分离出蕴藏在其中的热和冷、湿和干等对立物，万物就是这样借分离而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

赫拉克利特又进而把统一物分为两个对立面的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把对立面转化看作是世界的基本规律。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一切自然现象的物质始源，认为万物都在流动、变化，没有任何不动的东西，“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他认为对立面的冲突和斗争产生运动，万物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他认为一切都从斗争中产生，战争是万物之父，而对立面的和谐与和平，却只能产生静止与不变，只能使万物归于毁灭；他力图解释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

如果说，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是唯物主义地考察物质自然界对立同一的过程的话，那么，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则是

唯心主义地考察这些问题的。

毕达哥拉斯认为，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源是数，而不是物质；他认为万事万物是由奇和偶、一和多等等没有过程的、不能相互转化的对立面组成的。

以塞诺芬尼、巴门尼德和芝诺等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更加唯心主义地把毕达哥拉斯的这些抽象推到极端，得出了一切运动、变化都是虚假的现象，而宇宙则是一个没有运动和变化的“一”——“存在”的形而上学结论。

在这里，事情正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

“我们曾经看见，在自然哲学里运动被表象为客观的运动，为发生和消灭。毕达哥拉斯同样很少反思到这些概念，但也惯于把概念的本质、数，当作流动的来使用。但现在由于变化在它的最高抽象里被认作虚无，所以这种客观的运动被转变成为一种主观的运动，走到意识这方面来了，而本质则成为不变者了。这样一来，塞诺芬尼便否认了生灭、变化、运动等观念的真理性，这些规定只属于感性的表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希腊哲学史上的那种概念辩证法，那种不是把辩证法当作考察物质自然界对立同一的过程，而是把它当作比较对立的观点以求得真理的辩证法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例如，埃利亚学派的芝诺，追随其老师巴门尼德之后，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统一的、不动的，为此，他提出了四十个“命题”来反驳客观现实的多样性，提出了四个“命题”来反驳运动，他力求证明：承认了运动和多样性，就会引起不可解决的矛盾，就会造成“疑难”。

毫无疑问，芝诺的世界观是彻头彻尾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但是，当芝诺在其论断中谈到运动是矛盾的现象时，却自发地接触到了物质和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问题，感觉的矛盾性问题，以及如何在概念中表达这些矛盾的问题，正是由于芝诺对运

动概念的分析促进了辩证思维形式的发展，在世界观上反辩证法的芝诺才被亚里斯多德误认为是“辩证法的发明者”。

正因为在希腊哲学史上，在辩证法的发展中具有着这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当列宁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读到黑格尔写的“我们在这里〔指埃利亚学派〕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即纯粹的思维在概念中的运动的开端；同时还发现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自在之物与这自在之物的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并且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一段时：

列宁先是以“什么是辩证法？”为题，把这一段原文摘录下来；

接着，列宁又以“黑格尔论辩证法”为题，在这段原文的下面，指出：“两个标志　两种特征　这里实质上有辩证法的两种规定（规定而不是定义）：（α）‘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β）‘在对象的本质（自身）中（揭露）（发现）它（这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

随后，列宁就强调指出：

“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这个‘片断’应当表达如下：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不带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来说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

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①。

在希腊文中词意是指进行谈话、进行论战的辩证法，在希腊哲学史上曾被当作揭露和克服对方论断中的矛盾以求得真理的艺术的辩证法，为什么“就本来意义说”，却“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呢？

其原因就在于，正如上面概述的希腊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发生发展史所表明的那样，是先有人们把物质自然界当作对立同一过程的研究，然后才有人们对于这一过程在思维中的反映、对于概念辩证法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辩证法不在人的悟性中，而在‘观念’中即在客观的现实中”②，就在于“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③。

赫拉克利特并没有对其把物质自然界看作是对立同一的过程的研究，使用“辩证法”这个术语，那为什么列宁却反复强调：“如果恰如其分地阐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④呢？

原因就在于“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⑤，而赫拉克利特虽未对其研究使用辩证法这个名词，却正是以辩证法的这个实质、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把它作为一个新发现而引以自豪的。

---

① 《哲学笔记》，第276—278页。
② 同上书，第213页。
③ 同上书，第210页。
④ 同上书，第390—391页。
⑤ 同上书，第407页。

原因更在于，把辩证法看作是揭露思维矛盾引起对立意见的冲突以求发现真理的艺术的概念辩证法，归根到底植根于人们对物质自然界对立同一过程的考察，是物质世界辩证法的反映，而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看作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这种世界观，则正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①，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个把自然界理解为自身是无限的，就是说，把它的实质理解为过程的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辩证法的必要因素是人的思想和活动，所谓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把物质自然界排除在辩证法之外的种种说法，在实际上，统统不过是对辩证法的一种舍本而逐末、数典而忘祖的唯心主义歪曲罢了，他们的关于辩证法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和界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而同本来意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共同之点。只要摆明希腊哲学史上辩证法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就完全揭穿了这种种相互抄袭的定义、界说的原形。

对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所进行的攻击，上述希腊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发生发展史，同样提供了有力的驳斥。

什么“辩证法是超越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因为它发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是相互补充的对立面”，什么“辩证法并不必须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正如它也不必须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样”，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的这些说法，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全是一种无知妄言。

所谓用辩证法的观点观察问题，就是说，在考察事物或思想的时候，是从它们的联系和联结，从它们内部对立面的矛盾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而所谓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则是指人们在对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中，到底是把前者看作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还是把后者看作是本原的、第一性的。所以，辩证法是不能超越于、而只能结合于而且必须结合于唯心论或唯物论的，没有既不是唯物主义的而又不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当着人们使辩证法脱离其同唯物主义的结合的时候，就必定陷入到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上述希腊哲学史的一个片断，也同哲学史上其它时期的历史一样，这样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因此，“在哲学上企图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①。

什么“辩证法是与唯心主义联结在一起的”，“当辩证法在抛弃它的唯心主义基础的时候，就失去了一切使它成为合理的和可理解的东西”，什么“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不可调和的”，“辩证唯物主义自身就现身说法地表现为一个大矛盾”，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存在主义者加缪斯，巴黎大学教授勃勒叶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这一堆说法，全都把事情说颠倒了。

上引希腊哲学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最初，辩证法并不是同唯心主义，而恰恰是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在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那里，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处于直接的统一之中。他们根据直接的直观，认为整个自然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9页。

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漠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在不断的流动中，处在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他们都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种统一，把空气或水或火或其它某种物质（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的东西”是“未规定的物质”）当作本原、原始元素或原初本质。

请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好生看看，在这里，辩证法哪里是“同唯心主义联结在一起的”？不，辩证法最初恰恰是同唯物主义联结在一起的。而在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这种在希腊式的最初结合中，又哪里有什么“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不可调和”？又哪里有什么“自身现身说法地表现出来的矛盾”？又在哪里“失去了使辩证法成为合理的和可理解的东西”？不，古希腊哲学家们把自发的辩证法和素朴的唯物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观察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这里既没有什么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没有使辩证法失去任何合理的和可理解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在读到赫拉克利特所说“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一段话时，列宁特地强调指出：

“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①。

但是，事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古希腊人这种自发辩证法同素朴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世界观，虽然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为了认识这些细节，就必须把它们从现实的联系中抽象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另一方

① 《哲学笔记》，第395页。

面，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

早在泰利士那里，灵魂就被看作是同肉体不同的某种特殊的东西，阿那克西米尼把灵魂看作空气，而毕达哥拉斯派则把灵魂看作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它来说是纯粹偶然的……，所以在希腊哲学以后的发展中，辩证法终于和唯物主义逐渐分离开来，并逐渐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的概念辩证法，来分析、研究概念的运动、联系和相互转化，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研究在许多方面是按唯心主义的精神来进行的，因而与此同时，又发展了形而上学，发展了相对主义、诡辩论。例如，埃利亚学派运用其“辩证法”来反驳运动，否定物质世界和运动的真理性；以皮浪为奠基人的怀疑论学派用它的“辩证法”来否定认识物质世界的可能性，把辩证法看作是玩弄某种虚假的外观的把戏，……而这一切，则正是使辩证法脱离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泥潭里去以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列宁强调指出：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这种灵活性＝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

所以，事情和新实证主义者波培尔所说的刚好完全相反，当着使辩证法抛弃其唯心主义的基础的时候，不但不是“失去了”，而恰恰是获得了“一切使它成为合理的和可理解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地、随意地滥用概念的灵活性，才能客观地应用

① 《哲学笔记》，第112页。

这种灵活性，从而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永恒发展。

应当指出，在哲学发展的长时期内，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曾经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中，唯物主义往往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而辩证法则有时同唯心主义粘连，在更多的场合下则压根儿被遗忘，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曾经自觉地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哲学学说，而且，要想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拼凑在一起，在实际上也确实是不可能的。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过程中，在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创立了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而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在根本上统一了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不再象在唯心主义手里那样地被理解为关于精神的学说，而是第一次被确定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改造了并向前推进了旧唯物主义，使之不仅成为是辩证的、而且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说，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这样，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辩证法就成为唯物主义的，而唯物主义则成为辩证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由于研究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这同一个现象，而彻底统一了起来，成为一整块钢铁铸成的统一而完整的哲学学说。

当然，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写著作中，往往着重强调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某一个方面，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列宁在批判那个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去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的马赫主义时，却必须特别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不论在哪个时期，

不论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哪个方面，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始终是联结在一起的，是不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的。

所以，戴乔治所谓"马克思主义从其一开头就在它的唯物主义和它的适应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被撕裂着"，梅劳-庞蒂所谓"辩证法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平衡是不会稳定的"等等说法，统统不过是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主观愿望和幻觉罢了。

那么，资产阶级哲学家所谓马克思早期的辩证思想和自然主义的冲突，所谓由辩证法占统治地位和由唯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两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冲突，以及诸如此类被资产阶级哲学家当作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裂口的"证据"的东西，又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所谓马克思早期的辩证思想同自然主义的冲突，所谓马克思清除了自己的早期哲学云云，纯属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捏造。

事实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指出和论证过的那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而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因而，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必定留下他们逐渐清除黑格尔、费尔巴哈残余影响的痕迹。所以，它所证明的，乃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前进到马克思主义，而压根儿不是什么在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出现了所谓辩证思想同自然主义的冲突、所谓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相互撕裂，压根儿不是什么马克思清除自己的早期哲学，什么马克思从辩证法转到自然主义去的回流。

至于资产阶级哲学家所谓"两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

法”，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冲突”，在实际上，全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矛盾，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矛盾斗争。

这里且以资产阶级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代表卢卡奇及其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为例。

对于卢卡奇其人和他的辩证法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导论中，已经作过简要的评介。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肆意歪曲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妄图使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他打着为自觉的实践的创造性在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幌子，打着把人的意识、人的主观性恢复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的旗号，否认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并为此而对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展开了恶毒的攻击。

显然，卢卡奇鼓吹的这一套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而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这是卢卡奇本人在几次检讨中都不得不承认的。

那么，卢卡奇鼓吹的这一套，是不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所说的，是一种“辩证法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呢？

否。卢卡奇在这本书里，不仅否定唯物主义，而且也在本质之点上否定辩证法。这种倾向最集中地表现在卢卡奇大肆鼓吹的，他那个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矛盾，宣扬什么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第三条路线”和“伊壁鸠鲁式的中间世界”的所谓“总体性”理论，他还企图把这个理论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强加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决定性地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是由于它的总体性的观点，而不是由于它在解释历史时，给予经济动机的重要性。总体性的范畴，整体

对于部分的全面的和决定性的优越性，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以一种独创方式把它放在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基础上的方式的本质。……总体性范畴的优越地位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

所以，事情很清楚，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由于他鼓吹的这一套思想而展开的矛盾斗争，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冲突，而是修正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冲突。因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并不是什么“辩证法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而是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去歪曲、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著名代表马尔库兹所引列宁在谈到水杯问题时所说整个人类实践必须进入对象的定义中去的论述，是否真象马尔库兹所说的那样，瓦解了水杯的独立性，从而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裂口和冲突呢？

否。马尔库兹的引申，是对列宁论述的肆无忌惮的歪曲。

大家知道，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用辩证逻辑去批判布哈林借助于偶然拼凑的手法，把玻璃杯说成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的折衷主义定义时，曾经指出：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①。

很明显，列宁在这里所说把人的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定义中去，除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之外，是指的要根据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

人的需要去实际确定“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而把事物的“许许多多其他的属性、素质、方面以及同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① 暂时搁在一边。例如，如果我需要把玻璃杯用作饮具，那我就无需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圆，质地是否真是玻璃，关键是要底下无洞不漏水，口上无残不伤嘴；反之，如果我需要把玻璃杯用来镇纸，那我就无需知道它底下有没有洞……如此等等。

因此，列宁在这里所说把人的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定义中去，是指的人们在定义事物时，要根据人的实践需要，突出事物的规定性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而把其它方面暂且搁在一边。而在定义中所突出的这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如玻璃杯底下有没有洞，虽然是同人是否把玻璃杯当作饮具使用密切关联着，但玻璃杯的这一个方面，却终究和玻璃杯的其它方面一样，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的固有的属性、素质和方面，而并不是可以由人随心所欲地任意描绘的。

所以，列宁的这个论述，一点也不涉及到损害事物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的问题。但是，马尔库兹却硬要瞎说什么根据列宁的论述，“水杯的独立的客体性就这样瓦解了”，这不是肆意曲解，又是什么？因此，使水杯等事物的独立的客体性瓦解的，并不是列宁的论述，而是马尔库兹对辩证法所作唯心主义解释。而水杯的独立的客体性既然在辩证的分析中并没有瓦解，那么，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裂口和冲突，自然也就成了子虚乌有、空中楼阁的东西。

所以，无论从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发生发展来看，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斗争来看，还是从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分析的一些论述来看，资产阶级对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相结合所作的攻击，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作的攻

①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83 页。

击，都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事实反复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是事物的辩证法，因而辩证法必须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对辩证法作唯心主义的歪曲，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十、要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

资产阶级哲学家从唯心主义的哈哈镜里去看辩证法，因而排斥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把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看成是充满着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矛盾冲突，看成是什么木质的铁……但是，所有这一切，却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唯物主义，而并不反对辩证法。

尽管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自我标榜说，他们并不否定辩证法，但在实际上，他们所要的，却是辩证法其名、形而上学其实的假辩证法，而另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则赤裸裸地反对和蔑视辩证法，而鼓吹爬行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

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说：

“我们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不同于我们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我们必须以明确的否定态度拒绝唯物主义原理时，我们对辩证法却完全可以取得肯定的关系。而要是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或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方法，并以存在一元论为内容，那我们就必须断然地否定这种辩证法”。

既要否定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却又说还要肯定“辩证法”，那么，要肯定的到底是什么“辩证法”呢？

卡里什答曰：“基督教徒的辩证法”，这种基督教徒辩证法的根本实质则在于承认“作为世界上一切正在产生的存在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东西的最高原则的至高无上的上帝”（《基督教徒与辩证唯

物主义》1961)。

问题十分清楚，新托马斯主义的这种“基督教徒的辩证法”，确实既否定了唯物辩证法，又否定了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但它所肯定的却并不是什么超越于这两者之上或之外的“辩证法”，而只是赤裸裸的上帝辩护法！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尔说：

“在目前的知识阶段，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种〔辩证〕规律的存在。人人都有自由相信物理化学规律表达了一种辩证规律，但人人都有自由不相信它”；

“辩证法如果存在，那么，它就是它的对象的特殊的偶然性，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一个头脑中，在一个可知的天上，都不可能有预先假定而强加于种种个别事物的发展的公式”，“辩证运动并不是一种统一的强力，如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那样；它首先是一种结果。并不是辩证法强使历史的人通过可怕的矛盾而实现他们的历史，反之，是原来那样的人们，在‘缺乏’和‘必要’的影响之下，在种种情况中碰在一起，这种情况，可以由历史和经济学把它们罗列出来，但只有辩证的合理性才能使它们成为可知的。矛盾在成为一种动力之前，乃是一个结果”(《辩证理性批判》1960)。

一眼就可以看出，存在主义者所鼓吹的这种否定规律性而崇尚偶然性，否认客观矛盾的动力作用而宣扬各个个人在“缺乏”和“必要”的支配下的行动的所谓“人学”辩证法理论，压根儿就同辩证法没有丝毫的关联，而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破烂货罢了。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就其形式的、主要是最突出的外貌而言，乃是对立面的综合”(《黑格尔导论》1959)。

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辩证法是而且表现着一切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法在许多水平面上系统陈述着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法》1953)。

显然，新黑格尔主义者捡到的，是黑格尔思想的渣滓，是植根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的矛盾调和论，因而是一种十足的形而上学、假辩证法。

如果说，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是用他们的辩证法其名、形而上学其实的假辩证法去反对唯物辩证法的话，那么，资产阶级哲学的另一些流派，实用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所采取的则是另一种策略：他们先是鱼目混珠地把他们所谓的"科学方法"和辩证法等同起来，接着就偷梁换柱地要求用他们的"科学方法"去顶替辩证法。

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假如把辩证法加以恰当的理解的话，那么，它无非是科学方法而已，这样，在辩证法适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的时候，它就是在那个特定的领域内运用科学方法的一个名称"；

"辩证的方法，只有在其被理解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语时，才能声称有意义和正确性，而既然在其传统的公式中，辩证法为许多使人误解的和错误的概念所困扰着，那么，如果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就会更有助于清晰的思维"；

"为了澄清起见，最好让〔辩证法〕那个名词沉沦于废止的古语之中，……这是对思想史上通常被称为辩证法的那些假定和程序型式的任何批判性研究中所能得出的唯一正当的教训"，"回顾一下'辩证法'一词使用的悠久历史，我以为从我们的讨论中涌现出一种得到证明的教训，即：'辩证法'一词是那样地沾染着模糊的意义，以致不大可能在指望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获得可靠知识的任何研究中，作为对任何概念或理智行为的一种有用的名称来发生作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实用主义者所谓“科学方法”到底是什么东西？胡克说：“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探求可以被证实的假设，推断后果，在有控制的条件下的实验，或在不可能作实验的地方，谨慎地运用契合和差别的比较方法”（《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杜威的另一个徒弟、中国的胡适说得更干脆，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辩证法不是毫无例外地可以应用的”，“人们应用‘辩证法’这个术语时，显然应当是非常谨慎的。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根本不用它，因为我们总是可以用尝试和错误的方法这个比较清楚的术语”，“用尝试和错误的方法的解释，可以说是比用辩证的解释要略为宽广一些”（《推测与反驳》1963）。

那么，到底什么是“尝试和错误的方法”呢？坡培尔说：

“我们试验，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记录一个观察，而是作出解决某些或多或少实际或确定的问题的积极努力，而如果而且只有在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承认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利用它们而不是教条式地保持它们的情况下，我们就有进步。虽然这个分析可能令人觉得繁琐，但我相信，它描述了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我们越是自由地和自觉地准备冒险一试，我们越是批判地注意我们常犯的错误，这种方法就呈现出一种越来越科学的特性”（《历史主义的贫困》1964）；

所以，“这个方法的成功大体上依靠尝试的数量和种类，我们越尝试得多，我们尝试中的一个是成功的就越有可能”（《推测与反驳》1963）。

另一个新实证主义者莱辛巴赫说：

“在人类思想史中有许多辩证规律的例证”，而“经验方法的一般步骤，即尝试——错误法和成功——成功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试验，也可以被看作是辩证规律的无穷的反复”（《科学的哲学之兴

起》1957)。

实用主义者嘴里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新实证主义者所谓"尝试和错误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这是一种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人的感觉和行动的复合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一种夸大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忽视理性的认识的狭隘经验主义。为了弄清楚这种方法到底是不是象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者所鼓吹的是辩证法的别名或代用品，下面我们集中考察这种方法的狭隘经验主义特性，而把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暂且搁置一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过程，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先是看到客观存在着的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这些感觉、经验反复多次以后，就产生飞跃，突变而成为理性认识，然后再把这种对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又拿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和发展，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认识开始于经验，但又有待于深化，有待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但是，恰恰在这个有关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上，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却根本否定了辩证法。他们以为只有感觉、经验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他们根本不懂得感觉、经验，即使是唯物主义者那里的，来自客观外界的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也仅仅是表面的和片面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思维，不把这些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复制，那是不能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的，是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能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至于唯心主义者主观自生的经验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首先必须强调指出，实用主义者、新实证主义者鼓吹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尝试和错误的方法"，不仅不和辩证法相等同，而且恰恰是蔑视和反对辩证法的，实用主

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鱼目混珠地等同起来，带有明显的欺骗性质。

其次，正因为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是蔑视和反对辩证法的，是蔑视思维以致极其缺乏思想的，因此，尽管它的鼓吹者说什么要“批判地利用错误”呀，要“自由地和自觉地准备冒险一试”，乃至给它贴上“科学”的标签，但说到底，却终究是不科学乃至反科学的。

这是因为当着经验科学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知识材料，需要依据其内在联系加以系统的整理和建立各知识领域相互之间的正确联系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需要有理论思维。要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而且，科学研究的有些对象，如原子和电子，并不是靠运用显微镜等科学仪器所能观察到的，只有用思维才能把握住。

正因为离开了思维，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而狭隘经验主义又竭力禁绝思维，至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进行思维，因而它就必然从禁绝思维走到错误地思维，从自以为忠实地跟着事实走或只是忠实地叙述事实，走到同实际经验完全相反的地方去，从蔑视哲学、侮辱哲学走到充当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的道路上去。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曾经从自然科学史上引了大量的例证，来反复说明狭隘经验主义的反科学性。

例如，在关于恒值电流的产生问题上，存在着由伏特建立的接触说，和利特尔等人的电流化学说。接触说认为，不同的物体一接触就会产生恒值电流，所以并不需要补偿就能做一定的功；反之，化学说则认为，只有在激发物于接通电路以前就已经互相发生化学作用的时候，电流才能形成，但它不明白，化学作用如何能使电池产生电流和做功，虽然随着在理论上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确

立和在实践上大量电池的制作，为恒值电流的产生问题作出科学的结论，创造了成熟的客观条件，但由于狭隘经验主义的统治，以维德曼为典型代表的许多电学家还顽固地维护着陈旧过时的接触说。于是，在《自然辩证法》的以《电》为题的一篇论文中，恩格斯就以维德曼为例，展开了对狭隘经验主义反科学性的尖锐批判：

经验主义"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都是些因袭的观念，都是其前辈的思维的大部分已过时的产品"，"这些东西成为经验论的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很容易使人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这种经验论已经不再可能正确地描写事实了，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也一块混进去了"；"最新研究的成果、在此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或者尚在争论的事实的确定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在打击旧传统，所以这个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必须求助于各色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求助于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而最后却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任何出路。当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那种以'接触力'为根据的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从唯理论上来加以调和的时候，正是这种对于全部陈旧的电的理论的信仰，使得他在这里陷入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①。

又如，关于地球是扁球体的观点问题。一六七二年，天文学家李希发现：由于地球转动所发生的离心力，使地面上的重力不是各处均等。据此，牛顿认为，因地球转动而产生的离心力，应使地球沿转动轴发生扁缩现象，他还算出地球的扁度是$\frac{1}{230}$，就是说，地球半径要比赤道半径短$\frac{1}{230}$，但在牛顿的观点发表以后，在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7页。

六六九年到一七九三年间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的卡西尼世家中的第二代雅克·卡西尼（一六七七——一七五六）却加以激烈的反对。他力图证明地球似乎是沿转动轴伸长的，一些法国科学家以巴黎为中心，南到柯柳尔，北到邓克尔克进行的测量〔由于测量错误〕“证实”了这一见解，但牛顿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因而在牛顿逝世以后，法国科学院又派遣两支测量队，一去秘鲁，一去拉伯兰进行测量，结果证明在拉伯兰地区的子午圈弧度要比秘鲁的长一公里，而对原来所作的巴黎子午圈弧度的测量进行核校时，也得出与原来完全相反的结论。据此，就较精确地算出了地球的扁度为$\frac{1}{300}$，从而证实了牛顿的观点，于是，卡西尼家族的第四代雅克·多米尼克·卡西尼（一七四八——一八四五），也不得不承认牛顿关于绕轴旋转的地球的扁率的观点是正确的。

为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以“理论和经验”为题，指出：

“牛顿在理论上确定了地球是扁圆的。很久以后，卡西尼及其他几个法国人根据他们测量的经验断言：地球是椭圆的，并且以极轴为最长”①。

再如，关于机械运动与热的关系和热的本质问题。摩擦取火证明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而蒸汽机则证明热可以转化为机械运动。机械运动和热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些实践，解决了机械运动和热的关系问题，也说明了热的本质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神秘的热质、热素，但是由于狭隘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的阻碍，以致在机械运动和热的客观辩证法完全暴露之后，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物理学家，还大多满足于简单地把事实记载下来，而不能正确地从理论上阐明热和机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9页。

运动的辩证关系。法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萨迪·卡诺（一七九六——一八三二）认真研究了热转化为机械运动的过程，在一八二四年发表了《关于火的动力的研究》的著作，第一个以普遍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消耗由热源取得的热量而得到的功能的问题。卡诺的研究，在实际上包括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并已接近热功当量的观念，但是，由于狭隘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引导他相信错误的热素说，因而导使他没有能够探究到问题的底蕴、得出正确的结论。为此，恩格斯指出：

"在二十年代，萨迪·卡诺研究了这个问题，而且的确研究得很巧妙，以致他的最好的计算（后来曾由克拉佩龙用几何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现在还被克劳胥斯和克拉克·麦克斯韦所采用，而且他差不多已经探究到问题的底蕴。阻碍他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材料的不足，而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理论。同时，这种错误理论并不是什么奸险的哲学强迫物理学家接受的，而是物理学家用他们自己的似乎比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强得多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穿凿附会出来的"①。

最后，正因为狭隘经验主义蔑视理论和思维，蔑视辩证法，因而就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成了从自然科学通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篇文章中，举出了大量的例证。例如，英国经验主义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并开出了制造黄金和完成各种奇迹的正式方子；又如牛顿在晚年埋头于解释圣经中的约翰启示录，……英国的生物学家华莱士和化学家克鲁克斯则又成了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俘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51页。

狭隘经验主义者只相信自己看过、做过、经验过的东西，而神秘主义者则单凭信仰，完全排斥经验，这两个相反的极端如何会相通的呢？问题就在于狭隘经验主义者夸大经验而蔑视思维，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而否认理性认识的真实性及其重要作用，这就必然使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或者否认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或者给予虚无飘渺的东西以客观实在性，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之中。

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者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①。

那为什么实用主义者标榜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新实证主义者吹嘘的“尝试一错误”法，不能保证狭隘经验主义者不滚到神秘主义的泥坑中去呢？原因在于一旦狭隘经验主义因蔑视思维、蔑视辩证法而丧失了批判地思维的头脑，事先相信荒诞无稽的把戏是真实的或可能是真实的，从而作出“大胆假设”，并接着而进行种种“尝试”的时候，那么，他就完全被迷信和偏见所蒙蔽，在其“小心求证”中就只能看见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且在这里，任何科学仪器都是无济于事的，都是不能防止他陷进唯灵论的泥坑的。即使人们揭露出所谓降神的事实是骗局，狭隘经验主义者照样会在“伪造的东西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真的东西的真实”的信条下，去继续其“尝试一错误”的循环。所以，恩格斯又指出：

“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这样，经验论就发现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99 页。

已要驳倒顽固的请神者，势必要用理论的考察，而不能用经验的实验”①。

归结起来，无论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吹嘘和标榜的“辩证法”，还是被他们鱼目混珠、偷梁换柱地建议用来取代辩证法的“科学方法”，统统是形而上学，而且是同唯心主义连结在一起的形而上学。但是，妄图用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去取代唯物辩证法，却是徒劳的、枉费心机的。正如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正在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我们时代的主人那样，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发出了要唯物辩证法而不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强烈呼声，因为唯物辩证法给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0页。

第　四　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

马克思、恩格斯颠倒和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后，对于客观世界矛盾运动的认识，就更其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实质和最主要的特征。

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列宁就曾经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的"辩证法"，规定为"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①。

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又进一步指出：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而"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所以"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22 页。

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①。

正是因为事物矛盾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中所占据的这种极端重要的地位，使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歪曲、攻击和伪造唯物辩证法时，都要把矛头集中指向这个矛盾问题，而首先则是千方百计地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

早在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自己的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的形形色色手法。例如：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穆勒那种把对立的统一化为对立的直接等同，而排除它们之间的对立的"消除矛盾"的逻辑；

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大量的例证，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那种否认一切对立都是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观，特别是批驳了杜林用这种观点去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的陈词滥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桑乔那种把现实矛盾变为观念矛盾，用抛弃关于现实矛盾的观念来顶替实际解决现实矛盾的荒谬观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又揭露了穆勒那种企图用空话、靠捏造用语来"解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的矛盾的卑劣伎俩；

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列宁也指出经济浪漫主义在看到和指出资本主义矛盾之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解释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做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还"幼

① 《哲学笔记》，第240、407—408页。

稚地用关于消除它们的格言、揭露、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因而"把利益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制度本身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的矛盾)当做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就成了"浪漫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①。

…………

一百多年以来，尽管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其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的文章、著作中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时，力图来点花样翻新，但是，就其基本的思想路线来说，却终究没有跳出他们先辈的这些形而上学的巢臼。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其先辈确立的那个"基础"上面，又构筑了许多混淆视听、把水搅混的"上层建筑"，作为他们歪曲、攻击和伪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堡垒。对此，我们显然应当加以认真的考查。

一、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不容混淆

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否认矛盾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的一个主要的手法，是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借口荒谬的逻辑矛盾只存在于不正确的推理之中，而否认辩证矛盾的客观实在性。

在一八七五年出版的《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书中，杜林写道：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

此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把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混淆起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94—195页。

来而否认前者的客观实在性时，几乎都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杜林的这个说法。

例如，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在《辩证法和发展》一文中，就把事物本身实际存在的矛盾说成是它们在形式逻辑上的差别。他认为矛盾不是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概念之中，而且只具有消极的性质：矛盾只能说明思维的错误，而决不是思维的规律（《新时代》杂志第十八年度第二卷）。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首领考茨基说，矛盾的一个理解法“是表示两个现象或思想合不拢”，“但是，确定两个现象彼此是否合得拢的，是一个判断。而判断是仅仅存在于能出错的我的意识之中，而不存在于外界”，而且“就我们的意识来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存在矛盾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情。哪里发现一个矛盾，意识就要极力想法把它扬弃”（《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流派，也重复着与此完全相同的观点。例如：

新实证主义者艾耶尔说：

“如果从逻辑意义来看‘矛盾’这个术语，那么，自然界不可能有矛盾，只是在陈述中才可能有矛盾”，而“如果象通常那样，把这个术语任意地加以理解，以致把相互作用的每一种形式都看作是一种冲突，而且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任何后果都看作是它们的合题，那我们又会陷于绝境”（《哲学与科学》1962）。

另一个新实证主义者波培尔说：

“辩证法家……喜欢到处用‘矛盾’这个语词”，然而，“如果一个理论包含了矛盾，那么它就导出了任何东西，因而它实在什么也没有导出。如果一个理论，给它所断定的每一个知识又都加上这个知识的否定，那么它就根本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知识。所以，一个包含了矛盾的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来说，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推

测与反驳》1963)。

美国实用主义分子胡克把矛头直接指向恩格斯，他说：

“辩证法的一切规律的基本前提是：相信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之中的’。至少可以说，这是对‘矛盾’这个名词的奇怪的应用，因为自从亚里斯多德的时代以来，认为矛盾的是命题或判断或陈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这已经成为逻辑理论的一种老生常谈了”，然而，“恩格斯不仅认为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他还坚称它‘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如果按照字义来解释，这就会把逻辑范畴看成是物质关系，从而整个数学和逻辑学就会成为不过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枝”，更有甚者，“我们怎么能够由于运用了荒谬的矛盾和真正的荒谬而这样成功地去预言、构思和解释事物”(《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时间过了将近二十年之后，胡克仍在喋喋不休地说道：

“‘矛盾’这个名词通常和唯一能首尾一贯的用法是如亚里斯多德早已指出的把它作为论断或陈述的一个特性”，因而，关于矛盾的辩证法原则“不论如何读法，它都不能被看成是科学知识的任何一个特殊片断的前提或必要条件，因为这一科学陈述或任何其它科学陈述的真实性，是可以同否定这个所谓的辩证法规律相容的”(《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1959)。

西德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也在说什么：

“只有判断和判断才能互相矛盾，处于相互矛盾对立中；但是，事物是不能互相矛盾的”，“世界本身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矛盾；因为否则的话，任何一种重复实验都能导致矛盾的、模棱两可的结果，大自然对于同一个问题在同样条件下的答案可能同时是肯定的或者否定的，于是任何一门科学都成了问题”(《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格勒维洛甚至说什么：

"马克思主义……把矛盾放在现实的根源上，而把非存在提升到存在的等级上，贝尔底也夫说，这是一个'逻辑的怪物'"(《现代思想的几大流派》1954)。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所谓"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支，如意大利的科来蒂，他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一书，其最核心的命题，也是认为矛盾只存在于命题之间，而不存在事物之间，认为这两者之间的混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检验刻记，这把它规定为一种假科学云云。

一百年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矛盾问题上的这种反复重复的喧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们坚持不顾事实、蛮不讲理地硬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以形式逻辑排除荒谬的逻辑矛盾为论据，去否定辩证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并对揭示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歪曲和攻击。

然而，不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怎样叫嚷，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却毕竟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是不容混淆的，也是无法混淆的。

什么是荒谬的逻辑矛盾？这就是把在实际生活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概念、判断、推理中人为地搞到一块去，从而造成思想混乱，概念不清。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第四卷第三章确立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时，曾经指出：

"同一个属性，不能在同一时间内，在同一方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个主体"；

在同书的第四卷第四章中，亚里斯多德又指出：

"对于同一个主体，在同一时间，如果一切矛盾的说法都是真的，那么显然，一切东西都可以归为一了。因为这同一事物既是一艘战舰，是一堵墙，又是一个人了"。

这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对于同一个主体来说，只能说它或是战舰，或是墙，或是人，……而要是在同一方面、同一时间，把在实际生活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归诸于同一个主体，说某物既是战舰，又是墙，又是人，或者说某物既是战舰又不是战舰，既是墙又不是墙，既是人又不是人，……那便是荒谬的逻辑矛盾。要是不按照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把这些荒谬的逻辑矛盾排除掉，那便没有连贯的、正确的思维。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又确实到处存在着辩证矛盾，这就是存在于一切事物内部的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两重性。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关于“我们走下又不走下同一条河，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的名言，所揭示的就是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因为河水在不停地流动着，而我们肌体的细胞则永远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之中。显然，只有越来越深入地揭示这种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才能越来越正确和深刻。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就是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明确地区别开来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总是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论敌言论中包含的荒谬的逻辑矛盾，另方面又阐明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而列宁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两种矛盾的不容混淆性：

“‘逻辑矛盾’——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①。

但是，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在《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曾就当时俄国的农民已不再是一个阶级和还仍然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指出了辩证矛盾同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页。

臆造的、叙述的矛盾之间的原则区别：

"我们把农民这两个字放在引号内，为的是表明在这种场合下，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当然已经不是一个清一色的阶级。如果有人看到这种矛盾而惶惑不安，他就是忘记了，这并不是叙述的矛盾，也不是学说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这并不是臆造的矛盾，而是活生生的辩证的矛盾。既然在我国农村中农奴制社会正在受到'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排挤，那末农民就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裂成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了（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最小的资产阶级）。既然农奴制关系还保存着，那末'农民'还仍然是一个阶级，再重说一遍，这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而是农奴制社会的阶级"①。

在一篇《评论》中，列宁又就存在于俄国资产阶级身上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伊兹哥也夫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叛徒，想必会在这里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承认这种发展使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占有最充分的最纯粹的统治地位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又说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能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了！

"这种'矛盾'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不是错误论断的矛盾。资产阶级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决不等于自由资产阶级有本事发挥那样的历史主动性，使他们能够摆脱普利什凯维奇的'奴役'"②。

不仅如此，列宁还尖锐地揭露过皮达可夫借口排除荒谬的逻辑矛盾而反对在思维中反映辩证矛盾的企图：

"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这一矛盾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呢？是逻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9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83 页。

辑矛盾还是非逻辑矛盾呢？皮·基也夫斯基〔皮达可夫的假名〕用'逻辑'这个字眼时，却没有想一想，因而也没有觉察到这个字眼在这里恰好替他掩盖他所谈论的问题（掩盖读者以及作者的耳目）。这就是经济对政治的关系问题，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内容对一种政治形式的关系问题"①。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列宁强调指出，其原因就在于：

"在人的推论中的一切'矛盾'，都是逻辑矛盾；这是空洞的推论。皮·基也夫斯基用这种推论来回避问题的实质：（1）这种'逻辑'矛盾是两种经济现象或状态之间的矛盾？（2）还是两种政治现象或状态之间的矛盾？（3）或者是一种经济现象或状态同一种政治现象或状态之间的矛盾？"②

请注意，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评论 关于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兹哥也夫》以及《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文章中发表的这些清楚而明确的论述，是在一九〇二年、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六年写的，而上面所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的基础上，所发出的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言论，却全都是在此以后。所以，这一切攻击，不但无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半根毫毛，而且恰恰暴露了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无知，暴露了他们至今还在重复着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的杜林、皮达可夫、伊兹哥也夫之流的破烂货色！

杜林所谓矛盾只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的谬论；伯恩施坦所谓矛盾只存在于概念中，而不存在于事物中，并且只具有思维错误的性质的谬论；考茨基所谓矛盾表示确定两个现象或思想是否合不拢，因而只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判断，而不存在于外

①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37 页。

② 同上。

界的谬论；艾耶尔所谓只是在陈述中才可能有矛盾，自然界不可能有矛盾，否则我们就陷于绝境的谬论；格勒维洛所谓马克思主义把矛盾放在现实根源上，因而是一个逻辑怪物的谬论……所有这一切，不是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就是说只知有荒谬的逻辑矛盾而不知有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吗？不是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无知吗？

而胡克所谓如果认为矛盾是一种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界的现实力量，就会把逻辑范畴看成物质关系的谬论，所谓怎么能由于运用荒谬的矛盾去成功地预言、构思和解释事物的质问，坡培尔所谓包含矛盾的理论导出一切东西又导不出任何东西，因而完全没有用处的谬论，则进一步说明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流派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在蓄意玩弄他们的无知，蓄意混淆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以便在基础上制造混乱。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用形而上学的偏见，把马克思主义罗织成某种“不过是一个‘同时’谈两种截然相反的事情的糊涂虫而已”，把它同科学对立起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不科学、反科学、假科学的东西。

胡克所谓科学陈述的真实性是同否定矛盾辩证法相容的谬论；卡里什所谓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真正矛盾，否则任何一门科学都成问题的谬论；科来蒂所谓把存在于命题之间的矛盾，混淆地用于不存在矛盾的事物之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检验刻记，从而规定其为假科学的谬论，就表明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这个企图。

然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这一切谬论，所说明的却只是：挂在他们嘴上的所谓科学，才真是不折不扣的假科学！

问题在于，一方面，固然任何科学都要排除荒谬的逻辑矛盾，但在另一方面，任何科学又都必定要研究实际存在于它所涉及的

现象领域中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在《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中，列宁指出：

“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归根到底与消费相联系并且以消费为转移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学说中的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顺便指出，马克思的实现论之所以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正是因为它表明了这种矛盾是怎样实现的，并且把它摆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体系’所以带有‘论战性’，并不是因为它‘有偏向’，而是因为它从理论上确切地阐明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①。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②。

十分明显，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研究了它所涉及的现象领域特有的矛盾，任何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价值，就在于它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摆在首要地位，从理论上加以确切的阐明。号称科学而不研究、乃至排除它所涉及的现象领域特有的矛盾，这不是在取消科学研究的对象，使科学理论成为空谈，又是什么？没有研究对象、专尚空谈的“科学”，不是假科学，又是什么?!

说到底，荒谬的逻辑矛盾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是不容混淆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68—6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84 页。

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基础上，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其结果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反科学性。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有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就转而在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区分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的基础上来进行歪曲和攻击。例如，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就说：

"他们〔指马克思主义者〕把思维和判断中的'逻辑矛盾'同实际世界中的'辩证矛盾'加以区别。这样，他们终于错用了'矛盾'概念，并且把它改造成了具体矛盾"(《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明确区别开来，就是"错用了矛盾概念"呢？为什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要把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叫做是马克思主义"改造成的具体矛盾"呢？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荒谬的逻辑矛盾，因而就看不到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充满着矛盾。

二、形式逻辑勾销不掉辩证矛盾

然而，更其值得注意的却是，在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影响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和东欧泛滥起一股迎合和接近资产阶级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世界观的思潮，这股思潮企图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去勾销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

被苏联哲学界称作"积极反对非理性主义、信仰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反动势力"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索姆维尔，在一九六八年三月

出版的《国际哲学季刊》第八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本体论、逻辑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在文章有关本体论与逻辑的关系的段落中，索姆维尔报道和介绍了在苏联和东欧出现的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新立场”：

这种“新立场”“最近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内，在最近二十年内作为值得重视的事物而显露出来”。“新立场认为，在一切基本方面，只有一种逻辑，即形式逻辑，不允许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矛盾，在逻辑上也不许把矛盾导入合理的论述，同样不许在自然界中有事物本身的客观矛盾。那么，关于马克思以来所说自然界中存在客观矛盾，又怎么说呢？所说矛盾，在实际上不是正式意义上的矛盾，实际上只是某种冲突，对立着的力量的冲撞，它的存在并不侵犯矛盾律。……”。

索姆维尔还说：“在我在一九三五——三七年在苏联研究哲学时，这种立场还不能说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存在着，而现在，它在苏联，虽不是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程度上，但却在一个有影响的程度上存在着，而在有些马克思主义国家如波兰，则在一个巨大的占统治地位的程度上存在着，如沙夫的文章。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当我在苏联渡过另一个研究年度时，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青年逻辑学家集团——它们中间的领导人物是季诺维也夫，他的著作有这个方向，还有有高级研究位置和许多出版著作的老练的哲学家如巴克拉节和柯尔曼，他们是新立场的早期斗士”，“我出席了一次在第比里斯哲学研究所由巴克拉节所作听众很多的讲课，他在那里明确地和强调地陈述了这一观点。我也在中央哲学研究所听到柯尔曼以及苏联亚美尼亚哲学家阐述这一命题”，不仅如此，“如果人们考查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以及较古典观点的苏联哲学家如罗森塔尔，以及塔瓦涅茨、科普宁、纳尔斯基和高尔斯基这些逻辑等方面的专家的著作，则可看到新立场虽非占统治地位，却

影响了古典立场”。

索姆维尔所说“沙夫的文章”，是指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沙夫，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号的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上发表的题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矛盾律》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沙夫说，他改变了在同一杂志一九四六年第三——四期上发表的《当作辩证逻辑看的矛盾律》一文的观点。接着，他说：“辩证法主张矛盾的客观性，但马克思主义又拒绝思维中的逻辑矛盾”，怎样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沙夫的解决办法是把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和〔形式逻辑〕矛盾律相容的”，例如“一个对象的极性结构”；“与此相联系的、相互对立的力量的斗争”；“从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研究的、一个对象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对立”；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相容性”。另一类是“同矛盾律相违背的”，例如，关于“亦此亦彼”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谴责形而上学思维图式‘非此即彼’的狭隘性并经常指出用‘亦此亦彼’来代替它的必要性，而在这样作时，他们是在攻击矛盾律的效力”。

为此，沙夫建议用“一种在逻辑上没有矛盾的方式”，“必不要损害了逻辑上矛盾律的效力”的方式来谈论它，因为“只有在遵守矛盾律的中间，才有可能用一种在逻辑上没有矛盾的方式明智地谈到辩证法及其原则，谈到辩证的矛盾，否则的话，一切判断都会是同等有效的，而一切原则和法则就会失去一切意义”。总之一句话，必须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来勾销和抹掉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

索姆维尔提到的“有高级研究位置和许多出版著作的老练哲学家”、“新立场的早期斗士”“柯尔曼”，是指的当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从现代科学和实践看矛盾问题》讨论会时，当时还在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任职的柯尔曼，发表

的题为《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的报告。次年，柯尔曼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后，一九五九年第三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哲学杂志》当即发表了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柯尔曼说：

"形式逻辑的法则，其中包括矛盾律，也对辩证逻辑有约束力"，"辩证逻辑也必须考虑到矛盾律，矛盾律不允许我们对同一个意义上理解的同一个问题同时既作肯定的又作否定的回答"。

而波兰的里沃夫—华沙学派的新实证主义者艾杜凯维奇则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逻辑概要》一书中写道：

"矛盾律排除了两个相对立和矛盾的命题在同时成为正确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矛盾律排除了在实在中可以存在矛盾的事实材料，因而排除了某物可能如此这般而在同时又不如此这般的可能性。这肯定不是意味着矛盾律否认在实在中可能存在矛盾，倘若人们用'矛盾'此词去意指以一种对立的姿态发生作用的对立的趋势或力量的话"。

从沙夫、柯尔曼、艾杜凯维奇等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索姆维尔所谓"在最近二十年内"在苏联东欧"作为值得重视的事物而显露出来"的"新立场"，在实际上全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而不过是陈旧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的翻版罢了。花样翻新之处，只是在于：资产阶级哲学家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在此基础上歪曲攻击唯物辩证法，而沙夫等这一类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在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启示"之下，竟要大动干戈，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去勾销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沙夫等人论述中所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实际生活中到底是不是存在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二是这种矛盾同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曾经说过：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①。

在自然界中，必须承认存在着“亦此亦彼”的矛盾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关于光的本质的认识。

在一七〇四年，牛顿提出了光的微粒说，认为光是“由发光体向各方面散发的微细质点”组成，就是说，他把光看成好象是机械的微粒子流，看成间断的、不连续的过程。牛顿曾根据这个理论观点，令人满意地说明了光的直线散布、反射或折光等等现象，并依据其关于光的假设，第一个说明了霓虹色彩的本性。

但是，在不久之后，荷兰科学家惠更斯却提出了光的波动说。他认为光并不是质点或微粒的移动，而是某种假想的物质——以太的波状运动。就是说，他把光解释成一种连续不断的幅射。

在十九世纪中叶，发现了光的衍射和光的干扰的现象，即光线在遇到小小的障碍时，会象波一样在它的边缘绕行，或在穿过小空隙时，会提供一幅环形、线行或斑点形的暗明交错的画面，而分解为各种单色光；而在两道光相遇时，也会看到与此相类似的画面。对于这些现象，只有根据光的波动说才能加以说明，而根据光的微粒说却无法加以解释。

尔后，麦克斯威尔的电磁说，更为光的波动说奠定了基础，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4—555页。

它在两个世纪内被承认为不可动摇的经典理论。

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物理学的新发现，光的波动说却开始动摇了，因为它不能为光电效应、热幅射的光谱组成特点、柯姆普登效应等新发现的光的现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以光电效应为例，落在金属表面上而具有一定波长的光，会从金属原子中提出电子，而将自己的能的一部分，给予这些电子，而且这些光电子的速度，丝毫不依光的强度为转移。显然，只有把光看作是由光的量子所构成，才能解释这些现象。这样，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就形成了光的量子说，它确定光是量子流，也即是一种中断的不连续的过程（和牛顿的光的微粒说不同之处在于，光微粒具有机械的本性，而光量子则具有电磁的本性）。

但是，光的量子说虽然很好地解释了为光的波动说所不能很好地解释的许多重要的光学现象，却又不能给其它许多重要的光学现象作出满意的解释，于是，物理学家不得不承认光在同时既是中断的又是连续的，承认光是波又是量子微粒的一个统一过程。

有一些物理学家在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支配之下，曾力图否认光的这种亦此亦彼的矛盾本性，把光是波和量子微粒的统一，曲解成是“借助于‘微粒状态’一词加以描述的某些实验装置，以及借助于‘时距’或‘波长’等词加以描述的另外一些装置”，但是，物理学家们的实验却否定了这种曲解，而反复证明了光是波又是量子微粒的统一的矛盾本性。

这个典型实例，雄辩地说明了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竭力否认的“某物可能如此这般而同时又不如此这般”的矛盾，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正式意义上的矛盾”，对于这种实际存在的矛盾，要想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去勾销、排除、否认它，都是办不到的，也是徒劳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如实地承认它、正确地分析它，从而“对于同一意义上理解的同一个问题同时

既作肯定的又作否定的回答”。

那么，这难道不是“侵犯”、“损害”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吗？

不，只要我们对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不去作形而上学的错误解释，那么，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问题的实质在于，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指的是，在同一的意义和关系上既肯定某个对象又否定这个对象的两个相反的判断是不能并存的，说到底，它指的是：这两个相反的判断不可能全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判断和虚假的判断是不能并存的。所以，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只是排除荒谬的逻辑矛盾，而并不排除对于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作出如实的反映。

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不仅不排除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而且还正是在人的思维中正确反映这种辩证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不矛盾的逻辑形式去认识客观存在的辩证矛盾，才能防止从主观方面去添加荒谬的逻辑矛盾。恩格斯所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①，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会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去勾销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显然是因为他们把现实生活中的辩证矛盾同思维中荒谬的逻辑矛盾，把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又把人的思维必须反映现实矛盾，同不允许思维中有主观的逻辑矛盾，把这样两件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事情绝对割裂开来，借口形式逻辑矛盾律排除思维中荒谬的逻辑矛盾，妄图鱼目混珠地一笔勾销现实生活中的辩证矛盾的缘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10 页。

然而，恰恰正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这样随心所欲地胡乱使用矛盾律，才真正错误地解释并且损害了形式逻辑的法则。

翻开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一书卷四章三，在那里可以找到为形式逻辑矛盾律规定的含意是："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并说"这就是一切原理中最确切的原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不允许在同一情况下，说同样属性属于同一主题，同时又说它不属于同一主题。要是那样说，那便是违反了矛盾律，就是荒谬的逻辑矛盾。

按照矛盾律的这个要求，如果某一事物的属性是微粒状而不是波状，或者是波状而不是微粒状，那么，说这个事物的属性同时又是微粒状又是波状，或者说其属性是微粒状同时又不是微粒状，是波状同时又不是波状，那就显然违反了矛盾律，是荒谬的逻辑矛盾。

但是，客观情况却是极其复杂的。当着某一事物具有着明显的相互矛盾的特征时，当着象光那样的客体本身具有着是微粒状同时又是波状的活生生的矛盾的属性时，那就只有如实地反映这个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才是符合于矛盾律的上述要求的。反之，则是不符合于矛盾律的要求的。因为在这里，是微粒状同时又是波状，这就是光这"同一主题"的"同样属性"，因而"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它。

所以，要想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去勾销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那是办不到的。这种愚蠢的企图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形式逻辑矛盾律的理解，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是错误的。

三、目无矛盾根源于坚持形而上学世界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不仅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

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总之，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反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却异口同声地否认辩证矛盾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实在性，不遗余力地反对矛盾辩证法。

在一八七五年出版的《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书中，杜林写道：

"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真实地产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顶点，……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针对杜林的这些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的言论，恩格斯严肃地指出：

"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强的反对者，在反对矛盾辩证法时，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单纯的断言和许多的谩骂"①。

尽管如此，整整一百年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反对矛盾辩证法时，却大都还是在重复着否定矛盾的客观实在性的单纯断言和对于矛盾辩证法的谩骂。

例如，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说：

"马克思认为他的辩证法的主要源泉是事物中的一种真实的矛盾，但是矛盾除了在自我发展的精神的各阶段之间，只不过是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32 页。

死的东西"(《黑格尔逻辑研究》1959)。

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朗纳认为矛盾是非理性的，而具有着矛盾的存在就证明着非理性：

"矛盾破坏着规定的合理性，因此也就证明'思辨的'(即辩证的)规定。在这规定中，理性本身被合理的东西所破坏，因此矛盾就用合理的方式表现着超理性的辩证的东西"(《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24)。

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说：

"问题在于要恢复一种灵活而耐心的辩证法，把运动和它的真理结合起来，反对先验地把一切实在的冲突看作矛盾或者甚至看作对立面"(《辩证理性批判》1960)。

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尔克说：

"矛盾只在有纯粹否定的地方，即在思想中才存在"，"矛盾完全是观念上的东西"，并引证笛卡儿的话说，矛盾"不可能存在于悟性以外的任何事物上，而正因为事物是存在于悟性之外的，所以显然矛盾并不牵连到任何事物"(《肯定的辩证法》1952)。

奥地利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说：

"'对立面的统一'规律只是相关于一个不为空间和时间所限制的存在领域，因此也就是只相关于理想的存在领域，才是可以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1958)。

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世界上到处都有矛盾""这样一个论断……是惊人的"，"毫无根据的"、"的确只不过是以一种不严密的糊涂的说法为根据而已"(《推测与反驳》1963)。

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还专门论证了为什么矛盾只能存在于思维中而不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因。他认为：

在思维中，每一事物都是由它所是和它所非的东西来定义的，

因而是它在一个辩证体系中的地位来定义的；但在实际中，事物只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它们排斥着它们的对立面。黑格尔把事物的概念同事物本身混淆了起来，因而预先假定了事物本身朝着一个结合着有限东西和无限东西的合理目标发展着。相反地，马克思则认为，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以及从而对于它们的过去和它们的未来的可能性的估价，是独立于事物本身的，它们在其存在中，排除一切它们所不是的事物，而包括它们的过去和未来（《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6）。

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充满着矛盾，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于这些矛盾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从上面所引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都坚持着同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坚持矛盾的客观实在性，还是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在根本上相互对立的一个集中的反映。

恩格斯在批驳杜林否认矛盾客观实在性的言论时，曾经指出：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目无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把事物看作没有生命的、彼此孤立而没有联系的东西，这就必然只看到事物目前的存在，而看不到同它的这种现状相矛盾的、它过去的产生和将来的消失；就必然只看到它表面上的静止，而看不到造成着这种暂时的和相对的静止而又逐渐改变着这种静止的不断的运动；就必然只看到事物和它自身的同一，而看不到在这种同一中包含的差异，看不到一个事物同时是它本身又是别的，更看不到不断改变着事物和它自身相同一的、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就必然只看到一个一个彼此孤立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更看不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着。

为什么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实证主义……这些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全都异口同声地断言矛盾只能存在于"精神"、"思想"、"悟性"、"理想的存在领域"之中，全都异口同声地断言矛盾"破坏着规定的合理性"，因而不能存在于事物之中，否则便是"僵死的东西"，而且把坚持矛盾的客观实在性，说成是"惊人的"、"毫无根据的"，"以不严密的糊涂说法为根据的"呢？只要把他们那些几乎没有任何论证的、宣言式的论述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形而上学世界观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

而意大利德拉—沃尔佩关于为什么矛盾只能存在于思维中而不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因的论证，则更是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大暴露。

什么是事物？事物就是矛盾。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对立的矛盾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而它方则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就是由那个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事物内部矛盾着的这两个方面，不但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着，而且随

着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而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事物的性质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所以，德拉—沃尔佩所谓在实际中，事物只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它们排斥着它们的对立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事物所是的东西，也即其性质，是由其内部包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而除了矛盾的这个主要方面之外，在事物内部，又还有与矛盾的这个主要方面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的次要方面，并且随着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变化，而在一定条件下互易位置。要是这个对立面被“排斥”掉了，“事物只是它们所是的东西”，这个事物岂不就成了凝固不变的“绝物”了吗？然而，正如科学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这样的绝物是没有的。德拉—沃尔佩显然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它奉为自己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从而把每一事物和它自身相同一，理解成每一事物只能和它自身相同一，永远和它自身相同一，同时又把同一理解成排斥差异和对立的绝对的等同了。

事物的质，就事物本身来说，就是使它成为这一定的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而对于其它的事物来说，则又是使它不成为其它事物、不同于其它事物的区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①。所以，德拉—沃尔佩所谓事物在存在中排除一切它们不是的事物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它显然把同一和差异、把事物的规定性和区别性绝对地对立和割裂开来了。

正因为德拉—沃尔佩所坚持的这种把同一和差异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是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他为了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7页。

自已的观点多少易于被人们接受一些，就不能不吸取一些符合常识的实例进去，但这样一来，却使他的整个观点陷入到荒谬的自相矛盾中去。例如，德拉—沃尔佩不得不承认事物在其存在中包括它们的过去和未来，这无疑是合乎事实的，但却是同他所坚持的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理解的同一律相矛盾的。因为事物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作为同事物的现状、同事物现在所是的东西相矛盾对立的因素而包含在事物之中的，因此，要是事情正如德拉—沃尔佩所说的那样：事物只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它们排斥着它们的对立面，它们在其存在中，排除一切它们所不是的东西，那么，事物怎么能够包括它们的过去和未来？反之，既然事物确实包括它们的过去和未来，那么，这不一下子就宣告了德拉—沃尔佩所宣扬的所谓事物只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它们排斥着它们的对立面、它们排除一切它们所不是的东西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破产吗?!

事情十分明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会目无矛盾，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坚持着这种早已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早在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在谈到形而上学者观察问题时所用方法的特征时，曾经生动地说过：

“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①。

对照一下上面摘引的德拉—沃尔佩的言论，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发表了七十多年以后，德拉—沃尔佩所坚持的，还仍然是这种早就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驳得体无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肤的世界观吗?!

四、离开了同一去把握对立：把对立看成绝对不相容的和凝固不变的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坚持用形而上学世界观去观察事物，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离开了同一去把握对立，从而把存在于世界上万事万物中的矛盾，当成是没有内在关联的对立。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流派。

西德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说：

"我们承认世界上有对立的紧张和互补关系，但这决不是矛盾"，"我们主张，世界是可以观察到许多表示对立的（在某些方面）特性和现象。但是，人们不能把这种对立形式说成是矛盾"（《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奥地利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说：

"关于世界上出现实在矛盾的例子，也很清楚在大多数情形中实际上根本没有矛盾。常常是关于相反的对立（数学的正质与负荷），或者是所谓矛盾并不属于同一主体（次原子的粒子间的引力与斥力：电子之间有斥力，质子与电子之间有引力）或至少不在同一方面（一个生命机体中的细胞的生长与消灭）；两极的对立（北极磁力与南极磁力），并且甚至于平常观察到一个现象（象战争）可以有积极的结果与消极的结果，也被称为'矛盾'"，他说这是"'矛盾'与'对立'的混淆"（《辩证唯物主义》1958）。

瑞士新托马斯主义者鲍亨斯基说：

"列宁列举了下面这些例子来说明'对立'：'＋和－，微分和积分，作用和反作用，阳电和阴电，原子的化合和分解，阶级斗争'。显而易见，这里谈的不是矛盾的对立，而是另一种对立，这和恩格斯

相反，恩格斯显然不知道形式逻辑的要素，而把这里的对立看成矛盾的对立”(《苏俄辩证唯物主义》1956)。

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在辩证法家使用“矛盾”这个名词的地方，“如果换用象‘冲突’，或者也许‘对立的倾向’或者‘对立的利益’等等这样的语词，就会引起较少的误解”(《推测与反驳》1963)。

在矛盾问题上，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看法和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流派不完全相同，但他们一般也都把矛盾局限于精神领域，把矛盾说成是观念上的东西。也有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跟新托马斯主义者一样，在对立不是矛盾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把对立和矛盾这两者相互对立起来而否认矛盾的实际存在，说什么对立面不是互相矛盾的，每一个对立面本身也没有矛盾。

资产阶级关于对立不同于矛盾的这些断言，也在修正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反响。例如：

东德的乔治·克劳斯就以黑格尔为靶子，责备矛盾辩证法使“矛盾”此词和对立相混淆，而使“矛盾”此词含糊不清(《形式逻辑导论》1959)。

意大利的科来蒂则认为唯物主义是排除那种认为在实在中存在矛盾的观念的(见《访问科来蒂》，载《新左派评论》杂志 1974 年 7—8月号)。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这种对立观，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对立和同一是相联结而存在的，因此，离开了同一去把握对立，把一个个现实的、活生生的矛盾，说成是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对立，这种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

“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

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①。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

“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并且指出，认为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②。

杜林所谓事物中没有矛盾，而只有按相反方向的力的对抗，卡里什所谓不能把对立的紧张和互补说成是矛盾，坡培尔所谓用“冲突”或“对立的倾向或利益”去代替矛盾，引起的误会较少，以及所谓对立面不相矛盾、它自身也没有矛盾，威特尔、鲍亨斯基、克劳斯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辩证法混淆了矛盾和对立，……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这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正是离开了同一去把握对立，从而把矛盾歪曲成不存在于两极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中的对立，歪曲成只有相互排斥而不相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对立，并且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对立观去攻击矛盾辩证法的。

尽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一派又一派、一代接一代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对立观，但它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种对立观的谬误性。

说一个生命机体中的细胞的生长与消灭不是矛盾，因为它们不在同一方面，这纯粹是诡辩！

既然讲的是同“一个生命机体”，而不是讲的不同的生命机体中生长的细胞与死亡的细胞之间的对立，那么，就“一个生命机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4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348 页。

为单位来说，怎么能说这种对立“不在同一方面”呢？反之，要是不以一个生命机体为单位，而以细胞为单位来说，那么，尽管生长的细胞同死亡的细胞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一个细胞内部的矛盾对立，但在任何一个细胞内部，又都有从生长到死亡的发展过程，就是说，也都有生与死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

要是“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①。

说次原子的粒子之间的引力与斥力不是矛盾，因为电子之间有斥力，质子与电子之间有引力，所谓矛盾并不属于同一主体。威特尔的这个论据，同样是在内与外的界线上玩弄诡辩。

众所周知，每一个原子，都是由一个带正电荷的原子核（核内有质子和中子），和一定数量的带负电荷的电子所组成的。原子就是这些带正负电荷的粒子的统一：原子核内带正电荷的质子对原子核外带负电荷的电子有吸引作用，而原子核外带负电荷的电子之间则有排斥作用。正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规定着原子内部和原子核内部发生的过程。所以这种相互对立的作用，虽然对于原子中的电子和质子这每一个方面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的，但就整个原子来说，又纯属原子内部的，而且原子就是以这种矛盾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把次原子的粒子间的引力与斥力说成不属同一主体，因而不是矛盾，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它恰好再一次论证了恩格斯的名言：

“吸引和排斥象正和负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凡是有吸引的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页。

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①。

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要那么顽固地坚持早已破产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硬要不顾事实地把矛盾的对立，说成是什么非矛盾的对立，也即既不相互依存又不相互转化，因而是死的、凝固不变的、绝对不相容的对立呢？对此，毛泽东同志是有过尖锐的揭露的：

"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②。

五、何物"真正的对立"？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论证其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观，而否定矛盾对立的客观实在性，还搬出康德的"真正的对立"来，同唯物辩证法所坚持的矛盾的对立相抗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股思潮发轫于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后来又由其学生、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科来蒂来集其大成。

早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一书中，德拉—沃尔佩就攻击黑格尔把逻辑矛盾同物质对立、把相互包含的对立同相互排除的对立混淆起来，由此入手，德拉—沃尔佩鼓吹说，被辩证唯物主义者所描述为现实世界中的"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真正的对立"，也即非矛盾的对立，并把辩证矛盾说成只是思考客观的或"真正的对立"的一个工具。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86、58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05 页。

过了三年，德拉一沃尔佩的声音在东德得到了反响。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东德的《德国哲学杂志》上展开的关于矛盾问题的讨论中，有人公开提到要回到康德的“真正的对立”去，并说辩证唯物主义者所谓自然界中的矛盾，在事实上是没有矛盾的对立。例如，哈里希就说：

“如果人们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而逻辑并不把其它意义附加在上面——来看‘矛盾’此词，那么，矛盾就只是属于判断的领域。而且只在〔那些彼此矛盾的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中再生。反之，如果所谓‘矛盾’是某种不同于这个名词的纯粹和简单的意义上的东西，例如，对立面之间，旧的和新的，一物的二边之间的冲突和斗争，那么，在实际上就涉及一个真正的对立”（见一九五三年第一期《德国哲学杂志》）。

接着，林凯也撰文用康德所谓“真正的对立”来同“在东方也象在西方一样广泛流行的、认为在实在中存在矛盾的肤浅见解”作斗争：“矛盾”“这个名词在下列情况下应不再被使用：当暗含着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时，如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或在事实上是康德称之为真正对立的东西”（见一九五三年第二期《德国哲学杂志》）。

事情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在一九七五年，德拉一沃尔佩的学生科来蒂又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把康德“真正的对立”论搬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进行放肆的攻击。他宣称要把康德的“真正的对立”同辩证的或矛盾的对立这样两种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对立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非矛盾的对立。接着，科来蒂又说，在实在中不能包含辩证矛盾，而只能包含真正的对立，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主题上从来没有抱有清楚的思想，在绝大多数场合，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到有两种对立”：“恩格斯对……〔两种对立的这种〕区别不置一词”，“在列宁那里，则由混淆支配着”，“毛主席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沿着相同的路线前进”。科来蒂

还据此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同科学原则、同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不相容，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院哲学式的形而上学”(《矛盾和对立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载《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五年九——十月号第九十三期)。

既然科来蒂把“真正的对立”吹得那么天花乱坠，并把它当作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法宝，那就必须对它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和剖析，还它以本来面目。

(一)康德的观点和科来蒂的阐释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让我们先考查一下关于“真正的对立”，康德到底是怎样说的，科来蒂又是怎样加以阐释的。

康德先是在一七六三年出版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可能的根据》中谈到真正的对立，接着，又在同年出版的《关于把负数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中，用更大的篇幅加以展开，最后，在一七八一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所附《关于反思概念的含糊或暧昧的本质》的注中又有所述及。

综合康德关于“真正的对立”的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区分两种对立：对立“或者是逻辑的，包含矛盾，或者是真正的，就是说，是没有矛盾的”；

第二，认为“真正的对立”的两极并不彼此矛盾：真正的对立“是这样一种对立，在其中，一物的两个属性是对立的，但并不是通过矛盾的原则”，“两种力量，一种在一个方向上把运动给予一个物体，另一种在对立的方向上给予一个物体以同样的效果，这两者并不彼此矛盾”，“在真正的对立中，相对立的决定要素中的一方，永远也不能是另一方的矛盾的相反物”；

第三，认为“真正的对立”的两极都是肯定的，而不是一极是另一极的单纯否定：“在每一个真正的对立中，属性双方都必须是肯

定的”，“两个对立要素之一并不是另一个要素的矛盾的对立，而是：如果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并不只是它的一个单纯的否定，而是作为某种其本身就是肯定的东西来同它相对立的。让我们遵循数学家的方法，把日落称作一个否定的日出，它落到一个否定的升起之中，回到一个否定的前进之中。在这里，这个名词立即使它清楚起来，例如，落下之区别于升起，其方式不同于－A之区别于A，而倒正如升起那样，并只有在它被同升起联在一起的情况下，才在其本身包含一个否定的事项”。总之，“并不存在其本身就是否定的事物，就是说，并不存在否定一般因而是非存在的事物，就它们的内部结构而论，不论否定或抵销某物的结构是什么，其本身是一个肯定的项目”。

在《矛盾和对立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一文中，科来蒂又根据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对康德思想的解释，对真正的对立同矛盾的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区分，作了如下的阐述：

“‘矛盾的’或辩证的对立。在传统上，这是由‘A不是－A’的公式来表述的。在这个实例中，一个对立面如没有另一个对立面便不能成立，反之亦然（对立面的相互吸引）。－A是对A的否定，就其本身来说则是虚无；它是对另一对立面的否定而无它”，“由于矛盾的每一极其本身是否定的，是对另一极的否定，而且它的本质存在于它本身之外，存在于它的对立面中，因而如每一极要成为它本身，它就必须包含同另一极的关系，就是说对立面的统一，而且只有在这种统一或这种包含中，每一极才是另一极的否定或排除”。

反之，关于“对立的第二种类型”，即“真正的对立”，“在这里，每一样东西都不同了。表述它的公式是‘A和B’。对立的每一方都是实在的和肯定的。每一方都为自己而存在，因为要成为它本身，每一方都无须涉及另一方，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相互排斥的关系的例子。这是一种排除的对立，而不是一种包含的

对立。这样，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对立的相互吸引那样，在这里我们必须谈到对立的相互排斥”（《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五年九——十月号第九十三期）。

（二）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纯属子虚乌有

只要稍微有一点唯物辩证法的常识，读了康德和科来蒂的这两段妙文，就不禁会哑然失笑。因为被他们吹得玄而又玄的“真正的对立”同“矛盾的对立”的界限，在实际上竟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所谓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只是他们形而上学头脑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压根儿就不存在的。

让我们由近及远，先从科来蒂的阐释说起。

科来蒂为“矛盾的或辩证的对立”规定了三条特征：

一是在A不是－A这个公式中，一方是对另一方的否定，而无其他意义；

二是对立的一方的本质不存在于它本身而存在于对立的另一方中；

三是对立的一方要成为其本身，必须包含同对立的另一方的关系，而且在这种包含中，一方才是另一方的否定。

科来蒂所规定的这三项特征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所说明的无非是：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是相互依存而不能孤立地存在，要是没有同它相对立的矛盾的另一方，这一方就失去其存在的条件和具有的意义。

那么，所谓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又有什么特征呢？

科来蒂也为它规定了三项：

一是在A和B这个公式中，对立双方都是实在的和肯定的；

二是每一方都为自己而存在，无须涉及另一方；

三是这种对立是相互排斥而非相互包含的对立。

这三项特征又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所说明的无非是："真正的对立"的双方并不是相互依存的，而是能够孤立地存在的，即使没有对立的另一方，这一方也不会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具有的意义。

那么，普天之下，到底在哪里有这种"真正的对立"呢？遗憾的是，科来蒂的论文虽长，却没有举出任何一个实例来证明这种"真正的对立"的客观实在性。然而，我们却要强调指出：这种所谓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没有的东西。

尽管科来蒂在吹嘘其"真正的对立"时，曾经以傲慢的口吻，放肆攻击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他们所谓的两种对立的根本区别，或则"不置一词"，或则把两者"混淆"起来，但是，只要仔细阅读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却不难发现，原来在他们的著作中，早就有驳斥所谓两种对立根本不同论的思想武器。这里且以恩格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例。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曾经说过："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①。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9—80页。

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①。

恩格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精辟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一切现实的、具体的对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的，而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具有自己的存在条件和意义的。

且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来说吧。按照科来蒂的理论，这显然是一个要以“A和B”，而不是以“A不是－A”的公式来表示的对立。

不错，在这个对立中，A（姑且用它来指资产阶级）和B（姑且用它来指无产阶级）都是“实在”的，而不是什么“虚无”的。但是，A和B每一方是否“肯定”到“都为自己而存在”，“要成为它本身而无须涉及另一方”呢？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之所以是“实在”的、之所以能“存在”，原因就在于它开设了工厂、矿山、商店等企业去榨取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是没有了无产阶级，它就无从存在，对它就没法理解，所以，它是不能“无须涉及另一方”地“为自己而存在”的。

恰恰相反，在这方面，“A和B”的情况和“A不是－A”的情况相同：一方也是对另一方的否定；一方的存在同样地包含在同另一方的关系之中；对于一方的本质同样要从它同另一方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对立的一方也是不能“排除”了对立的另一方的存在而孤立地存在的；在这里，对立的双方也是相互依存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对立，而不是什么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02 页。

在实际上，要是对立的一方真能够把另一方“排除”掉而孤立地存在，要是对立的一方真能够“无须涉及另一方”地“为自己而存在”，那么，对立的双方也就不是互相对立的了，从而，也就不成其为现实的、具体的对立了。所以，所谓“真正的对立”，恰恰是一种否定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的同一性的虚假的对立。

不仅如此，对于双方都是“实在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早就作过清楚的论述的。这里且举马克思对麻布和上衣这两个商品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为例来加以说明：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的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①。

马克思的这个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是象麻布和上衣这样双方都是“实在的”对立A和B，只要它们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两极，而不是漠不相关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总是既“互相排斥、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而并非只是相互排斥而不相互依存的。科来蒂所说的那种双方“肯定”到只有相互排斥而不相互包含，“要成为它本身，每一方都无须涉及另一方面”的“真正的对立”，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没有的。

“没有上衣，麻布不是照样肯定地为自己而存在吗？为什么一定要涉及它呢？”这就是科来蒂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他宣扬非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页。

盾的真正对立论的思想基础。

然而，这却是一种取消矛盾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问题的实质在于：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中的甲地的麻布，和乙地的丝绸上衣，可以说各自为自己而存在，并不涉及另一方，但它们也不构成现实的对立。而当这两方进入商品交换之中，成为同一价值表现的对立两极时，双方就处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而且就连这两种商品的自然形式也是表现这种对立同一的关系的。马克思强调指出：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①。

康德在论述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时所举二例，其情况也与此相类似。

一种力量在一个方向上把运动给予一个物体，另一种力量在对立的方向上给予一个物体以同样的效果。康德认为这两种力量"并不彼此矛盾"，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但并不是通过矛盾的原则"。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这两种力量是在一个物体的相对立的方向上，而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上把运动给予一个物体的。

然而，康德在这里之所以否定矛盾，也恰恰是因为他只看到对立而没有看到同一，没有从同一中去把握对立。问题的实质在于，尽管两种力量是被施加在相对立的方向而不是同一个方向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6页。

但这种相对立的方向，却终究是同一个物体的对立的方向，一种力量要使一个物体沿着这个方向运动，另一种力量却要使这同一个物体沿着与此相对立的方向运动，这就使对立方向上的两种力量终究成了同一种关系的相反而又相成的两极，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斗争，从而使对立具有了内在的关联，成为表现这个物体到底是处于运动状态还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到底是朝这个方向运动还是朝对立的方向运动以及到底以什么速度运动的本质的、必然的对立，也就是矛盾的对立。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谈到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是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而对“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一公式感到十分自在时，曾经指出，这是因为这个公式给“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的“辩护论帮了很大的忙”：

在这个公式中，“剩余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不同形态，不是作为异化形式相对立，而是作为相异的和彼此无关的形式、作为只是彼此不同但无对抗性的形式相互对立。不同的收入来自完全不同的源泉，一个来自土地，另一个来自资本，第三个来自劳动。因此，它们不是处于相互敌对的关系，因为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内在联系”①。

康德只看到两种力量在对立的方向上把运动给予物体，而不强调这对立的方向是同一个物体的对立的方向，从而把这两种对立力量说成“并不彼此矛盾”，“并不是通过矛盾的原则”的作法，在实际上，和庸俗经济学家之用“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的公式去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的作法同出一辙，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557、559页。

它们都是不从同一中去把握对立、从而取消矛盾的形而上学。

日落与日出的对立，康德认为这和A与－A的对立不一样，因为对立双方都是肯定的，只有在把二者联结在一起时，一方才包含有一个否定的事项，而不是其本身就是否定的事物，因而这是一种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

然而，就是在这里，矛盾之所以被取消，也完全是因为康德的形而上学头脑在作怪的缘故。

太阳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在天空中运转着，居住在地球的一定地点上的人们，把运转着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叫做日出，而把其从西方地平线上消失叫做日落。

康德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称作“都是肯定的”而“不是其本身就是否定的事物”呢？显然是因为他觉得即使没有太阳从西方地平线上消失此事，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也是肯定地存在的，似乎对立双方并不是相互依存，而是可以孤立地存在的。

然而，这却是一个糊涂观念。

不错，太阳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在天空中运转着，而不管人们叫它什么。就这一点来说，它是“肯定”地存在于人们的命名之外的，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这是一回事。

但是，还有与此不同的另一回事是，当人们把运转着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现象叫做日出，把它的从西方地平线上消失的现象称作日落的时候，这两者、这对立的双方却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而压根儿就不存在对立的一方能“肯定”地独立存在于另一方之外的问题。

这是因为没有日出，就无所谓日落，而没有日落，日出也就不见。正如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上，就无所谓下那样。而康德之所以把日出和日落的对立，看作对立双方能肯定地彼此存在于同对方的关系之外，叫作什么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则显然是把这两

件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搅到一起，把太阳能够独立于人们的命名之外，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肯定”地运转着，看作是日出和日落这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范畴能独立于彼此之外“肯定”地存在着了。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察，所谓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从而所谓矛盾的对立同所谓真正的对立的根本区别，也就纯属形而上学的幻觉。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下列著名论述又一次闪烁着无比的光辉。

早在一八六五年，马克思就说过，为要辩证地说明问题：

“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①。

而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谈到“回到康德又成为时髦的事情”时，则进一步指出：

“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②。

对于康德关于真正的对立的论述所作上述分析，对于科来蒂拿了康德的真正对立论去同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对立观相抗衡所作上述解剖，不是又一次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警句的真理性吗?!

（三）不许造马克思的谣

德拉-沃尔佩和科来蒂为了否定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不仅把康德的真正的对立论搬出来同矛盾对立论相抗衡，而且还公然在这个问题上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起来，把事情描绘成似乎是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

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而马克思则崇尚康德的"真正的对立"。

例如，德拉-沃尔佩就竭力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特别是"把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对立，解释成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真正的对立，就是说，一种没有矛盾的对立"（参见《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四年七——八月号第八十六期）。

这显然是拙劣的捏造，是在公开造马克思的谣！

这里且不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从始至终是对这个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分析，而不是对什么康德的真正对立的分析，即使早在一八四四年所写《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马克思就以明确的语言指出了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对立，是矛盾的对立。

马克思先是在《私有制底关系》这个手稿中指出：

"私有财产底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两者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各项必然要经历的运动是"："〔第一〕——二者底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第二〕——二者相互间的对立"，以及"〔第三〕——二者各自对自己本身的对立"；

接着，马克思又在《私有财产和劳动》这个手稿中，强调指出：

"只要没有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理解成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那就还是一种不是在其能动的联结上，在其内在的关系上来把握的、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还没有当作一个矛盾来把握的对立。甚至没有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它也能表现在这个第一种形态之中（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等）。它还没有作为由私有制本身所确立的东西出现。但是，劳动，作为财产的排除的、私有财产的主观的本质，以及资本，作为劳动的排除的、客体化的劳动，却构成为它的矛盾的发展状态的私有制——从而是一种朝着它的解决强有力

地运动的动的关系”①。

问题很清楚，和德拉—沃尔佩的捏造相反，马克思不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是矛盾的对立，是处在矛盾的发展状态中的对立，从而是使有产和无产之间的矛盾接近解决的对立；而且还认为，不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上去理解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是没有从内在关系上来把握的对立，没有当作一个矛盾把握的对立。无须再作什么解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这里，康德所谓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是连一丝影子都找不到的。马克思的论述，彻底戳穿了德拉—沃尔佩制造的谣言。

眼看着德拉—沃尔佩的谣言根本经不起检验，在马克思的原著面前已经原形毕露，科来蒂就出来同他的老师划上一条小小的界线，力图据此而使他们的真正对立论站住脚跟，并把它修饰得更有欺骗性一些。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一书中，科来蒂还在原封不动地宣扬德拉—沃尔佩的上述论点，但在一年以后，在《从卢骚到列宁》一书中，他却为自己的退却埋下了伏笔。在该书的最后一篇论文中，科来蒂反复谈到资本主义的实在是“头足倒置”的，是一种“以头站地”的体系。而到了一九七四年，科来蒂就进一步承认：“在重读马克思著作中，我已注意到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无疑地是辩证的矛盾”，“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工资劳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矛盾”（见《访问科来蒂》，载《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四年七——八月号第八十六期）。

但是，科来蒂的退却毕竟是有限的。他在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是辩证矛盾而不是真正对立的同时，又重申“我所据以坚定地立脚的根本命题是唯物主义预先假定着不矛盾——对实在是不矛盾的”，“我继续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3、79—80 页。

认为唯物主义排除一种有矛盾的实在的观念”(见《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四年七——八月号第八十六期)。

既然科来蒂这个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在是不矛盾的，却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是辩证地矛盾的，那么，怎样来摆脱这个在逻辑上说来是荒谬的自相矛盾呢？

开始时，科来蒂选择的办法是歪曲和攻击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实在，这不是因为象辩证唯物主义会说的那样：是实在就必定是矛盾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这个实在是一个翻过来的、颠倒的、头足倒置的实在”。

“我完全意识到一个头足倒置的实在的观念，显得是和任何科学的箴言相冲突的。马克思是相信这个观念的效力的，我并不是说他必然是正确的。我还不能说一个颠倒了的实在的观念是和一门社会科学相容的”。不仅如此，科来蒂还说：

“我已经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也有关于辩证法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的临界领域”(见《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四年七——八月号第八十六期)。

后来，科来蒂显然意识到了这种赤膊上阵地攻击马克思的作法，是不利于他继续打着马克思的招牌说东道西的，因而在一年多以后发表的《矛盾和对立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一文时，他就改变策略，学他老师那样，用造谣的手法把“真正的对立”强栽给马克思：

“马克思那里有一段话，清楚地指出了一个同辩证的对立显然不同的‘真正的对立’的特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写道：‘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同时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有对另一个极端的渴望、需要或预期’”。

接着，科来蒂就把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续到康德“真正的对立”的家谱上去。他说：

马克思“很可能是直接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对立的理论，或间接地从费尔巴哈那里”达到真正的对立的理论的，“肯定的是，现代真正的对立的理论之父是康德”。

而关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立是矛盾对立的问题，科来蒂现在说：

“这个实例中这些极端真是属于一种非常特别的种类”，因为“从马克思的配景来看，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特征”，“矛盾是由这个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新左派评论》杂志一九七五年九——十月号第九十三期）。

科来蒂的这整段论述的意思是说：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那只是一个例外场合，因为矛盾的对立，在实际生活中只是对立的一种特别种类和特征。而在一般情况下，实在是不能包含矛盾，而只能包含真正的对立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三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提出真正的对立来了。这就是科来蒂立论的要害所在。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让我们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指导思想的方面来进行考察。马克思在书中指出：

“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象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

即本质的矛盾”；

“他〔指黑格尔〕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①。

非常明显，在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乃是不仅要揭露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理解其根源和必然性，从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去把握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而批判的，则是黑格尔的那种把矛盾理解为在本质上正在消失的现象以及满足于表面解决矛盾的矛盾调和论。从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到批判矛盾调和论，这便是马克思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科来蒂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述了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这岂不是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同马克思的原意背道而驰的吗？

其次，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科来蒂所引马克思谈到“真正的极端”那段话的锋芒所指。把那段话放到上下文的联系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段话所批判的，并不是黑格尔的矛盾对立论，而是黑格尔的对立面中介的矛盾调和论。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书中还再三肯定了黑格尔的矛盾对立观点，说这是他的深刻之处：

“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象存在于我们的各个邦里的那类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②。

在那里，马克思所批判的，只是根源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的对立面中介论：

“黑格尔总是把国家和政府当做同一的东西放在一面，而把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358、338页。

② 同上书，第312、338页。

为特殊领域和特殊个人的人民放在另一面。各等级是这两个方面之间的中介机关”；

然而，“这是为某个局外之物所做的虚构”，而且，“这种‘中介’也恰巧需要——正如黑格尔所正确论述的——‘它的中介得到存在’。它本身与其说是中介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矛盾的存在。”“可见，黑格尔断言这种中介作用要由等级要素来实现，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这一中介体系还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一个人想打败自己的敌人，同时又不得不保护自己的敌人免遭别的敌人的打击；由于这种双重的地位，他的打算全部落空了”①。

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的对立面中介论作了这样透彻的揭露和批判之后，才提出真正的极端不能被中介所调和，也不需要任何中介的思想的。所以，把马克思关于真正的极端的这段论述，不是看作指出了同对立面中介论显然不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斗争的思想的特征，而是看作指出了同辩证的矛盾对立论显然不同的、“真正的对立”的特征，那显然是对马克思本意的肆意歪曲和颠倒。

最后，让我们再从马克思所说“真正的极端”的含意方面来进行考查。

在紧接着科来蒂所引有关“真正的极端”那段论述之后，马克思指出：

“初看起来，下述情况是和这种说法相抵触的：‘两极是相通的’，北极和南极相互吸引，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而且也只有男女两性的极的差别相结合，才会产生人”。对此，马克思回答说：

“北极和南极都同样是极，它们的本质是同一的；同样，男性和女性构成同一个类、同一种本质——人的本质”，而“真正的、现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8、350、351—352、354—355页。

的极端是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在前一种场合，差别是存在上的差别，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各本质之间的差别，是两种本质的差别"①。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所说"真正的极端"，是指的象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这样一些存在于两种本质之间的对立，以区别于存在于南极和北极、男性和女性这样一些表示从同一种本质分化出来的两种规定之间的对立。

所以，尽管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本书，是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一八四三年写成的，有些提法还不够完善，但是，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极端"这个概念，其意图却是很清楚的：他是想用它来指出矛盾有不同的类型，指出在象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这种类型的矛盾中对立面斗争的尖锐性，而丝毫也没有要用它来指出什么不同于辩证对立的、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的意思。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论述了真正的极端不能被中介所调和，也不需中介之后，又强调指出了由对立面的斗争所达到的"对立面的转化"，"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定性斗争的热烈渴望"②。

问题十分清楚，马克思的"真正的极端"同康德的"真正的对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事。科来蒂显然是把马克思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不可调和的论述，曲解成康德所谓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的论述了。

所以，无论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指导思想来看，还是从马克思关于真正的极端一段论述的锋芒所指来看，还是从马克思赋予"真正的极端"这个概念的含意来看，科来蒂所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

② 同上书，第356页。

马克思关于真正的极端的那段论述，并不是象科来蒂所说的那样，似乎“清楚地指出了一个同辩证的对立显然不同的‘真正的对立’的特征”，而倒正好相反，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对立，同样是辩证的对立、矛盾的对立，是同康德所谓的非矛盾的“真正的对立”迥然不同的。

科来蒂不顾这一切客观事实，硬把同马克思原意截然相反的东西强加于马克思，这不明明是在造马克思的谣吗？

不仅如此，科来蒂关于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颠倒的实在，所以才论证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说法，关于马克思认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特征的说法，也同样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谣言。

事实是，马克思不仅在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中，而且在有关一切问题的论述中，都是坚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的。这是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象对于恩格斯来说一样，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特征，而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在内的一切客观实在以及反映这种实在的人类思维的共同特征。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除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作精辟的论述之外，还充满着对于客观存在的其它矛盾及其根源和解决办法的分析。象在前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那样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实例，在马克思著作中比比皆是，这里仅举几个方面的典型例子，以资证明。

一是马克思对蒲鲁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

马克思在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曾经指出：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

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①。

小资产者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这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空间、同一人物身上的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又是什么？小资产者存在于矛盾的基础上，又体现这个社会矛盾，在这里不是充满着辩证矛盾，又是什么？而这一切又都发生在蒲鲁东、小资产者身上，而并不是发生在科来蒂所说的什么"翻过来的、颠倒的、头足倒置的实在"上！

二是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分析。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7—488页。

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①。

在使命上，路易·波拿巴既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又自命为这个阶级的政治和著作力量的敌人，既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又首先觉得他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

与此相适应，在行动上，波拿巴被他的处境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着，忽而颁布、忽而撇开、忽而违反法令；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那个阶级。……

在这里，不是充满着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吗？而这个在使命和行动上集结了这么多矛盾的路易·波拿巴，不是同科来蒂所说什么“翻过来的、颠倒的、头足倒置的实在”，丝毫不相干吗？

三是马克思对自己在接到朋友的资助信件以后的心情所作的分析。

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您的信使我既不愉快又愉快（您看，我总是在辩证的矛盾中活动着）。”“不愉快的是，因为我知道您的物质状况，如果我同意接受这样的礼物而损害您家庭的利益，那我就太不象话了。所以，我把您寄来的十五磅当作借款，到时候我要还。”“愉快的是，这不仅表现了您的深厚友谊（而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在私人生活中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而且还因为您帮助我摆脱了由于〔女儿〕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4—225页。

事临近而造成的十分困难的处境”①。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指出了自己在接到库格曼的信以后心情又愉快又不愉快的矛盾，而且还强调自己总是在辩证矛盾中活动着。而这一切不是同科来蒂所说什么“翻过来的、颠倒的、头足倒置的实在”毫无关系吗？

还可以举出很多的实例，但仅此几个方面的例子，即足以说明马克思认为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是无往而不在的，从而也就有力地戳穿了科来蒂所谓马克思认为矛盾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特征的谣言，戳穿了科来蒂散布谣言把马克思续到康德的“真正的对立”的家谱上去的一切图谋。

六、离开了对立去把握同一：否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和客观实在性

如果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否认矛盾客观实在性的一种手法，是离开了统一去侈谈对立，从而用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去取代辩证矛盾的话，那么，他们所用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手法，便是离开了对立去侈谈统一，从而竭力否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和客观实在性。

他们中间，有的人竭力否定矛盾对立的普遍性。

例如，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假如严格地应用两极性的隐喻，那么，把它扩展到每一种事物，就是最纯粹的神话。……而且是和科学方法的任何非神秘的概念不相容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加以解释，那么，或者两极对立仅仅表示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7页。

然界存在差别，那是正确的可又是不足道的，因为在科学上说来，重要的是差别的种类、性质和程度；或者两极对立完全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是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在各个领域和情境中的结构之后，必须从经验上来加以证明的东西。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磁石中的两极对立的结构，是完全不同于阳性与阴性、算术上的加与减、遗传与环境（这些实例是恩格斯所引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对立的结构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否认两极对立的普遍性，这在实际上还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

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各方面，是不能孤立地存在的，如果没有同一方相对立的矛盾的另一方，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从而也就无所谓矛盾。

所以，压根儿就不存在胡克所说的什么把“两极性的隐喻”“扩展到每一种事物”中去的问题，因为每一种事物本来就都是矛盾，它的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就是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连结着，根本就不需要人们把什么“两极性的隐喻”“扩展”进去。因此，“和科学方法的任何非神秘的概念不相容的”，并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坚持矛盾对立的唯物辩证法，而恰恰是否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的形而上学。

至于借口两极对立在结构上的差异性，来否认两极对立的普遍性，则更加暴露了胡克的形而上学头脑是不懂得差异从来就是与同一相联结的。

不错，不同对象的对立同一和斗争，在结构上是各不相同的，但不论它们是怎样的“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所表明的，终究只是两极对立的差别性问题，而不是两极对立的有无问题。无论是磁石的南极和北极，还是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还是数学中的加和减，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其两极对立的结构有千差万别，但却表明着它们都是包含在自然界、人类

社会或思维过程中的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而且正是这包含在一切事物中的矛盾对立着的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在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发展。因而，用两极对立在结构上的差异性去否认两极对立的普遍性，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如果说，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企图借口两极对立在结构上的差异性，去否定矛盾对立的普遍性，那么，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则企图用在对立之外侈谈共同点的方式，去达到同样的目的。

卡里什写道：

“男人和女人在体形上和心灵上可以有所区别，但他们并不是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也适用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正电和负电，北极和南极，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精神和物质有着本质的对立特性，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被创造下的事实。……粒子和波（尽管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也有共同的特性：它们都是物质”。据此，卡里什得出结论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只在某些方面才有对立现象，而绝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有对立现象”（《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应当指出，就在卡里什的这些观点中，包含有驳斥这些观点的因素。不错，男人和女人是有某种共同点的，但是，这种共同点并不是处在对立之外的，而恰恰是和对立相联结在一起的。一方面，在这种共同点内部存在着男人和女人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这种共同点本身，又作为矛盾的一方，而同诸如自然、动物、植物之类的矛盾的另一方相对立。

同样，南极和北极之间也是有某种共同点的，因为它们都同样是极，但一方面，在这种共同点——极——的内部，存在着南和北的对立，另一方面，极又作为矛盾的一方，同作为矛盾的另一方的

非极相对立。所以，尽管在一些场合下，在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点，但这种共同点却是同矛盾对立相联结着的，因此，事情就完全不象卡里什所说的什么“只在某些方面才有对立现象，而绝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有对立现象”。

为了否认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尔干脆否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矛盾着的对立双方。

萨特尔论证道：

“被剥削者也不是剥削者的对立面（或矛盾）”，“诚然，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而工人却没有：这是一个单纯的矛盾。但是，正是这种矛盾不足以说明每个事件：这个矛盾是事件发生的场所，它造成社会环境的经常紧张性，创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破裂；单是（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代一切事件的这种基本结构不足以说明任何事件的具体实在性。……从其完全具体的实在性上讲来，事件乃是互相超越的对立面的多数性的有机的统一”（《辩证理性批判》1960）。

透过萨特尔这些晦涩难解的语言的迷雾，可以清楚地看出，被他用来否定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矛盾对立的一个“根据”，就是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统一”。

应当指出的是，用统一去否认对立，这并不是萨特尔的新发明，而是早就破了产的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破铜烂铁。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资产阶级辩护论者为了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认为“各个对立要素的统一排除它们的对立”①。

马克思在揭露这些资产阶级辩护论者所用的手法时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II，第 593、571 页。

“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如果某种关系包含着对立，那它就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对立的统一。因此，它就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①。

萨特尔用什么“互相超越的对立面的多极性的有机的统一”，来否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对立，不正是在一字不易地重复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穆勒“消除矛盾的逻辑”吗？

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其他流派稍有不同，新黑格尔主义竭力把矛盾说成是非实在的东西、抽象的东西。

例如，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写道：

“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象对立的概念那样，因为它们并不象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那样，是互相对立的”，“对立是……实在的东西中的非实在的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形式或阶段”（《逻辑是关于纯粹概念的科学》1909）。

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一切对立面的绝对统一，总既是暂时的又是永恒的”，“那些对立面，抽象地说来是彼此排除的，在实际上却从事着一种具体的辩证法”（《对立面的相互作用》1956）。

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来玄而又玄，不可捉摸，但是，在实际上，却只是他们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的变种罢了：他们认为对立只存在于概念之中而不存在于事物之中，认为在事物中只有同一而没有对立，因而只有同一才是实在的，而对立则是抽象的、非实在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91、106页。

然而，这种把 a = a，把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相同一的同一律奉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的形而上学观点，却早已被科学所驳得体无完肤了。

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总是包含着差异和变化的。例如，在有机界，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总之，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生命又经历其各个发展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因而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相同一又和自己相区别；在无机界，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从而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也即修改着它的和自身的同一性。而"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①。

所以，事情十分清楚，所谓矛盾对立是非实在的、抽象的云云，纯属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哈哈镜里的歪曲。不，由于任何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总是包含着差异性，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抽象的等同，而总是对立的同一，因此，矛盾双方的对立就总是具体的、实在的。

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比新黑格尔主义更进一步，干脆把对立面说成是人们自己设计的抽象概念，并据此而攻击坚持对立统一原理的马克思主义把词当作实体，是向着十二世纪的唯实论的复归，是用语言技巧来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英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列夫。

列夫写道：

"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寻找对立面，又怎样替它下定义呢？难道黑与白、冷与热、软与硬这些对立面除了都是人造名词而外，还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卷，第 672 页。

另外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果真能够找到任何客观工具来测量和限定这些品质，以便给对立面下定义吗？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当我们把某物叫作冷和热时，其所指的品质在物理学上并无与之相应的对应物。我们把华氏150°叫热，35°叫作冷，但只就温度表上的度数来说，并没有什么东西足以表示其中一个是冷，另一个是热这样相反的品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黑和白，软和硬：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独立自存的品质，并不能够用这些人造的名词，或者作为相反的对立面而加以物理的描述。至于其它能够加以计量的品质，如干和湿，轻和重，也同样没有更好的根据，除非作为理智抽象活动的结果，其中没有哪一种能够叫作对立面”；

列夫攻击马克思主义坚持对立统一原理，就是在“实际上把来自主观经验而非来自自然界的范畴加以实体化，这样一来，它就变成它自己的概念的奴隶”；

列夫对列宁的攻击更加恶毒。他说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所举五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实例，它们之间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概念上的抽象物，是头脑的人工制造品”，他攻击列宁“把人造的符号、语言的辞汇和逻辑的范畴跟现实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并企图利用它们来解释现实”(《概念的暴政》1961)。

列夫在这里所要把戏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把人们赋予一些对立面以一定名词的“人造”性，同这些名词所意指的对立状态的客观性绝对割裂开来，便是把人们经验的主观性同这种经验的本原和内容的客观性绝对割裂开来。

不错，黑与白，冷与热，软与硬，干与湿，轻与重……这些对立的名词都有其人造的一面，都有其被人们的感官所体验的一面。但是，这完全不是说，这些名词除了是头脑的人工制造品之外，就别无所有了，完全不是说这些体验纯属主观自生，与客观现实毫不相干，因而“其所指的品质在物理学上并无与之相应的对应物”，也

不能“找到任何客观工具来测量和限定这些品质”了。

不，黑与白，冷与热，软与硬，干与湿，轻与重，……这些对立的概念虽然是人造的，但是，他们所意指的那些对立状态，却是确确实实地客观存在着的。

要是列夫果真象他写的那样认为它们纯属“理智的抽象活动”，在现实世界并无“相应的对应物”，因而可以随着人们的主观想象随意摆弄的话，那么，我们奉劝他不妨用自己的行动去检验一下这种理论的真理性：试把黑当作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单凭肉眼去读一读只在白天或在效果如同白天一样的照明条件下才能看得见的报章杂志；试把冷当作热，纵身跳入零下数十度的冰窟窿里去品尝一下“盛夏酷暑的滋味”；试把硬当作软，把其硬无比的金刚钻塞进嘴里，权当软绵绵的蛋糕咀嚼一番；把重当作轻，让自己的肩膀扛上千斤、万斤的重担那怕走上几步、几十步；……这样地尝试一番，列夫就会发现，无须什么精密的客观工具，仅仅凭借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就能准确地测知上面这些对立的概念、名词，它们所意指的对立状态是客观地存在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

所以，事情和列夫所说的完全相反，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把人造的符号、语言的辞汇和逻辑的范畴跟现实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并企图利用它们来解释现实”，而倒正是象列夫自己那样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者，硬把这两者绝对割裂开来，妄图用在概念中消除矛盾对立的办法，来否定现实的矛盾对立。然而，这终究只是一出掩耳盗铃的把戏，欺人不足，徒然自欺罢了！

应当补充的是，就连这出蹩脚的把戏，也并不是列夫的发明创造。远的姑且不说，早在列夫发表其大作的整整一百十五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尖锐地批驳过列夫的一个先驱——桑乔了。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

“把世界神圣化的一个最一般的例子，就是把实际的冲突(即个人和实际生活条件之间的冲突)变成思想的冲突(即这些个人和个人自己产生的或自己塞进自己头脑中去的那些观念之间的冲突)。这套戏法也是非常简单的。正象圣桑乔以前曾把个人的思想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的情形一样，他在这里又使现实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离开了这些冲突本身并使这种思想上的反映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这样一来，他就狡猾地把现实的冲突，即它在思想上的反映的原型，变成这个思想上的假象的结果了。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问题不在于实际消除实际的冲突，而仅在于抛弃关于这种冲突的观念。他以一位道貌岸然的道学家的姿态号召人们抛弃这种观念”①。

我们奉劝列夫好生读读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段关于“圣桑乔如何把个人的观念同他们的生活条件、同他们的实际的冲突和矛盾割裂开来”② 的揭露，并把它同自己所要戏法对照一下，并扪心自问一下：这难道不也正是对我列夫所要把戏的真实写照吗?!

然而，如果说，列夫在重复圣桑乔的假貌伪善的道学家姿态方面还有点羞羞答答的话，那么，他的同伙、语义学的倡导者斯图加特·切斯就要比他坦率得多了。

切斯写道：

“语言学上的困难造成了一张更加不准确的〔经济〕地图，它们把一些抽象概念人格化了，特别是采取下列的形式：一种绝对的‘资本主义’与一种绝对的‘社会主义’相对立，不容许任何中间的观点，于是产生了关于语词的可怕的战斗，有时候还引起流血”，他慨叹说：“这两个词之间的斗争，大约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语言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326页。

碍了！"(《词的威力》1955)。

然而，不论桑乔、列夫、切斯多么善于玩弄语言上的戏法和逻辑上的诡计，他们却终究无法把实际存在的矛盾对立，变成他们所鼓吹的仅属观念、名词、词汇上的矛盾对立。如其不然，这项"神圣的买卖"岂不早就应当由桑乔一揽子作成了，又何必在百年之后还要劳切斯、列夫的大驾去继承其破烂衣钵呢？而既然桑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并没有能够完成使命，切斯、列夫又不以为鉴，那又怎么能避免重蹈桑乔的复辙呢？

七、运动的矛盾性质无法抹煞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谈到人们在事物中是否碰得到矛盾，这取决于把事物看作是静止不变的还是运动变化的之后，紧接着就论述了运动的矛盾性质。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①。

恩格斯的这个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基石之一。问题很清楚，矛盾之所以是普遍的、绝对的，就在于世界无非是运动着的物质，而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则不仅是由其所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斗争所决定和推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亦此亦彼"辩证矛盾的表现。要是运动的矛盾性质被抹煞、被否定，那么，对于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进而对于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显然就无法再坚持下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

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就总是怀着否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奢望，去抹煞和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质。巴伐利亚研究院的法尔克教授在《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慕尼黑 1961 年版）一书中就写道，论证运动的矛盾学说的错误，就意味着使“共产主义辩证法，同时也是它的整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发生动摇。

早在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党人切尔诺夫，就把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诽谤成是什么“逻辑上的翻筋斗”，胡说这种论述把时间不是看作不间断的，而是看作停滞不动的一瞬间了（《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攻击恩格斯的论述是芝诺悖论的变种，并用物体具有不同部分，因而在同一时间占有两个不同地方之类的诡辩，来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奥地利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也攻击恩格斯的论述是芝诺谬论的重复，是建立在预先假定向一个方向延伸的线是由不向任何方向延伸的点构成的这一虚构上面的（《辩证唯物主义》1958；《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3）。

西德新托马斯主义者奥基尔曼用所谓构成运动的矛盾因素的统一，不是现实地存在，而是其中未来一方仅仅是潜在的、有可能性的谬论，来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质（《唯物辩证法》1958）。

英国伦敦大学哲学教授阿克顿把恩格斯的论述诬蔑为“杜林的‘概念的翻新’”，因为他从“事物在运动着”“必然看到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时代的幻觉》1955）。

另一名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列夫借口“运动是一个连续”，“没有客观根据把它们划分为各个阶段”，否则就是“把自己夹在其中”，以此来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质（《概念的暴政》1961）。

直到最近，瑞典科学理论研究所的缪萨契还在说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质的表述，“只能模糊过程而不是澄清它”，是“继承了

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踪迹”，“错误地解释了形式逻辑的法则”（《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载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一九七七年秋季号）。

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修正主义者递了降表，扯了白旗，跟着一起来攻击和篡改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首先依据所谓无限的东西是无法表象的，人们不能解决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在一定瞬间固定在一定地方的问题的谬论，来否认运动的矛盾性质，并提出用运动物体在起止两地同时离开，即在达到B以前已经离开了A的说法，来顶替恩格斯的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先是波兰的里沃夫—华沙学派的新实证主义者艾杜凯维奇发表文章，说把运动物体说成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是建立在对“同一瞬间”的两种意义的混淆上面的，因为前者指正好处在时间的一点上，后者意味着时间已有延伸。他建议用运动物体“通过点P”的说法来代替“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变化和矛盾》，载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一九四八年第八期）。

七年以后，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沙夫循着这条思想路线，发表文章公开攻击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同芝诺的陈述“建立在同样的形而上学的立场的基础上”，是“接受了黑格尔的论证”，是“攻击矛盾律的效力”，为此，他提议用“一个运动着的物体通过空间中的点”的说法来取代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矛盾律》，载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在沙夫的鼓舞下，艾杜凯维奇随即又发表文章，鼓吹抛弃“变化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假设（见《德国哲学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一九五八年四月，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从现代科

学和实践看矛盾问题》讨论会上，当时正在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任职的捷克人柯尔曼，发表了题为《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想中的反映》的报告，公开攻击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的论述“违反了矛盾律”，跟“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陈述有分歧”，并提议用“物体在同一个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的说法去取代恩格斯的论述。

而根据美国哲学家索姆维尔所作在苏联听课情况的报道，苏联哲学家巴克拉节等人在各地讲课时，也公然攻击“恩格斯〔所说运动即矛盾〕是错误的，是被一种多半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关于运动本质的错误概念所误导”（《本体论、逻辑和辩证唯物主义》，载《国际哲学季刊》一九六八年三月号）。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这些歪曲和攻击，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其中除辩证矛盾同形式逻辑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①]之外，现在，让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逐个进行考察。

第一个问题，恩格斯关于运动即矛盾的论述，同马克思的论述到底有没有分歧？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攻击和否定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时，施展了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所惯用的花招：把恩格斯同马克思对立起来，制造恩格斯同马克思有分歧的谣言。

例如，柯尔曼就说恩格斯在有关运动矛盾性质的那段著名论述的“最后一部分中，对于物体在某一瞬间是否在某一地方这个问题，既作了肯定的又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就同马克思“有了分歧”，因为“马克思……并不象恩格斯在其关于机械运动的论断的第二部分中那样来研究这个问题……决没有把黑格尔式的自白强加到唯物辩证法之上”（《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想中的反映》，载捷

① 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克斯洛伐克《哲学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然而，靠制造谣言是帮不了柯尔曼的忙的。

问题不仅在于恩格斯在其中阐述运动矛盾性质的《反杜林论》，马克思曾听读过其"全部原稿"，因而"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①，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再三使用过这种所谓"既作了肯定的又作了否定的回答"的方式，去阐述现实生活中的辩证矛盾。

我们在本章第五节中所引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致库格曼信中所说"您的信使我既不愉快又愉快（您看，我总是在辩证的矛盾中活动着）"②，是例子之一。

例子之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的发展没有扬弃商品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排斥关系，但为这些矛盾创造了运动形式时，曾经说过：

"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③。

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马克思对椭圆运动的这个描述，对照恩格斯关于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论述，不是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运动就是矛盾的论述，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吗?!

例子之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的产生时，着重指出：

"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2页。

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①。

为什么说资本必须在流通中、而且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马克思说得很明白：要是在流通领域以外，要是不同其它的商品所有者发生接触，商品生产者就不能使其商品的价值增殖，并由此使货币或商品变成资本。问题很清楚，必须要以等价物的交换作为出发点，必须要在商品交换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去说明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是说，作为资本家幼虫而存在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照价值购买商品，必须按照价值售卖商品。这就是资本必须在流通中，而且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的原因。

那为什么又说资本不在流通中、而且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呢？马克思同样说得很明白：那是因为作为资本家幼虫存在的货币所有者，在流通过程的终末所取出的价值，必须比他原来投入的价值来得更多，而这部分比原来投入价值来得多的剩余价值是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这就说明，关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一定有某种在流通中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发生在流通的后面。

马克思强调指出：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②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出论述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的不少类似例证，但仅此数端，即戳穿了柯尔曼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攻击和否定恩格斯关于运动的矛盾性质的论述而炮制的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8页。

② 同上，第188—189页。

谓马克思同恩格斯有“分歧”的谣言。

第二个问题，运动变化，到底是否表现出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抹煞和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质，便矢口否认运动变化本身就是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

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党人切尔诺夫，为了反驳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曾经把运动描绘成物体在某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个地方。

对此，列宁曾经批判说：

“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没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它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搁置起来”①。

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奥基尔曼等人在否认运动的矛盾性质时，所提出的论据虽然和切尔诺夫的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立足点却都是把运动歪曲成静止状态的总和，借以掩盖运动的矛盾本性。

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威特尔写道：

“设想出现于变化中间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矛盾，经过再仔细考虑，也缩小到没有了。只有当变化实际上绝对在同一时间又存在又不存在，或在同一方面表现着（限制着的）存在与不存在，矛盾才会出现，但是前者在变化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对地存在，那就是无限地存在，无限的存在不能变化，因为它不包含它会由之发生（即变）的不存在，而绝对的不存在是空无，从空无中出现不了任

---

① 《哲学笔记》，第 284—285 页

何东西；变化永远以某种变化的东西为前提；从空无中过渡到存在之发生，不是变化，而是通过无中生有、创造的活动。因此变化只有当变化的东西仅只在某一定的方面有存在与不存在才可能，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它不能在'同一方面'表现出存在与不存在，而只有这样，矛盾才会出现。因为变化相对于刚好在它前边的东西是不存在，相对于它已经变成功的东西则是存在"。

而在《唯物辩证法》一书中，奥基尔曼则说：

组成运动的矛盾因素的统一，不是"现实地"存在的，因为在"现在"中，未来的存在"只是潜在的、即有可能性"，因此，所说变化着的事物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只有采取另外一种矛盾因素的涵义才行。作为现实的存在同非现实的非存在的统一，从而就没有绝对的'非存在'的地位，而只有实在的潜在，后者好象是准备转变为现实的"，"无论如何，这里没有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

威特尔、奥基尔曼的这些言论，即使暂且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新托马斯主义荒谬绝伦的宗教说教不说，单从哲学上来加以考察，也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把运动变化看作只是"存在"和"现实"，而且看作是其内部不包含矛盾的"存在"和"现实"了，这就不仅是对运动变化的歪曲描述，而且还从根本上杜绝了运动变化的任何可能性。

而事实的真相却是：现实的存在不仅是和可能的非存在相联结着的，而且这种尚属非存在的可能性，还是作为表现着存在于现实之内的一定倾向，而包含在现实之中的。正因为现实同可能、存在与非存在是作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这样具体地联结着，运动变化才是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指出：

"在运动（=技术、历史等等）的一定环节上，存在和非存在这两个消逝着的环节在一刹那间相符合"，"'消逝着的环节'=存在

和非存在。这是辩证法的极好的规定!!"①

和新托马斯主义者的立论有所不同，里沃夫一华沙学派的艾杜凯维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责难说：

"我们应当认为在物体处在甲种状态的瞬间和它处在非甲状态的瞬间之间，应当存在着它既不处在这种状态又不处在另一种状态的那样一个瞬间，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因而应当抛弃"变化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假设。

艾杜凯维奇提出的根据之一是说在"量子形式"(即通过飞跃)地实现过渡的条件下，不存在事物同时是甲又是非甲的状态；

根据之二是说甲态和非甲态之间的差别不论怎样微小，毕竟还是存在的，因而事物永远不能处在甲态又处在非甲态；

根据之三是说，在事物向新的状态过渡之前，它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绝对同一，只在过渡的一瞬间，矛盾才出现（《德国哲学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艾杜凯维奇在这里耍的尽是偷换命题的把戏。因为恩格斯所说的，是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地又在另一地，既在同一地又不在同一地，根本扯不上在物体处在甲态瞬间和处在非甲态瞬间之间，有没有一个既不处在甲态又不处在非甲态瞬间的问题。

而被艾杜凯维奇用来论证应当抛弃"变化本身包含矛盾"的假设的三条"根据"，第一、二条其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企图把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否普遍存在是甲又是非甲的过渡状态的问题，同运动是否表现亦此亦彼矛盾的问题混淆起来，用前者去顶替后者。而在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视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为转移，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而后者则是必然存在的。说运动着的物体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矛盾，这完全不是说它处在又是甲又是非甲的过渡状态之中，而是说它既在甲地又在非甲地、既在甲

① 《哲学笔记》，第310、301页。

地又不在甲地。

而艾杜凯维奇的第三条“根据”，则暴露了其前两条根据错误的根源。要是真象他所说，事物在向新状态过渡前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绝对同一，那么，事物就只能是绝对静止的“死物”，所谓的“向新状态过渡”，也只是外力把它从一地改放在另一地而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运动”，就连艾杜凯维奇羞答答地承认的那个出现在过渡一瞬间的“矛盾”，也只能是这个“死物”同把它由一地改放到另一地的那个外力的“矛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运动变化本身就是亦此亦彼的矛盾、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这是无法否认的。否认了这个矛盾，也就必定否定运动变化本身，要想承认运动变化而又否认其矛盾本性，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三个问题，恩格斯关于运动的表述，到底有没有揭露运动的矛盾本性？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否认运动的矛盾性质的同时，又从割裂运动的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矛盾统一入手，从一端或者从另一端来歪曲和攻击恩格斯的论述，指责它并没有揭露出矛盾。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严格地说来，恩格斯对于运动所作的描述，完全没有揭示出形式上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物体具有不同的部分，那么，说它在同一时间内占据两个不同的地方，这是完全正当的；而如果我们把不同的时间加以区分开来，那也不难承认一个物体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首先应当指出，胡克在这里一开头就肆意歪曲恩格斯的原意。因为恩格斯所说的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就一个运动着的物体整体而言的，而不是就物体的“不同的部分”“占据着两个不同的地方”而言的；是就

"同一瞬间"而言的，而压根儿不是就"不同的时间"而言的。

同时，胡克的这种歪曲描述，还说明他和切尔诺夫完全一样，是把运动描述成为它的结果，即：物体在一个瞬间在一地而在另一瞬间在另一地的静止状态的总和。

所以，问题很清楚，在胡克那里，恩格斯的论述之所以"完全没有揭示出形式上的矛盾"，那是因为胡克对这个论述作了面目全非的形而上学的歪曲的缘故，是因为胡克步切尔诺夫的后尘，把运动所体现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人为地割裂开来，抓住其间断性加以绝对的夸大，而否认其不间断性的结果。

如果说，胡克是从把运动的间断性方面加以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极端，来否定恩格斯论述所揭示的辩证矛盾的话，那么，考茨基、列夫和威特尔则是从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即通过把运动的不间断性加以绝对化，来达到同一目的的。

考茨基说：

"既然无限的东西是我们所无法得到表象的，那么，要想使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在一定的瞬间固定在一个一定的地方，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我们来说，从这里也不能产生与相反的东西的矛盾"(《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

考茨基把物质在其中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同有限、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割裂开来，又把其中的无限和不间断性加以绝对化的这种作法，显然同样是错误的。

问题在于，一方面，固然整个物质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具体的个别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是有限的，而且无限的宇宙空间和时间正是由无数的有限的空间和时间所构成的；一方面，由于在任何两个空间广延性要素、任何两段时间之间，总有把这两者联结成统一的空间广延性和时间连续过程的广延性要素和时间持续性，因而时间、空间都是不间断的；而另

一方面，又由于任何空间广延性要素、任何两段时间，其内部特性和结构又总是按照各个物体和物质过程的质的差别而各各不同的，因而，时间、空间又总是间断的。抓住时空的不间断性一面去否定其间断性的一面，说什么无法表象无限的东西，不能解决使运动物体在一定瞬间固定在一定地方的问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列夫说：

“把运动划分为一系列的这里那里，……这是一个武断的概念，确实是地地道道主观的。运动是一个连续，我们没有任何客观根据来把它划分为这些阶段。这样划分阶段实际上不过是把我们自己夹在中间，而把它视作和我们相关的，可是那样一来，就不再能把它作为一个物理上的事变来看待，更不用说作为科学上的事变了”(《概念的暴政》1961)。

列夫的这个指责也是错误的。因为正如运动的不间断性一样，运动的间断性同样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不是主观虚构的。当然，在人的概念中反映它时，有一个反映得是否如实的问题，但是，事情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要是不把运动的不间断性同它的间断性统一起来，那是根本就无法描述运动的，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去客观地“看待”物理事变、科学事变了：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这里也有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①。

显然，要是把列夫那个不把“我们自己夹在中间”的逻辑贯彻

① 《哲学笔记》，第285页。

到底，那就不仅不能根据运动的间断性来划分阶段，而且同样不能根据运动的不间断性来把它说成是一个连续！而只能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置一词，这不就充分暴露了列夫的“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吗?!

威特尔说：

恩格斯关于运动矛盾性质的论述的“错误在于预先假定一条线是由点构成的。运动的道路是向一个方面继续延伸的线；但是点却不向任何方向延伸。即使无限数目的点并在一起，我们也得不到最小程度的广延。所以一条线不是由点构成，而完全属于另外一种。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也不能说一个运动的物体在或不在任何一定的点。所以没有根据说一运动的物体又在又不在一特殊的点是一个‘矛盾’”(《辩证唯物主义》1958)；

威特尔还说：

恩格斯论述中“这种把线的不间断性分为间断因素的划分……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它等于一种虚构。但是，如果利用这种虚构，……那么……运动就应当被理解为物体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位置’。而道路上每一个点都有物体的一个特殊位置与之相对应；物体的运动就在于它此刻在‘这里’而下一刻在‘那里’，于是在运动现象中也就没有任何矛盾了。如果不同意这种运动的划分，那就应当做得彻底一些，也反对线的划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3)。

威特尔洋洋自得地一再重复的线不由点构成的议论，纯属无的放矢。因为恩格斯关于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在一地又在另一地，在同一地又不在同一地的论述，和一条向一个方向延伸的线并不是由不向任何方向延伸的点所构成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恩格斯所说“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当然是以它们座落在向着一个方向延伸的道路上为前提的。

而隐藏在这种无的放矢的议论后面的，威特尔所谓把线的不间断性划分为间断因素在本体论上等于一种虚构的论调，则和考茨基、列夫的刚被批驳的谬论一样，是一种把运动的不间断性加以绝对化，而否认其间断性的客观实在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而威特尔论据的压轴戏：要么把运动的物体看作此刻在“这里”，下一刻在“那里”，从而没有什么矛盾，要么“彻底”地反对线的划分，从而消除矛盾的观点，则更加说明了这位奥地利神父只能思维于形而上学的极端之中，而不能想象真理恰恰在于要把握矛盾的统一。

问题的实质在于，既然运动是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统一，那么，无论片面夸大其中的哪个方面，把它加以绝对化，而否定其另一方面，就都是错误的。

第四个问题，能不能在对运动的表述中，消除运动物体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否认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指责恩格斯的论述没有揭示出矛盾的同时，还力图在对运动的描述中消除矛盾。

考茨基说：

“只要我们把〔恩格斯关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命题扭转过来，如果我们不把运动看作是一个物体在运动起止的两个地方同时存在，而看作是从这两个地方同时离开，那么在运动上也就没有矛盾了，物体在达到B以前已经离开了A。在这样的想法中就完全没有什么充满矛盾的东西”（《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

显然，如果从严格的字义上来理解考茨基的“同时离开”论，那就会立即发现他的妙论只是招致了荒谬的逻辑矛盾，因为只要稍有一点常识，就会知道：任何一个运动物体要不是超时空的话，就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其运动的起迄两地“同时离开”的；而如果按照考茨基自己的词不达意的解释，把“同时离开”论理解作“物体在

达到B以前已经离开了A”，也仍然无法回避运动物体亦此亦彼的矛盾本性。因为说运动物体介乎两个地点之间，还是意味着它在这两者中间的某一个地点运动着的问题，“物体在达到B以前已经离开了A”只说明它在A、B之间的某地运动着，而并未说明运动本身到底是什么。而既然它在A、B之间的某地运动着，那么，为要揭示运动的本质特征，就仍然只能说，在同一瞬间它在A、B之间的某地又不在那某地，既在这某地又在其前面的另一地。

所以，考茨基所谓“物体在达到B以前已经离开了A”这种说法，并不能消除运动的辩证矛盾，而只是把它掩盖和隐藏起来。

为了在对运动的描述中消除矛盾：

艾杜凯维奇提出用“运动物体‘通过点P’”的说法去取代恩格斯的论述（《变化和矛盾》，载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一九四八年第八期）；

沙夫也跟着提出用“一个运动着的物体通过空间中的点”的说法来取代恩格斯的论述，并说，这样，“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又在又不在空间中的某个点上，从而意味着它又通过又不通过空间的那个点上，这会是自相矛盾的，但明显地也是虚假的，运动着的物体确实通过空间中的各个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矛盾律》，载波兰《哲学思想》杂志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柯尔曼提出用“物体在同一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的说法去取代恩格斯的论述，他说：“于是，矛盾就不在对物体在某一瞬间是否在某一个地方这个问题既作肯定的又作否定的回答，而在于物体在某一瞬间和某一地方既有相对运动又有相对静止”。所以，这个取代“不仅阐明了相对主义语义哲学意义上的词句表述，而且说明了从形而上学观点到辩证法观点的过渡”（《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载捷克斯洛伐克《哲学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显然，艾杜凯维奇、沙夫、柯尔曼的这一切说法，同考茨基的“同时离开”论一样，也是掩盖和隐藏运动的辩证矛盾的拙劣举动。问题并不象沙夫所愚蠢地设想的那样，似乎在把恩格斯的论述篡改成“一个运动着的物体通过空间中的点”以后，再要谈论运动的辩证矛盾，就只能说一些诸如物体“又通过又不通过空间的那个点”这类在形式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荒唐话了。不，运动的辩证矛盾压根儿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以这种“又通过又不通过”的荒谬的逻辑矛盾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在艾杜凯维奇一沙夫的“通过”两字中隐藏起来了！

这是因为，既然说的是运动着的物体通过空间中的点，那么，在这个“通过”之中，就仍然存在着运动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存在着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在这个点上又不在这个点上，既在这个点上又在另一个点上的问题。

艾杜凯维奇、沙夫的提法并没有消除运动的这个辩证矛盾，而只是把它隐藏、掩盖在“通过”两字之中罢了。而柯尔曼所谓“物体在同一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的说法，则和艾杜凯维奇、沙夫的“通过”论完全是一路货色，企图把运动的辩证矛盾消除在把提法篡改为“经过并且静止”这样的文字游戏之中，并颠倒黑白地说是什么“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过渡”，这岂非在白日作梦?!

归结起来，无论是考茨基的“同时离开”论，也无论是艾杜凯维奇、沙夫的“通过”论，还是柯尔曼的“经过并且静止”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运动物体亦此亦彼的辩证矛盾，它们同那种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的说法一样，只是企图用一些谋略把这种矛盾掩盖和隐藏起来罢了。但既然任何矛盾都是无法掩盖和隐藏的，那么，被他们用“达到与离开”、“通过”、“经过”这样一些字眼掩盖起来的矛盾，当着对这些字眼进行分析时，就又立刻从中纷

纷飞了出来，把考茨基、艾杜凯维奇、沙夫、柯尔曼之流"消除了矛盾的运动表述"的招牌砸个稀烂。

第五个问题，恩格斯关于运动的表述，是芝诺观点的变种，还是对芝诺观点的否定？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了抹煞运动的矛盾性质，还把恩格斯的论述同芝诺的悖论等同起来，把水搅混。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恩格斯为他的关于运动就是矛盾的主张所提出的唯一的论证，是在很久以前由芝诺所提出的各种总的考虑中一个考虑的变种"(《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奥地利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说：

恩格斯的论述"不过是芝诺反对运动可能性的陈旧谬论的重复"(《辩证唯物主义》1958)。

波兰的沙夫则说：

恩格斯的论述同"芝诺拒绝矛盾并首尾一贯地否认运动的客观性"的陈述，"都建立在同样的形而上学的立场的基础上——是从同一个错误前提产生出来的、某种从静止中去解释运动的错误企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矛盾律》1955)。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知道，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芝诺在反驳运动时，曾经提出过四个悖论，其中第三个说的是"飞矢不动"：

"飞着的箭是静止的。因为，如果每一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飞着的东西在任何一定的霎间总是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那么它就不能动了"(见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第六卷，第九章，页 239b)。

事情很清楚：芝诺说的是飞着的箭都是静止的，因为在任何一定的霎间它总占据着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从而根本不能动；

反之，恩格斯说的却是一切运动都是矛盾，因为任何运动着的物体总是在同一瞬间在一地又在另一地，既在同一地又不在同一地。

芝诺说飞矢不动，恩格斯说一切运动都是矛盾，芝诺由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走到否定运动的真实性，而恩格斯则由揭露一切运动的矛盾性质，进而论证矛盾的普遍性。只要略加比较，就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论述显然是对芝诺观点的否定。所以，胡克所谓恩格斯的论述是芝诺考虑的变种，威特尔所谓恩格斯的论述不过是芝诺谬论的重复，这一切指责纯属无稽之谈。

芝诺为什么把飞矢说成是静止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忽视了运动的不间断性而把其间断性绝对化了。芝诺所谓由于飞矢在任何一定的霎间总是占据着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从而就不能动了的论证，正是集中反映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他把飞矢所经过的空间分成许多彼此隔绝的小段和点，以此为前提说飞矢时而在这点，时而在那点。而没有看到一方面飞矢固然在限定的空间时间内飞行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总是不断地克服着这种限制性，冲破着这种界限，而使自己的飞行航程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之流的。

列宁指出：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①。

芝诺所谓飞矢不动悖论的哲学前提，就是把列宁所指出的这种表现为运动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人为地割裂开来，抓住其间断性的一面加以绝对的夸大，而否认其不间断性的一面。

当着胡克把运动物体说成在同一时间内物体的不同部分占据两个不同地方，在不同时间内在同一个地方和不在同一个地方时，当威特尔说什么如果把线的不间断性划分为间断因素，运动就应

① 《哲学笔记》，第283页。

被理解为物体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位置时，他们的这些论述，不倒正是芝诺谬论的不折不扣的重复和变种吗?!

反之，恩格斯的论述，却为我们提供了从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的矛盾统一中去把握运动的范例，从事物的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矛盾统一中去把握事物运动的范例：说运动物体在一定瞬间在一地，这是从时间空间的间断性着眼来说的，是从运动中事物的相对静止方面着眼来说的；而说运动物体在这同一瞬间又不在这同一地、又在另一地，则是从时间空间的不间断性着眼来说的，是从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和连续性着眼来说的。由于这两者在实际生活中总是统一起来的，因而就说任何运动着的物体在同一瞬间总是在一地又在另一地，既在同一地又不在同一地。

芝诺把时间空间的间断性和不间断性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否认另一个方面，从而把运动诡辩地说成是静止；反之，恩格斯则把时间空间的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把运动物体的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揭露了运动的矛盾性质。在这里，两条路线的对立是非常清楚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和混淆的。所以沙夫指责恩格斯同芝诺的陈述，都建立在同样的形而上学立场上，都从静止中去解释运动的同一错误企图、错误前提出发云云，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指鹿为马的瞎说。

第六个问题，恩格斯关于运动即矛盾的表述，是否就是黑格尔运动概念的复述?

为了抹煞和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蓄意混淆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的原则界限，把恩格斯的论述说成是“接受了黑格尔的论证”、接受了“黑格尔对运动的解释”(沙夫)，“被黑格尔的错误概念所误导”(巴克拉节等)，“继承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踪迹”，“非批判地接受了把思维中的逻辑矛盾唯心主

义地投入到真正世界中去"的学说(缪萨契:《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等等。

诚然,黑格尔确实说过:

"运动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而同时又不在这个地方"(《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外部的感性运动是〔矛盾的〕直接存在。一物并不以这样一种在这个'现在'在这里,在另一个'现在'在那里的方式运动着,而是在这个'现在'同时它又是又不是。人们必须承认古代的辩证法家在真实存在的运动中所发现的矛盾。然而,并不由此推演出结论说运动并不存在,而是相反地存在着一个现存的矛盾"(《逻辑学》)。

但是,由于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理论思维构成世界的本质,因而在达到了这个论断以后,也就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反之,在恩格斯那里,这个有关运动一般的论断,虽然指出了运动就是矛盾这一本质,但却又仅仅是具体、现实的运动的抽象。为了彻底阐明运动的本质,停留在这个抽象的领域里是不行的,必须进而对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及其辩证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

正因为这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运动即矛盾的论述,指出了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地又在另一地,既在同一地又不在同一地的矛盾之后,紧接着就以生命、认识、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等等为实例,去具体地揭示和分析"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的矛盾: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

"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

来”；

“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

“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①。

在这里，恩格斯把矛盾的普遍性同矛盾的特殊性紧紧地联结起来，从客观的物质运动形式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出发，去揭示其运动规律和所体现的矛盾。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到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地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一个范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于唯物辩证法不同于唯心辩证法的这个本质特征，置若罔闻，却闭着眼睛瞎说一气，硬把恩格斯的论述这样那样地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同起来，他们如此这般地信口雌黄，不倒正好说明他们自己不仅是形而上学的信徒，而且还继承了唯心主义的破烂衣钵吗?!

八、在事物发展动力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坚持还是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是同在事物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3页。

展动力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分不开的，是同两种发展观的对立斗争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持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坚持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反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形而上学之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抹煞运动的矛盾性，则正是由于，也是为了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

“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①。

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指出：

“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②。

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强调指出：

“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

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①。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也指出：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始终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同这条唯物辩证法的路线相对立的，则是从形而上学滑到唯心主义去的路线，就是从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到把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泉源转移到主体乃至神那里去的路线。

在哲学和科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人在这条由形而上学滑到唯心主义的路线上留下了自己的覆辙。例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由于不在被他看作惰性的物质本身中，而到所谓"纯粹的形式"中，也即到物质之外去寻找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这就使他离开了唯物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承认神是所谓的第一推动者。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由于断定自然界中一切力量都可以互相中和，这就否认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运动的内在源泉，并据此得

① 《哲学笔记》，第 40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76、277 页。

出结论说，单是整个世界不能成为什么东西，而只是根据另一东西的意志，它才是某种东西，从而为用宗教信仰代替科学知识扫清了道路。

英国自然科学家牛顿，由于在发现了机械运动的客观规律以后，用形而上学去观察行星绕太阳运行这一运动的源泉问题，不是把它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把它看作非物质的力量，这就赋予宇宙、赋予太阳系的天体以"第一推动力"的上帝。

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基于其阶级利益的需要，自觉地维护和巩固这条由形而上学到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力图从对唯物辩证法所坚持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的思想路线的非难和攻击中，去为唯我论的主体、为神和上帝争得一席之地。

奥地利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辩证法家说矛盾是丰富多产的，或产生进步的。……但是，只有在我们决心不容忍矛盾和决心改变任何含有矛盾的理论的时候，这才是真实的"；

"假如我们改变这个态度，而决定容忍矛盾，那么矛盾必定会立刻失去任何一种的丰富多产性。它们不会再产生理智的进步"，"因此，那种推进辩证发展的唯一的'力量'，就是我们决心不接受或者不容忍正和反之间的矛盾"；

"推动发展的，不是这二种观念里面的一种神秘的力量，不是它们之间的一种神秘的紧张；完全是由于我们不承认矛盾的这个决定和决心，才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个可以使我们避免正和反的新观点"；

"实际上产生反的只是我们的批判态度，而在缺乏这样的批评态度的地方——情形通常是这样的——'反'是不会产生的。与此

相类似，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认为‘产生’合的是正和它的反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属于诸心灵的斗争；而且这些心灵必须是能够产生新观念的；因为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中，有许多徒然的斗争，即毫无结果的斗争的例子”(《推测与反驳》1963)。

首先必须指出，坡培尔的这整段议论都具有着张冠李戴、鱼目混珠的特征。

这是因为，坡培尔叫嚷着“决心不容忍”的矛盾，是指的、而且仅仅是指的荒谬的逻辑矛盾，而唯物辩证法所说事物发展动力的矛盾，却是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但是，既然坡培尔蓄意把这两者混淆起来，把他关于决心不接受荒谬的逻辑矛盾的议论，用来攻击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其议论的“票面价值”，逐条予以剖析。

人们不接受、不容忍矛盾的决心、决定是从哪里来的？

坡培尔显然认为是在矛盾之外的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心接受还是不接受，容忍还是不容忍它。但是，这是道道地地的主观唯心主义。

把这些问题放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背景中去加以考察，就可以得到明确而清楚的回答。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人们接受或不接受、容忍或不容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正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本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促使人们表明自己对于它的态度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容忍还是不容忍。

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

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①。

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容忍和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无产阶级却不接受和不容忍它呢？原因在于“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②。

所以，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容忍还是不容忍矛盾的决心、决定，并不是由处在矛盾之外的人们的头脑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本身、由人们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促使人们作出的。

不仅人们对矛盾的态度，而且克服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也是由矛盾本身、由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斗争所产生的，而并不是象坡培尔所说的由“能够产生新观念”的“诸心灵”凭空想象出来的。

如所周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空想的性质，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现代社会主义学说，才具有科学的性质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还很不发展，新的社会制度所据以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还只是开始形成。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所创始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发明出来，而不能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这一点注定它从一开始就要成为空想的、幻想的。

反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中叶创立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情况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在那时，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充分发展起来以后，已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

恩格斯分析当时的情况说：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②。

既然人们对矛盾的态度、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一切都决定于和产生于矛盾本身、人们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那么，事物发展的动力，就显然是矛盾，而不是波培尔所谓的不接受、不容忍矛盾的决心，不是波培尔所谓"能够产生新观念"的"心灵"！波培尔不顾事实地鼓吹的这一套货色，不正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又是什么呢?!

然而，不仅新实证主义，而且资产阶级其它流派以及修正主义者也参加了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自己运动论的围攻。

例如，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283 页。

② 同上书，第 293 页。

"在恩格斯谈到矛盾是一切运动和发展的动力时，用一种甚至连黑格尔的逻辑唯心主义也不曾证明过的方式，把逻辑观念变成了造物主"(《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显然，在这里，胡克和坡培尔一样，是蓄意在把荒谬的逻辑矛盾同实际存在的辩证矛盾混淆起来，以便把水搅混。

胡克还攻击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

"无非是用内在的神学来代替超越的神学，因为对宗教来说根本的不是用'上帝'这个词，而是相信宇宙或多或少对人和人的目的是友善的，相信自然过程是这样的，它们必须实现人的最高理想"(《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1959)。

布哈林也攻击唯物辩证法关于自己运动的概念带有笨拙的"目的论"的气味(《历史唯物论》1921)。

所谓"目的论"，是一种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被某种目的所决定和支配的唯心主义学说，它认为一切事物之所以象现在那个样子，是由于上帝或神的有目的地安排和创造的结果，或由于诸如"绝对观念"之类东西的"内在的目的"的作用。

反之，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却根本否认自然界有任何目的，根本否认自然界是按神的目的创造或按绝对观念的内在目的运转的。它坚持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它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

正因为这样，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不仅同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毫无共同之点，而且还坚持批判这种反科学的谬论。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就曾讽刺目的论说：

"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尔曾经指责马克思的辩证运动是没有目的论内涵、没有指导的精神力量的假设的突创的进化(《一种辩证哲学的范围和限度》,载《黑格尔逻辑研究》,1959)。把马克思主义主张质量互变的辩证法运动说成是什么突创的进化,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缪尔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运动没有目的论内涵的抱怨,却比布哈林从相反方向所作的攻击,更接近于事实。

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根本否定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但是,它是不是象胡克所说的那样,主张自然过程必须实现人的目的呢?

否。唯物辩证法认为,只有人的活动才具有自觉的目的,而且只有人的自觉目的才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列入到事物的因果联系之中去;但是,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人的目的不仅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而且只有当它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不是相反的时候,才能对客观事物发挥支配作用。

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强调指出:

"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而在黑格尔谈到"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于自然界的"的地方,列宁又写上"注意"、"黑格尔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注①。

所以,把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说成是相信自然过程必须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内在神学,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扯。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实用主义者胡克的理智还不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鲍亨斯基神父来得清醒。

鲍亨斯基说:

---

① 《哲学笔记》,第201、202页。

“辩证法对于他〔指列宁〕来说，是排除上帝的一个有效工具。……正是在这个理论中，辩证法为自己堵塞了通向假设上帝存在的道路。列宁在这个理论中发现了另一个绝对的东西，只由自身中产生的处于运动中的无限的永恒的物质：这就是他的上帝”（《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1956）。

鲍亨斯基硬要给战斗的无神论者强加一个上帝，这无疑是他当神父的宗教偏见和职业嗜好。但是，把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看作是“只由自身中产生的处于运动中的无限的永恒的物质”论，这不是要比胡克所谓自己运动论是内在神学的胡扯，来得高明一点吗？

当然，新托马斯主义者陈述唯物辩证法自己运动论的主张，并不是为了维护它，而是为了攻击它，为了用神学去顶替它。

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奥基尔曼说，他发现自己运动论中有“逻辑”矛盾，这就是在发展着的事物中应包含它将向之转化的某种别的东西，在低级事物中应包含高级的，在简单的事物中应包含复杂的。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非精神的潜能，不能包含任何精神行为”，“本体论上低级的现实性不能具有本体论上高级性质的行为能力”。如要从高度发展的物质的东西中产生出它的对立面——非物质的、心理的东西，就需要有“本体论上更高的实体”即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他强调说，由潜在过渡到现实的存在，不是自己运动，而是“最终的、绝对充足的基础”或“纯粹无限的现实性”，即“神的结果”(《唯物辩证法》1958）。

奥地利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也说：

“如果事实上有真正的自己运动，这种运动肯定只能适用于没有增加的存在的变化，象地位的变化等，——而不能适用于象上面所规定的从相对的不存在过渡到相对的存在的意义下的任何真正

变化过程”，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种动力因的作用”，“而这种原因，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第一推动者或上帝’”（《辩证唯物主义》1958）。

基于同样的原因，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也说：

“极端的紧张和相互对立的关系，无疑是自然和社会中变化发展的源泉，……但这不是发生着的东西的唯一的原因，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上帝”（《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被这些新托马斯主义者此唱彼和地用来反对唯物辩证法自己运动论的论据，集中到一点，就是说，在可能变为现实的问题上，在物质的东西产生心理的东西的问题上，靠物质的自己运动是不成的，必须求助于他们的上帝。

所谓可能性，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可能性，是指的存在于事物内部的一定的发展倾向，是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内部根据。它作为矛盾的否定方面而同规定着事物的现实性质的矛盾的肯定方面共居于现实事物这个统一体之中，经过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斗争，而在一定条件之下，克服矛盾的肯定方面而使自己居于支配地位，那时，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性，一事物就转化为它事物。

所以，由可能变为现实，并不是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恩赐，而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它体现了事物的自己运动和自己发展，根本不容什么“第一推动者”之类的“动力因”的插手。奥基尔曼所谓说发展着的事物包含它将向之转化的某种别的东西，是自己运动论的“逻辑”矛盾，由潜在过渡到现实的存在是神的结果，威特尔所谓自己运动不能适用于从相对的不存在过渡到相对的存在的意义上的变化过程，卡里什所谓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上帝等等，统统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瞎说。

至于奥基尔曼所谓为要从物质的东西产生出非物质的心理东西，需要有本体论上更高的实体，即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说穿了，

就是认为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不是由于事物的自己运动，而是由于上帝的创造，但是，这同样是一种为科学所粉碎了的宗教迷信。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揭示生命的本质说：

“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为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①。

而现代自然科学则证明原始蛋白体是通过化学进化而导致的物质的逐渐复杂化，是由此产生的以核酸为主导成分、以蛋白质为表现工具的复杂的特殊物质体系；并证明生命一旦出现之后，就经过内部的矛盾斗争，而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地由一种类型转化为它种类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一直发展到人类的。

所以，即使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物质的自己运动和自己发展，而压根儿就没有奥基尔曼所谓“本体论上更高的实体”——“某种神秘力量”——“神”发挥其特创作用的余地。

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马尔库兹从另一个角度攻击唯物辩证法的自己运动论，而鼓吹外因论。

在一九六六年于布拉格举行的黑格尔大会上，马尔库兹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否定概念》的报告中，攻击马克思主义集中注意力于事物内部否定力量，而对资本主义一体化力量估计不足，他说：

这种一体化力量“是很强大的，以至于可以中立否定力量，甚至使否定力量变成肯定力量”；

“主要的困难在于辩证的概念，按辩证的概念，否定的力量是在现存的对抗体系内部发展的”，但在现在，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89、90、133 页。

之间在"全球的统一的整体"中的对立，却吞没了"晚期资本主义里"的革命潜力，使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这个全球性的对立中变了样"，据此，他得出结论说，矛盾的真正辩证的解决，导致一定要"从外面"来解决。

作为马尔库兹在政治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表现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

辩证法认为，一事物不仅有其肯定的、正面的规定性，而且同时也包含有否定的反面的因素。肯定方面是保持事物的现在的存在的方面，而否定力量则是促使事物灭亡的方面，正是由于事物内部这两个方面的对立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否定方面战胜了肯定方面，取得了支配地位，才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反之，要是事物内部只有肯定方面而没有否定方面，要是否定方面也变成了肯定方面，那在事物内部就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事物发展中的新陈代谢，而只有死水一潭、停滞不前的形而上学王国。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看作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看作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辩证法感到恼怒和恐怖的根本原因：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而列宁则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谈到"这个否定性……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泉源，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泉源，是辩证法的灵魂，而所有真理的东西本身都含有这种辩证法的灵魂，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且只有通过它才是真理"的地方，加上：

"辩证法的精华"、"真理的标准（概念和实在的统一）"的批注①。

恰恰正是在这个使辩证法具有批判的、革命的本质的根本问题上，恰恰正是在这个事关辩证法的精华的根本问题上，几十年来一直以辩证法自我标榜，并把自己的理论称作什么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尔库兹，却彻底背叛了辩证法，而滚到形而上学的泥潭里去。

马尔库兹关于马克思主义忽视资本主义一体化可以中立否定力量、把它变为肯定力量的指责，正是从这种由辩证法滑到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而提出来的。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立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阶级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

① 《哲学笔记》，第246—247页。

消灭对立的行动”①。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据无产阶级和私有者这两者在私有制的矛盾对立中所占有的地位，而不是根据别的什么东西，来划分这个对立中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私有者因为在这个对立中得到自我满足，要保持现状、保持这个对立，所以是对立的肯定方面；反之，无产阶级却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建立在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因而不得不从事雇佣劳动替资产阶级生产财富，因而要破坏现状、要消灭这个对立，所以是对立的否定方面。

问题十分清楚，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措施，是马尔库兹所说的什么“资本主义一体化”也罢，还是别的什么也罢，只要它没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而从事被剥削的雇佣劳动的地位，那么，即使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一下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即使它能在一定时期内模糊一些工人的阶级意识，却终究改变不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私有制的对立中所处的这种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的地位和关系。

什么资本主义一体化力量“可以中立否定力量，甚至使否定力量变成肯定力量”，这完全是胡言乱语。长时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为反对垄断资本的进攻，争取自身和各阶层人民的经济政治权利，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和支援第三世界的反帝反霸斗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哪里扯得上什么“中立”，什么变成维护资本帝国主义的“肯定力量”了呢？

马尔库兹关于什么“中立”，什么“变成肯定力量”的指责，显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

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起来夺取政权而说的。然而，这是由于在那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和工人阶级的分裂，也由于垄断资产阶级采取“社会化”政策，特别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心目中的形象，以致在那里暂时还不存在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等复杂情况所造成的。但是，暂时还没有起来夺取政权，乃至一时的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意识模糊，却完全不等于说，在阶级地位和阶级本质上，无产阶级已经“中立”了，已经变成维护资本主义的“肯定力量”了。

至于马尔库兹关于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全球对立，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变了样，致使矛盾一定要从外面来解决的说法，在哲学上就更加表明他已经彻底抛弃了辩证法的伪装，而露出形而上学的真面目。

这是因为，正是这个内因论还是外因论，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发展观从原则上区别了开来。

诚然，内与外的概念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矛盾，就世界的角度来说，又是同一个世界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内与外的界线又是确定的、不容模糊的。当着问题涉及到一国社会制度的改变的时候，又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一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不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因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无论如何，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只能作为外因，通过一国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内因而发生作用，而绝不能代替或者变成这个内因。马尔库兹所谓“从外面”对矛盾进行“真正辩证的解决”论，纯属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同辩证法连边都沾不上。

九、矛盾调和论和矛盾不可解决论是假辩证法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离开了对立去把握同一、又离开了同一去把握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在矛盾是不是客观实在的问题上，表现为矛盾对立的取消论和用对立顶替矛盾的谬论，而在矛盾如何发展、怎样解决的问题上，则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矛盾不可解决论。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竭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辩证法的同时，又热衷于炮制形形色色的假辩证法去鼓吹矛盾调和论和矛盾不可解决论。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缪勒说：

"辩证法是而且表现着一切对立面的统一"，"辩证的统一必须是差异、对立和紧张关系的一种活的统一并处在其中的"，因此，"一切哲学都想出对立面的一种和谐、一种统一、一种调和，而又保持着对立面的两极的紧张"；

"生活是一个辩证的整体，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是诸矛盾的一个不矛盾的统一性"，"对立面的这种绝对的和谐，不仅仅是善的目标，而且是善的原因和善的永恒存在，而接受这个看法，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和快乐"（《辩证法》1953）。

以后，缪勒用他的这套观点去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矛盾辩证法说：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上的对立，改造成粗暴残忍的权力集团的冲突。他们的'辩证法'只是力量对力量的一种冲突，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这些力量又被限于经济上的阶级。整个智力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文化，以及它们的辩证关系，都消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血腥的千篇一律中了"，"马克思

的理论……酿成麻烦并煽动世界上一切仇恨，为对世界进行共产主义征服而软化这个世界”(《对立面的相互作用》1956)。

再后，缪勒又进一步发挥其观点说：

“相反的对立面彼此需要，以便成为它们之所是，就象男人和女人在相互对立中成为他们之所是一样”(《辩证法与教育》，载美国《人格主义者季刊》一九六三年夏季号)。

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尔说：

“问题在于要恢复一种灵活而耐心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看来，“被剥削者也不是剥削者的对立面（或矛盾）：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一些在一个以缺乏为其主要特点的制度中斗争着的人们”(《辩证理性批判》1960)。

十五年以后，萨特尔在其七十岁生日时又发表谈话说：

“要改变人们的经济关系、文化感情关系，只有当物质的‘匮乏’被消除时才能实现”，“物质的缺乏是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对立和对抗的根源”(《七十自述》1975)。

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尔克提出了一种“肯定的辩证法”和“上帝的关系辩证法”。他说：

“解决矛盾的几种方法”：或者“为了对立面的一方面而消除另一方，或者把双方都维持下来而加以调和。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后一种态度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你要取消彼方，就不得不把它暗中吸进此方来”，而且“根本不可能排斥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所以我们断言对立双方实际上是必然一起存在的”，“它们之间冲突所提出的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硬把其一方或另一方否定，而在于把它们同时肯定和把它们综合起来”。所以，“真理不在于一味肯定对立面的一方而对另一方的损害，而在于双方之调和，所以又在于及时地把对立的双方综合起来”，他把他这一套观点叫做“肯定的辩证法”，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矛盾达到调和一致的时候，才保证了肯定

性的许多主要因素之间的和谐(《肯定的辩证法》1952)。

以后,马尔克又把矛盾分为矛盾、对峙、关系、缺乏等几个等级。据他说,初看起来,象有限和无限,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存在和变化,一物和它物这样的相互对峙好象相互矛盾,实际上却是互为手段,因此它们之间不应有斗争。只是由于人们自己的不完善才不能避免对峙的冲突。所以,任务在于使矛盾从对峙发展为纯粹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斗争为和睦所代替,因为关系可以缓和矛盾并在最后协调一致,可以调和一切矛盾,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律是和睦而不是敌对",反之,"缺乏这个因素就会发展起来","个人就会瓦解,……因此就会产生肉体的疼痛,疾病,死亡,道德的败坏,错误,罪恶"等等。为此,他号召人们不要把矛盾弄得尖锐化,而要"让上帝去处理","上帝进入历史的目的是要在人类建立这种上帝的关系辩证法,以代替对峙的辩证法",这意味着各方面的完全综合、绝对和谐(《方法和辩证法》1956)。

西德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卡里什则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辩证法"。他说,这种"辩证法"承认"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事实",但他却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圣父强调调和阶级对立的迫切必要性"。他说:

"按照概念来说,世界上只能有对抗性的矛盾;因为一切矛盾都意味着对立",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对抗性矛盾,没有完全对立的事态",因此,他提出"以可以忍受的和不可忍受的生存条件来代替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又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必须用革命斗争来加以解决的、不可忍受的生存条件,现有的紧张关系总是可以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在保留它的体现者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政治和社会的对立应当经常借助于爱、正义,借助于仇恨的排除,通

过意识的进化和变化来调和”(《基督教徒与辩证唯物主义》1961)。

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提出用一种所谓“自然的连续性的逻辑”来调和矛盾。他写道:

作为“一切发展的动力”的“冲突和对立的辩证的解决”,“是一个情境内部相互冲突着的要素的富有成果的综合”,“正题和反题是在这样一种方式中得到解决的,即否定每一方的构成为关系的整体的要求;然而,每一方的形态却被保留或保存在每一个新的整体或情境之中;并被重新解释或提升为一种更加囊括一切的整体中的附属的要素。正如查理·皮尔士所了解的那样,黑格尔摸索着用这种方式来加以表示的,乃是自然的连续性的逻辑。黑格尔断言这种连续性是纯粹逻辑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它主要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后来,胡克又由此直接引出鼓吹阶级调和的政治结论:

“因而,在有矛盾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运用理智的方法使有不同的意见的人,通过协商而得出共同的结论,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是找出一个更能包括一切的旨趣,这种旨趣使我们求同存异,缓和不同的意见或者超越它们,而这样做也就可以把价值之间的矛盾化为可以相容的价值之间的差别”,据他说,“这是一种解决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冲突的有效办法”(《实有的寻求》1961)。

新老修正主义者有许多都是矛盾调和论的吹鼓手。

例如,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就公然申言:

“我期待随着民主制度的发达而阶级斗争会和缓起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说:

“如果工人和资本的积累有利害关系,这不就表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和谐一致了吆?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主人穷了,奴隶就要

挨饿，奴隶病了，主人就要受损失”（《国债的经济影响》191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修正主义者白劳德叫嚷“必须改变”“反希特勒联盟中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他说道：

“既然任何一方不能消灭其他一方，唯一的超出这种划分的办法就是每一方使自己适合其他一方，不是从它们自己的愿望和意识形态去求得一个共同的纲领和看法”（《德黑兰：我们在战争和和平中的道路》）。

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苏联领导集团又虚构在核武器面前人类共同活命和全部毁灭的矛盾，去掩盖各种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们叫嚷什么：

“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在氢弹面前一切人都是一样”，“核战争对任何人都不会同情”，因此，“在现代，人类面前只有一个选择：是和平共处，还是毁灭性战争”，“它能够使所有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商人还是资本家都联合起来”。

尽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给自己鼓吹的矛盾调和论，披上名目繁多、五光十色的“辩证法”招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假辩证法，因为它们是以一系列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原则为依据的。

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武器的矛盾同人与人的矛盾这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由于一切生产，都是许多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内，并借此社会形态进行的对自然的利用，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既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同时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制约着的：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

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①；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②；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决定着他和自然界的关系"③。

所以，象萨特尔那样，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去掩盖和抹煞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看作是"在一个以缺乏为其主要特点的制度中斗争着的人们"，而否认他们之间的矛盾对立，并把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归结为"物质的缺乏"，那是完全错误的，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曾经批判蒲鲁东的谬论说：

"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④。

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也正击中了萨特尔谬论"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要害所在吗？

问题十分清楚，并不是"物资的缺乏"勾销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而恰恰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在造成"朱门酒肉臭"的同时，又造成"途有饿死殍"。

至于苏联领导集团用虚构的所谓在核武器面前人类共同活命和全部毁灭的矛盾，去掩盖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更加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谬绝伦。

唯物辩证法历来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而并不是新式武器。尽管新式武器往往具有空前未有的杀伤力，但是，人民群众却终究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它。所谓核武器会使整个人类都归于毁灭云云，不过是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为了威吓人民群众而散布的核恐怖、进行的核讹诈；掌握了核武器的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它们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是抵抗不得的，如要抵抗，那就是把人类推向世界热核战争，共同毁灭。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核武器面前，人类共同活命与全部毁灭的矛盾，而是在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面前，革命的人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去对待它们的霸权主义，是抵抗还是投降的问题。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原以为只要手中挥舞核武器，再虚构一个人与武器的矛盾，就可以逼使革命人民对它们的霸权主义政策屈膝投降，放弃斗争，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同这些蠢人的痴心梦想相反，他们用核讹诈、核威胁去推行他们的霸权主义政策，只是把他们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激励人民觉悟起来，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革命的人民只要不怕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坚持正义的斗争，就可以挫败它们的霸权主义政策，取得斗争的胜利。而要是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核武器去屠杀人民，那么，可以肯定，其结果只能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连同他们的罪恶的旧制度被彻底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

二是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所谓矛盾的同一性，指的是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又在一定条

件下互相转化。反之，形而上学却总是撇开了矛盾对立去看同一性，从而把同一性歪曲成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之类的东西，歪曲成矛盾双方的没有矛盾、没有对立的等同。

那么，在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共同利益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就这个范围而言，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是谈不到什么相同的东西的。

然而，当着在某一个矛盾中作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而存在的东西，在另一个矛盾中，又作为矛盾对立的一方而联合起来，同矛盾的另一方相对立时，在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程度和内容的共同利益。尽管这种不同程度和内容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影响着矛盾的性质和解决办法，却并不勾销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对立，并不等于就是矛盾的同一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

"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①。

在同阶级敌人、民族敌人进行斗争的人民中间，是有着对敌斗争的共同利益的，但他们之间又经常存在着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矛盾是在人民对敌斗争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它的解决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必须采取诸如团结——批评——团结那样的正确方针和方法，但是，在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之间，却是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的，更不能把它们双方的矛盾同一性归结为"共同利益"。

至于产生在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的基础上的敌我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页。

那就根本不存在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问题。

所以，缪勒责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是力量对力量的一种冲突，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考茨基所谓"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云云，都是一些从调和阶级矛盾的观点出发的形而上学言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正是针对着诸如此类的梦呓，马克思强调指出：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①。

考茨基所谓"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云云，不正是对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所作的蓄意歪曲吗？

需要指出的是，胡克所谓总是能够找出一种使人们求同存异的旨趣，使不同的意见的人得出共同结论的说法，也是一种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

这是因为，所谓求同存异是人们用来调节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对敌的一项方针。所谓求同，是指的寻找在反对共同敌人这个首要问题上双方的共同利益；所谓存异，是指的不应由于彼此之间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不必要的争吵，而影响共同的对敌斗争。因此，所谓求同存异，无非是指的应当使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而不要把两者等量齐观，相互混淆，更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因此，它根本不适用于敌我矛盾。在敌我矛盾中，矛盾双方利害根本冲突，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范围内，是无"同"可求，无"异"能存的。

同样地，白劳德所谓在反希特勒联盟中，要超出社会主义和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1页。

本主义的划分，不是从自己的愿望去求共同纲领，而是使自己适合他方的观点云云，也显然是一种调和阶级矛盾的形而上学谬论，因为它把这个联盟中不同社会制度各国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立场而参加的反对希特勒的共同斗争，看成是没有矛盾的完全等同了。而事实则刚好相反，参加这个联盟的不同社会制度各国，不仅有共同反对希特勒的一面，还有彼此差异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它们不能不在同的方面进行联合的同时，又在异的方面进行斗争。又由于不同社会制度各国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动机、立场、出发点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即使是共同反对希特勒的那个“同”，也并不是完全等同，而是在一致中又包含有不一致的，所以，即使在这个方面，也不能不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白劳德调和阶级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显然是同客观事实不符合的。

三是关于同一性的相对性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相反的东西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依存而又能相互转化，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却贯串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它无所不在，所以说它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却竭力把相对的同一性绝对化，又把绝对的斗争性相对化，以此来调和矛盾。

缪勒、特别是马尔克说，对立双方彼此需要，以便成为它们之所是，所以必然一起存在，而根本不可能排斥其中的一方，只能把双方都维持下来加以调和，对双方都加以肯定和综合等等，这是一种把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加以绝对化的典型谬论。

让我们且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例来考察这种观点。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确实是相互依存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

就没有资产阶级。

但是，这矛盾双方却并不是无条件地、全面地、永远地"彼此需要"的，而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在一个方面相互依存的：

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丧失生产资料才需要出卖劳动力，而同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相互依存。反之，在无产阶级自己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却并不如此；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也只是在必须出卖劳动力这一个方面，才同必须雇佣劳动力的资产阶级相互依存，而在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进而求得彻底解放等方面，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革命斗争；

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这种以买卖劳动力为其具体形式的相互依存，其本身就是造成这两个阶级间剥削和被剥削矛盾的根源，资产阶级依靠其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以维持这种相互依存，更进一步激化了这一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就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破这种形式的相互依存。也正因为这样，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对矛盾的对立双方，都维持下来加以调和，都加以肯定和综合，使它们永远一起存在下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缪勒、马尔克上述把这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加以绝对化的种种说法，只不过表现出资产阶级辩护士一厢情愿的痴心梦想罢了。

那么，能不能象马尔克所说的那样，使矛盾从对峙发展为纯粹的关系，从而使斗争为和睦所代替？

不能。因为"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①。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在任何矛盾中，都只有靠着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才得以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的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以及由于这种斗争所引起的它们的相互转化，而没有也不可能有它们之间没有斗争的和睦与和谐。

对于任何矛盾，都只能加以解决，而不能予以调和，因为矛盾双方总是体现着彼此对立的倾向，而这些对立倾向又处在统一之中，因此，它们就必定要相互排斥、相互斗争，而决不可能相互融合、混一。

那么，能不能象卡里什所说的那样，通过把对抗性矛盾说成是不须用革命来解决的、可以忍受的条件，通过鼓吹爱、正义、仇恨的排除、意识的进化和变化，来防止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立两极的"紧张关系"，以便在"现存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在保留它的体现者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同样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①，因此，用改变名称那样的掩耳盗铃的把戏，是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时，正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植根于社会生活条件之中的，因而，不去根本改变这种社会生活条件，而去鼓吹什么"爱、正义、仇恨的排除"、"意识的进化和变化"，那就同样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卡里什的这一套说教并没有也不可能使资产阶级演变到放弃剥削和压迫，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指望无产阶级听信这一套，俯首甘受奴役而抛弃革命斗争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论资产阶级的牧师、神父们怎样祈祷，在存在有剥削阶级的地方，阶级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级对抗的紧张状态总是无法防止的。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又只能是原来的统一的破裂，而不能是它的保留。事情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①。

矛盾的解决，是不是象马尔克、卡里什、胡克所说的那样，是在"保留"对立关系的"体现者"的情况之下，矛盾双方的"综合"，以表现出事物发展的"自然的连续性"呢？

不是。因为通过矛盾的解决来实现的事物的发展，总是由统一体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导致的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旧的统一的破裂，进而导致新生力量在斗争中彻底消灭腐朽力量，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一个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的过程，而不是使旧事物永世长存的、矛盾双方的折衷主义的"综合"。

不错，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新事物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也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矛盾的解决，事物的发展，却又总是通过新生力量在斗争中彻底消灭腐朽力量的方式来完成和实现的，此其一。其次，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有标志着连续性的渐变，突变和飞跃必须由渐变中引出，但是，从事物的发展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却是标志着连续性的中断的突变和飞跃。

列宁说过：

"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情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而"飞跃"，也"即渐进过程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73页。

中断"①。

上述一切，清楚地说明了，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总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清楚地说明了，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是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的，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新生力量总是要战胜腐朽力量的。所以，缪勒所谓"辩证法是而且表现着一切对立面的统一"，"一切哲学都想出对立面的一种和谐、一种统一、一种调和"的说法，只是说明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谓对立面的统一，是抹煞斗争、调和对立，使旧事物永世长存的别名，从而他们所标榜的"辩证法"，就不能不是彻头彻尾的假辩证法，不能不是为资产阶级调和矛盾提供理论根据的地地道道的辩护学。

然而，用形而上学的绝对同一论编织出来的矛盾调和论，还只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假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假辩证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用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观点捏造出来的所谓矛盾不可解决论。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就有一些新康德主义者用康德的二律背反去偷换矛盾辩证法，而炮制什么"悲剧辩证法"、"矛盾不可解决论"。例如，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分子李毕特就鼓吹说，辩证法，这是最大限度地展开矛盾的方式方法，而且也是承认原则上的不可解决性为根据的方法；现代辩证法其本身就带有悲剧性的两极化的烙印，因此，为克服矛盾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无谓之举，因为这种悲剧式的两极化是存在本身的特点(《辩证法的精神和世界》192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鼓吹矛盾不可解决的"悲剧辩证法"，又在一些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者那里重新流行起来。例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348页。

如，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里特说，黑格尔认为，人类的辩证发展的基础，是对抗性的冲突，为死亡而斗争、战争等等，这一切都是“和存在不可分开的紧张化”的表现，这种紧张化是存在的本质，是根本不可消灭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在或远或近的未来消除这种“紧张化”，这就是想要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矛盾，这就是鼓吹“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955)。

还有一些实用主义者也鼓吹矛盾不可解决论的观点。如胡克在鼓吹矛盾调和论的同时，又说什么：“从抽象的方面来说，一切对立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是什么阻挠我们承认某些对立也许是不可调和的呢？的确，除了不能被证实的教条武断地说事物的图式中必须有潜在的和谐之外，凭什么说一切困难都必须有单一而确定的解决办法呢?”(《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这些观点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宣扬对立的矛盾不可解决论和鼓吹同一的矛盾调和论，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但在实际上，它们却服务于同一个社会政治目的：矛盾调和论通过歪曲地强调同一、否定斗争，以此来鼓吹资本主义社会永世长存和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矛盾不可解决论则通过歪曲地强调对立、否定转化，以此来完成垄断资产阶级相同的社会定货。

而从理论上说来，矛盾不可解决论也和矛盾调和论一样，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因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不仅是又统一又斗争的，而且由于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导致到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产生。“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①。资产阶级哲学家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06页。

谓对抗性的冲突是永恒的、不可解决的、是和存在的本质分不开的论调，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为什么说，一切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解决的呢？其原因在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内部都有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开始时新的是非主要的，旧的是主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它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但是，随着它们之间相互斗争的发展，它们的力量却不断发生着增减的变化，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消灭的东西；而一旦新的方面取得对于旧的方面的支配地位的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就互易其位置，旧事物的性质就转化为新事物的性质。所以，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正如世上没有不变的事物那样，也没有什么矛盾是不可克服、不可解决的；它们都必然在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中得到克服和解决。宣扬矛盾不可解决，就是鼓吹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是凝固不变的，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转化的。

所以，带有不可克服、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的烙印的，并不是辩证法，而是辩证法其名、形而上学其实的假辩证法。

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在宣扬矛盾调和论的同时，又宣扬矛盾不可解决论的"悲剧辩证法"，是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就把它箝制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许可的范围内，以延续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事与愿违，阶级斗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无法箝制的，它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确立。

十、剖析"矛盾的多元的决定"

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号的法国《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亚尔都

塞的《矛盾和多元的决定》一文。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亚尔都塞的思想产品中，这个"矛盾的多元决定"论，被认为是最有影响、最有独创性的。

在《矛盾和多元的决定》一文中，亚尔都塞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那里，借用了"多元决定"这个名词(此词原指由于许多原因同时起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神经病)，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也是多元决定的，而不是象黑格尔的矛盾观那样是单纯的。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论文集《读〈资本论〉》(和其它人合著)和论丛《保卫马克思》等书中，亚尔都塞又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是多元决定的论述。

亚尔都塞所鼓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是多元决定论，归纳起来，有六个要点：

第一，亚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不同性，表现在如对立的统一、矛盾等等基本结构上，表现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单纯性和马克思的矛盾的多元决定上面。而这种不同的矛盾观又是同两种不同的历史观相联系的：黑格尔的矛盾的单纯性，同黑格尔的关于每一个社会中的内在原理的辩证法，即"观念"的各个环节的辩证法的历史观相一致，而马克思的矛盾的多元决定论则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上面(见《矛盾和多元的决定》)。

第二，亚尔都塞说，包括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革命经验证明，成功的革命永远也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经济矛盾的简单结果。相反，这个矛盾总是被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些社会形态和具体历史情况所特殊化的，被上层建筑的种种形态、国内外历史情况所特殊化的。所以，在同一个运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总是既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被决定的，被它所促成的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所决定的。这就说明，任何矛盾，在历史实践中，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来

说，都是表现为多元决定的矛盾的。矛盾，在它的原则上，就是被多元决定的东西（见《矛盾和多元的决定》、《读〈资本论〉》）。

第三，亚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在经济和政治之间，作为本质同现象那样的同一性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那些层次之间的关系的新观点。马克思向我们指出了一条链索中的两端：一端是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端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特殊作用力。这就是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决定的和被决定的，每一方都有助于决定它是其组成部分的那个全局的构造的本质，又转而被这个构造所决定。他认为，在真实的历史中，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是在经济、政治、理论等等之间的主要作用的相互调换中行使的。这是不是用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去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亚尔都塞说不是，因为所说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它的特殊作用力并不消除经济的归根到底决定作用，而所谓经济的归根到底决定作用，则意味着经济决定自己在特定的时间内，在一个社会构造中是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并在它自己是非决定的场合下，决定上层建筑中哪个要素成为决定的，所谓矛盾的多元决定的性质，就是以上层建筑的存在和它的本性为基础的（见《矛盾和多元的决定》、《保卫马克思》）。

第四，亚尔都塞说，整体的每一个相对自主的平面，都有其相对自主的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韵律和连续性。这样，我们就有经济结构的历史，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等等，在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可还原的。这就意味着不存在被用来衡量一切历史的唯一的线状时间连续性，意味着一个横断历史过程的断面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原始的无所不在的本质，而是那个复杂的构造的特殊的多元决定的局面，从而意味着本质的断面是不可能的（见《读〈资本论〉》）。

第五，接着，亚尔都塞又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那里，借用

了"结构因果性"这个名词，指出由上述论证，产生出一种同线状因果性、表现因果性不同的结构因果性。亚尔都塞所说线状因果性，是指一种能描写一因素对另一因素的作用，但却不能描写整体对于部分的作用的因果性，它根源于笛卡儿，被考茨基和布哈林所推崇；亚尔都塞所说表现因果性，是指一种能够描写整体决定部分，但却有把整体描写为本质，把部分还原为整体的现象，也即有把整体简单化的危险的因果性，这种因果性由莱布尼茨首先表述，黑格尔加以发展，尔后又为受黑格尔影响的"左"派共产党人所采用；而亚尔都塞所谓结构因果性，则是指整体对于部分的、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哪个要素在社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那样的因果性，它内在而不是外在于诸要素的作用之中，但它只存在于这些要素作用的关系整体之中，而不是出现在它们中间任何一个之中。亚尔都塞说，马克思在其晚年著作中，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使用过这种因果性(关于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一段论述)，但却不能用一种恰当的语言从概念上来表述它(见《读〈资本论〉》)。

第六，亚尔都塞认为，关于上层建筑以及其它因素的特殊作用力的理论，其大部分还有待于开始去创立，还需要有一种关于上层建筑的特殊的诸要素所固有本质的理论，这在目前还处于大探险以前的非洲地图的状态，他认为，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还只有葛兰西一个人继续进行过这种勘探工作(见《矛盾和多元的决定》)。

建立在马克思历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矛盾观，是不是真象亚尔都塞所描写的这种"多元决定"的东西？亚尔都塞就矛盾的多元决定论所展开的上述各点，究竟有多少是属于马克思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来逐项进行考察。

(一)从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倒退

关于表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在1859年1月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作过经典的表述：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是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及表现这种历史观的马克思的矛盾观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线索。那么，马克思的论述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它首先说明：由于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这才有可能在社会现象中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并找到可靠的根据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才有可能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人们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所由以发展起来和必须从中求得解释的基础，从而摧毁了主张从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反之，亚尔都塞却走着一条与此完全相反的道路。什么经济同政治之间没有本质与现象那样的同一性，它们各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发展韵律和连续性，什么马克思的社会观的中心是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不存在能用来衡量一切历史的唯一的线状时间连续性，什么横断社会结构的本质断面的不可能性，亚尔都塞的这些言论，不明明是在否定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原理吗？不明明是在否定马克思关于“人们借以意识到”和“克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的原理吗？根据亚尔都塞鼓吹的那一套，哪里还有什么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问题呢？所以，事情很清楚，亚尔都塞所谓矛盾的多元决定论是同马克思的历史观、矛盾观毫不相干的，是同它背道而驰的。如果说马克思用他的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而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话，那么，亚尔都塞打着马克思的旗号，鼓吹什么多元

决定论，则意味着一种偷运唯心主义、从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倒退的企图，起码是倒退到流行于十八世纪的所谓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相互决定论。

其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上述那段论述还说明，虽然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矛盾，但马克思却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它上面，而总是把它同上层建筑联结起来进行考察的。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总是一方面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另方面又作为现实基础而“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而且在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使现存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其桎梏，而要求社会革命的时候，“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概括和发展了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思想，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①。《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②。

---

①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3 页。

② 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所以，被亚尔都塞作为矛盾的多元决定论的论据而抛出来的所谓成功的革命永远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矛盾的简单结果云云，在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无的放矢之谈。因为在从马克思直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从来都不是把社会革命看作单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运动的产物的。

然而，亚尔都塞之所以要抛出这个无的放矢之谈，却是为了要从中引申出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总是被上层建筑的种种形态所特殊化，从而在原则上矛盾总是被多元决定的这样一个结论。

应当指出，亚尔都塞从无的放矢之谈中引申出的这个结论，是一种胡扯。这是因为，不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人们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不同的具体情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范畴，在实际生活中，它们总是以各不相同的具体形态存在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之中。所以，压根儿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上层建筑的种种形态所特殊化”的问题，而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中，无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罢，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罢，都有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联结的问题。亚尔都塞不是指出要具体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的问题，而是去创造一个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总是被上层建筑的种种形态所特殊化的新提法，这岂不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总是千篇一律一个模样的，只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的，反之，上层建筑却总是各各特殊，而没有什么共性、普遍性的，亚尔都塞所创造的这个“新提法”显然是荒谬绝伦的，是只能把本来非常清楚的事情搅得乌七八糟，

而无助于说明任何问题的。

然而，亚尔都塞之所以要创造这么一个荒谬的“新提法”，却又并不仅仅是他思想错乱的结果，而是有他明确而清楚的意图的，这就是企图用“上层建筑的种种形态”的作用，去引申出所谓矛盾在同一个运动中总是既起决定作用又被决定的多元决定论，以否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联结着）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从而达到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唯心主义折衷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的目的，达到从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倒退的目的。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曾经说过：

“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①。

列宁对《资本论》的这个评述，也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说明：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说明一个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的，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说明它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这是《资本论》的骨骼，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骨骼，但马克思又并不以此为限，而是“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在说明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的问题上，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骨骼与血肉的关系。

反之，亚尔都塞却借口经济同政治没有本质与现象那样的同一性，而把它们的关系描绘成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韵律和连续性的平面之间既决定又被决定的关系，这不是在把骨骼与血肉等量齐观，由唯物主义历史观向着唯心主义历史观倒退过去，又是什么呢？

（二）羞答答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亚尔都塞所谓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具有其特殊效力的矛盾的多元决定论，说穿了，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罢了，但由于亚尔都塞硬要用一块薄薄的遮羞布把他的理论的真意掩盖起来，这就使它成了一种羞答答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在晚年时，不是也再三强调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在许多情况下也起决定作用吗？为什么亚尔都塞强调了上层建筑的特殊效力，就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呢？

原因在于亚尔都塞所鼓吹的多元决定论，同恩格斯的论述，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

“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1—432页。

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①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

“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平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②

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指出：

“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461页。

② 同上书，第487、491页。

红线”。①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指出：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②

恩格斯的这一长列系统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他是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上，而不是什么多元论的立场上来论述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

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并不是两个互不依赖、意义相等的要素，而是经济是“原始的起因”，思想等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原因所“造成”的，并以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的要素；虽然上层建筑一经造成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就有自己的运动，但它终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

正因为这样，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不是不分主次轻重的相互决定。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是“第二性”的；这是两种“不相等”、“不平衡”的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其中，经济力量“更有力得多”，“最有决定性”；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往往主要是决定历史斗争的“形式”，而经济则归根到底作为“必然性”而向前发展，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总之，恩格斯对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9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论述，始终坚持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根源性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依存性，始终坚持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础，它使一定的上层建筑得以发生出来，并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虽然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发生极其巨大的反作用。

反之，亚尔都塞却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说成是不分原始和派生，不分主次的两者既都决定又都被决定的作用，这岂不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截然相反的吗？

不错，亚尔都塞也说到过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说到过上层建筑的特殊作用并不消除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是，既然他竭力鼓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既然他大肆宣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韵律和连续性，既然他完全否认有显示社会形态的原始本质的断面的可能性，完全否认有能够用来衡量一切历史的线状时间连续性，那么，亚尔都塞所谓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是相对的，岂非成了掩人耳目的一句空话？岂非成了掩盖其上层建筑决定论真面目的一块遮羞布？

（三）徒有虚名“归根到底”决定

然而，亚尔都塞的上层建筑决定论不仅表现在他把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说成是万事自备的绝对自主性，而且还表现在他把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变成名存实亡、徒有虚名的东西。

什么是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前引恩格斯的论述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它意味着“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

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所以，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无往而不在的。

但是，在亚尔都塞那里，关于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只有一点还是实在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哪个要素在社会构造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中，确实包含有这样一种决定形式。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中，就曾经说过：

“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①

然而，却不能把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仅仅归结为这一点，因为它并不限于这一点，主要地不是表现为这一点，而且即使在这一场合，它也并不是象亚尔都塞所解释的那样，似乎经济基础除了决定上层建筑中那个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构造中占有统治地位之外，便没有什么作用了，是什么“通过其不在而表现出来的”“不在的原因”。

事实并非如此。在上面所引《资本论》第一卷那个注中，马克思紧接着又强调指出：“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②，因为“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归根到底是”“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③。事情很清楚，即使在这个被亚尔都塞奉为重要论据而极力宣传的古罗马共和国内，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也远不仅仅表现在决定上层建筑中政治斗争起主要作用上面，而且，更重要的，还表现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7页。

在决定着古罗马政治斗争的目标和内容上面。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到处显示其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说成是什么“通过其不在而表现出来的”“不在的原因”呢?!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①。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说明，一定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一定的主权和依附的关系，独特的国家形式，对于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一定经济形式来说，一是直接从其中产生的，二是建立在它上面的，三是要在当中去找其最深的秘密隐蔽的基础。这些，才是经济基础对于政治结构法律制度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主要表现。

不仅对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来说是如此，对于意识形态来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经济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最终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它“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0页。

亚尔都塞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把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讲得这样明白透彻的地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在歪曲《资本论》的一个注上狠下功夫，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主要方面、在社会生活中无往而不在的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说成是什么“通过其不在而表现出来的”“不在的原因”，这不是对唯物史观的明目张胆的篡改，又是什么？

（四）离奇的神话

然而，更加离奇的还在于，亚尔都塞还说什么关于上层建筑的固有本质和特殊作用力的理论，还有待于开始创立，目前还处于大探险以前的非洲地图状态，而且在马、列之后只有葛兰西作过勘探云云。

亚尔都塞编造的这则离奇的神话，完全是胡言乱语。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阐述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这不是“关于上层建筑的固有本质和特殊作用力的理论”又是什么？撇开了这个前提，要去搞什么“大探险”，去“开始创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是唯心史观，而唯心史观又早已被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所创立，只要“拿来”即可，哪用什么“探险”呢！？

至于说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只有葛兰西一人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理论作过勘探，同样荒诞不经。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葛兰西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作全面的评价，但是需要指出，葛兰西借用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概念，而提出的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集团”理论，虽然强调了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但由于他经常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物质生产力和人的意志的关系，同自然和精神的关系等量齐观，并只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去说明人的实践的意义，因而有许多离开马克思

主义的地方。

例如，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写道：

"结构〔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集团'"（《结构和上层建筑》）；

"'历史集团'这个概念，即自然和精神（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统一"（《作为自然科学的政治学》）。

显然，葛兰西的这种把经济基础看作是自然、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精神的"历史集团"理论，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阐述过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社会的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归根到底决定着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葛兰西在其"历史集团"理论中，却把这么一个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和发展规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自然与精神的关系问题。

试问，有什么根据，把葛兰西这样的"勘探"，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再联系到在葛兰西的"实践的一元论"中，自然、物质实际上是被还原为在实践中同人的实际活动合为一体的，归根到底是要依赖于人的实践的：

所谓"不可以把物质作为它本身来考察，而必须作为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的东西来考察"（《物质》）；

所谓"在科学中向人类的外部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悖论。没有人，宇宙的实在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外界的现实"》）；

…………

联系葛兰西的这些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其"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历史集团"理论，这种理论的背离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不是就暴露无遗了吗?!

把这么一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理论，说成是什么对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固有本质和特殊作用力的理论的“勘探”和“大探险”，这不是在编造离奇的神话，又是什么呢?

（五）要害在于用结构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亚尔都塞所谓马克思使用过、但却不能用恰当的语言从概念上加以表述的，整体决定着组成部分中哪个因素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因果性”。

亚尔都塞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在一切社会中都有一种生产支配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的论述，当作马克思使用过“结构因果性”的证据，那么，马克思在那里究竟是怎样说的呢?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接着马克思就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为例，指出:当农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时，那么那里的工业及其所有制形式、甚至连资本也带有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反之，当资本居于支配地位时，农业就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受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因为“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①。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到底是什么因果性？是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因果性，还是亚尔都塞所谓整体决定各组成部分中哪个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因果性”？尽管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诸如“结构”、“相互关系”这样的字眼，但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却显然是主要矛盾规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因果性，而不是亚尔都塞所谓“结构的因果性”，因为马克思在这里从原则到具体地反复加以论证的是：一种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及其关系，在支配和影响着其他各种居于非支配地位的生产和关系，而并不是一个社会决定其中的哪种生产居于支配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谈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曾经指出：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②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不是同马克思在《〈政治济经学批判〉导言》中所作上述分析一脉相承的吗？马克思在那里所使用的，不正是主要矛盾规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因果性吗？

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仅没有使用亚尔都塞所谓整体决定各组成部分中哪个因素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因果性，而且还明确指出，从诸如人口这样的整体出发，是一种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7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95、298页。

误的方法，因为“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①

以后，列宁又进一步指出这种被马克思批评过的、从整体的抽象出发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尾开始。当你还没有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预先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②

马克思、列宁对于从整体出发的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的批判，进一步揭穿了亚尔都塞所谓马克思使用过整体决定各组成部分中哪个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因果性”的谎言。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对于马克思在有关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明确的论述，亚尔都塞为什么全都置若罔闻？反之，对于马克思所没有说过的东西，甚至马克思所竭力反对的东西，亚尔都塞却偏要通过什么“依据症候的阅读法”，把它们强加于马克思？亚尔都塞明明是在说些同马克思毫不相干乃至截然相反的东西，为什么他还要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把它们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

要害就在于亚尔都塞要挂着马克思的招牌，偷运结构主义，用结构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75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23—124 页。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深化,在西方广泛泛滥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发轫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封闭自足的"系统论"。在二十世纪初,在索绪尔死后,根据其学生听课笔记集合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同十九世纪的"历时态"语言学相对立,提出了一种所谓"同时态"的语言学。"历时态"语言学着重研究各主要语种的某些语言现象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而"同时态"语言学则主张作统一的语言体系的研究,即着重研究同一时间内各语言现象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因为它认为各种语言现象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并存、相互制约、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符号系统。总之,索绪尔不是历时地从语言符号在时间上的变化去研究它们,而是同步地从它们的静的相互关系和排列(互换)中去研究它们,他展开了同步分析的主要特征。字同相应的心理映象是相对立的,以前的语言学理论涉及后者,把语言设想成思想的表现。索绪尔则关心能在形式上加以分析的字,而字是只有在总的体系内才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没有"热"这个字,"冷"这个字就是无意义的,因此,语言首先是一个体系或结构,在其中,组成分子是次于总体的,意义并不在表述者的思想中,而是在符号本身体系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945年发表的《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的论文中,特别是在1962年出版的《野蛮人的思想》一书中,把索绪尔的同时态语言学方法应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提出固定不变的"原型论",这就是企图根据一些神话、传说和其它史前资料,通过对原始人和半开化人思想过程的研究,去发现人类心智的结构原型,发现当前民族、文学、政治、法律等等的基础结构。从此以后,结构主义思潮又向西德、意大利、英国、美国、丹麦、苏联、捷克、波兰等国学术界扩

散出去，并波及数学、物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等许多学科。

虽然亚尔都塞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是，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却正是结构主义有色眼镜下的"马克思主义"；被他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上面的所谓矛盾的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性，正是他根据于结构主义所谓总体对于其各组成部分的优越性，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又有相对的自主性；所谓一个结构内的矛盾，不能被只放在一个平面（如经济），而是由为结构的每一个其它平面所专有的矛盾所混合而成等等原理炮制而成的。

结构主义思潮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由一连串彼此相关的事件所组成的一个封闭的体系，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从事物存在的那天起就"命定"了的。它决定着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不受历史、社会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它容许有排列组合的变化而不容许根本改变结构的质变，它主张从事物的横断面去找一些一成不变的"模式"，而反对从历史的发展上去研究任何现象。显然，这种结构主义思潮，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根本对立的。亚尔都塞企图把结构主义强加在马克思头上，不能不意味着偷运结构主义，意味着用结构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于亚尔都塞的这种企图，就连赞同他的一些资产阶级教授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例如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比亚齐在1968年出版的《结构主义》一书中，就曾把亚尔都塞的全部努力表述为"用现代结构主义的名词去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

第 五 章

关于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攻击和伪造，最后把矛头集中指向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

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流派，把唯物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冒充为普遍性的东西，把它硬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竭力鼓吹不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去消灭阶级对抗和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诬蔑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调和矛盾，停止辩证过程。

而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则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特殊性的幌子之下，全面否定和篡改唯物辩证法、首先是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打着“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的招牌，全盘复活资产阶级的矛盾调和论、矛盾融合论等形而上学货色。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歪曲、攻击和伪造的手法有所不同，乍看起来还似乎相反，但是，不仅他们的目的，他们据以攻击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阵地是相同的，即通过宣扬形而上学而去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在他们相互之间还竭尽其配合和呼应之能事：苏联的一些哲学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破烂捡过来，伪造成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辩证法”，资产阶级哲学家则把这一堆恰恰正是他们自己的形而上

学思维的产物的东西，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账上，胡攻乱批。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在歪曲、攻击和伪造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时所施展的这一套伎俩，向我们提出了全盘推倒资产阶级的诬蔑和彻底揭露苏联的一些哲学家炮制的假辩证法的任务。

一、驳阶级对抗永恒论

资产阶级在指责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调和矛盾、停止辩证过程时，所提出的主要“证据”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一段论述。

例如，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费萨说：

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作为黑格尔的哲学终点的‘时间的取消’采为己用，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是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抗争底真正的解决，是历史之谜底解决并知道自己是这种解决。这一次是真正的时代的结束、一切时代的结束了，是一种真正的末世论了”；

“把《现象学》的‘时间的取消’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时代的终结’，转化为一个现实的末世论，越是因马克思想象末世论理应在时间之内出现，这个末世论越是现实”（《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载西德《黑格尔年鉴》第一卷上册，1961）。

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说，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为它所承认的基本过程，辩证过程，应当是一个无尽止的运动；另一方面，革命的运动却以一个标志‘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争论’的终结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人对命运的最后胜利为目标和极限，……它以历史里面的上帝的王国为极限”（《完整的人道

主义》1936)。

英国的新实证主义者罗素说：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过程是力图走向'绝对'的精神的逐渐自我实现。马克思用生产方式代替了精神，用无阶级的社会代替了绝对"；

"辩证的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阶级斗争，这个冲突继续进行着，直到无阶级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一旦到达无阶级社会，将没有可发生冲突的东西留下来，辩证的过程就可以停止。对黑格尔来说，地球上的王国是普鲁士国家，而对马克思来说，地球上的王国是无阶级社会"(《西方的智慧》1959)。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加缪斯说：

"向一个矛盾得到调和的未来艰苦地前进，却毕竟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想象着在生产的最高阶段有一个变化发生，使调和的社会得以实现"(《反叛的人》1956)。

法国的巴黎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教授顾尔维奇说：

"马克思的上升辩证法，……趋向于实现地上乐园的梦想。在那里，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一切困难和紧张将一劳永逸地被消除"；

"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是一种卫道的辩证法"，它"为地上的完满和谐卫道，它为历史的终结卫道。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辩证法由于最终目的论而告终，在最后目的论里，人类得救的预告和历史终结汇合在一起了"(《辩证法与社会学》1962)。

另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朗格则说：

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导到时代协调一致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1955)。

那么，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共产主

义，马克思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题为《私有制和共产主义》一稿中，马克思说过：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性的人的自己本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底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生存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①。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究竟是什么意思？共产主义所“真正解决”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什么样的“抗争”？它所“解答”的，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之谜”呢？

大家知道，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题为《异化劳动》的一稿中，马克思曾经全面揭露过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后果：

一是使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分离开来，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同劳动者相敌对。于是，劳动者不仅被剥夺了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得越多就变得越贫穷：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神奇的产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者创造了宫殿，但也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者创造了美，但也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也注定了劳动者底愚钝、痴呆”②。

二是强使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也成为同劳动者相敌对的异己活动，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是自由地从事真正创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2—83 页。

② 同上书，第 54 页。

造性的劳动，而是被迫从事在身心两个方面摧残自己的活动。

"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己是自己，而在劳动过程中则觉得自己是与自己隔绝了的。他在不劳动时觉得有自己存在，而在他劳动时，就失去了自己"，"所以，劳动并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之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①。

三是决定了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不是人占有自然界，并按照人的方式来改造它，而是自然界转化为越来越同人对立的异化的世界。

"要是人越是用他的劳动征服自然，越是用工业的奇迹使上帝的奇迹成为多余的，而人却又因为这些力量的缘故，而越来越抛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于产品的享用，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啊！"②。

四是使人的生活活动服从于最起码的需要的满足，把人的活动贬低为维持个人的动物生存的手段，把人变成孤立的私人，变成社会的人的对立物。

"有意识的生活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活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成为一个类的存在"，而"异化劳动却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成为：正因为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就使他的生活活动、他的本质的存在变成仅仅是他的生存的一种手段"，就是说，"异化劳动把人类的生活，变成他的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③。

五是使人们彼此之间分离开来，格格不入地彼此敌对地对立着。

"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活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的异化"；

---

①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5 页。

② 同上书，第 61 页。

③ 同上书，第 58、59 页。

“正象他把自己本身的生产活动变成他自己从现实中的排除，变成对他自己的惩罚，而他自己的产品被他丧失，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产生出不从事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在他把自己本身的活动从自身异化出去的时候，他也就使不属于另一个人的活动为另一个人所占有”；

“劳动者通过异化、外在化的劳动产生着一个和劳动无缘、并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种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产生着资本家或人们称之为雇主的那种人同劳动者的关系”①。

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上述论述，同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后果的这些论述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

当马克思谈到作为对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及作为向社会的人的自身的复归的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时，所说的“矛盾”显然是指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而引起的那种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越是用他的劳动征服自然，人却因此而越是抛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于产品的享用这种矛盾，以及劳动者同那个和劳动无缘并站在劳动之外却还要支配生产和生产品的资本家、雇主之间的矛盾，而并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

当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是生存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时，所说的“抗争”显然是指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所引起的那种抗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作为某种异己的东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62页。

西同劳动者相分离和敌对，劳动成为同劳动者相敌对的异己活动，从而人的自我对象化并不是人作为主体的真正的自我确立的矛盾和抗争，以及由于资本主义使人的类的生活、本质的存在，变成为维持人类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生存和本质、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和抗争，而并不是也决不可能是指人类社会内的一切抗争；

据此，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时，所说的“历史”，也显然是指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覆灭为标志而告终的人类社会的前期历史，而并不是也决不可能是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全部人类发展历史。

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表述得很清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只是人类今后向前发展的基础，而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过了十五年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同一个思想。

在那里，在谈到资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而在其中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时，马克思明确指出：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进一步证明了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时，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而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共产主义“真正解决”了“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和“抗争”时，所指的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那些“矛盾”和“抗争”，而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和抗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所以，费萨所谓“现实的末世论”，马里旦所谓“革命运动以历史里面的上帝王国为极限”，罗素所谓“辩证过程在无阶级社会可以停止”，加缪斯所谓“向矛盾得到调和的未来前进”，使“调和的社会得以实现”，顾尔维奇所谓“为地上的完满和谐卫道，为历史的终结卫道”，朗格所谓“引导到时代协调一致的终结”，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说法，统统是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所作毫无根据的歪曲。

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费萨不得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史前时期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覆灭而告终的论述，同他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现实末世论”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但他却把这归咎于马克思，并据此而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攻击。

费萨写道：

马克思的“这两段话肯定可以证明，在‘历史的终结’或‘史前期的终结’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是含糊不清的，正如黑格尔对于‘时间的取消’的思想那样”，“这点含糊性使我们怀疑，马克思和黑格尔不分上下，他也未充分地意识到他想用以理解历史的那个辩证方法”(《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1961)。

上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原文的引证和分析，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毫无“含糊不清”之处，清楚地说明了费萨在这里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从而把资产阶级肆意歪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反说成马克思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辩证法。

那么，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指引着资产阶级哲学家坚持不顾马克思原文的上下左右的脉络关系，坚持不顾马克思的原意，去歪曲马克思的辩证法呢？

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形而上学偏见，他们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当作人类社会的末日，硬把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覆

灭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终结，当作人类历史的终结！

资产阶级在把资本主义的末日当作人类社会的末日的同时，又把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那种阶级对抗凝固化、绝对化、普遍化和永恒化，然后把它套用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据此而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

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说：

"只有异乎寻常地轻信黑格尔的对立的辩证法，才能想到由一个阶级使用强力就会突然转变为一个民主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强力引起相反的强力；牛顿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在物理学上还是有效的，而暴力正是物质的力量"(《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载拉脱纳编《世界的智慧　杜威的哲学》1939)。

首先，把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说成是异乎寻常地轻信黑格尔对立辩证法的结果，这只是暴露了杜威这位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无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是因为众所周知，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的辩证法并没有斗争出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而倒是调和出了一个普鲁士王国来。

其次，杜威把牛顿的作用和反作用规律搬到社会领域中来，显然是想使社会发展在作用与反作用的无限循环中象走马灯那样老是踏步不前。

但是，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却反复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的反抗，尽管可以在一时一地给革命阶级的统治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甚至在历史上造成一些曲折，但它毕竟阻挡不了历史洪流的奔腾前进。历史并不老是在强力与相反的强力中间不断重复的，而总是在革命的强力经过曲折的斗争最终克服和彻底消灭反革命强力中向前发展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在最后必然过渡到没有

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和任何专政相类似，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了政治统治权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还和以往的任何专政根本不同，它要通过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内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①，造成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转变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岂不就成了势所必然，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奥地利新实证主义者坡培尔说：

“从两个阶级中只剩下一个阶级这个事实，得不出结论说将会有一个无阶级社会”，因为“辩证法的原理会提示说，一种新的对立、一种新的阶级对抗必然不久就发展出来”，所以“最可能的发展是，那些在胜利时实际掌权的人——那些在夺权斗争和各种情况之后还活着的革命领导人和他们的参谋——将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新社会的新的统治阶级，一种新的贵族政治或官僚政治”（《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1952）。

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斯也说：

“一种辩证的阶级斗争的牢不可破的原则，是没有理由一下子突然失效的。这个原则要么永远有效，要么从来也不曾有效。马克思虽然说，在革命以后阶级就不会有了”，但却“没有理由说阶级不会让位于另外一种社会对抗，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本质却系于这个肯定的判断”（《反叛的人》1956）。

把马克思关于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的论述，描绘成由两个阶级到一个阶级再到没有阶级，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歪曲。以此为靶子来展开论难攻击，这完全是一种唐·吉诃德同风车搏斗式的战斗！

---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23 页。

早在一八四五年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就描述这一发展的辩证过程说：

“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然在最终过渡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引导到什么新的阶级对抗社会，其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在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的过程中，它自身也趋于消亡。

而在一八四七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象是预见到资产阶级会发出类似于坡培尔那样的责难似的，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消灭一切阶级：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工人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②。

至于为了把阶级对抗永恒化、绝对化而求助于资产阶级哲学家所一向深恶痛绝的“辩证法的原则”、“辩证的阶级斗争的牢不可破的原则”，那更是枉费心机的蠢举，因为这只能暴露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窍不通。

唯物辩证法历来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又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唯物辩证法又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在人类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①，它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条件中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因此，把阶级对抗套用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就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问题就全然不是加缪斯所说的什么“辩证的阶级斗争的牢不可破的原则，要么永远有效，要么从来不曾有效”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能把阶级斗争、阶级对抗和矛盾斗争等同起来，把它乱套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

那么，“那些在革命胜利时掌权的人难道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阶级”，“一种新的贵族政治或官僚政治”，从而产生出“另外一种社会对抗”吗？

应当指出，这并不是坡培尔、加缪斯之类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新发明，而是他们从德热拉斯那里抄袭来的。

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写道：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行国有化，掌握社会财产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权，这样，共产党内必然要形成一个‘新阶级’，国家所有权必然要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这是绝对无可逃避的命运”，“这个新阶级是在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植根于共产党内。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是在那些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

然而，被资产阶级哲学家奉为至宝、竞相抄袭的这个理论，却是极其荒谬的。

德热拉斯的这个理论之所以荒谬，首先是因为它从根本上颠倒了阶级的产生和消灭。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而不是同它的一切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划分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同样，它也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08 页。

灭。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所以，它必将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被消灭。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描绘这个过程说：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但是，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不是为的要造成一个新的阶级，而是为了要以此为手段去根本消灭阶级：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②。

所以，德热拉斯把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将资产阶级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在以无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手里，说成"共产党内必然要形成一个'新阶级'，国家所有权必然要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这是绝对无可逃避的命运"，德热拉斯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把逐步走向消灭阶级的过程，说成是产生和形成新阶级的过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89 页。

② 同上书，第 491 页。

那么，在把资产阶级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到社会主义国家手里以后，是不是会发生以国家的名义掌握社会财产的个人或集团化公为私的现象呢？这不仅在理论上来说是有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发生过。但是：

第一，通过这种途径所产生出来的，并不是原来的社会阶级以外的什么“新阶级”，而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那个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复辟；

第二，就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说，这不过是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暂时的曲折和反复，而丝毫不意味着整个历史进程由消灭阶级到重新产生阶级的倒转；

第三，更其重要的是，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把资产阶级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到社会主义国家手里以后，以国家的名义掌握社会财产的个人或集团化公为私的现象，从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能来说，也就是发生了由社会公仆到社会主宰的质变的问题。应当指出，对于这种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纪元的巴黎公社，就已经在自己短暂的革命实践中努力加以预防过，而马克思则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地总结过他们的宝贵经验。

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强调指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

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①。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措施，实际上，也就是防止以国家名义掌握社会财产的个人或集团化公为私的措施，也就是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措施。实践反复证明，只是在巴黎公社的这些原则遭到破坏的地方，才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德热拉斯所谓“国家所有权必然要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这是绝对无可逃避的命运”，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是把事物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却也完全有可能加以防止的支流，当作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作不可抗拒的主流了。

所以，资产阶级要想以德热拉斯的观点为依据，把阶级对抗的“永动机”安放进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去，这种企图显然是不能得逞的。

归结起来，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②。因此，把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局部上面的特殊表现，加以夸大，冒充为一般辩证法，硬套硬塞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去，套不上，塞不进，就叫嚷什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调和矛盾、停止辩证过程，叫嚷什么按照辩证法原理，不可能实现没有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种叫嚷本身就反映出叫嚷者的观点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

② 《哲学笔记》，第409页。

二、驳对立统一规律过时论

唯物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是个别，把个别冒充一般，到处乱套，那是不行的。但是，一般又是与个别相联结而存在的，一般辩证法、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却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借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而否定唯物辩证法及其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适用性，这同样是不成的。事情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①。

然而，在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把唯物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冒充为普遍性的东西，把它硬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又有一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否认唯物辩证法及其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否认马克思阐明的唯物辩证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马尔库兹就认为：

“没有任何马克思理论可以被有意义地称作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不论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的。没有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理论，因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的、对立的——辩证的法则是不适用于自由人类的历史的，并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而不能预先确定自由的法则。马克思理论也并不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以证明的趋向而去'预言'"(《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

而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打着社会主义社会特殊性的旗号,去否定唯物辩证法的普遍适用性,去篡改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和内容。

随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大搞社会帝国主义,苏联领导集团迫切需要有一种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编织成的假辩证法谬论,来为其路线提供理论根据。

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就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为割裂、歪曲乃至公开修正和篡改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而准备舆论,什么"必须看到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结构的变化"呀,什么要"阐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作用的新结构"呀,什么"必须注意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给客观世界诸矛盾方面和矛盾倾向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辩证法规律的发展所提供的新内容"呀,什么"正确地理解的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包括对立面的适应",而且"这一规律的这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呀,……在赫鲁晓夫集团的鼓励和支持下,要求篡改对立统一规律的反动思潮在苏联哲学界广泛泛滥开来。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以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捷潘年、哲学研究所所长乌克兰采夫、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主任罗任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博士图加林诺夫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哲学家,就破门而出,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这一根本规律进行全面的攻击、篡改和修正。

显然,斯捷潘年、乌克兰采夫、罗任、图加林诺夫等人的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未免过于露骨、过于愚蠢,而不适合于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去骗人的需要,因而,随着苏联领

导集团中由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换马，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举行的“现代唯物辩证法问题全苏讨论会”上，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间，苏共莫斯科市委讲师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举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讨论会上，以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费多谢耶夫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博士罗森塔尔为代表的另一些苏联哲学家，就对斯捷潘年等人的作法进行了点名批评和指责。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也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伟大的五十年》一文中，表态支持以费多谢耶夫、罗森塔尔为代表所宣扬的观点。

但是，正如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同谋者，勃列日涅夫推行的路线是赫鲁晓夫路线以更加狡猾的形式的继续那样，得到苏斯洛夫支持的费多谢耶夫、罗森塔尔等人的观点，同斯捷潘年等人的观点之争，在实际上，也正是如何以更加巧妙、更加狡猾的方式去修正唯物辩证法、修正对立统一规律之争，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哲学观点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互补充的。

在一九六五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一文中，费多谢耶夫一面叫嚷说：“‘对立面’、‘矛盾’、‘对立面统一’、‘对立面斗争’等等概念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着在质上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在争论中提出了许多方法论和逻辑的问题（关于矛盾的结构问题，它们的相互联系、矛盾和统一的关系等等）。但是，讨论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没有以对问题作出什么重大的科学探讨而告终；对现实的具体矛盾研究得很差，而在这里主要的则是对克服矛盾的途径和形式没有进行探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二期）。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争论的实质是：到底在诸如矛盾的结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等这样一些问题上，赤裸裸地去修正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呢，还是采取狡猾的手法，把这

种修正寓于“对现实的具体研究”之中，把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篡改，对于诸如对立面、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内容这些重要问题的篡改，隐蔽到“对克服矛盾的途径和形式的探讨”中去。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双方的哲学观点，在实际上是一种孪生的形式。

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在回顾这一场“争论”时，一方面指出：“在不久以前，存在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错误评价，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丧失了一切矛盾的社会”，另一方，他又号召苏联哲学家“客观地、科学地指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本质，去研究它们的具体表现，自然，不是企图把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为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科学和现时代》，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八期）。

真是好一个“不是企图把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为矛盾”！苏联哲学家们显然应当知道，不把发展的整个过程归结为矛盾的那种“矛盾”观，压根儿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观，而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为掩饰其形而上学而在需要的时候把“矛盾”的字眼搬出来点缀一下的矛盾观。

所以，勃列日涅夫亲信的这一号召，一语戳穿了苏联哲学界似乎已经重新承认矛盾的骗局。原来，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赤膊上阵地否认矛盾的客观实在性，从而撕掉了苏共领导集团假马克思主义伪装的笨拙手法；他们所提倡的，则是玩弄“矛盾”的字眼而阉割其实质，把矛盾同“发展的整个过程”割裂开来，以便打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的招牌去招摇撞骗。所以，尽管近年来，斯捷潘年一伙赤膊上阵地叫嚣对立统一规律过时论的观点，在苏联报刊上已经不再公开露面，但是，费多谢也夫一伙却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虚伪口号下，继续鼓吹着在实质上和斯捷潘年一伙的谬论相类似

的货色。

因此，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不仅要揭露和批判斯捷潘年这伙人修正和篡改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公开叫嚣，而且还必须深入到苏联哲学家们否认对立统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彻底批判他们的错误观点，而不论这种观点以斯捷潘年式的赤裸裸的方式出现，还是以费多谢耶夫式的狡猾、隐蔽的方式出现。

以斯捷潘年、乌克兰采夫、罗任、图加林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家们要求修正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借口之一，是说它只反映对抗性社会的特点，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过时。

乌克兰采夫说：

"辩证法的许多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对抗性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某些正确地反映了对抗性社会特点"的"公式"，如果"不加详细规定就不能反映社会主义辩证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载《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66 年莫斯科版)。

斯捷潘年说：

因为这些"公式很明显地不适应于上升的共产主义世界"，为此，就"应该""用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公式去代替过时的公式"(《揭露和克服矛盾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载《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66)。

那么，他们所谓"过时的公式"指的什么，又打算用什么"新公式"去代替它呢？

斯捷潘年回答说，他所谓过时的公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他要用来取代它的新公式则是"矛盾的方面和趋势的统一和斗争"：

"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规律是在概括一般对抗性社会形态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最尖锐的社会冲突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然要强调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公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和发展时期，我们应更多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另一些辩证法实质的公式”，它们“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适用于共产主义时代”；

接着，作为例证，斯捷潘年列举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述；列举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关于矛盾就是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成为发展的内因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冲突的定义，以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的实质，最主要的特点、特征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等论述；

据此，斯捷潘年得出结论说：“在关于辩证法根本规律的实质这些经典定义中，普遍适用的不是对立面的斗争，而是矛盾着的方面和趋势的斗争”，“可以完全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精神，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定义为‘矛盾的方面和趋势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或矛盾规律”，“这一公式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最普遍公式，它不仅适用于上升的共产主义的整个时代，而且也适合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内在内容，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内容”（《揭露和克服矛盾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1966）。

把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样的基本原理，说成是经典作家在概括对抗性社会形态、特别是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制定出来，只是反映了对抗性社会的特点而很明显地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说法起码是完全不顾客观事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反复强调：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

因而，“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的两个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因袭者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②。

然而，斯捷潘年等苏联哲学家们，却把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限制为只反映对抗性社会的特点，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都不适用，更不用说自然界和思维运动这样的领域了。这不赤裸裸地暴露了苏联哲学界的这些“通讯院士”、“博士”、“所长”、“主任”，尽管浑身贴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标签，却终究不过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的因袭者”吗?!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硬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塞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去，塞不进时就叫嚷马克思停止了辩证法的牢不可破的原则，苏联哲学家则借口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定出来的，因而就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种表面上看来似乎相反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却完全是一路货色：它们都把普遍和特殊先是混同起来继而又割裂开来，借口普遍是通过某一个特殊发生作用的，或者用这个特殊（如阶级对抗）去冒充普遍（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或者用另一个特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质）去否定普遍（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因而都是形而上学。

然而，问题并不到此就算结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② 同上书，第611页。

既然在斯捷潘年这伙人的心目中，由于有关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制订出来，反映对抗性社会的特点，因而就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为什么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同一个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制定出来，而且也同样反映了对抗性社会特点的有关同一个唯物辩证法实质及其核心的另一些论述，却被认为是“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适用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呢？区分这两类论述的客观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苏联哲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说明原因，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客观标准，因为这种划分和取舍纯粹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由于前一类论述提到“对立”，而后一类论述则提到“矛盾”，而他们所能容纳的却只是没有对立的“矛盾”，因而他们就把这两类论述割裂开来，对前者宣判死刑，而把后者加以歪曲，拿来当作他们修正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经典依据”。苏联哲学家们的这种作法，不是清楚地说明了他们修正和篡改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手法，不仅是形而上学的，而且还是唯心主义的，是“对我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式的吗?!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被斯捷潘年提出来作为修正和篡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由的三个“经典依据”。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辩证运动的实质的呢？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和蒲鲁东的辩证法的过程中论述这个问题的。

在那里，马克思首先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当作他思维中发生的一切，让理性作为正题把自己安置下来，让它自相对置地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是”和“非”，这两者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与“非”的相互转化和各自的自相对置。马克思揭露这种唯心主义思辨辩证法的矛盾融合论的实质说：“对

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销。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接着，马克思又进而考察“蒲鲁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情况：“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对此，马克思强调指出：

“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①。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他在谈到辩证运动的实质时，所提到的共存、斗争和最终转化为一个新范畴的“两个矛盾方面”，也就是两个“对置”着的“对立面”，无论是黑格尔的“是”与“否”也罢，无论是蒲鲁东的“好”与“坏”、“益处”与“坏处”也罢，都是“两个矛盾方面”，又都是两个“对置”着的“对立面”。

所以，斯捷潘年把马克思的这个关于辩证运动的实质的论述，说成是什么和“在最尖锐的社会冲突时期”“强调”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公式”相区别的，“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适用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另一些辩证法实质的公式”，纯属无稽之谈。试问：有什么根据说，“是”与“非”这样的对立面，只反映“对抗性社会”或“最尖锐的社会冲突”的特点，而不能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又有什么根据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这样“两个矛盾方面”，竟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145、146页。

面”？看来，斯捷潘年这位通讯院士，除了用胡话进行搪塞之外，是拿不出半点根据来的。

那么，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又是怎样“给矛盾下了最完整定义”的呢？

大家知道，在一九一八年所写《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并没有象斯捷潘年所说的那样，去给矛盾下个什么定义，而是在谈到辩证法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时，指出这种发展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发展的内因”①。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造成事物发展内因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同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列宁在前此三年即一九一五年所写《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②。

所以，作为事物发展内因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就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斯捷潘年把两者割裂开来，把前者当作否定、修正和篡改后者的“论据”，是毫无根据的。

至于用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关于“统一物之分为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② 《哲学笔记》，第407—408页。

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的论述为“依据”，去否定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就更加荒谬绝伦。

这是因为，正是列宁本人在同一年所写《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在谈到思维、感觉对于运动和任何概念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的时候，曾经明确指出：

“这里也有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①。

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这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或本质的论述，本来都是讲的一回事情，而不是两回事情，但是，斯捷潘年为了修正和篡改对立统一规律的需要，却硬要把它们说成截然相反的东西，这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

问题十分清楚，斯捷潘年一伙为他们所谓对立统一规律只反映对抗性社会特点、因而已经过时的“理论”所提出的论据，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驳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负荷由斗争转到统一论

以斯捷潘年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哲学家，要求修正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借口之二，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负荷已经由斗争转到统一。

斯捷潘年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各阶级社会、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辩证法的规律时，……与历史发展的实在进

① 《哲学笔记》，第 285 页。

程完全相适应，强调了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为《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1963年莫斯科版）一书所写序言）；

因此，“不能……把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公式同辩证法的实质、核心混为一谈，并且把这个公式搬到整个共产主义形态中来，……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未把这个公式称做辩证法实质和原理的表现”（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伏英诺夫、库兹涅佐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图加林诺夫说：

“如果承认上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可能有特点的话，那么这个特点首先在于，在这个规律中，‘重心’可以说是从一些范畴转到另一些范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个规律的作用的主要‘负荷’就越来越不是落到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的力量上，而是落到统一和相互渗透的力量上”（《辩证法规律在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的特点》，1963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版）。

乌克兰采夫走得更远，他公然把矛头指着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论述，叫嚷说：

“辩证统一的一般基础——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看来，未必能认为是易逝的，因为它是对立面本身的存在和实现对立面斗争的必须条件。因为对立面的互为依存是区别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的一切形式的基础，所以它是相对中的绝对因素”（《社会发展中的辩证统一形式》，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七期）。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发展历史上，明确阐明事物矛盾运动中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指出：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先是从矛盾的斗争存在于事物运动所采取的两种状态，即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矛盾双方共处于统一物中和统一物的分解的两种状态中，来展开对列宁论述的阐发；继而又从矛盾的东西所以具有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互相转化的同一性，就是因为具有一定的条件，而矛盾的斗争则无条件地、无所不在地贯串于过程的始终，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的方面，来阐发列宁的论述；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阐明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的关系在于：

“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又一次重申：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③。

从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有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就适用范围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原理时，是就其“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对于“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的意义来说的，就是说，是普遍

---

① 《哲学笔记》，第 40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07—30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2 页。

适用于自然界、人类历史和思维的各个领域的，而并没有把它局限在某一个领域之内，更没有把它局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阶段上。因此，斯捷潘年把它说成只同“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实在进程”相适应，而否认它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就具体内容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原理，所论述的，就是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所涉及的，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①。所以，斯捷潘年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未把它称作辩证法实质和原理的表现，不能把它和辩证法的实质、核心混为一谈的说法，同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原理，说明了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的和凝固不变的，而是有内在的矛盾在推动其发展，并不断地推陈出新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②。

因此，如果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这个相对绝对的关系颠倒过来，或者把二者说成都是绝对的东西，就必定把实际生活中生动的、可以转化的东西，变成僵死、凝固的东西而否定其变化发展。例如，象乌克兰采夫那样，鼓吹什么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是“对立面本身的存在和实现对立面斗争的必须条件”，把它说成“未必能认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② 同上书，第423页。

易逝的""相对中的绝对因素",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必然要打破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促使它们相互转化,那在实际上就是否定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象图加林诺夫那样,说什么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负荷就由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的力量上转到统一和相互渗透的力量上,那也是在否定事物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还有变化发展,这是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事物也仍然要通过矛盾和斗争,在斗争中旧的统一的分解和新的统一的建立来向前发展,而要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负荷果真转到了统一上面,这一切就无从谈起。

事情很清楚,斯捷潘年一伙为否定对立统一规律而提出的这个借口,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四、驳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平衡和谐论

以斯捷潘年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哲学家要求修正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借口之三,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平衡与和谐。

斯捷潘年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社会的统一、社会关系一切方面的和谐发展被坚定地提到首要地位"(为《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一书所写前言,1963);

罗任说:

"随着向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就确立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和谐的平衡的关系"。他抱怨把"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原理整个搬用到社会主义矛盾上去",因为"正是其各方面表现为不同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典型的和占统治地位

的”，据此，他提出了“就其内容而言是不同的、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辩证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辩证法”（《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问题》，载《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66）。

莫斯科大学附属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施特拉克斯跟着鼓吹这种“和谐和平衡的辩证法”。他说：

“新制度的性质在于，在辩证法规律的作用中破坏性的趋势的影响在这里总是从属于建设性的趋势”，“所以，必须把普遍规律对该社会制度所起的整个说来是建设性的作用的倾向，也列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一般特性”（《共产主义建设的辩证法》1968年莫斯科版）。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初期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鼓吹形而上学的均衡论以取代唯物辩证法时，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过程有一个开始，那么，显然在它开始以前，就还没有发生两种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在这一方面就存在着某种平衡。如果这个过程在某种结束，那就无疑不再存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且关于这些力量，某种新的平衡已经自行建立起来”（《生动经验的哲学》，彼得格勒—莫斯科1923年版）。

如果把引文中波格丹诺夫所说的“这个过程”，具体地规定为“阶级对抗”的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的过程”，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斯捷潘年一伙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的招牌所鼓吹的上面所引那套货色，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完全是几十年前波格丹诺夫宣扬过的形而上学的均衡论。

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统一，由于矛盾着的对立双方，其发展情况总是各不相同的、总是不平衡的，或有快慢之分，或有革新保守之别，因而，随着事物的发展，这种平衡就总要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

所以，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平衡是对不平衡说

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这种矛盾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矛盾不断地产生又解决，解决又产生，事物就是在这种平衡建立了又被打破，再建立再被打破中不断地发展前进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是没有条件的，是永久的，否则的话，事物就凝固不变而不能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平衡不平衡的这种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因为，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可以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经过国家计划去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就是说，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却并不因此而消失，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以后，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观规律，造成相对的平衡。但是，在发展中，这种平衡却总是要不断从局部到整体地被打破，从而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乃至作出新的平衡。

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①。

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发展被坚定地提到首位，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和谐的平衡的发展，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规律作用中的破坏性趋势从属于建设性趋势，什么矛盾不再表现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表现为不同力量和趋势，表现为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4页。

一的社会机体的各个不同的有内在联系的方面和趋势，斯捷潘年等人宣扬的这一切，说到底，无非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平衡已经成了绝对的、永恒的：往里看，没有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斗争，往前看，不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不会被不平衡所取代。于是，他们就用波格丹诺夫的均衡论编织了一个形而上学王国，去点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社会帝国主义。显然，他们鼓吹的这一套，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归结起来，斯捷潘年一伙修正和篡改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各种借口，无论是说对立统一规律只反映对抗性社会的特点，已经过时，无论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的负荷已经由斗争转到统一，也无论是说，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和谐与平衡，统统都是没有根据的。因此，这种种借口，所能证明的，就不是什么对立统一规律已经过时，什么对立统一规律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只是证明了这些苏联哲学家已经完全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已经形而上学化了。但是，要想用这一套彻底形而上学的货色，去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却适足以起到欲盖弥彰的作用罢了！

五、驳社会统一绝对论

“不是企图把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为矛盾”，苏联领导集团的这一纲领性的指示，对于苏联哲学家来说，首先意味着把矛盾从社会统一这个领域中排除出去，鼓吹所谓社会统一绝对论。

例如，施特拉克斯鼓吹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一切规律的作用是表现其社会统一”（在一九六五年“唯物辩证法讨论会”上的发言，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期）；

“社会的统一、合作和互助关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社会统一条件下辩证法的一般特性》，载《共产主义建设的辩证法》1968)。

另一些苏联哲学家则借口社会学范畴同哲学范畴有区别而否认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原理，可以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统一，而竭力宣扬社会统一的绝对性。

例如，全苏函授工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博士杜杰尔说：

“列宁关于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和斗争是绝对的这一阐明任何辩证矛盾两个方面的公式，丝毫不意味着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统一是相对的，它的性质是暂时的，而把哲学范畴和社会学范畴等同起来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矛盾和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统一》，载库尔桑诺夫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1973年莫斯科版)。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外国思想派别学术委员会主席、院士米丁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一个具体的非对抗性的内部矛盾中，对立方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还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统一也同样是相对的，即具有过渡的性质，因此，辩证法的这个规律适应着社会现象的特点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条件下，它的社会统一即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及知识分子的联盟也会存在——而这个统一即这个联盟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它是绝对的，指的是：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载《列宁和哲学的迫切问题》1971年莫斯科版)。

把社会统一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核心，又把这种社会统一说成处在辩证法关于统一相对性和斗争绝对性的原理之外，说成是绝对的，这哪里是在谈论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

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呢？不，这明明是在否认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用不着经过什么深刻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苏联哲学家鼓吹的这种社会统一绝对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蠢话。

这是因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在事物同一性问题上的分界线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同一性理解为相对的、有条件的、包含矛盾的，而形而上学则把同一性理解成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包含任何矛盾的。形而上学所理解的这种绝对同一性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它对现实的具体的同一性的一种歪曲罢了，因为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包含任何矛盾的同一就是等同，而“完全相同的东西甚至在自然界最简单的事物里也是没有的”①。

那么，把唯物辩证法关于同一的相对性原理应用到对社会统一的分析上去，这是不是象苏联哲学家们所说的，是“把社会学范畴同哲学范畴等同起来”呢？

不，因为唯物辩证法关于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原理，指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因而就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它应用到对于象社会统一这样的具体事物的分析中。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把社会学范畴同哲学范畴等同起来的问题，而只存在到底是把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挂在口头上，还是也要把它应用去观察社会实际生活的原则立场问题。

列宁曾经说过：

“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3页。

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①。

列宁所表述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这是因为，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是包含有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致，而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等同，这种一致要在不断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日益巩固和发展。反之，要是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那么，本来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发生对抗，而损害一致、破坏统一。

且以被米丁当作论证社会统一的绝对性的例证提出来的工农联盟来说吧。在事实上，这个统一根本不是什么绝对的，因为在这个统一中，包含着工农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如不加以正确处理，工农联盟就有破坏的危险。同时，这个统一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克服工农之间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矛盾的过程中，由一种质的水平到另一种更高级的质的水平地变化发展着的。

所以，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统一绝对论，同列宁在上述引文中所批驳的那种借口一致而抹煞人民内部阶级差别的谬论一样，也是一种幻想。

然而，苏联哲学家们却不仅宣扬这种幻想，而且还为了鼓吹这种幻想，而公然否认被列宁称作是辩证法的实质、本质、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的一分为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适用性。

苏联科学院哲学法学部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博士契尔特科夫说：

---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118页。

"谈到各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领域，则社会主义已将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从这个领域转移到局部利益、暂时利益的领域去了"(《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某些特点》，载《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66)。

米丁则说：

"整个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是统一的，它不被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个别现象和过程中，统一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是可能存在的"，就是说，只是"在这个社会统一体内，在它的个别部分、方面、因素间产生了非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载《列宁和哲学的迫切问题》1971)。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一分为二是不可抗拒地适用于一切领域、一切社会形态的客观规律，因为统一体总是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的，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分为二只存在于局部、暂时利益的领域、存在于个别部分、方面、因素间，而不存在于整个社会统一中，为什么各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领域就不是一分为二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哲学家们的答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某种生产关系的凝固化、同旧东西联系起来的阶级。因而，不是某些阶级主张改革，某些阶级反抗改革，而是所有集团都关心进步，关心克服旧东西，而且，矛盾的解决也不是对个别阶级和社会集团，而是对整个社会，对各个社会集团都有利。据此，苏联哲学家们引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立面斗争的实质在于不是为社会一部分人的利益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每个人的利益而斗争；另一个结论则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的利益不是不可调和的。

用苏联领导集团头目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这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形成了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在共同劳动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捍卫社会主义的战斗中，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尽管苏联领导集团及其御用哲学家们把他们幻想的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统一“仙山琼阁”描绘得如此之淋漓尽致，但它毕竟遮盖不住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

事实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决不是而且不可能是象苏联领导集团头目及其哲学家们描绘的这么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统一的“仙山琼阁”。

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也还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在原来的剥削阶级的成员中，还有极少数人会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抗，还会产生小量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而剥削阶级的影响则更是大量的。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就还会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会存在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还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总的说来，阶级斗争的面在逐步缩小，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又还会猖狂进攻。所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说一切都是阶级斗争，或把阶级斗争说成越来越尖锐，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这么一个基本事实，来考察苏联哲学家们的一些言论，什

么"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社会中不存在着把自己的利益同旧东西联系在一起，因而捍卫着这种东西的阶级，整个社会都关心克服旧东西"(索波列夫：《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克服途径》，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二期)，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既定生产关系的某种状态联系起来的阶级"，大家"都对保存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并使之永久化不感兴趣，相反，他们都关心经常不断的使它们完善，向共产主义前进"(契尔特科夫：《辩证法的核心》1963年莫斯科版)，……这不明明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而即使在劳动人民中间，也还存在有革新与保守、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矛盾斗争，总还存在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的人，也存在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事实上，即使在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在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乐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所以，即使到了那时，还会有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

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①。

对比之下，苏联哲学家们鼓吹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某些阶级主张改变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陈旧方面，而另一些阶级则反抗进步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社会集团都深切关心进步，关心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进"（费多谢耶夫：《共产主义与哲学》1971莫斯科版），鼓吹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矛盾的解决有利于""不是个别阶级或社会集团而是整个社会"（费多谢耶夫：《现代辩证法》1975年再版）……，苏联哲学家鼓吹这些东西，岂非蓄意在用仙山琼阁的梦呓去掩盖矛盾？

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对立面'斗争的实质只有一个：不是为社会一部分人的利益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每个人的利益而斗争"（乌克兰采夫：《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问题》，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

既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既然即使在劳动人民中间，也还存在着革新和保守、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矛盾斗争，那又怎么能够把这一切矛盾中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统统归结成为整个社会、为每个人的利益而斗争？

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没有象剥削社会里所具有的那种绝对性和不可逆性，在那里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例如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封建主、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不是这样"（米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几个问题》1971）。

事实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319页。

盾呢？矛盾只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之分，却并没有可调和同不可调和之别。即使是劳动人民中间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也不能通过调和矛盾双方去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充分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通过先进的人们用民主、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才能使矛盾获得解决，才能使社会前进。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在揭露海因岑复活那种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相对立的粗俗文学时，曾经说过：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①。

看来，苏联哲学家们为了掩盖矛盾，已经动用了一切武器，连这个被马克思批驳过的粗俗文学中的粗俗性格也调动起来了。他们鼓吹的这一整套梦呓式的社会统一绝对论，难道不正是粗俗文学中这种“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的“全部粗俗性格”的哲学表现吗?!

六、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基本矛盾论

苏联哲学家们鼓吹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说到底，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货真价实的矛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就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有基本矛盾。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学术界刚刚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2页。

开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位叫做克伦罗德的经济学博士出来竭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产生那种决定着其它一切矛盾的运动并通过所有其它矛盾而表现出来的矛盾"，"换句话说，分析一下，从方法论方面来看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范畴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如何理解这一范畴，就可以揭示某种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设想是不合乎规律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矛盾问题》，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二期）；

"构想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某种基本矛盾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的本身就没有科学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是一个新型的矛盾，在其体系中不存在着某种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及其解决的方法》，载《苏联共产主义建设问题》，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版）。

直到七十年代，苏联中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列则尔曼还在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根本不能按照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由产生到灭亡的道路的那种基本矛盾的类推法来提出并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问题"，"不要进行这类探讨，而要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的现实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三期）；

"把某种个别矛盾当作基本矛盾的那些论据都是十分不可靠的，应该以分析社会主义的现实矛盾来代替这一类公式"（《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1973年增订第二版）。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在存在有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的发展

过程中，必定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矛盾，是以构成该事物的决定条件为基础，表现着这些条件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因而同该事物的质分不开，在该事物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规定或影响其它矛盾存在和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基本矛盾。

显然，在有许多矛盾存在的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把这种基本矛盾划分出来，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来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对世界上和对国内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构成为党在国际国内总路线的出发点。

而社会主义社会既然也是一个存在有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其中自然也有其基本矛盾，把这种基本矛盾划分出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显然也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反之，克伦罗德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不会产生、不存在基本矛盾，所谓构想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种基本矛盾是不正确的，格列则尔曼所谓把个别矛盾作为基本矛盾的论据是十分不可靠的，所谓应以分析现实矛盾代替基本矛盾的划分等种种说法，在方法论上却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由许多矛盾组成的一切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都是错综复杂地作为对立的统一而相互作用着的，但是这种相互作用中的各方，其力量是各不相等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不相等、不相同，就是基本矛盾之区别于非基本矛盾的客观依据，就是从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划分出基本矛盾来的可靠依据，也是不能用对现实矛盾的分析去顶替基本矛盾划分的重要原因。

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总结了他长期研究的成果，经典地论证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所具有的决定一切的作用。以后，他又把这个

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其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写作。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指出马克思得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时"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于适合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①。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有力地说明了克伦罗德所谓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如何理解〔基本矛盾〕这一范畴，就可以揭示某种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设想是不合乎规律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分析"所"揭示"的恰好相反，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决定一切的基本矛盾，这才有可能科学地阐明由这种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有什么根据说，揭示这些决定着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基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18、120、1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本矛盾，反倒是“不合乎规律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也有力地说明了格列则尔曼把提出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说成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类推法的指责，完全颠倒了是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决定一切的作用时，一方面以“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背景，另方面，又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而毛泽东同志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时，也明确指出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在旧社会，其性质和情况根本不同。试问：在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去类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痕迹呢？不，这里所用的，并不是什么类推法，而是普遍和特殊相联结的分析法。一方面，根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各个时代中都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而把它们确定为贯串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另方面，又根据这些矛盾在旧社会和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作用时条件的不同，而指出它们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所以，无论从方法论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有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极其明显，无可否认。

那么，为什么苏联的一些哲学家、经济学家硬要强词夺理地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9 页。

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要通过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描绘成只是局部情况，只是暂时现象，特别是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据此而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部的种种矛盾。

例如，在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费多谢耶夫根据他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在全苏唯物辩证法讨论会上所作报告写成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一文中：

一方面，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的土壤”，虽然“在社会和反社会的犯罪分子之间，斗争带有对抗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

另一方面，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对抗性矛盾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在精神生活领域——从科学问题上的友好争论，直到同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和敌对思想的影响进行最尖锐的斗争；在社会关系领域——从同志的竞赛，直到坚决消除诸如官僚主义、犯罪、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生活的民主准则、压制批评、民族纠纷的残余这样一些反社会的现象；在经济领域——从个别企业中的失算到破坏国民经济中最适当的比例，从克服劳动的物质刺激制度中的缺点到防止投机和盗窃公共财产”（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四期）。

在这里，费多谢耶夫否认阶级对抗、对抗性矛盾的客观存在，是为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服务的；而承认上面罗列的那些矛盾的存在，则是为了在日益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强化苏联领导集团的专政和镇压服务的。

然而，伪善的外衣毕竟隐藏不住凶恶的本质，以致弄得捉襟见肘、破绽百出，这个矛盾甚至在费多谢耶夫的这段短短的文字中也暴露出来了：

郑 保卫

既然在“社会和反社会的犯罪分子之间，斗争带有对抗性质”，那又怎么能够把“坚决消除诸如官僚主义、犯罪……这样一些反社会的现象”，列为“多种多样的”“非对抗性矛盾”？这岂不是象费多谢耶夫自己在申斥别人时所说的那样：“把社会同凶手、强盗、小偷、公共财物贪污犯、祖国的叛徒看成是非对抗性矛盾”吗？

显然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小小的矛盾，后来，费多谢耶夫在把此文作为核心部分收进其题为《现代辩证法》的1975年增订第二版时，就作了一点小小的修改：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对抗性矛盾是多种多样的”一句，改为“社会主义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是极为多种多样的”。

就是说，在增订本中，把“非对抗性矛盾”改成了“矛盾”，也就是偷偷摸摸地承认在非对抗性矛盾之外，还有对抗性矛盾的存在，这算是堵住了漏洞。

但是，堤岸的另一边却决了口：既然现在，费多谢耶夫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对抗性矛盾在内的矛盾是极为多种多样的，那么，他所谓“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的土壤”，岂非成了梦呓？

于是，费多谢耶夫就再来一个小小的修改：

把“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的土壤”一句，改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对抗和与之相联系的对抗性矛盾的基础”。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对抗性矛盾，但它却不同阶级对抗相联系！

费多谢耶夫显然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成是社会同反社会分子的犯罪行为的斗争，就既能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又能血腥镇压反抗苏联领导集团统治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然而，费多谢耶夫“发明”的这个论据却一点也帮不了他的忙。

马克思早就指出：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只有“那些把法和法律看作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①。

在经济领域里存在着从投机、盗窃，一直到破坏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在政治领域里存在着压制批评、官僚主义、破坏法制、犯罪乃至民族纠纷；

在思想领域里，存在着资本主义残余和敌对思想的影响……。

仅仅从费多谢耶夫本人开列的这份清单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存在着的，绝不是什么不同阶级对抗相联系的“反社会的犯罪行为”而已。

费多谢耶夫把这样严重地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纠纷，说成是什么“守法公民与犯罪分子”之间的矛盾斗争，这除了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幻想家”，又能说明什么呢?!

七、驳差别不是矛盾论

苏联哲学家们否认矛盾普遍性的另一手法，便是宣扬差别不是矛盾论。

在这方面，做得最露骨的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罗任和图加林诺夫。

早在一九五七年，罗、图二人就合伙写文章鼓吹这种理论说：

“有时把任何差别都当作矛盾，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目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79 页。

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社会主义城市和社会主义乡村在生产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有差别，也不能认为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在客观上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的”（《论矛盾和动力》，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罗任在同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是哲学科学》（1957年列宁格勒大学版）一书中，又从感觉器官之间的关系上去论证差别不是矛盾论：

“毫无疑问，各个感觉器官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和内在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们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彼此相反的；……这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不同方面之间，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的作用相冲突，相反对的那些方面之间才存在着矛盾”。

而图加林诺夫则在几年以后出版的《辩证法规律在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的特点》（1963年列宁格勒大学版）一书中，进一步鼓吹说：

“差别的关系具有不同于对立和矛盾的特殊属性，……当具有差别的现象之间产生矛盾、互不相容的关系的时候，它们的差别就变成对立；相反地，当矛盾被扬弃（被克服）或者根本消失的时候，对立就变成差别”，“苏联最主要的社会关系（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现在已经不是矛盾（即使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正是差别，差别（而不是对立）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苏联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社会范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走着……从对立到差别，从差别到统一和融合”的道路。

正是从和罗任、图加林诺夫相同的这一思潮出发，苏联哲学界中，有人提议用“差别统一”去取代“对立统一”作为辩证法的核心

(见克伦罗德:《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及其解决的办法》,载《苏联共产主义建设问题》1958);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乌克兰采夫则创造了“熄灭着的矛盾”的概念去称呼这些差别,并说其特征是“不仅在不断地得到解决,而且逐渐消失而化为乌有”(乌克兰采夫等人合著:《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1963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

首先,应当强调指出,这种差别不是矛盾论,并不是苏联哲学家在五十、六十年代的新发现,而是他们对于早在二十、三十年代就已经破了产的资产阶级、老修正主义观点,特别是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和俄国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德波林的观点的抄袭和复活。

克鲁齐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缺点之一,就在于他认为辩证法的基础是概念的对立性、矛盾性,而不是其差别性。为此,他主张用差别论来取代矛盾对立论,用概念的差别和统一来顶替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作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辩证法无非是差别原则”(《关于我的哲学著作》);

“矛盾性只有在差别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所以,在精神的统一中,基本的东西是差别,差别和这种统一构成一个整体,这种统一的表现无非就是差别的过程。……相反地,黑格尔则紧紧抓住了纯粹的矛盾性,把它当作基础,把它变成现实的创造者;因此,他不了解精神及其形式的复杂的辩证法”(《逻辑是关于纯粹概念的科学》1928)。

德波林则否认矛盾贯串于事物、过程的始终,他把事物、过程的发展分为绝对同一、差别、对立、矛盾诸阶段:“差别”不是矛盾,即使在“对立”阶段上,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也还是静止的,只是到了“矛盾”阶段,才呈现出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的活动:

“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等同,经过差异和对立

而达到极端的矛盾——都过去了的时候，'解决矛盾'的时期就到来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

德波林还说什么，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的富农和贫农、中农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矛盾，公然为布哈林反党集团鼓吹阶级合作，鼓吹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供理论根据。

克鲁齐、德波林的观点，在出笼以后就受到了驳斥，特别是德波林，更其受到联共(布)的严厉批判。德波林派对唯物辩证法的修正和歪曲受到了系统的揭露，德波林本人也在一九三三年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科学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上的"最严重的错误"，他表示自己要、并号召其过去的追随者也要彻底抛弃错误。

但是，在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在苏联却立即掀起了一股为德波林翻案的妖风：从一九五四年起，苏联中央的理论刊物，哲学、历史的专业刊物就陆续发表德波林的文章；一九六一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德波林的《哲学与政治》论文集时，让德波林在序言中发表翻案声明，标榜自己五十多年来一直"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篇文章不是用来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并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同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举行集会给德波林八十岁生日祝寿，在会上，苏联领导集团授予他以政府最高奖赏——劳动红旗勋章，并在祝词中吹捧他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老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历史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一九六三年德波林死后，苏联领导集团又吹嘘"德波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天资和组织才能，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社会科学发展事业和干部教育"。

为什么苏联领导集团那么热衷于替德波林翻案？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要把他在二十、三十年代鼓吹过的差别不是矛盾的谬论，重新捡起来为他们现在推行的路线服务。

什么“差别的关系具有不同于对立和矛盾的特殊属性”，什么“把任何差别都当作矛盾，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什么工农之间的差别“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罗任、图加林诺夫在五十、六十年代鼓吹的这一堆东西，不正是克鲁齐、德波林在二十、三十年代贩卖过的那些否认矛盾贯串于事物、过程的始终，宣扬差别不是矛盾的破烂货色吗？

什么“在苏联社会，差别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范畴”，这不正是几十年前克鲁齐所谓“辩证法无非是差别原则”的差别是基础论的翻版吗？

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走着从对立到差别，从差别到统一和融合的道路”，这不正是德波林几十年前提出的那个“同一——差别——对立——矛盾”的次序颠倒了的图式吗？

什么用“差别统一”取代“对立统一”作为辩证法的核心，这不正是克鲁齐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干过的勾当吗？

然而，具有更大的讽刺意味的还在于，在今天的苏联哲学界中，鼓吹早在三十年代就被批判的德波林的谬论的，还有当年带头批判过德波林的米丁院士。

过去，米丁在批判德波林时说：

“在每一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辩证唯物论》）。

今天，米丁却捡起了被他批判过的德波林的谬论说：

“矛盾指的是成熟的已经完全形成的矛盾，……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形式，矛盾就是从普遍形式发展来的”；

米丁甚至叫嚷什么：

“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这样的“新的现象、新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苏共第二十二次

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任务》，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四期）。

然而，差别不是矛盾论的反动本质，却并没有因为苏联领导集团及其哲学家的这么一番丑恶表演，并没有因为他们给它贴上什么“辩证唯物主义”的标签而有丝毫的改变。

不，差别不是矛盾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差别也罢，对立也罢，它们所指的，都是现象内部的矛盾性，因而，在马克思的有些著作中，差别和对立是相互通用的。

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曾经说过：

“北和南是同一种本质的两种对立的规定，是同一种本质在高级发展阶段上的差别”，在这里，“差别是存在上的差别”，而在“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这样的对立规定之间，“则是各本质之间的差别，是两种本质的差别”①。

显然，要是把德波林的“同一——差别——对立——矛盾”的图式，把苏联哲学家们鹦鹉学舌地鼓吹的差别不是矛盾论，套用到这里，其荒谬性立即暴露无遗，因为谁都知道，北和南，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这些都是相互排斥的矛盾对立，而马克思却在同时又把它们称作为差别——“存在上的差别”和“本质间的差别”。这不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差别就是矛盾吗？

诚然，马克思在另一些著作中，也曾从发展阶段上谈论过差别、对立、矛盾的关系。

例如，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

“这种两重性的有区别的存在，一定发展为差别，差别又一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

发展为对立和矛盾”。

但是，只要把马克思的这段话同其上下文联系起来，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两重性的论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立即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这个论述，同德波林的那个“同一——差别——对立——矛盾”的图式毫无共同之点，因为德波林说的是矛盾只出现在事物发展过程的终末阶段，而马克思说的却是矛盾有一个展开和激化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同内在矛盾的内容发展相适应的，矛盾的外部表现形式的顺序阶段：

就内在矛盾的内容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在交换的最初阶段，劳动产品“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①，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商品的使用价值同它的交换价值分开，这就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这种两重性的有区别的存在，一定发展为差别”；交换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使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②，这就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差别又一定发展为对立”，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外部对立的尖锐化，发展到使商品的这种运动和转化暂时停止的程度，于是危机来到，矛盾以不可遏止的力量爆发出来。

所以，事情很清楚，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上引那段话，所表述的是矛盾外部表现的不同形式的顺序阶段，从而证明了差别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有力地驳斥了差别不是矛盾的谬论。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6页。

了阶级斗争理论这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够在看来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时，曾经指出：

其所以在“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①。

列宁在这里揭示了各阶级意向上的矛盾，同他们在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方面的不同的相互关系，从而，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差别即矛盾的道理。

为什么各阶级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的意向就矛盾？原因在于，所谓差别就是并非同一的东西的统一，这些互不同一的各方，又处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因而就必定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斗争。

正因为这样，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又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同一个道理：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发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②。

毛泽东同志则在《矛盾论》中，在批判德波林派所谓差别不是矛盾的谬论时，进一步展开了差别即矛盾论的各个方面：

德波林学派否认矛盾在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

② 《哲学笔记》，第96页。

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劳资两阶级发生时，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尚未激化的矛盾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之间的差异，是不会激化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形态的矛盾的论述，关于这些差异同以其它形式出现的矛盾相比，是矛盾的差别性、而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的论述，从矛盾的发展阶段上和矛盾的性质上，从矛盾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实质的统一性上，精辟地说明了差异就是矛盾的道理。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这些论述作武器，来剖析苏联哲学家关于差异不是矛盾的叫嚷，就立刻可以发现他们所施展的诡辩伎俩，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否认差异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否认差异的内在发生就是矛盾斗争的客观逻辑，就是把矛盾的一种性质、一个发展阶段、一种表现形式加以绝对化，奉为矛盾的唯一实质，而否认表现为差异的矛盾，也是矛盾，它同矛盾的其它性质、其它发展阶段、其它表现形式的关系，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而并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

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曾经说过：

"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82页。

立。"①。

而在苏联哲学家那里，我们所看到的却刚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修正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本能恰恰在于冲淡、掩盖和否认差别的矛盾对立本质。

什么"把任何差别都当作矛盾，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差别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别的姑且不说，试问，当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不能满足集体农民对于农业机械的迫切需要，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因而不能满足工业对于粮食和原料的需要时，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工农差别"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或者"已经不是矛盾（即使是非对抗性矛盾）"呢？又如，当着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教育和帮助集体农民继续克服小生产者固有的特点和倾向时，有什么根据说这只是差异而不是矛盾，有什么根据说这"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或者"已经不是矛盾（即使是非对抗性矛盾）"呢？

硬把表现工农、城乡之间差异的这些活生生的矛盾，说成"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或者"已经不是矛盾"，这不是在冲淡、掩盖和否认差异的矛盾对立本质，又是什么?!

什么"各个感觉器官之间只有差别而不相互矛盾"，当着各个感觉器官由于自己的局限性而只能触及事物的这些或那些现象，只能触及现象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而不能综观全局、深入本质，因而发生不一致时，这岂不就突出地暴露出了各个感觉器官之间的矛盾了吗？俗话所说"耳闻不如目睹"、"百闻不如一见"，就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耳与目之间的矛盾。所谓各种感觉器官之间只有差别而不相互矛盾，纯属无稽之谈。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苏联哲学家鼓吹的差别不是矛盾论，

---

① 《哲学笔记》，第 149 页。

不仅在历史上有其渊源，就是在当前，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一股用差别去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的国际资产阶级思潮的一种表现。例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中，颇为流行的社会层理论，其理论基础就是把对立阶级说成是没有对立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差别论”。同样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谋士们在鼓吹国际范围内的阶级调和时，也总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说成不是对立、而是有“差别”的经济结构的。所谓差别不是矛盾论，现在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掩盖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烟幕弹。

八、驳矛盾未必对立论

苏联哲学家们否认矛盾普遍性的又一个手法，便是在字面上承认矛盾的幌子之下，阉割和否定矛盾的实质，使之成为名存而实亡的空壳子。

而使矛盾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子，又还有两种办法，其中之一，便是鼓吹矛盾未必对立论，即否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矛盾双方仍然是互相对立的。

鼓吹矛盾未必对立论的主要代表，是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斯捷潘年，他把它当作公开要求修正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理论根据”。

早在六十年代初，斯捷潘年就鼓吹说：

“生活本身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矛盾，但并不是社会对立。任何对立都是矛盾，但是并不是任何矛盾都是对立。强调指出这一个原理，对于正确理解共产主义时代在辩证法基本规律表现形式变化上所提供的新情况，是很重要的”，“社会分裂为各种互相排斥的社会对立面，这是一切阶级社会形态的特征。对

立的对抗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最深刻和根本的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具有社会对立，对抗性的形式。没有社会对立，这是新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

斯捷潘年在举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例来论证其“矛盾未必对立”的理论时，一方面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关系中的矛盾”，另方面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乃是既有统一又有差别的历史上两种公有制的新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而是同一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两个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方面。在这种统一的范围内它们又在成熟程度上，在公有化的水平上，在发展的速度上，以及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的计划和职能的特点上具有差别”（《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1960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见该书第一章第二节《社会统一在克服现实矛盾的基础上的不断巩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在一九六五年四月的“现代唯物辩证法问题全苏讨论会”上，斯捷潘年重复鼓吹其“矛盾未必对立”论说：

“把关于统一物分为相互排斥的社会对立面的旧公式重复应用于新社会，这就意味着使旧公式永恒化，看不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发展的新的社会内容”，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阶级斗争时期，矛盾才具有社会对立的性质。而在社会关系中，除去社会对立就没有别的对立。随着社会对立的消失，所剩下来的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见，一切对立都是矛盾，但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对立。在对抗性社会形态条件下，社会矛盾具有社会对立的性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则是另一回事”（《揭露和克服矛盾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载《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66）。

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期间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讨论会”上，斯捷潘年又一次兜售其“矛盾未必对立”论说：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不仅是产生新型的统一，而且产生新型的矛盾。如果说任何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具有相互排斥的社会对立面的性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非对抗性矛盾则具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差别的性质”，“这些非对抗性矛盾不是通过社会对立面的冲突所特有的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得到克服的，而是在矛盾着的趋势的统一和斗争的基础上得到克服的，这种统一和斗争保证着统一社会机体的那些有内在联系的方面相互转化”（引自伏英诺夫、库兹涅佐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讨论会的报道）》，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斯捷潘年鼓吹的这种矛盾未必对立论，在其它的苏联哲学家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非对抗性矛盾的特征的论述中，也有相类似的表现。

例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乌克兰采夫认为：

“非对抗性矛盾是产生于社会的社会统一中而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非主要倾向的某些分析中的那些矛盾”（《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1963）。

莫斯科大学的施特拉克斯认为：

“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矛盾的起初阶段也是差别”，“这种矛盾的发展阶段（矛盾正是在这一阶段得到克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本质差别而不是对立”，因为“社会的社会统一意味着：矛盾的极其尖锐状态——对立、特别是冲突在根本的社会关系方面失去了客观的基础”（《社会统一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1966）。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罗森塔尔也说：

“如果对抗性矛盾是导向极化的”，“那么在非对抗性矛盾的运动中这种转变为对立面极化的现象就没有客观的必然性”，“对立的趋向只能是不正确的行动和错误政策的结果”（《列宁和辩证法》，1963年莫斯科版）。

把斯捷潘年等苏联哲学家在鼓吹矛盾未必对立论时所提出的上述论据归结起来，无非是说：

第一，只有在阶级对抗社会，社会才分裂为互相排斥的社会对立面，从而才有社会对立，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旧公式已经不适用了，因而也就没有社会对立了；

第二，在社会关系中，除了社会对立之外，是没有别的对立的，因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也就不再有对立了；

第三，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还留下非对抗性矛盾，但是，在这种矛盾中，矛盾双方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而只有本质和非本质差别的性质，只表现为非主要倾向的某些分歧，一是因为相互排斥是社会对立的冲突所特有的，二是因为在这时，对立、对立面的极化已失去客观基础、必然性，对立趋向只能是由不正确行动和错误政策所人为地导致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论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一分为二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现象，是辩证法的实质，因而把一分为二这样那样地说成是只有在阶级对抗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反辩证法的。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为什么说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的实质呢？

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一个过程，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又相联系又相斗争而得到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

为互相斗争的两个对立物的。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①。

所以，象斯捷潘年那样，把一分为二在某种具体条件下所具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即把一分为二在阶级对抗社会所具有的特定内容和形式，加以绝对化，把它说成是一分为二在一切条件下的唯一内容和形式，接着就据此而把一分为二说成是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旧公式，这种作法，从观点到方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总要分解为相互斗争的对立物，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普遍地适用的，不论在阶级对抗社会，还是在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普遍地适用的。至于一个具体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以什么形式进行分解，分解为具有什么内容的对立物，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阶级对抗社会，一分为二首先表现为阶级的分裂，社会分裂为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封建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分为二是否不再适用了呢？不，还是适用的。虽然到了那个时候，社会已经不再分裂为阶级，但还是要分解为诸如先进和落后、革新和保守这样的对立物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①；

什么只有阶级对抗社会，社会才分裂为互相排斥的社会对立面，才有社会对立，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旧公式已经不适用，已经没有社会对立，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这种胡言所包含的诡辩，在于把只有在阶级对抗社会，社会才分裂为阶级这个符合事实的正确命题，同只有在阶级对抗社会，社会才一分为二、才有对立物这么一个反辩证法的荒谬命题混淆起来，用后者去偷换和取代前者了。

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非对抗性矛盾的双方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因为在这时，对立、对立面的极化已失去客观基础和必然性，对立趋向只能是不正确行动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这种胡言乱语完全把对立同阶级对抗混淆了起来，因为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虽然非对抗性矛盾的双方，并不是作为敌对阶级的双方互相对抗着，却仍然作为对立面而相互排斥着。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②。

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斗争，这种不同一性，和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同一性一样，是任何矛盾的必备因素，无此就不成其为矛盾。

尽管这种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具体形式，因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02、303页。

的性质和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不论什么矛盾，只有当双方互相对立、排斥、斗争而又互相依存、转化时，才成其为矛盾。

试问，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非对抗性矛盾之中，对立、对立面的极化怎么会失去客观基础和客观必然性，成了只能是由不正确行动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呢？反之，要是事情果真发展到没有了对立，哪还能有什么矛盾存在呢？这样一来，所谓的“非对抗性矛盾”，岂非成了非对立的矛盾，从而压根儿就不再是什么矛盾了吗？苏联哲学家们玩的这套把戏，不是挖心战术，把矛盾掏成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壳壳，又是什么?!

什么非对抗性矛盾的双方只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差别的性质，只表现为非主要倾向的某些分歧，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这种观点所暴露出来的，实际上还是“差别不是矛盾”那种谬论的流毒。这是因为不论是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差别也罢，还是主要的或非主要的倾向的某些分歧也罢，哪里有差别，哪里有分歧，那里就有“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那里就有“对立的规定”，从而那里就有差别、分歧双方之间的对立斗争。

谓予不信，且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被斯捷潘年当作矛盾未必对立论的例证举出来的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斯捷潘年认为，社会主义的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只是在成熟程度、公有化水平、发展速度、计划和职能的特点上有所差别，而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然而，事实却是，它们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就包含了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化水平”不同，这就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能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但是，在另一方面，工业和农业这两者，又在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少粮食、原料和多大的市场，工业能够为农业提供多少化肥、农药、农业

机械和日用轻工业品等各个方面密切联系着。对于这样两个千丝万缕地密切联系着的生产部门，由于其公有化水平不同，致使工业可以在全国统一生产和分配，而农业却只能在一个一个集体的范围内，而不能完全在全国统一的范围内进行生产和分配，这两者之间怎么能没有矛盾呢？怎么能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呢？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不仅是这两种形式的所有制的矛盾，在实际上还是工农之间的矛盾，由于在私有经济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集体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特点，这就给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了教育和引导农民的经常性任务，而这种教育和引导，也就是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虽然这种斗争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列宁在研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时，曾经写道：

“（1）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及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传统的任何重现和复辟）。

（2）对无产者以外的一切劳动者给予经常的指导性影响，（同样等于斗争，然而是一种特殊的斗争；也是克服一定的反抗，然而却是完全另一种反抗和完全另一种克服）”①。

看，列宁把问题说得何等的透彻！

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相比较，无产阶级专政给予包括农民在内的其它劳动者以经常的指导性影响，“同样等于斗争”，“也是克服一定的反抗”，这两句话讲的是在对抗性矛盾和非

---

① 《列宁文集》第3卷，俄文版，第494页。

对抗性矛盾中，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都普遍地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是互相排斥、对立、斗争的有无问题。

"然而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却是完全另一种反抗和完全另一种克服"，这两句话讲的是在非对抗性矛盾中，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具体情况不同于对抗性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解决的是在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中，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排斥、对立、斗争的差别性问题。

在这里，也象在其它地方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把普遍同特殊相互联结起来考察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用事情的一个方面去抹煞和否定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的。而斯捷潘年等苏联哲学家们，却只见社会主义的两种形式的所有制之间的差别，而否认它们也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则显然是一种用矛盾对立的特殊性去否定矛盾对立的普遍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完全背离唯物辩证法的。

九、驳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

然而，阉割和否定矛盾的实质，使之成为名存而实亡的空壳子的另一种更加狡猾而隐蔽的办法，却是鼓吹所谓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

所谓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一方面，在口头上不仅承认矛盾，而且承认矛盾双方是对立的，而在另一方面，又把矛盾双方的发展倾向说成是共同、一致、符合乃至合谐的，否认它们是矛盾对立的、不一致的。

苏联哲学家把这种所谓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当作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把它吹得神乎其神，有的说这是"新型的对立"，有的说这是"对立面的特殊同一"，有的则说这是"对立统一的特殊形式"，

也有的说这“改变了统一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逐个考察一下所谓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的鼓吹者们所提出的各个主要论据和例证吧。

在一九六一年苏联领导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抛出其纲领以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博士罗森塔尔就把它提到相应的哲学高度，炮制了一种所谓对立朝同一个方向工作的谬论：

“尽管这些和那些倾向就某种意义说是对立面，但它们同样都是进步的，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共产主义方向‘工作’的”(《从苏共纲领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迫切问题》，载苏联《政治自修》杂志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

过了二年以后，罗森塔尔又在《列宁和辩证法》(1963年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一书中，进一步展开了对这种谬论的论证：

“由于任何一种矛盾的复杂联系和互相交错，对立面的趋向和方面不仅是互相对立着，并且也能够暂时地互相适合、融合、朝着同一方向行动”；

“第一，对立面的每一方自身都包含着不同的矛盾，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绝对‘纯粹的’对立面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完全同一的对立面的方面是不存在的。就其对另一个对立面而言，它或多或少是同一的，但对它本身来说，它不是‘纯粹的’和同一的。

“第二，不论在社会内或在自然界内，只有两个对立面出现并互相斗争着的这样一种‘活动范围’是没有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甚至于互相进行着斗争的两个基本的对立方面和趋向，跟许多其他的矛盾和对立面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因而不同的对立面虽

然还是对立面，也能够在各自的行动上互相适应，它们的不同趋向能够联合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而‘进行工作’”；

所以，虽然“对立面依然还是对立面，以及依然会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同时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的趋向是可以适合、可以‘联合’的”。

作为例证，罗森塔尔援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论述，加以引申和发挥说：

“在无产阶级国家所容许并处在它的监督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尽管它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却是循着增加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向活动的”，所以，“象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对立要素和方面在其趋向上是相适合的，它们两者都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增长，国家对经济监督过程的加强，而这是同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性和杂乱无章的态度相反的”。

罗森塔尔所鼓吹的这种所谓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论，是一种在口头上承认矛盾对立、在实际上却否认对立、取消矛盾的典型谬论。

事实是，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这才成为矛盾，成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反之，要是矛盾双方果真象罗森塔尔所说的那样倾向一致，“朝着同一个方向工作”，那就不再具备不同一性，就不再成为矛盾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又哪里还有什么对立呢？

（一）矛盾的错综复杂，并不使对立双方朝同一方向行动

罗森塔尔援引矛盾的复杂联系和互相交错来说明对立面的趋向不仅互相对立，而且朝同一方向行动。然而，矛盾的复杂联系和互相交错却并不说明对立双方是朝同一方向行动的，而只是说明

罗森塔尔为了虚构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而诡辩地把处在复杂联系中的矛盾双方，在不同方面的关系混淆不清，纠缠到一起去了。

不错，在矛盾的复杂联系和互相交错中，一个矛盾中的对立双方，往往又作为另一个矛盾中的一方，而与另一方相对立；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甚至利害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

那么，一个矛盾中的对立双方组成为另一个矛盾中的一方，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联合起来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这是不是说明矛盾双方倾向一致，说明对立面不仅互相对立，而且朝一个方向行动呢？

不，丝毫也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因为，一个矛盾中的对立双方，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又作为另一个矛盾中的一方，而与另一方相对立，但却并不因此而停止其作为一个矛盾中的对立双方，也并不因此使这个对立的双方不再对立而朝着同一个方向去行动。至于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在为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之后，也并不因此而停止其阶级利害上的根本冲突，也并不因此而使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变成什么发展倾向、朝同一个方向工作。

例如，在我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把若干其它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也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矛盾、政治集团间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成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34页。